

编者按:

鲁枢元先生被学术界公认为“中国新时期文艺心理学学科的创建者和代表者之一”,自1980年代末,他已开始关注生态环境及精神生态问题,把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看作一个有机完整的系统进行研究,在生态文艺、生态文化诸领域有许多开拓性成果,继《陶渊明的幽灵》之后,其新著《天地之中说聊斋》,为中国生态文化批评提供了又一跨学科研究的范例,亦为我们提供了在现代生态视野中重读并激活经典文本的新路径。

本刊特邀青年学者段晓琳和朱鹏杰博士,对鲁枢元先生的学术生涯进行系统梳理、反思和评价,以期对当今学界有所借鉴或启示。

段晓琳博士在翔实严谨的资料梳理中,在当代文学史的背景中,发现“向内转”不仅是鲁枢元1980年代文艺研究的“关键词”,也是贯穿于鲁枢元整个学术生涯的“关键词”,体现了鲁枢元文艺思想的精神底色和学术研究的总体向度;并总结出鲁枢元的文学批评与文艺研究风格:鲜明的学术主体性,敏锐的思想感悟力,自觉的学科建设精神,强烈的先锋气质,开创进取的理论勇气和深厚的人文主义情怀。

朱鹏杰博士系统梳理了鲁枢元先生三十多年来的生态文化批评历程,结合《天地之中说聊斋》这部新著,总结出鲁枢元先生独特的生态文化批评范式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精神生态的思考与拓展,中国传统智慧的思考与借鉴,乡土价值的发现与重构,绿色话语的构思与实践。这种建立在精神生态、乡土思考、传统文化和绿色话语之上的研究范式,推动了中国当代生态文化研究。朱鹏杰博士的文章,亦旨在寻找一种中国生态学者的思想逻辑和思想贡献,在世界生态批评场域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

“向内转”:鲁枢元1980年代文艺研究关键词

段晓琳

(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青岛266100)

摘要:“向内转”是鲁枢元1980年代文艺研究的“关键词”。“向内转”、创作心理研究与文艺心理学学科建设是鲁枢元1980年代学术研究的重心。鲁枢元1980年代中后期的文学言语学研究与精神生态研究也生发于文艺心理学研究,具有强烈的精神性、内向性与主体性色彩。虽然文学与心理学、文学与语言学、文学与生态学的跨界研究,分属于鲁枢元不同阶段、不同领域的文艺研究,但三者之间具有血脉联系和思想共性,即鲁枢元一以贯之对精神、心灵与内宇宙格外关注。因此“向内转”不仅是鲁枢元1980年代文艺研究的“关键词”,也是贯穿于鲁枢元整个学术生涯的“关键词”,体现了鲁枢元文艺思想的精神底色和学术研究的总体向度。

关键词:鲁枢元;“向内转”;文艺心理学;文学言语学;精神生态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3.04.001

中图分类号:I206;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3)04-0001-09

从1980年代初期对作家创作心理的研究,到当下生态批评与生态美学研究,鲁枢元的治学之路已

收稿日期:2023-04-20

基金项目:中国海洋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项目“新时期文学批评‘向内转’问题研究”(202113021)

作者简介:段晓琳(1989—),女,山东莱芜人,文学博士,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经走过了四十余年。总体来看,鲁枢元的学术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文学与心理学、文学与语言学、文学与生态学的“跨界研究”。从1980年代初的文艺心理学研究到1980年代后期的文学言语学研究,再到1990年代的精神生态学研究和新世纪以来的生态文艺学研究与生态文化批评,鲁枢元的学术研究呈现出了明显的阶段性特点。而且,在这三种“跨界研究”之间,还存在着血脉相连、密不可分的关系:创作心理研究是鲁枢元的学术起点,创作心理研究与“文艺心理学”学科建设奠定了鲁枢元学术研究的基础,也确立了鲁枢元在1980年代新潮学界的学术地位。而创作心理研究又促使鲁枢元关注并探索文学创作过程中的言语活动,进而由创作心理研究生发出文学言语学研究。由文学语言问题,他又进一步关注到人的精神问题,尤其是现代人的精神状况,进而由文艺心理学与文学言语学研究又生发出精神生态研究与生态文艺学研究。可见,鲁枢元的文艺心理学、文学言语学与精神生态学研究三者之间具有一脉相承的思想共性与学术追求,即一以贯之地对精神、心灵与内宇宙的格外关注。这种研究向度可以借用他的学术术语“向内转”来凝缩概括。“向内转”不仅是鲁枢元1980年代文艺研究的“关键词”,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关键词”,更是贯穿鲁枢元整个学术生涯的“关键词”。“向内转”所具有的强烈的精神性、内向性与主体性色彩体现了鲁枢元文艺思想的精神底色、文学批评的个性特质和学术研究的总体向度。

一、新时期文学“向内转”与鲁枢元的“向内转”

“向内转”是鲁枢元1980年代文艺研究的“关键词”,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关键词”。关于新时期文学“向内转”的讨论,从1980年代中后期一直延续到1990年代,是一场旷日持久、规模可观、反响相当强烈的文坛论争。1986年10月18日,《文艺报》发表了鲁枢元的《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该文标志着新时期文学“向内转”论的正式提出,鲁枢元因此成为“向内转”的“首义者”^[14]。1987年6月20日,《文艺报》发表周崇坡的文章《新时期文学要警惕进一步“向内转”》,自此拉开了关于新时期文学“向内转”的论争。“向内转”论争,是1987年中国文艺界讨论参与度高、争鸣声势浩大、持续时间长且影响深远的一场文坛论争。从1986年至1991年,《文艺报》《文艺理论研究》《文艺争鸣》《争鸣》《外国文学评论》《南方文坛》《作家》《人民日报》等报刊接连发表文章,对“向内转”问题进

行了热烈的讨论与批评。也正是在1980年代与1990年代的文学论争与术语使用中,“向内转”的语义与内涵发生了变化。总体来看,作为一个从西方现代文论借用而来的术语,“向内转”在用于描述中国新时期文学创作特征与发展动势时,发生了语义的接受与变异。

经过1980、1990年代的论争与沉淀,中国当代理论批评界所使用的“向内转”术语主要有以下两层内涵:“(1)转向主体/心理。指文学创作转向表现内心世界;理论批评转向文学主体研究,尤其是包括创作心理研究在内的文艺心理学、精神分析批评等。(2)转向本体/形式。指文学创作中文学本体意识的觉醒,包括形式自觉与文体自觉等;文学研究转向文学本体研究、文学‘内部研究’,也包括文学批评与文艺美学的学科独立与自主建设等。”^[2]同时,从1980年代的文学现场来看,鲁枢元的“向内转”论,与1980年代的“现代派”“主体性”“文学本体论”等文学思潮密切相关。如果从宏阔的思潮史、批评史或文艺学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向内转”与“现代派”“主体性”“文学本体论”等思潮及其相关的文艺心理学、形式批评、批评主体性与批评本体性、“纯文学”等重要问题,也都属于1980年代文学和理论批评整体“向内转”的重要内容。因此,由鲁枢元“首义”的“向内转”,既是对新时期文学现象的一种概括与总结,其本身也是1980年代文学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相较于后期“向内转”术语所具有的丰富内涵,鲁枢元的“向内转”论在提出时更接近于一种纯粹的、立足于文艺心理学基础上的“直觉感悟”:“我凭靠的只是一种直觉,一种对于1980年代初期中国文学创作状况的感悟”^{[3]87}。但事实上,鲁枢元对新时期文学“向内转”问题的思考由来已久。1983年,鲁枢元的《审美主体与艺术创造》发表于《文艺报》1983年第5期。在该文中,鲁枢元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对艺术家在作品中表露自己精神面貌的权力予以肯定,并用了整整一节的篇幅为新时期文坛的“写心灵”趋势辩护。鲁枢元认为“写心灵”已经在新时期文坛上形成了一股“奔突腾跃的潮头”,推动着文艺创作向前发展。在鲁枢元看来,“写心灵”是一个既体现创作深度,又体现创作广度的艺术原则,而新时期出现的“写心灵”创作潮头,不仅是对中外文艺创作传统的一种继承和发展,更是新时期文学内部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审美主体与艺术创造》中的主要观点已经明确预示了鲁枢元新时期文学“向内转”论的形成,如果将“写心灵”替换为

“向内转”，则该文的部分内容可以与《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中的部分表述相重合。1985年出版的《创作心理研究》是鲁枢元文艺心理学研究的第一部著作，汇集了鲁枢元1985年以前的创作心理研究文章。其中在《文学创作中的微观、中观、宏观境界》一文中，鲁枢元明确谈到了新时期文学创作的“新的‘势头’”^{[4]132}，该“势头”以邓刚的《迷人的海》、张承志《北方的河》和张贤亮的《绿化树》等为代表，表现出了创作中宏观、中观、微观境界的结合以及哲理性、故事性、情绪性的通体交融。而且，在《文学艺术家的感情积累》《艺术创造中的变形》《深入生活内外谈》等文章中，鲁枢元也已经开始讨论主体的“内”与“外”和文艺创造的“内”与“外”问题。可见，对新时期文学“向内转”问题的思考，是贯穿于鲁枢元1980年代前期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正是这些已有研究为鲁枢元“向内转”论的正式提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鲁枢元大约从1984年底开始频繁提及“向内转”。1984年12月11日，杭州会议前夕，上海市作协召开小型见面会，会上鲁枢元“与李陀谈及文学的向内转现象”^{[5]125}。12月13日杭州会议上，鲁枢元“继之讲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5]127}。鲁枢元的杭州会议发言被周介人扼要总结为：“研究人物的心理环境比研究物理环境更为紧要，当代文学正在‘向内走’。”^[6]这是鲁枢元第一次明确谈到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1985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在北戴河举办文艺学方法论研讨班，正是在本次讲学的讲稿《文学心理观》中，鲁枢元正式将“向内转”看作是新时期文学的整体创作动势：“从心理学的眼光看来，我国新时期文学的一个带有整体性的趋势，一个带有鲜明时代气息的流向，是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向内转’。”^[7]而且鲁枢元认为这种趋势突出地表现在“三无”小说、“朦胧诗”、“寻根文学”等新潮创作以及文学批评与文艺研究所体现出的“主体意识”中。1986年4月，鲁枢元在本月写就的《黄土地上的视觉革命》中还谈到了新时期美术界审美视野的内移，这同样是一种“向内转”，且与文学的“向内转”相类相通。鲁枢元认为新时期画坛的审美视野发生了由“外向”到“内向”的转移，美术创作转向追求艺术的心理性、精神性、表现性与创造性。同月，鲁枢元在“全国第一次中外文艺理论信息交流会”上做题为“新时期文学与心理学”的发言，该发言稿就是《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的未删节原版，鲁枢元在日记中称之为“‘向内转’一文”^{[5]148}。该讲稿认为，文学“向内转”

不仅是西方20世纪文学的整体趋势，也是中国1980年代文坛的突出现象，正因为小说、诗歌乃至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中都发生了文学的“向内转”，所以新时期文学与文艺研究特别需要“心理学”。1986年9月7日，鲁枢元参加“新时期文学十年学术讨论会”，并做题为“心理学与文学观念的变迁”的会议发言，在发言中鲁枢元不仅重申“向内转”是新时期文学的整体动势，而且还强调随着文学“向内转”与心理学的兴旺发展，文学与心理学之间也发生了相互渗透与相互影响，而这正是新时期文艺心理学再度崛起的重要背景。

1986年10月18日，《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发表于《文艺报》。这是鲁枢元“向内转”论的正式提出，也正是这篇文章引起了文坛的持久论争，让“向内转”成为了1980年代文学思潮中的重要一脉。在该文中，鲁枢元认为“向内转”不仅是整个西方文艺从19世纪向20世纪过渡时的主导趋势，而且也是新时期文学“自生自发、难以遏止的趋势”。新时期文学表现的重心发生了由外部世界转向内心世界的“向内转”，表现出了强烈的情绪性、心理性等内向化特征。不仅“三无小说”“朦胧诗”等最活跃的“极端现象”彰显了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倾向，而且在军事题材、改革题材等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中，也发生了“向内转”的倾斜与位移。正是对内心冲突与内心世界的关注，让“内向化”的文学观成了新时期审美意识中的一个“主要因素”。而且，通过对世界现代文学与中国新文学发展历程的梳理考察，鲁枢元认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不仅受到了世界文学“向内转”的影响，也复归和延续了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向内转”进程。此外，新时期文学“向内转”还具有特定时期的社会文化心理动因，这主要包括前摄因素的作用、逆反心理的导引、民族文化积淀的显现以及主体意识的觉醒等方面。由此可见，鲁枢元的“向内转”是对新时期文学十年发展历程的阶段性总结与现象性归纳，它以文艺心理学为理论根基，敏锐地发现了新时期文学创作的新趋势与新时期理论批评研究的新动向。

自“向内转”论正式提出后，鲁枢元就将该论作为自己的重要发现和新时期文艺心理学崛起的背景，频繁地将“向内转”引入自己的论著中，“向内转”因此成了鲁枢元1980年代学术思想与文艺研究的一个关键词与核心术语。如在《创作心理研究》的1987年修订版中，鲁枢元就用“向内转”术语来表述“虚静”：“从心理学来讲，实现‘虚静’的过

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变‘外部注意’为‘内部注意’的过程。这是一个变观察为思索、变感觉为体验、变感受为回味、变认知为想象的过程。要实现这种‘向内转’,自然就要暂时撇开外部世界的干扰。”^[8]在《文学心理学教程》一书中,鲁枢元则将19世纪末开始的世界性文艺“向内转”和现代心理学的迅猛发展看作是20世纪以来人类对自身存在进行“内探索”的两条重要途径。而在《文艺心理阐释》一书中,鲁枢元则直接用一卷三章的篇幅来论述“向内转”。从诺伯特·维纳的“脱节”论、以“现代派”为突出代表的西方文学“向内转”,到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和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向内转”历程,再到文学“向内转”与现代心理学之间的相互关系,鲁枢元通过“文学艺术活动的‘向内转’”、“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进程”以及“向着心理学呼唤”三章,将“向内转”作为文艺心理学“背景转换中的文学动势”来论述,用世界性的文学“向内转”突出了文艺心理学研究与文艺心理学学科建设的必要性、重要性与迫切性。可见《文艺心理阐释》中的“向内转”论,是对《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的全面细化升级与拓展深化。至1990年出版《超越语言——文学言语学刍议》一书时,鲁枢元又在“文学言语学”的论域中使用“向内转”,并为“向内转”增添了语言学维度上的内涵:“从中国新时期头十年中文学创作的实际情况看,诗人小说家的言语操作明显呈现出‘向内转’的趋势:由外指向的语言转换为内指向的语言,由以语法、逻辑为准则的外部语言转化为以语词、意象为重心的内部语言。”^[9]₁₂₂₋₁₂₃

客观来说,在《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中,鲁枢元的“向内转”并没有明确的术语定义,作为一种对文学现象与创作趋势的直觉性概括,鲁枢元在提出“向内转”时,并没有想要创立一个文艺学新概念或文学批评新术语。但“向内转”问题的重要性及其所引起的广泛论争,使“向内转”超出了鲁枢元“首义”时的内涵,并逐渐具备了文艺思潮性质的深远影响。至1990年代末,鲁枢元在《文学的内向性》和《“向内转”》中对“向内转”作出了更为明晰具体的界定,使“向内转”具有了相对确切的术语内涵:“‘向内转’,是对中国当代‘新时期’文学整体动势的一种描述,指文学创作的审美视角由外部客观世界向着创作主体内心世界的位移。具体表现为题材的心灵化、语言的情绪化、情绪的个体化、描述的意象化、结构的散文化、主题的繁复化。‘向内转’是对多年来极‘左’文艺路线的一次反拨,从而使文学更贴近现代人的精神生存状态,为中国当代文学

的发展开创出一个新的局面。中国当代文学的‘向内转’显示出与西方19世纪以来现代派文学运动流向的一致性,为从心理学角度探讨文学艺术的奥秘提供了必要性与可行性。”^[17]

由鲁枢元“首义”的“向内转”论在文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陆贵山、王先霭主编的《中国当代文艺思潮概论》、尹昌龙《重返自身的文学:当代中国文学思潮中的话语类型考察》、方维保《当代文学思潮史论》、王春荣等著《中国新时期文学三十年(1978—2008)》、於可训《中国当代文学概论》、黄曼君主编《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1985—1990》、姚鹤鸣《理性的追踪——新时期文学批评论纲》、王洪岳《先锋的背影——中国现代主义文论(1978—2008)》、杜书瀛《新时期文艺学前沿扫描》、张婷婷《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四部)、陶东风、和磊《中国新时期文学30年(1978—2008)》与《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1949—2009)》、高建平等著的《当代中国文学批评观念史》等思潮史、文学史、批评史与文艺学学术史著作中,均论及“向内转”、“向内转”论争或“向内转”思潮。由此可见,“向内转”不仅是鲁枢元1980年代文艺研究的关键词,也是新时期文学与中国当代文艺思潮、理论与批评的一个关键词,它贯穿于鲁枢元1980年代的文艺研究中,体现了鲁枢元1980年代文艺批评的敏锐感悟力与学术建构力,代表了鲁枢元1980年代学术研究对中国当代文坛的突出贡献。

二、鲁枢元的创作心理研究与“文艺心理学”学科建设

相较于“向内转”,鲁枢元1980年代的学术研究对中国当代文论更重要的贡献是文艺心理学研究与“文艺心理学”学科建设。作为新时期文艺心理学研究的“新潮代表”,“鲁枢元由于在重建学科的独立概念与体系框架方面所显示的自觉意识,而被1985年‘方法论热’推到了文艺心理学螺旋发展的第三阶段”^[10]。从根本上来说,鲁枢元“向内转”批评视野的获得根源于他对文学和心理学关系的思考,“向内转”论的基石正是文艺心理学。鲁枢元的“向内转”术语本来自于里恩·艾德尔的《文学与心理学》,当鲁枢元借用“向内转”术语以描述新时期文学现象时,鲁枢元表现出了对创作主体性、个体性和文学心灵性、内向性的格外关注。这与鲁枢元1980年代的学术重心直接相关,“我把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作为文艺心理学研究的前提,又把文艺心理学研究的兴起,作为推动文学‘向内转’的动力,‘文学的向内转’与‘文学研究的心理学化’几乎

成了我这一时期关注的唯一课题”^{[3]89}。

回顾鲁枢元 1980 年代的学术研究,创作心理研究和文艺心理学一直是其研究的核心。在“向内转”论正式提出之前,鲁枢元的学术成果集中体现于 1985 年 7 月出版的《创作心理研究》,该著作收录了鲁枢元 1980 年代前期的代表性文论与批评,是新时期较早地在创作心理研究方面予以探索的学术著作。《创作心理研究》作为鲁枢元确立其学术地位的第一部代表作,其研究重心是创作主体研究:“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文学创作活动要复杂得多,它远非生活、思想、技巧的三者相加,而是作为创作主体的文学家对生活现象感觉、知觉、直觉、体验、注意、记忆、思维、联想、想象的过程。”^{[4]3}无论是对文学艺术家“感情积累”“情绪记忆”“创作心境”“艺术知觉与心理定势”“创作冲动与控制力”“文学兴趣与写作习惯”的学术考察,还是对文艺创造中的“变形”、文艺作品中的“生气灌注”、文学语言的心理机制以及文学创作“黑箱子”的探索,鲁枢元都立足于文艺心理学,并以文艺创作主体为研究重心。

正如“向内转”论“所体现的‘反拨精神’标识了又一个文学时代的莅临”^{[1]4},鲁枢元以创作主体为核心的创作心理研究同样是一种“反拨”。鲁枢元“向内转”论与创作心理研究的理论动机,是对机械“反映论”与庸俗社会学的不满。早在 1980 年代初,鲁枢元就频频指出仅仅局限于“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是“不够”的,因为“它没有表达出文学作品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忽视了作家在创作文学作品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1]1},“仅仅停留在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个最基本的出发点上显然也是不够的,还应当研究这种反映究竟是如何进行的”^{[1]2},因为“在社会生活和文艺作品之间横亘着的并不是一面什么‘镜子’,而是一个人,一个活生生、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感情、有意志、有创造性的人,一个为任何具备复杂物理属性的‘镜子’也远莫能比的人”^{[1]3}。在鲁枢元看来,文学的反映不同于科学的纯客观反映,是一种艺术的主观反映,因此仅仅关注于外部社会生活与作家艺术反映的“一致性”,而不关注二者之间的“异质性”与“差异性”,会导致“艺术取消主义”^{[1]4}。在创作心理研究过程中,鲁枢元阅读了大量西方 19 世纪、20 世纪的作家传记与创作谈,并由此发现“创作主体的独立的人格、独特的个性、丰厚的感情积累、细微复杂的心理活动在文学创作活动中起着决定性作用”^{[3]87}。

至 1985 年,鲁枢元更是从文学本体论的角度,

阐述了文学反映论的不足以及创作主体的重要性。《文学评论》1985 年第 4 期开辟“我的文学观”栏目,鲁枢元《用心理学的眼光看文学》作为首发文章刊出。在该文中,鲁枢元强调“在复杂的心理活动中,外界的物理刺激与内在的心理反映绝不是一种机械决定的因果关系,也不是单一的同步对应关系”,主体的理想信仰、心理素质、价值观念、经验情绪、审美记忆,以及潜意识中的心理定势等都会导致“反映”的变异与变形,因此作为一种主观反映的文艺反映,是一种“个性化反映”,“反映的是经过作家心灵折射的社会生活,是灌注了作家生命气息的社会生活,是一种心灵化了的社会生活”^[15]。在鲁枢元看来,文学是一个“心理的世界”,是心灵创造性的自由表现,其本质属性是“心灵性”,而文学作品则是创作主体实践活动、生命活动与心理活动的结晶。由于鲁枢元的文学本体论是建立于文艺心理学之上的、带有浓厚主体论色彩的本体论,因此在鲁枢元这里,“欲望、知觉、情感、体验、思维、想象等心灵活动对于文学来说,不仅具有发生学的意义,也具有本体论的意义”^{[9]106-107}。鲁枢元认为,从文学本体论的高度来看,过去的文学反映论无法接近文学的本质,也不足以阐释文学创造的内在机制,文艺研究就必须从反映论向主体论内转。因此,“向内转”的以主体为中心的创作心理研究就成了鲁枢元 1980 年代文艺研究的重心。

鲁枢元在创作心理研究的起步期,就善于在阐释命题时提炼出相对应的文艺心理学概念,也正是“情绪记忆”“创作心境”“心理定势”“感情积累”“生气灌注”“艺术变形”“文学语言的心理机制”等活泼新锐有启发性的概念,展现了鲁枢元文艺心理学学科重建的自觉性,而且这些概念与理论成果也确实被吸纳进《文学心理学教程》,成为新时期文艺心理学学科重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我国文艺心理学事业发展过程中一个过渡性环节”^{[16]2}。

1987 年 12 月出版的《文学心理学教程》是“我国第一部文学心理学教材”^{[17]411}。主编钱谷融与鲁枢元在“前言”中表明了编者的学科建设立场,随后在第一章“文学心理学研究概况”中,鲁枢元对文学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途径与研究方法予以了具体说明。《文学心理学教程》具有鲜明的文学心理学学科建设自觉,在吸纳借鉴西方现代文论与中国传统文论的基础上,该教材通过对文学艺术家的个性心理结构、文学创作的心理过程、文学作品的心理分析、文学语言的心理机制、文学欣赏的心理效应等五个方面的探讨,将文学心理学研究覆盖了文学创

作与接受的各个环节。而且,在《文学心理学教程》中,鲁枢元还特别强调了文艺心理学研究的学术主体性。在鲁枢元看来,文艺心理具有“模糊性”和“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特性”^[18],企图完全用科学主义方法精准描述与界定文艺心理是不可能的,还必须借助于内省与体验。因此文艺心理学研究本身也应当成为一种“积极的探讨”、“学术上的探险”和“富有心灵色彩的创造”^{[16]22}。鲁枢元一向主张文学批评与学术研究要有主体性,在1980年代“我所评论的就是我”的论争中,鲁枢元从文艺心理学的立场出发,强调了批评独立性与批评主体性的重要性:“评论家在评论文学作品,同时也在表现他自己,表现他自己的文学观念、审美情趣、人格人品,表现他自己对于现实的时代精神、社会心理、民族文化意识的认识和体验。他评论作家作品的同时,也是评论他自己。”^[19]

一直致力于创作心理研究和文艺心理学学科重建的鲁枢元,于1987年完成了第二部代表作《文艺心理阐释》。该书作为上海文艺出版社“文艺探索书系”之一种,于1989年6月正式出版。在该著作中,鲁枢元试图在心理学与文艺学之间“做一点交接沟通的工作”,鲁枢元已有的“向内转”研究、创作心理研究、文艺心理学学科建设经验以及丰富的现代心理学知识都被融入这部著作中。该著作共有《背景转换中的文学动势》《现代心理学参照系》《文学,在心理的屏幕上》三卷。其中卷一是对“向内转”论的扩充、细化、升级与深化,在总体上将20世纪文学整体“向内转”的动势作为文艺心理学研究的大背景。卷二10章详细梳理了构造主义心理学、机能主义心理学、行为主义心理学、精神分析心理学、分析心理学、格式塔心理学、日内瓦学派、人本主义心理学、“维列鲁”学派等九个心理学流派,并将现代心理学作为“文学是人学”和文艺心理学的重要参照系。卷三则是鲁枢元从文艺心理学角度阐述其文学观的部分,主要从文学本体论、文学创作论、文学价值论以及文艺心理学研究与学科建设等方面对文艺心理学的诸种重要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

总体来看,新时期的文艺心理学研究与文艺心理学学科重建属于新时期人道主义—主体性思潮的一部分。而人道主义—主体性思潮是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社会转型期乃至整个1980年代人文思潮中的主潮。围绕着“人”“人性”“主体”等核心概念所展开的“新启蒙”运动,构成了新时期“最为醒目且持续时间最长的一组话语形态”^[20]。而“向内转”论和文艺心理学本身就是新时期“主体性”思潮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艺心理学由于积极地参与了主体性话语的理论建构而顺理成章地成了“一门显学”^[21],并且是“整个主体性思潮中最为活跃、发展最迅猛的一支”^{[22]159}。在主体性启蒙思潮中重建起来的新时期文艺心理学,以新时期人道主义时代语境与“文学是人学”的文坛共识为背景,当它作为文艺回复到自身的重要环节和“向内转”的主体性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复出时,“一方面以一种普遍性、中立性的知识形态,接续了这一学科研究的血脉,另一方面又以其鲜明的主体性内涵为新时期文学中人的主体存在、价值、意义的高扬提供了实证性的理论基础”^{[22]154}。从这个角度来看,鲁枢元的“向内转”论与文艺心理学研究贡献卓著,也正是文艺心理学研究与文艺心理学学科建设方面的成果奠定了鲁枢元在1980年代新潮学界的学术地位。

三、“文学言语学”与“精神生态”

1990年,鲁枢元的“文学言语学”专著《超越语言》出版,该著作标志着鲁枢元从文艺心理学研究向语言学研究的正式转向。事实上,鲁枢元的文学语言研究起步甚早,语言研究本就是鲁枢元文艺心理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1980年代前期的《试论文学语言的心理机制》及《文学语言特性的心理学分析》等论文中,鲁枢元就从创作心理学的视角对文学语言进行了研究。鲁枢元对文学语言的心理发生、文学言语活动的深层心理结构、文学语言与形象思维的深层关系等重要课题,从心理学的角度予以了探讨,同时对文学语言所表现出来的“情境性”“暗示性”“贴切性”“口语性”“音乐性”“独创性”等特性进行了心理学分析。鲁枢元所关注的重心是从言语主体的心理活动层面,对文学创作中的语言现象进行探索,即文学语言的奥秘远不在作品的篇章词句之间,而是在作家运用语言的心理活动之中。在鲁枢元看来,文学语言研究是文艺心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因此《文学心理学教程》专门用一章的篇幅来论述文学语言问题。该著第五章“文学语言的心理机制”由鲁枢元撰写,从文学语言的心理发生、文学言语活动的心理机制、文学语言的心理功能、文学语言的心理特性四个方面予以了阐释论述,内容上吸纳了鲁枢元1980年代前期文学语言研究的主要观点,并进行了扩充与细化。因此,在《超越语言》正式出版以前,鲁枢元就已经在创作心理研究的基础上生发出了文学语言研究的分枝,并累积了一定的学术成果。1980年代中后期,形式本体论与形式批评在中国本土语境中崛起,文体批评与

文体理论研究走向自觉,1987年甚至被称为“文体年”^{[17]448}。面对“语言转向”与“语言热”带来的冲击与挑战,鲁枢元以《超越语言》作为“应战之作”,矛头直指结构主义语言学,并试图在“语言沙文主义”中重申主体的权力。

鲁枢元写于1988—1989年的《超越语言》试图建立的是一种“文学言语学”。在该著开篇,鲁枢元引用了米盖尔·杜夫海纳关于“言语”的话作为全书题记:“当语言在创造行为中被使用时,它已不再是语言或者还不是语言。艺术是言语,不是语言。艺术似乎是超语言学的最佳代表。”^{[9]1}而鲁枢元的“超越语言”就是要探讨文学艺术的语言问题,并试图建立一门“文学言语学”。鲁枢元在该著《跋》中谈到,当他读到斯特拉塞的《恢复内在性应有的地位》时,他颇有“异域遇故交”^{[9]254}之感。斯特拉塞为被贬斥与被放逐的“内在性”高声呐喊,呼吁恢复“内在性”的应有地位,这让撰写《超越语言》时的鲁枢元颇为认同。这透露出了鲁枢元《超越语言》的立论基础还是文艺心理学。早在1983年,文学语言的心理机制问题就已经进入了鲁枢元的创作心理研究中,《试论文学语言的心理机制》等论文从言语主体的心理活动层面探讨了文学创作中的语言现象,可见鲁枢元的文学语言研究正是从创作心理研究开始的。当1980年代“语言热”漫卷文坛,一时间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语言学、符号学新论迭出的时候,鲁枢元却感到不满和缺憾。因为在他看来,文学语言是一种“言语活动过程”,文学语言研究的重点应是“言语”,而结构主义语言学却把重点放在“语言”而非“言语”上。“语言”倾向于科学,而“言语”则倾向于人文,鲁枢元拒绝“语言”对“言语”的压制或取代,为此,他十分认可柯林伍德、苏珊·朗格与杜夫海纳的观点——“典型的例子要数柯林伍德:‘语言如果不能维护自己的表现力,它就不再是语言了,要做到这一点,只有抑制语言学家的努力以便保持语言的原始生命力的本分’”;“苏珊·朗格就曾说过:‘当人们称诗为艺术时,很明显是要把诗的语言同普通的会话语言区别开来’”;“杜夫海纳也曾说过:‘艺术是超越语言的’……”^[23]鲁枢元试图站在苏珊·朗格、杜夫海纳这类美学家的立场上来观察文学语言,并尝试以“裸语言”“次语言”“场语言”“超语言”等概念来建立超越语言的“文学言语学”。鲁枢元有意识地以“言语者的主体性介入”“言语在个体知觉中的整合”“言语在理解的历史进程中绵延”等几个方面,来突破常规的语言学研究。由于鲁枢元的价值标准是“诗的”而非“科学的”,所以有

着浓厚文艺心理学背景与主体论立场的《超越语言》就表现出了明显的人文主义倾向。这种人文主义式的文学语言研究引起了强烈的争议,受到了诸多批评,但也得到了王蒙、韩少功、白桦、南帆等作家、批评家的欣赏与支持,尽管他们与鲁枢元之间不乏分歧。

鲁枢元《超越语言》试图解决的是个体生命对语言的超越问题。“只重视语言的‘科学性’的结构主义批评和不重视语言的‘本体性’的社会学批评,在忽略文学中主体心灵的创造过程和排斥言语个体的独特风格这一点上殊途同归”^[24],正是这种危险令鲁枢元不惜返回传统,重提“心灵”“直觉”“神韵”“顿悟”等概念,以期实现对语言的穿透与超越。他立足于语言学与心理学的交叉地带,以“文学言语学”的设想,来维护和恢复主体“对于语言的统辖权与支配权”^[25]。为与结构主义语言学形成对比,鲁枢元刻意突出文学言语的个体性、心灵性、创化性以及流变性,并创造性地运用“气氛型综合信息”“缜缜”“神韵”“延宕修辞”“瞬间修辞”“裸体语言”“内部言语”“场型语言”等带有浓厚心理学内涵的术语概念,来建构生命——言语——诗性三位一体的“文学言语学”。鲁枢元将文学言语与主体生命和精神生态紧密联系起来,在语言领域中再一次高扬了主体精神。

更值得注意的是,文学言语研究为鲁枢元生发出了新的理论增长点,即“精神生态学”研究。纵观鲁枢元的学术生涯,文艺心理学研究、文学言语学研究与精神生态学研究是血脉相连、密不可分的:“对于文学家、艺术家创作心理活动的探讨,于是便有了《创作心理研究》一书的问世;而对于创作心理的进一步探寻就不能避开文学创作过程中的言语活动……我转向语言学,完全是由于我的文学心理学研究的需要,于是便有了《超越语言》一书的出版……接着,几乎是顺理成章地,我由文学语言问题进一步关注到人的精神问题,尤其是现代人的精神状况。”^[26]尽管鲁枢元的精神生态研究与文艺生态学批评主要从1990年代开始集中进行,但事实上,早在1980年代的文艺心理学研究中,鲁枢元就已经开始思考“精神生态”问题了。1989年7月24日至26日,“全国第二届文艺心理学研讨会”在张家界举行,鲁枢元在会上发言时谈道:“文艺心理学的学科建设必须重视人的生存状态,包括人的‘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尤其是人的‘精神生态’,应当把这些作为学科研究和学科建设的背景。”^[27]这是鲁枢元第一次谈到“精神生态”问题,鲁枢元不仅将“精

神生态”与“自然生态”并置,而且尤其强调“精神生态”的独特性与重要性。此后,鲁枢元便开始关注生态问题,并积极进行精神生态研究、生态文艺学建构与生态批评实践。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与“向内转”的文艺心理学研究与文学言语学研究相比,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研究与生态批评似乎是一种“向外转”,但其学术内核与理论底色仍旧带有强烈的精神性、内向性与主体性色彩,“精神生态”是其生态文艺学的理论核心与研究重心。1998年11月,鲁枢元生态文化随笔集《精神守望》出版。该著作认为,在“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之上还存在着一个“精神生态”层面。而“精神生态”具体包含两个命题:一是“精神”作为人的一种内在的、意向的、自由的、能动的生命活动,在更为高蹈的层面上对地球生态系统发挥着潜隐的巨大作用;二是“精神”作为人类的一种生发着、运动着、兴衰着、变化着的生命活动,具有内在的能量吞吐转换机制,具有独立的与其环境交流感应的体系,它本身是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生态系统”。显然,鲁枢元的“精神生态”研究与其文艺心理学研究和文学言语学研究是密切相关、一脉相承的:“从‘创作心理研究’到‘文学言语探秘’到‘精神生态寻问’,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是血脉相连的。”^[28]2000年12月,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出版,虽然该著作试图探讨文学艺术与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关系,并进而透过生态学视野、运用现代生态学观点来考察文学现象、进行文艺研究,但该著作的最核心内容还是“精神生态学”。《生态文艺学》在鲁枢元的原写作计划中本名为《精神生态学引论》^[29],鲁枢元在“生态三重性”的基础上立论“精神生态学”,并在生态文艺学的理论建构中积极“开发精神生态资源”^[30]。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表现出了建构中国本土生态批评与生态文艺学学科的学术野心,在后续的《狷狷言说:关于文学、精神、生态的思考》《生态批评的空间》《心中的旷野:关于生态与精神的散记》《文学的跨界研究: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时代的文化反思》等著作中,鲁枢元进一步阐述了其“精神生态学”与生态批评理论。鲁枢元还通过主编《自然与人文:生态批评学术资源库》与《生态文化研究资源库》等方式进行资源库建设,为“精神生态学”与生态批评提供资源参照。

2022年11月,鲁枢元最新著作《天地之中说聊斋》出版,该著作与2012年出版的《陶渊明的幽灵》,共同构成了鲁枢元从生态批评视角研究古典文学的双璧。这两部著作的共性,便是在生态文化

视野中,从生态批评的视角,对中国古典文学资源进行了生态学阐释。鲁枢元将陶渊明看作是一位伟大的“生态诗人”,并将其精神内涵界定为“自然”。正是天性自然、崇尚自然、因生命融入自然而获得了极度个体自由的陶渊明,以自然中的“诗意栖居”“知白守黑”的人生准则和对内宇宙精神自由的真正实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为当代人提供了一个素朴的东方范本。而对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鲁枢元同样参照生态批评的方法,对这本古典文学瑰宝做出了新的阐释。鲁枢元不仅从蒲松龄的生平经历总结出了蒲松龄立足自然、扎根原野、融入乡土的精神特点,还提出《聊斋志异》的伟大之处正在于“它是与天地并生的精神之花,是蒲松龄的‘生态精神’绽开的文学奇葩”^[31]。《聊斋志异》中的“非人类中心”思想、“万物有灵”观、“女性生态批评”元素、“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等理念,无不体现着《聊斋志异》的“生态精神”。因此,从生态文化的角度来看,《天地之中说聊斋》与《陶渊明的幽灵》正是鲁枢元生态文化研究的两个经典个案,它们为鲁枢元的生态批评观念在批评实践中提供了具体验证。

总体来看,从1980年代的“向内转”与文艺心理学研究,到1980年代后期的“文学言语学”研究,再到1990年代的“精神生态学”研究和新世纪以来的生态文艺学研究与生态批评建构,鲁枢元的文学批评与文艺研究表现出了鲜明的学术主体性、敏锐的思想感悟力、自觉的学科建设精神,与强烈的先锋气质、开创进取的理论勇气和深厚的人文主义情怀。在文艺心理学、文学言语学、精神生态学、生态文艺学以及生态批评等领域,鲁枢元都为中国本土文学批评与文艺理论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尽管文学与心理学、文学与语言学、文学与生态学的跨界研究,分属于鲁枢元不同阶段、不同领域的文艺研究,但三者之间具有血脉联系和思想共性,即鲁枢元一以贯之对精神、心灵与内宇宙的格外关注。因此“向内转”不仅是鲁枢元1980年代文艺研究的“关键词”,也是贯穿鲁枢元整个学术生涯的“关键词”,体现了鲁枢元文艺思想的精神底色和学术研究的总体向度。

参考文献:

- [1]鲁枢元.“向内转”[J].南方文坛,1999(3).
- [2]段晓琳.主体与本体,文学向内转的双重维度:兼谈新时期主体论与形式文论的关系[J].当代作家评论,2018(2).
- [3]鲁枢元.文学的内向性:我对“新时期文学‘向内转’”讨

- 论”的反省[J]. 中州学刊,1997(5).
- [4]鲁枢元. 创作心理研究[M]. 郑州:黄河文艺出版社, 1985.
- [5]鲁枢元. 梦里潮音[M]. 深圳:海天出版社,2013.
- [6]周介人. 文学探讨的当代意识背景[J]. 文学自由谈, 1986(1).
- [7]鲁枢元. 文学心理观[C]//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文艺学方法论讲演集,1987:85.
- [8]鲁枢元. 创作心理研究[M]. 2版. 郑州:黄河文艺出版社,1987:149.
- [9]鲁枢元. 超越语言:文学语言学刍议[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 [10]夏中义. 新潮学案 思想实验[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91.
- [11]鲁枢元. 文学,美的领域:兼论文学艺术家的“感情积累”[J]. 上海文学,1981(6).
- [12]鲁枢元. 反映论与创作心理[J]. 上海文学,1984(6).
- [13]鲁枢元. 审美主体与艺术创造[N]. 文艺报,1983(5).
- [14]鲁枢元. 新时期文学与心理学[C]//春风文艺出版社. 中外文艺理论概览.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39.
- [15]鲁枢元. 用心理学的眼光看文学[J]. 文学评论,1985(4).
- [16]钱谷融,鲁枢元. 文学心理学教程[C].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 [17]陶东风,和磊. 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 1949—2009[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 [18]谭好哲. 文艺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及其他:访鲁枢元、金开诚、童庆炳三教授[J]. 文史哲,1987(5).
- [19]鲁枢元. 我所评论的就是我[J]. 文学自由谈,1985(1).
- [20]贺桂梅. “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51.
- [21]杜书瀛. 内转与外突:新时期文艺学再反思[J]. 文学评论,1999(1).
- [22]张婷婷. 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四部)[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 [23]鲁枢元. 语言学与文学:答伍铁平、孙逊对《超越语言》的批评[J]. 文艺争鸣,1994(5).
- [24]白烨. 一部充满创新精神的著作:评鲁枢元的《超越语言》[J]. 文艺争鸣,1991(2).
- [25]南帆. 超越的本义[J]. 上海文论,1992(1).
- [26]鲁枢元. 文学的跨界研究:文学与语言学[J]. 上海:学林出版社,2011:350.
- [27]鲁枢元. 来路与前程:在张家界全国第二届文艺心理学研讨会上的发言[N]. 文论报,1989-09-05.
- [28]鲁枢元,夏中义. 从艺术心理到精神生态[J]. 文艺理论研究,1996(5).
- [29]鲁枢元. 我与“精神生态”研究三十年:后现代视域中的天人和解[J]. 当代文坛,2021(1).
- [30]鲁枢元. 开发精神生态资源:《生态文艺学》论稿[J]. 南方文坛,2001(1).
- [31]鲁枢元. 天地之中说聊斋[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2022:3.

(责任编辑 刘海燕)

“Inward Turning”: The Keyword of Lu Shuyuan’s Literary Studies in the 1980s

DUAN Xiaoli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Shandong 266100, China)

Abstract: “Inward Turning” is an important keyword of Lu Shuyuan’s literature and art studies in the 1980s. “Inward Turning” research, literature creation psychology research and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of literary psychology are the core parts of Lu Shuyuan’s literary studies in the 1980s. Lu Shuyuan’s researches of literary linguistics and spiritual Ecology in the late 1980s also appeared in his literary psychology studies. These researches have obvious spiritual, inward and subjective characteristics. Although the interdisciplinary literary studies on literature and psychology, literature and linguistics, literature and ecology belong to Lu Shuyuan’s literary researches in different stages and different fields, they share “blood ties” and ideological commonality which demonstrates Lu Shuyuan’s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spirit, the soul and the inner universe. So “Inward Turning” is not only the keyword of Lu Shuyuan’s literary studies in the 1980s, but also the keyword of his whole academic career. It’s the the outstanding characteristic of Lu Shuyuan’s literary research.

Key words: Lu Shuyuan; inward turning; literary psychology; literary linguistics; spiritual ecology

中国生态文化批评的范式探究

——论鲁枢元的生态文化观

朱鹏杰

(苏州科技大学 文学院, 江苏 苏州 215123)

摘要:鲁枢元《陶渊明的幽灵》和《天地之中说聊斋》是生态文化批评的代表作,前者对陶渊明的历史影响、当代价值进行了研究,提供了跨文化研究的典范;后者则聚焦于蒲松龄及其《聊斋志异》,以生态文化批评的方法进行解读,为中国生态文化批评提供了跨学科研究个案。在这两部专著及近年来的一系列学术文章和访谈中,鲁枢元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态文化批评观,这是建立在精神生态、乡土思考、传统文化和绿色话语之上的研究范式,推动了中国当代生态文化研究。

关键词:生态文化批评;范式;鲁枢元;文化观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3.04.002

中图分类号:I206;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3)04-0010-07

近年来,全球各地不断出现强对流天气和洪水、高温等气候灾害,这些信号向人类宣告生态系统已经出现异常,迫使人们去思考发展路径。生态批评是建立在相关文学和现实危机之上的批评范式,它探索人与自然的连接节点,探究这些节点如何在个体、社会、自然和动植物的生命中发挥作用。在人和自然连接的节点中,生态文化是关键节点。生态文化关注自然对人类生存的价值,推动人类从文化层面体认与自然间的本源联系。生态文化的作用路径主要有两条:一是以文化的方式研究自然、阐释自然,推动人类加深对自然的认识,树立对自然的责任感;二是探寻人类和自然之间的联系,探寻人类文化与自然之间的关联,确立文化的自然属性。

当下生态批评的发展逐渐超越了局限于文本的文学批评,成为面向创作主体、自然危机和社会现实的生态文化批评。相关学者对生态文化批评的现实属性和自身使命有着清晰的认识,斯洛维克提出:“我自己的很多工作是徘徊在‘职责’的两极之间:充分参与此生的职责,及投身我所属的社会并针砭时弊、促其健康发展的职责。”^[1]因此,生态学者往

往同时游移在文学艺术和社会现实之间,在不同的领域发挥作用,推动社会向生态文明转型。

作为中国生态批评的代表性学者,鲁枢元近年来致力于生态文化批评的建构与实践。鲁枢元是中国生态批评的开拓者,他早期关注文学心理学,中期转向文学语言学研究,后期则转向生态批评研究。追溯其生态批评的形成理路,我们发现他始终围绕着人的精神和自然的关系进行思考,1990年前后,他开始关注国人的精神状况,2000年起,他致力于中国生态批评的构建与实践,最近十余年,他的思考重心由生态批评逐渐转移到生态文化批评上,代表作即是获鲁迅文学奖的《陶渊明的幽灵》和新近出版的《天地之中说聊斋》。这两本著作以中外古今跨学科研究的方式审视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代表性个案,对陶渊明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进行了生态维度的考察,“重新”发现其生态属性和精神价值。这两本书的先后出版鲜明地勾勒出其生态文化批评范式,即以生态文化的视野来观照作家、作品、学者及社会现象,用跨学科的方法进行个案研究,重新发现其“生态学”价值。除了这两本专著外,鲁枢

收稿日期:2023-03-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主体论美学视野中的西方身体艺术研究”(17BZW067)

作者简介:朱鹏杰(1981—),男,河南许昌人,文学博士,苏州科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生态文化批评研究。

元还出版了学术文集《生态时代的文化反思》，发表了研究泰戈尔、杜亚泉等的文章，丰富了其生态文化批评实践。对鲁枢元的生态文化批评范式进行研究，有助于了解中国本土生态学者的思想逻辑和思想贡献，推动中国生态批评学派的发展，在世界生态批评的场域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鲁枢元的生态文化批评范式，主要由如下四个部分组成。

一、精神生态的思考与拓展

“精神生态”是鲁枢元近三十年来学术思想演变的主线，从1988年张家界文艺研讨会提出“精神生态”^[2]开始，鲁枢元始终把关注重心放在个体的精神层面上。20世纪90年代，鲁枢元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中提出了建立精神生态学的设想。^[3]他认为，人类既是一种生物性的存在，又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同时，更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他提出，生态学可以按照三分法来划分：以相对独立的自然界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生态学；以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生态学；以人内在的情感生活与精神生活为研究对象的精神生态学。三者之间有着密切联系，但是绝不完全等同，不能相互取代。稍后，他在《生态文艺学》一书中为“精神生态学”归纳出这样一个定义：“这是一门研究作为精神性存在主体（主要是人）与其生存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一方面关涉到精神主体的健康成长，一方面关涉到一个生态系统在精神变量协调下的平衡、稳定和演进。”^[4]这个概念从人类是精神性存在这个事实入手，认识到人类和自然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认为以精神性为本质属性的人类个体在生态系统中处于特殊地位。

有趣的是，法国哲学家加塔利在相近时间段也提出了“精神生态”和“精神生态学”的构想。在1989年出版的《三重生态学》里面，加塔利详细阐释了他的有关精神生态的思考。他认为，资本主义全球化不仅在破坏自然环境、侵蚀社会关系，同时也在以一种更为隐秘和无形的方式对人类的态度、情感和心灵进行渗透。他提出，要规避危机必须关注“不断生成的主体性；持续变异的社会场；处于再造过程中的环境（自然环境）”^[5]。这三点横贯精神、社会、自然三个领域，生成了包含“精神生态学”“社会生态学”“自然生态学”的“三重生态学”体系。他认为，生态美学最终走向“自然——社会——精神”三元合一的模式，自然环境、社会关系与人类主体性是紧密相关的，其中任何一个领域取

得长足进展，都会同时促进另外两个层面的完善，最终在外在生存环境和内在生命本体的双向互动中通达生态智慧，改善人类生态。^[6]

鲁枢元和加塔利均关注了精神与生态的关系，阐明了精神的重要性，“二者都主张扩大‘生态’的范畴，以精神生态学为核心……建立总体性、系统性的‘生态智慧’”^[7]。但是，加塔利的关注重点是资本影响下精神的“消解”及伦理对生态的影响，而鲁枢元的关注重点则是生态对精神的影响及精神性主体的能动作用。鲁枢元指出，精神生态、社会生态和自然生态的三分法“并不是要把三者拆离开来，恰恰是要在地球生物圈的有机整体中，深入考察其位置、属性、功能、价值以及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8]他认为，精神生态学有两个主要任务，一个是关注精神性主体——主要是人类的健康成长，关注人类个体内在价值系统的稳定与平衡，另外一个则是关注整个地球生态系统如何在精神变量的协调影响下趋于平衡。作为生态文化学者和文艺评论家，鲁枢元的精神生态构想与文学艺术紧密相关，他认为精神生态学应该关注文学艺术和自然之间的联系，这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有关自然的维度，“文学是人学的命题不能简单否定，但要真正地理解人，同时必须能够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文学是人学，同时也应当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学，是人类的精神生态学”^[3]。他指出，研究精神生态的目的是把精神因素引入地球生态系统中，关注精神变量对于自然的影响。在最近几年，他尤其关注精神生态作为一个“观念系统”对生态系统的影响，他指出：“‘生态学’已远远不仅是一门学问、一门学科，而成为一套完整的观念系统，成为一个包容了生命与环境、人类与自然、社会与宇宙、精神与物质的世界观，成为一个现代工业社会之后新的文化体系、新的文明样态。”^[9]由此可知，他对精神生态的思考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转向，精神生态成为一个观念系统，一种世界观，是其生态文化批评范式的核心。

鲁枢元提出的精神生态及“三分法”成为国内生态批评常用的理论范式，据统计，近二十年来，以精神生态作为理论研究的期刊论文有2000余篇，博硕士论文有接近500篇^①，充分证明了精神生态理论的生命力和影响力。而且，随着鲁枢元对生态文化的进一步思考，他对精神生态的认识也在加深。他认为，在这个“过于物质化、功利化、金钱化的社会，大自然饱受攻掠、濒临崩溃，精神生活日益沦落颓败”^[8]，人的“精神性”在解决生态问题方面至关重要。而要想真正解决生态问题，“要从作为活动

主体的人类自身开始,从改善人类内在的精神状况开始,以此弥合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与裂痕”^[8]。因此,他在近几年以精神为本体生发出生态文化批评范式,把关注重心转移到生态文化层面的精神审视,生态文化成为影响个体、社会、生态系统的重要部分。他认为,中国生态文化关注的核心是个体的精神,而奠定中国生态文化基础属性的则是中国的道家智慧及乡土传统。

二、中国传统智慧的思考与借鉴

鲁枢元的生态文化批评范式的形成受到中国古代思想的影响,尤其是“道家哲学”的影响,他“认同老子说的‘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个‘无’,大有讲究,并非什么都没有,而是‘空无一有’中的‘涵容万有’,是‘无限’,是‘无极’,是‘小而无内,大而无外’”^[10]。他看重“前现代的思想遗存”与“后现代的思想萌芽”联手,认为这样形成的生态文化才是应对200多年来愈演愈烈的生态灾难的关键。他指出:“在道家哲学里,人与自然、与天地万物是在一个有机整体之中,即‘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不但天人合一,天人之间还可以相互感应。人和自然是在同一个系统里,这个系统又是运动变化着的。”^[9]道家思想给鲁枢元的生态文化批评提供了一个整体的世界观,他认识到世界万物是相互关联、有机统一的。他还提出:“人类与包括动物、植物、微生物在内的其他物种拥有共同的‘母体’,来自同一个源头。”^[11]这就奠定了中国生态文化批评的根基,即从统一性、整体性的角度去认识人和自然及其他动植物生命之间的关系。他的生态文化批评范式蕴含了丰富的传统文化思想,“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是生态立场;“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善待万物”是生态涵养,他从生态伦理的角度指明了中国生态文化批评的特质。

除了“老庄哲学”外,鲁枢元还从《周易》里获得许多启示,他认为《周易》里的“生生”体现了中国生态文化的基本属性,即一种生长的、交互的生态属性。他指出:“《周易》源于自然,源于大自然生生不息的循环运动变化。……‘生生之谓易’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核心。这里的‘生’,是‘生命’‘生长’,也是‘生存’‘生活’。一方面体现了生命个体的生长发育、生命群体的化生繁衍,同时也包含生命个体与生存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10]这和曾繁仁的观点构成了互证,曾繁仁提出,中国生态美学是一种“生生美学”,表现为“亲和

自然,敬畏自然,顺应自然以及天人相和、阴阳相生的生命论与有机论思想”^[12],从“生生”这个核心出发,认为中国生态文化是“天人相和”的生态文化。此外,程相占提出,“生生”是中国生态美学的本体论基础,“天地自然是孕育人及其文化创造的母体,人的使命应该是‘辅天地之自然而不敢为’‘赞天地之化育’,人与天地万物之间存在着‘感而遂通’的‘感应’关系”^[13]。从本体论基础上进一步确认中国生态美学和生态文化的核心是“生生”。他们对“生生”的阐述,拓展了中国生态文化的理论构建,为中国生态文化找到了立足于中国传统的本体论基础,也为生态文化批评提供了基本立场,即批评对象是否符合生态系统“化育”的特性,是否有利于生命的交互、生长。

鲁枢元特别重视中国生态文化的本土源头,他在写《聊斋志异》的生态精神时,认为这本书的生态精神表现在五个方面:“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人类与天地万物是一个有机整体;万物有灵,禽兽可以拥有仁心,人类有时也会丧失天良;善待万物,并不单以人类的价值尺度衡量万物的存在;钟情荒野,扎根乡土,守护人类质朴、本真、善良的天性;尊重女性,视女性与自然为一体,赞美女性的独立、自由。”^[11]这其中,前四个都和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密切关联,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为当代中国生态文化的构建提供了厚道、共情、平等交往的生态伦理原则。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他所呼吁的生态精神中,“扎根乡土”具备独特的意义,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和乡土有着密切的关系,更是因为乡土本身是一个特殊的文化场域,是自然和文化交融的场所,是中国文化的发源地。

三、乡土价值的发现与重构

如果说“荒野”是西方生态文化产生的源头,那么“乡土”则是中国生态文化形成的基础。在鲁枢元的生态文化研究中,我们总能看到他对乡土和田园的持续关注,《陶渊明的幽灵》对栖居在乡土上的诗意灵魂深入探寻,《天地之中说聊斋》中对“乡先生”蒲松龄进行细致勾勒,都显示出鲁枢元对乡土的关注。在鲁枢元的笔下,乡土在建构中国生态文化方面有双重价值。

首先,乡土是安身立命之所,为个体提供“泥土性”的根基。乡土是“地方”的典范,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乡土有着不同的生态景观和动植物生命,为个体提供了独具特色的生存环境。对于作家来讲,从环境到住宅,从交往到日常生活,乡土提供

了鲜活生动的生存场域,使作品中呈现出丰沛的生命原力。鲁枢元在《天地之中说聊斋》中指出,蒲松龄能够“与底层民众同呼吸、共患难,休戚与共,同舟共济,不惜‘滚一身泥巴,这‘泥土性’最终也成了他文学生命的基因”^{[14]20}。他点明了乡土对于中国作家的价值。他特别指出,当代作家莫言和阎连科都受到了《聊斋志异》的影响,莫言曾经提出:“蒲松龄对我的影响是根本的……一个作家必须回到自己的故乡。必须从自己的童年、少年的记忆里寻找故事源头。”^{[14]174}而阎连科更不讳言对《聊斋志异》的崇拜,“阎连科断言,《聊斋志异》的伟大在于写‘乡土’,乡村与土地是这部伟大经典生长的广袤土壤”^{[14]2}。从中国生态文化的生成来讲,乡土跟田园、泥土、植物、动物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中国生态文化的生成场域,而个体的精神品格也在这样的生态场域中逐渐形成。以蒲松龄为例,鲁枢元指出,“荒凉的山路”“贫瘠的乡村”“精英荟萃的毕府”是蒲松龄“生活、读书、写作的环境”,正是在这个文化与自然交融的乡土环境中,才出现蒲松龄这样独特的作家,乡土是“蒲松龄生命活动的生态系统。在这一有机循环的系统中培育出蒲松龄独特的人生价值、文化品位、文学风格”^{[14]23}。中国从古至今的文学创作,始终有一支和乡土田园紧密相关,一直延续至今,充分证明了乡土的价值。

乡土所提供的“泥土性”不仅影响到个体的成长,更体现在他们的创作中,鲁枢元从作者身份、叙述视角和人物的活动环境三个方面对蒲松龄创作的女性故事进行观照,这三个方面全部与乡土有着密切联系。他指出,从作者身份来讲,蒲松龄是“乡先生”,类似于“乡绅”而且是贫穷的;从叙述视角来讲,蒲松龄对于描写对象“乡野民妇”是平视的,不管是民妇还是鬼怪精魅,几乎都是发生在周围日常生活世界的事情,“少年时代的同桌,青年时代的初恋,出租屋里的情人,邻村的大姐小妹”^{[14]117};从人物活动的环境来讲,蒲松龄笔下的主角生活在一个“开放的生态系统”,凭借源自山林的“法力与野性”,获得“跋山涉水、上天入地的自由”。鲁枢元依托中国生态文化中有关乡土的思考,对蒲松龄创作的女性群像做了深入的分析,探究了“乡土”在作品中的体现,显示了生态文化批评对作品意义层面的强大阐释能力。

乡土为个体提供了有关生态伦理的感知,影响到他们的言行举止和创作表达。鲁枢元认为,蒲松龄笔下所反映的最有价值的生态品格是“厚道”,包括“善良、真诚、友爱”等特点,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提供了道德基石。他指出:“‘蛇’‘蝎’‘老鼠’这些被现代人视为寇讎、务必扑杀的动物,都成了蒲松龄同情、怜悯、赞美的对象!……基于‘万物一体’,蒲翁已经破除了‘人类中心’,将人类社会伦理学扩延到生态伦理学的领域。”^[15]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品格,跟其所处的乡土空间和农业时代的文化密不可分,中国本土生态文化的构建就是建立在乡土空间及其衍生的伦理精神和世界观之上。因此,鲁枢元特别指出:“农业时代的文化更富有生态精神,这对于东晋时代的陶渊明来说如此,对于明末清初的蒲松龄来说也是如此。”^[15]

其次,乡土为抵抗“现代化”“城市化”提供了根基。鲁枢元认为,现代化就是,“尽最大可能发挥人的才智(表现为科学技术),通过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不断满足人类占有物质财富(体现为资产、利润)的欲望,让所有人过上越来越富有,越来越方便、快捷的生活”^[16]。然而,日益严峻的生态现实却证明了现代化的种种弊端。现代化过程对生态系统造成了不可逆转的破坏,包括物种灭绝,资源枯竭,改变山林植被和地形,带来气候灾难、化工污染;此外,技术的发展和异化了社会和人性的,科技的发展让人们的生活更加便捷,但是人性和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异化”,来自自然的本性被技术逐渐消解,人们越来越呈现被技术“异化”的状态。物质、技术、消费破坏了自然、精神,这是人类环境不断恶化的根源,而生态文化注重自然的精神价值,从自然(物质层)和精神(文化层)两个层面“拯救”或改善人类的整体生存环境。

现代化和发展经济并不是人们的唯一出路,从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到中国本土生态文化的思考,人们始终在探寻和生态友好共生的发展路径,如绿色低碳发展、可持续发展、生态友好型经济,在许多方面做出尝试并且有所收获。对于中国生态文化来讲,其使命是汲取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发掘乡土传统中的生态伦理,去应对消费主义、利益至上带来的伦理崩坏,用文化、伦理来影响改变人类的精神,从而推动生态的好转,最终走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想境界。在这个过程中,尤其要警戒某种思想走向极端,不管是技术中心、经济中心还是生态中心,都不应该“一家独大”,如经济极端的人心崩坏,技术极端的伦理覆灭,生态极端的发展停滞,要以长远的观点来看待当下的发展,用多元共存的发展路线取代单一的发展路径。对于当下来讲,就是在尊重生态底线的基础上发展经济、技术,将其作为工具和手段,而非目的。这其中,鲁枢元所提的“低消耗的

高品质生活”^{[17][26]}比高能耗的奢侈生活对生态更友好,这种生活方式提倡把商业文化氛围下的“身份符号”消费转移到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上,比如和自然更长时间的接触,让身心在自然中感受到陶冶和净化,这种愉悦不是金钱能买到的。生态文化推崇的“高品质”生活是更长的休闲时间、健康的身体、绿色的生活环境,这比奢侈品更能带来身心健康,是真正的“财富”。

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与城市化的进一步拓展,乡土的价值愈发凸显出来。在悠久的中国文化传统中,乡土是大部分中国人生活的地方,是土地与家人,是宗族与住宅,是铭刻个体童年记忆和精神坐标的源头。然而,随着中国城市化的高速扩张,乡土不再是人们生活的依托,也不是必须回去的“家”,而是呈现急速衰落的趋势。这种衰落带来了种种问题,比如:人们天性中和自然呼应的一部分极度萎缩,精神受到影响,人们从乡下互动、整体、主体间性的状态进入城市“宅”的状态,最终失去了群体价值观,进入自以为是的信息茧房。对于迁移到城市的农民来讲,乡土承载了他们童年的回忆——繁茂的野外植物,一茬接一茬的农作物,拥有各种声响、气味的鸡鸭猫狗,温驯的牛羊,多样化的乡土生命以一种精神印记的方式存储在他们的记忆深处。对于他们来说,高楼大厦的城市景观千篇一律,各具特色的乡土才是他们的精神原乡。此外,乡土的价值还体现在与城市空间的“互证”上:乡土生命物种的“繁多”与城市物种的“单调(主要是人)”形成对比,乡土田野的“柔软”与城市建筑和路面的“坚硬”构成对照,乡土生命生长的“无序”与城市要求的“秩序”成为“反照”,城市化的扩张越快,乡土的价值就愈发凸显。

在当下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追问、挖掘乡土的生态价值是必需的,乡土是中国文化传承的主要阵地,是自然和文明的结合地带。高翔在“生态文明论坛”上指出:“深度挖掘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尤其是乡村振兴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鲜活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积极为乡村振兴和生态文明建设贡献更多创新理论、前瞻思考和战略对策。”^[18]当现代化和城市化成为世界潮流,中国生态文化更要关注乡土与传统,从延续几千年的田园文化出发,提炼其中蕴含的生态文化因子,作为当下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宝库,这是当下中国生态文化的发展方向,也是中国对世界生态文明的独特贡献。

作为中国生态文化批评的倡导者,鲁枢元不仅

从批评的角度对作品进行个案分析,挖掘乡土的生态文化价值,同时也身体力行,以参与实践的方式推动乡土生态文化建设。正如中科院院士许智宏所言:“鲁枢元在忙于生态文艺学教学、科研的同时,还积极投入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教育宣传的事业之中,并一直关注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在中国的实施。”^[19]他参与多项“人与生物圈”的调研活动,进行了井冈山、梵净山的田野调查,撰写多篇生态科普文章,并且作为“历届委员会中第一个文学界委员……率领他的团队积极投入人与生物圈计划的事业中来”^[19]。此外,2021年10月他受邀考察千年古村——河南焦作“段村”,为乡村发展建言献策,考虑到千年传统与乡土的特殊价值,他提出将文化与自然“联姻”,以生态文化的理念去重新认识、构建当下“生态田园”。2023年5月,初步转型的段村迎来了新阶段,3万株蜀葵花盛放,“粮仓美术馆”也隆重开馆,国内知名的画家、作家、植物学家、生态学者齐聚段村,为段村的“生态转型”揭开帷幕,绿色、文化、旅游、休闲等成为段村发展的关键词。在田园传统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共同影响下,千年古村焕发新的活力,传统与“后现代”在此碰撞,成就中国生态文化的实践案例。

四、绿色话语的构思与实践

在生态文化批评的范式构建中,鲁枢元尤其注重绿色话语的应用。他提出:“人文学科,包括哲学、历史、文学、艺术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文化研究,其话语表达的体制、方式、风格应当是不同的。至于在生态研究领域,更应该有另一种符合生态的绿色‘学术话语’。”^[20]在他看来,绿色话语不是一种规则,而是一种表达方式。当学界均为抽象化、陌生化的学术表达而绞尽脑汁的时候,模糊性和有机性的学术话语独树一帜,为学术文章写作提供富有生命活力和野性的典范。他认为,绿色话语的特征是“性情先于知识、观念重于方法。写作应该契合人的性情和本性。……学术话语要具备有机性与生命性,让‘灰色的理论’化为‘绿色的理论’”^[15]。这是一种和乡土文化、精神原乡和生态紧密相连的话语方式,从遣词造句的角度讲,是生态语言的运用,富含生命力;从学术表达来讲,则是浸透作者个性与才情的独特叙述。

绿色话语是生态语言运用的典范,赵奎英认为:“生态语言是人在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基础上生成的,体现了一种全息性关系和生态意识、生态观念,或有利于表现或促进人的生态意识、生态观念的

语言。”^[21]生态语言有四个特征:第一,淳朴自然。来自乡土和动植物的特性浸透其中,带来一种淳朴和活力交融的语言风格,充满了“泥土性”。第二,有机交互。生态语言和自然一样是有机的,富有质感的,是“呈现自然的本质力量,保持着人与自然的天然亲近……洋溢着大地芳香、借助自然事物进行表达的有机语言”^[22],这使得借助生态语言表达的绿色话语富有美感和生命力。第三,词物对应。在生态语言中,词语与物是一一对应的,绿色话语因此真实可感,为读者提供了“具身化”的体验,传达出强烈的情感。第四,与“乡土”“地方”紧密相连。生态语言往往和故乡、童年联系在一起,比如鲁枢元在《天地之中说聊斋》中多次提到他出生的地方,生动可感,饱含真情,传达了故乡对于个体的深刻意义。绿色话语使用生态语言来表述,是一种审美工具,推动生态意识的表达和传播,促使生态运动的深化。

此外,绿色话语有独特的行文特点,“充满了主观视角、自我体验、个人情愫、瞬间感悟、奇妙想象,案例的举证多于概念的解析,事件的陈述优于逻辑的推演,情景的渲染胜过明确的判断,随机的点评超越了旁征博引的考据”^[20]。这是一种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综合表述,是一种“后现代的学术话语形态”^[20]。以《天地之中说聊斋》为例,文章采用随笔、漫谈、札记的书写方式来写作,这种写作方式掺杂了作者自身的生态文化基因,呈现出有机化的行文特征。语言是人类思维的表达方式,语言的运用可以影响乃至塑造人类的意识,这是绿色话语发挥社会影响的路径所在。绿色话语的使用和推广可以影响读者的世界观、价值观,进而影响生态系统。例如,非绿色话语强调人类中心主义、主客二分、等级制,这些都会导致人类的思维趋向于非生态,思维影响行动,进而导致生态破坏。而绿色话语强调生态整体主义和“有机共生”的世界观,个体通过阅读、使用绿色话语,认识到生态系统的要义在于稳定和平衡,进而做出有利于生态系统稳定的举动。人类使用绿色话语,本身也是构建理想生态世界的行动。“人作为生态整体中的有机的一员,言说者及行为本身也是生成与变化的一部分。”^[23]对于绿色话语的使用,推动了言说者本身的生态意识发展与生态实践。

综上所述,鲁枢元的生态文化批评范式以作品和现象作为出发点,触及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传承与当下中国社会的精神生态层面。他的文化批评从作品到现实,又和古今中外的作家作品纵向对比,呈现出广阔的文化视野,衍生了独特的生态文化

属性。他指出:“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种种生态困境,正是由于人类自己营造的‘精神圈’出了问题。我们征服了世界,却不幸在征途的某个地方失去了灵魂。物质的发展过分地超过了精神的发展,在本不可缺少强有力的精神文化的地方,我们则荒废了它。”^[24]所以,他尤其重视精神、文化在改善生态问题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因此,近十年来他把研究重心聚焦于能够直接作用于人类精神层面的生态文化上,撰文陈述自己对生态文化的认识,建设中国生态文化体系,并身体力行推进生态文化的传播。毕竟,在他看来,“人与自然”是人类生存的“元问题”,而生态文化是改善、解决人与自然这个“元问题”的最佳路径。“生态问题必然牵涉到伦理、信仰、教育、哲学等问题,说到底或许还是一个文化问题。”^{[17]3}要想解决生态问题,必须从生态文化入手,关注人类生存的精神环境、文化氛围,而这正是中国生态文化批评的使命和价值。

注释:

①在中国知网上以“精神生态”作为主题词进行搜索,从2005至今,共有期刊论文2230篇,硕博学位论文496篇,详见网<https://kns.cnki.net/kns8/defaultresult/index>.

参考文献:

- [1] 斯洛维克. 走出去思考:入世、出世及生态批评的职责[M]. 韦清琦,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3.
- [2] 鲁枢元. 来路与前程:在全国第二节文艺心理学研讨会上的发言[N]. 文汇报,1989-09-05.
- [3] 鲁枢元. 说鱼上树:精神生态与人类困境[N]. 光明日报,1994-12-21.
- [4] 鲁枢元. 生态文艺学[M]. 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148.
- [5] Félix Guattari. The Three Ecologies[M]. Trans. L. Pindar and P. Sutton 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 2014:47.
- [6] 张惠青. 论生态美学的三个维度:兼论加塔利的“三重生态学”思想[J]. 文艺理论研究,2019(1).
- [7] 胡艳秋. 三重生态学及其精神之维:鲁枢元与菲利克斯·加塔利生态智慧比较[J]. 当代文坛,2021(1).
- [8] 鲁枢元. 我与“精神生态”三十年[J]. 当代文坛,2021(1).
- [9] 鲁枢元. 生态哲学:引导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世界观[J]. 鄱阳湖学刊,2019(1).
- [10] 鲁枢元,张嘉如. 关于中西方生态文化思想的对话[J]. 中州大学学报,2019(2).
- [11] 鲁枢元. 《聊斋志异》新解:在生态文化的视野里[J]. 汉语言文学研究,2022(3).
- [12] 曾繁仁. 生态美学的中国话语探索:兼论中国古代“中

- 和论生态-生命”美学[J]. 中国文化研究,2013(1).
- [13]程相占. 生态美学引论[M].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 2021:53.
- [14]鲁枢元. 天地之中说聊斋[M]. 郑州:中原古籍出版社, 2023:20.
- [15]鲁枢元. 读聊斋,做一个厚道人[N]. 文汇读书周报, 2023-06-28.
- [16]鲁枢元. 东方诗哲与现代性生态陷阱[J]. 当代文坛, 2020(1).
- [17]鲁枢元. 生态时代的文化反思[M]. 上海:东方出版社, 2020:226.
- [18]高翔.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07-01.
- [19]许智宏. 鲁枢元的生态环境以及精神生态研究[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04-28.
- [20]鲁枢元,张雅玲. 生态文艺学研究的观念与方法[J]. 鄱阳湖学刊,2019(1).
- [21]赵奎英. 从生态语言学批评看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J]. 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
- [22]龙其林. 生态中国:文学呈现与跨文化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38.
- [23]吴承笃. 返身于物与多元共生:生态语言的生态性反思[J]. 南京社会科学,2019(8).
- [24]鲁枢元,李金来. 困惑与突围:生态批评的空间:博士生导师鲁枢元教授的访谈[J]. 社会科学家,2017(9).

(责任编辑 刘海燕)

Research on the Paradigm of Chinese Ecological Culture Criticism

——Lu Shuyuan's Ecological Culture View

ZHU Pengji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zhou, Jiangsu 215123, China)

Abstract: *The Ecological Era and Classical Chinese Naturalism* and *Talking about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in Heaven and Earth* are Lu Shuyuan's representative works of ecological cultural criticism. The former studies on the historical influence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f Tao Yuanming and provides a model for Cross-cultural studies; the latter focuses on Pu Songling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his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and interprets it in the way of ecological cultural criticism, providing a case of transdisciplinarity study for China's ecological cultural criticism. In these two monographs, as well as a series of papers and interviews in recent years, Lu Shuyuan has developed his unique ecological and cultural criticism perspective, which is a research paradigm based on spiritual ecology, local thinking,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green discourse, promoting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and cultural research in China.

Key words: ecological cultural criticism; paradigm; Lu Shuyuan; culture view

《金阁寺》:物人映衬的 叙事特色与物哀美学的艺术呈现

王运涛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传媒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金阁寺》中的金阁作为贯穿小说始终的重要物象,不仅为人物沟口提供了美好想象、理想幻灭、自我毁灭的契机,也在他处理同“重要他者”的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金阁的多面形象映射了沟口不同时期的心理状态,构成了沟口精神嬗变的伦理标志物;沟口的多面形象与金阁的多重物象隐喻遥相呼应,成了金阁“物语”表达的参与完成者。小说在写人状物的“双线并进”中探讨了欲望与诱惑的“无常”。

关键词:《金阁寺》;叙事特色;物哀美学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3.04.003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3)04-0017-05

20世纪是一个战争灾难频仍的世纪,对战争的书写一直是世界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日本当代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的长篇小说《金阁寺》,描述一位从小倾慕“金阁寺”的青年沟口,时时谨记父亲生前“世上最美的是金阁寺”之赞誉;然而战后观光客增加,金阁寺的美因此染上尘俗,逐渐令他无法忍受;同时他一向景仰的住持竟犯了色戒,等等,青年绝望之余,走向极端之路。这是一部以真实历史事件为素材的小说,却以虚构的手法塑造了沟口这一典型形象,展现了二战时及其后日本青年的心理状态。

在围绕金阁寺建构的伦理空间中,沟口就像一个行走在绳索之上的人,时刻要保持美的虚幻和欲望的真实之间的平衡。伴随着“绳索之上的行走”,沟口自身及其注视的风景都有了诸多变化,沟口对金阁的态度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从“物人关系”的视角来看,可以发现金阁形象的多重变幻与沟口形象的多面转换有其内在呼应的一致性,空间叙事中的写人与状物各自具有独立的赋义价值,由此形成了小说物人映衬、双线并进的鲜明特色。

一、金阁形象的多重变幻充分展示了“物的诱惑”

小说从“自幼年时,父亲便常对我提及金阁”开

篇,到结尾部分“我起身俯瞰远方山谷间的金阁,只能看见翻滚的浓烟和冲天的火苗”^[1],深入探讨了金阁的诱惑是如何唤起了沟口占有的欲望,以及沟口欲望的满足又是如何在金阁的毁灭中得以达成。“物只有作为与人有关,尤其是与需求、欲望等有关的隐喻与象征,才会在叙事中获得特别的意义”,而“物的显现带来诱惑,而欲望的满足往往又意味着幻灭,许多故事都是始于诱惑而终于幻灭。”^[2]

(一)金阁口耳相传中的美好形象

父亲是金阁与沟口这一“物人”关系的缘起,也是两者相互靠近的桥梁。沟口对金阁的向往,最早源于幼年时期父亲口中时常提起的美轮美奂的金阁。沟口的父亲是一座寺庙住持,在宗教信仰的激发下,父亲眼中的金阁令人向往和沉迷。在沟口幼年时,父亲便常常对他讲述金阁的美,“父亲从未提过现实中的金阁如何光芒璀璨,可他的话总让我觉得这世上再无比金阁更美之物”。在父亲一遍又一遍地真诚讲述“这世上再无比金阁更美之物”后,金阁已经不仅是一座五百多年的古老建筑,也是少年沟口心里的“诗和远方”,以及理想之美的化身。从此,沟口常常幻想着金阁的美,“每当见到阳光照耀在

收稿日期:2023-04-10

作者简介:王运涛(1977—),男,河南开封人,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传媒学院副教授,西北大学文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古代文学和文艺学。

远方的田地,我都觉得那是来自目不可及的金阁的投影”。前往金阁寺成为他长久以来的梦想,这也是他因病去世的父亲的遗愿。作为人与物关系的塑造者和“物”符号意义的主要传播者,父亲不仅让美轮美奂的金阁幻影融进了少年沟口的血脉,也在其离世之前为沟口走近金阁提供了路径。由此可见,沟口的成长深受父亲话语及父亲话语背后隐藏的社会规则的影响,金阁在某种意义上具象了沟口的“理想之美”。

(二)金阁眼见为实的建筑形象

父亲生前曾抱病带沟口进入金阁寺,沟口由此得以近观金阁。看景不如听景,听景不如幻景。曾让沟口产生过无限遐想的金阁,一旦近在眼前,便从神奇的宝物复归为一座普普通通的古老建筑。“那不过是一座旧得发黑的三层小楼”“就连阁顶的凤凰,看起来也只不过是只歇脚的乌鸦”。虽然眼前的现实无情地击破了沟口自幼时便无数次憧憬的金阁之美,曾令他心向往之的世上最美之物金阁的幻象破灭了,然而身临其境的沟口却不愿承认这一点,“无论如何,金阁必须是美丽的”。于是他以自我安慰的方式化解了理想之美的破灭,“金阁刻意隐藏了它的美”“美的事物出于自我保护而掩人耳目”“我得更加接近金阁,去除我眼中感到丑陋的障碍,逐一检查细节,亲眼见证美的核心”。他依然坚信着理想之美——金阁是最美的存在,如今看到的不够美好,或许是金阁为了掩饰自身而幻化成了别的什么东西,而我暂时还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对金阁生动细腻的描写,更加立体地刻画了沟口迷恋金阁的程度。

(三)金阁若即若离的神秘形象

父亲在金阁与沟口这一物人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既为沟口“种下了希望的种子”,也为他提供了靠近的路径。父亲亡故前,专程带沟口到金阁寺“托孤”;父亲亡故后,沟口得以遵照父亲遗愿到金阁寺当了僧徒。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原本“曾让我无比失望的金阁,它的美在我返回安冈后竟日复一日地在我心中被唤醒,不知不觉间竟成长为较之先前更美的金阁了”。待到沟口再次来到金阁寺,“在战争阴霾的映衬下,金阁看上去更耀眼、更生机勃勃了”。由于暗夜里无法看见金阁的面貌,沟口白日里动不动便跑去眺望金阁,在若即若离的相处中对金阁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执着之情”。当“金阁一定会化为灰烬”的想法在沟口心里生根以后,“金阁身上悲剧性的美比以往更为浓烈”,现实中的金阁转化为不逊色于想象中的金阁之美的存在。当他想到金阁可能会被来自空袭的烈火烧毁,“将我烧成灰烬的火焰同样也会将金阁烧成灰烬,

这一想法令我沉醉”。这时的金阁由于沟口“玉石俱焚”的幻想变得更加神秘美艳。

(四)金阁世俗功利的财富形象

如果说父亲是宗教和审美的引导者,那么母亲便是现实及功利的化身,沟口想要排斥躲避又无法排斥躲避,反而深受其影响,直至被其野心打动并俘获。随着母亲的到来,母亲出乎意料的野心俘获了沟口的心,“以后除了在这金阁寺成为住持,你已经没有其他出路”,“我就盼着看一眼你成为鹿苑寺住持的样子再死”。这时的金阁俨然变成了被占有的对象。母亲的看法有其社会基础,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广大俗世民众的看法。在一次远离金阁的独自旅途中,沟口充分领略到了世俗文化浸润下民众眼中的金阁形象。谈到金阁寺,旅途中所遇民众的愤愤不平溢于言表:“每年收入大概有五百多万元,而且这些收入还不用纳税……”

(五)金阁超脱现实的隐喻形象

当师父因不满其旷课、跟踪师父等做法,明确告知让他继承住持衣钵的想法已经荡然无存时,沟口苦闷于占有金阁的想法越来越难以实现,便尝试与女子欢愉,追求现实的享乐,却多次看见“乳房化身金阁”,遭受“金阁在我与女人之间现身阻挠的挫折”。金阁成为隔绝沟口融入现实的一道鸿沟,迫使沟口无奈中一次又一次地放弃。这时的金阁在沟口迷失良心与道德的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唤醒作用,不仅是沟口的精神图腾,也成为他加速融进世俗现实中不得不背负的沉重“十字架”。“女人与我之间,人生与我之间总是伫立着金阁”,由于饱受“金阁”折磨而又难以自拔,沟口对金阁的感情产生了微妙的变化,“总有一天我要控制你,不让你再来坏我好事,总有一天我一定会让你属于我”。而烧掉金阁的想法就像一颗种子,一旦种下就会疯狂生长。最终沟口选择了火烧金阁,当象征着理想之美的“金阁”焚烧于万丈火光中时,“疯狂”的沟口看到了毁灭之美,他摆脱了金阁的束缚后,心里想的是“我想活下去”。至此,烧毁金阁的极端事件超出了个人伦理选择的范畴,成为文化暴力由空间向伦理转化的隐喻,成为作家表达时代和历史之思的政治寓言。“作为完全超乎日本战败、民族悲哀之隐喻的金阁,其毁灭与三岛由纪夫的民族主义情结有着密切关系”^[3]。

二、沟口形象的多面转换充分展示了“人的欲望”

(一)有口难言的受难者

沟口是一位天生口吃、身体羸弱、精神极度压抑的受难者。从沟口的成长经历来看,其身心都遭受了“难言”的苦难:其一,沟口因为先天口吃无法自

由交流而与外界相对隔离,时时要承受“有口难言”的身体缺陷的折磨。其二,母子隔膜是沟口作为受难者的隐秘痛楚。母亲在父亲和他熟睡的帐篷里出轨的行为,导致沟口对母亲情感上的隔膜,精神上由此承受了“难言之隐”的折磨。阿德勒说:“幸运的人一生都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值得注意的是,沟口对女性的认知与追求,构成了其不同人生阶段的分水岭。他对女性的态度,既与母亲带给他的影响有关,也与其内心欲望的脱缰有关。其三,父亲身份是沟口作为受难者承受群嘲的诱因。父亲在偏僻半岛上的寺庙做住持,这让他同学们在中间长期成为被嘲笑的对象。其四,对金阁的“爱而不得”是沟口作为受难者愤懑压抑的“难以承受之重”。沟口到金阁寺后,渴望得到重视以便有机会继承住持,而师父对他不理睬的态度,让他时时感到一种想飞却飞不起来的精神压抑。精神压抑及其苦难长久地折磨着他,让他心理逐渐扭曲,一步一步误入歧途。

(二) 不择手段的追求者

沟口畸形的精神状态与其不幸的幼年生活经历有关。沟口从小因为口吃和不便交流吃尽了苦头,“吃得苦中苦”的人更加渴望“成为人上人”。机缘巧合之下,他如愿以偿地有了进入金阁寺和上大学的机会。童年的苦难经历,在沟口进入金阁寺后反而成为他执着追求的动力。对金阁长久以来的那份特殊的感情,令他在有了占有金阁的可能后,不知不觉间有了更深的执念,沦为一个为占有金阁而不择手段的疯狂追求者。父亲去世后,沟口作为从“孤儿寡母”家庭走出来的一名“孤儿”,到金阁寺作僧徒本是极大的福缘,但其内心的欲望却随着身份的变化而悄然改变,特别是受到了母亲贪婪想法的影响,在不断追求内心欲望的过程中变得更加疯狂。沟口在金阁寺的形单影只使他渴望与同门交往,与同门柏木的交往却为他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同时也使他走上了一条放纵欲望的不归路。在柏木的带领下,沟口与女性之间的交往密切起来。当沟口渴望放飞自我融进俗世生活时,亲近女性的行为却一次又一次地受到了金阁幻影的困扰。在对抗金阁幻象影响的过程中,沟口变得越来越不择手段,最终沦为一个因欲望膨胀而逐步迷失自我的追求者。

(三) 贪婪疯狂的投机者

当沟口发现自己占有金阁寺的欲望遥遥无期后,就做出了一系列毫无底线地讨好住持的疯狂投机行为。“交友不慎”的沟口,在同门柏木的影响下,逐渐领略到了人性沉沦的乐趣,洞察了人世间更多的“真相”:那些看起来高贵善良的姑娘不过是被

柏木轻易捕获的猎物,到大学进修对继承住持看来也没有什么用,想要拥有金阁辉煌的美,就要不择手段。沟口思想的转变逐渐演变成一系列的疯狂试探。沟口在试图引起住持注意的过程中,竟然用虐待孕妇得到的香烟来换取住持师父的欢心。当然,沟口对柏木的言行开始还多少有些“不敢苟同”,但在对善良淳朴的一次次背叛中,他把自己改造成了另一个“柏木”,甚至变得更加疯狂。一门心思只想得到住持更多关注的沟口,表现得越来越贪婪、疯狂,最终用焚烧金阁蒙蔽自己的良心,实现了短暂占有金阁永恒之美的幻想。至此,沟口在不断失去做人底线的过程中,逐步沦为了一名贪婪疯狂、热衷钻营的投机者。

(四) 难以自拔的沉沦者

沟口不仅是蒙受灾难、承受苦难的不幸者,也是制造灾难和导致灾难的负罪者。尼采说过:“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成为恶龙;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以凝视。”^[4]在占有金阁的疯狂执念的影响下,沟口在相继失去了父亲的指引、失去了师父的教导、失去了鹤川的帮助后,最终在柏木的推波助澜下,在占有金阁的狂热中沉沦,乃至难以自拔。父亲去世后,沟口进入金阁寺不久就遇到了三个对其产生重大影响的人:一个是他的师父,一个是鹤川,一个是柏木。当师父对他照顾有加时,沟口怀揣着占有金阁寺的梦想,关注并揣测着师父一言一行背后的意味。当鹤川成为他身边的“白月光”,用自己的言行引导他向善向上时,他表现出足够的理性和善良。当师父对他采取不理睬的态度,而鹤川又因爱自杀后,邪魅的柏木的影响力发挥到了极致。柏木具有超强的说服能力,极具煽动性的话语赢得了沟口由衷的钦佩,他像一个引导者让沟口不断地释放着自己的欲望。于是,师父破色戒的行为和柏木的“循循善诱”,让沟口变得更加“疯狂”,逐渐背离了少年的初心和父亲的期望,一步步的心理扭曲,在美丑反转中走上了烧毁金阁的不归路。

(五) 毁美而生的纵火者

在占有金阁的欲望驱使下,沟口最终上演了一把火烧毁金阁的故事。在他占有金阁的追求由于住持的漠视而陷入困境难以突围时,他的心理逐渐扭曲变态。在此过程中,他看到了德高望重的住持破戒的丑陋,看到了阳光善良的鹤川轻生的残酷,看到了二战结束而金阁毁灭无望的现实,而他内心试图消解金阁美的执念日盛,直至为了短暂占有金阁永恒之美的私念沦为烧毁金阁的纵火犯。究其原因,既有家庭方面的外部原因——母亲变卖了一切,没有了父亲曾经住持过的寺庙,他除了当金阁寺住持

再也没有别的出路;也有其主观上的原因——鹤川“爱不得”苦闷自杀的事实,柏木描绘的俗世快乐的诱惑,激发了他选择尽快融进现实的冲动,推着他追随欲望的脚步走向毁灭。当金阁幻象一次又一次地阻碍他融进现实、亲近女性时,沟口意识到自己已经彻底被金阁“束缚”住了。为了摆脱令他郁闷至极的“束缚”,沟口生出了烧毁象征美的实质的金阁的念头,他要烧毁金阁来迎接自己崭新的未来。从某种角度来看,“父亲话语构建的欲望和师父的期待形成了挥之不去的无意识”,通过语言渗入沟口的思想,致其纵火以求从束缚的人生中得到解脱^[5]。

三、沟口形象的多重意蕴充分展示了“人物的深刻”

(一) 沟口形象的审美意蕴

小说以真实案件为基础,却不拘泥于历史事件和人物本身的经验性真实,而是在历史的合理性、可能性的限度之内,塑造了沟口这一人物形象。通过对沟口心理变化的细腻描写,以物哀美学的旨趣,将沟口放在二战时期日本军事、宗教、经济、教育、文化的背景中来塑造。通过物人映衬叙事手法的妙用,成功塑造了沟口这一具有典型性格的美学形象。作家三岛由纪夫一直以其对人性欲望的深刻洞察而著称,他的美学观念与创作实践与当时风行日本的物哀美学相辉映。物哀文化强调悲与美的相通,沟口这一审美形象融入了作家对美与存在、虚妄与真实、悲剧与毁灭,以及美学与人生、精神与肉体乃至民族前途与个人关系等问题的思考,凝聚了作者“惜生崇死”的生死观,浓缩了作者毁灭美学的深切体验。有评论认为,三岛由纪夫借用林养贤的经历,用沟口替换现实中的林养贤,令沟口“他者化”,成为自己的艺术与人生理念的实践者。从审美视角看,沟口是一个被金阁的美深深吸引难以自拔的人,小说旨在从美学角度来解释他火烧金阁寺的动机;探索他从渴望美到被美所折磨,与美对抗,到“杀”美,通过一步步推翻美而得到“重生”的心路历程^[6]。王国维在谈论诗词时曾讲,“一切景语皆情语”。沟口眼中金阁的独特之美,也是蕴含着深沉情感的“景美”。面对社会的异化、现实的丑陋,沟口期盼以艺术和美来化解,直至烧毁金阁,在美的瞬间求得永恒的静寂。作为战后文学代表作家,三岛由纪夫对中世“物哀”美学中向死而生、视死如归之精神的继承,使得他笔下的沟口更多地沉湎于对战争和死亡的幻想,少有对战争的抗拒和憎恶的情绪。沟口醉心于“毁灭”的形象,不仅是对二战后日本社会复杂现实的真实写照,也是对日本青年在战争期间心理

扭曲、充满迷茫的心路历程的隐喻。

(二) 沟口形象的历史意蕴

沟口不仅是作者着力塑造的一个审美形象,还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历史人物”。“《金阁寺》不仅是在美丑反转中呈现恶的辩证法的伦理小说,还是表达作家个人的时代、历史之思的政治寓言。”^[7]小说虽然把对金阁的描写置于京都随时可能遭遇炮火的历史背景中,却较少使用民族、国家视野的宏大叙事,更多地通过沟口的眼睛对具体人物或者环境的观察,以小见大地折射出日本当时的社会氛围和民众心理。无论是“父亲与住持谈起军队和官僚一味看重神社却轻视寺院”时的愤慨,还是“母亲、佛家弟子和施主众人都立在(父亲)棺前哭泣”的场景,都有着日本社会现实境况和传统习俗的影子。“以文学见证历史,为历史作证,凭借的是想象和情感的力量,其聚焦点是人,其出发点和终极目标也是人。”^[8]小说把二战的影响作为沟口和青年伙伴的青春记忆书写的同时,深入思考了引发战争并将日本青年置于惨无人道的暴力情境中的群体自身所应承担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作家将“青春羡慕”与军事人才培养的记忆放在二战的宏大历史背景中加以观照,二战的炮火不仅作为叙事背景,更作为决定着主人公沟口与金阁关系走向的重要契机,成为二者“相爱相杀”的重要分水岭。小说在讲述沟口对“金阁之美”的追逐转为对“金阁之恶”的毁灭过程中,以伦理叙事的内在多质性和物人映衬的微妙呼应性,表现了作家对文明的趋向、人性的复杂走向所抱有的强烈兴趣,并展示了成熟而出色的驾驭历史事实和人物心理的能力。

(三) 沟口形象的哲学意蕴

沟口与金阁的物人映衬本质上是在探讨诱惑与欲望的关系。题材来自真实事件的《金阁寺》,“因为融入了作家对美与存在、虚妄与真实、悲剧与毁灭的探讨,而使得金阁之火成了某种饱含隐喻的哲学象征”^[9]。由于受到日本传统的无常观念的影响,沟口的遭遇充满了哲学悖论的意味;冷眼旁观他人时表现得理性克制,自身行为却深受柏木的“非理性”说辞影响;身处金阁时反而感觉距离金阁远了,在情感上无法真正融入金阁寺;从小就一直幻想占有金阁,却在试图和姑娘亲密时不断地受到金阁幻象的困扰;努力谋取住持的关注,却在跟踪过程中遭到被发现犯了色戒的住持的彻底抛弃。小说通过二战特定历史情境下金阁寺特定环境中青年烧毁金阁的特殊事件,在理解沟口烧毁金阁的反常行为的基础上,通过诠释和还原沟口与金阁相爱相杀的内心历程,探讨人的欲望和人性真相。通过探寻沟口从

疯狂迷恋金阁、到极力想要摆脱金阁对他的束缚却又处处受其困扰、最终毅然选择了火烧金阁寺的过程中心理变态的缘由,获得超越真实案件的生命启示和生活哲思。沟口从迷恋金阁到毁灭金阁的转变过程,既是一个进城的日本青年在“他者意识”的影响下不懈追求的奋斗过程,也是一个宗教信仰徒不断抛弃品格和底线的堕落过程。跟随着柏木的引导,追逐着内心的欲望,沟口尝试了许多俗世狂欢的事情,并在疯狂追求占有金阁的过程中陷入了一种精神困境,无法摆脱的“束缚”最终促使他踏上了烧毁金阁的不归路。小说通过对人的细腻体察,以及人和事、情和境的悉心观照,揭示了人物性格和心理的内在有机性,使人物性格和命运在一个连续、完整的叙述中得到了饱满、从容的表现。

四、《金阁寺》物人映衬双线并进的艺术特色

(一)物人映衬双线并进的具体表现

沟口随着时间和具体情境的变化不断成长,其成长经历及其对“金阁”的态度转变构成了全书的明暗双线。明线以时间的先后、地点的转换为顺序,如父亲亡故、入寺为僧、攻读大学、同门交往、师徒反目等;暗线以沟口对金阁态度的爱恨转换为顺序,如开篇点金阁(远眺想像金阁)、父亲与金阁(临终托孤金阁)、母亲与金阁(渴望占有金阁)、沟口与金阁(迷恋金阁、火烧金阁)等。小说对金阁的描写被有意地置于“显”的位置,对沟口“心路历程”的刻画则被置于“隐”的位置,显隐相依,以显突隐,彼此映照,在展现“金阁”多面形象的同时,也将沟口对金阁的由爱生恨、相爱相杀的心路历程刻画得淋漓尽致。在战火的威胁下,沟口对炮火来袭的渴望显然是不合时宜、不健康的心理,作者极为耐心地细致描述这种扭曲的心态,由此构成探寻沟口烧毁金阁心理轨迹的重要一环。小说通过对金阁多面形象的生动描写,不仅巧妙地与沟口成长的心路历程相互映衬,也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特定时代的特殊氛围。

(二)个人主线与多人发声的表现方式

金阁形象的多面性呈现,既源于心与物的交汇,也缘于物与人的关系。金阁寺不仅是一个联系着沟口和身边“重要他者”的“场域”,也是一个牵系着沟口和身边“重要他者”关系走向的“地标”。小说围绕沟口对金阁的疯狂迷恋和渴望占有展开,采用“个人主线”与“多人发声”相结合的方式,将更多关于物人关系的思考和想象融入沟口走近金阁的过程。小说以助推或阻碍其占有金阁为标尺,将身边“重要他者”大致划分为两类,如助推其亲近金阁的是父亲,助推其占有金阁的是母亲,阻碍其占有金阁

的是师父,助推其远离金阁的是柏木。这些人的影响形成合力,从根本上影响了沟口对金阁的态度,也决定了沟口的生活态度和未来的命运。小说通过设置对立性人物和矛盾冲突线索凸显人性之复杂,如父亲源于宗教信仰的浸染,引导其萌生迷恋金阁之美的执着;母亲缘于世俗烟火的熏染,催生其产生占有金阁想法的狂热。由此可见,与沟口有或远或近、或浅或深关系的相关人物的言辞,为沟口对金阁的态度变换提供了互补性视角,展现了沟口身边“重要他者”关于欲望、人性和道德的思考和想象。

(三)物的诱惑与人的欲望的双重视角

金阁与沟口的关系十分密切,两者的多面形象之间蕴含着复杂微妙的关联。作者以物的诱惑和人的欲望的双重视角,让金阁和沟口的多向度的形象随着多个出场人物的登台亮相而渐次展示,物人映衬的内在关联性也由此得到了更为丰富的揭示。沟口在不幸的童年生活中承受了无尽的孤独,父亲的多次讲述使得那时的他最向往金阁的美;母亲的到来,点燃了他占有金阁寺的欲望之火;当他占有金阁寺的欲望难以遏制时,却始终被师父的忽视所淹没。为了能够继承住持占有金阁,懦弱的他多般讨好师父,曾打破做人的底线脚踹孕妇而为师父送上香烟;在柏木引导下试图放纵的他,却时常要遭受对抗金阁伟岸形象的煎熬;当发现自己敬重的住持居然犯了色戒时,几近疯狂的沟口选择了短暂逃离金阁寺。在独自旅行中对人生有过一番深刻思考后,再次回到金阁寺,他却发现寺庙里的生活早已没有了当初的平静。在这里,沟口既是我们窥见人性的窗口,也是窥见“重要他者”与人性矛盾纠缠的窗口。

综上所述,从沟口与金阁的关系来看,沟口这一人物形象具有丰富的审美和历史意蕴及深刻的哲学意蕴。沟口与金阁物人映衬、遥相呼应的关系,形成了小说双线并进的叙事特点——展现了沟口为占有金阁寺所作出的各种努力,也揭示了他在金阁的“诱惑”面前逐渐迷失自我的心路历程;既剖析了沟口在与金阁若即若离中野蛮成长的烦恼,也探讨了战争时期日本民众被异化和扭曲的人性,揭示了以丑恶征服美的价值观的缘由。

参考文献:

- [1]三島由紀夫.金閣寺[M].代珂,译.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以下未注明引文皆出自此处)
- [2]傅修延.文学是“人学”也是“物学”:物叙事与意义世界的形成[J].天津社会科学,2021(5):161-173.

(下转第26页)

东西方诗意现实主义的交汇与碰撞

——论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

芦丽红

(上海电机学院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1306)

摘要:《挪威的森林》是村上春树的一部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作品中大量使用了西方文化符号,将诗意现实主义同主人公的生活意境有机联系在一起,再现了日本都市青年在彷徨和苦闷中尚存的浪漫主义自娱自乐生活精神。在这部后现代主义作品中,东西方诗意现实主义的交汇与碰撞,让读者既体验到了西方文学的浪漫氛围,又看到了东方文化雕刻在青年一代身上的传统印记。

关键词:村上春树;诗意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叙事手法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3.04.004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3)04-0022-05

学界一直倾向于认为,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是受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影响而完成的,考证主要来自对书中提到的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进行的对比研究,认为他是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崇拜者,因为这部作品包含的美国文化元素很多。然而,人们没有注意到的是,这部作品的叙事虽深受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但它在艺术风格上同样受欧洲浪漫主义特别是德国诗意浪漫主义(后来发展为诗意现实主义)的影响,这在作品中很多地方都能观察到。在《挪威的森林》中,它们是怎样共同影响村上春树的创作的?目前少见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过讨论。

《挪威的森林》里,有四位男性人物,分别是渡边、木月、“敢死队”和永泽;还有四位女性人物:直子、绿子、玲子和初美,这些人物代表了20世纪70年代日本不同个性的青年男女。虽说他们基本上都是在校学生,但对生活的态度迥然不同,有的是把玩自我,如渡边;有的是个性张扬,如绿子;有的玩世不恭,如永泽;有的与世隔绝,极度封闭自己,如直子;而非学生身份的玲子则是逆来顺受、服从天命的弱女子。小说表面反映的是他们放任自我的生存意识,但深层却

是日本青年在后现代主义社会思潮中的孤独和无助。

正因为渡边心中对此现状不满,有着挥之不去的压抑感,使得他把大学看作只是消遣的场所,觉得大学教育“毫无意义”,甚至把大学看作是“集训,训练自己对无聊的忍耐力”^{[1]58}的地方。因此他不愿随波逐流,而是极力在逃避现实中放逐自我。在生活中,渡边一反日本传统社会道德,不断放纵自己,他先后同他认为是贴心好友的几位女性都发生过性关系,其中他所倾注的情感以直子为最多,但他并不因此感到蒙羞。实际上,直子是他最亲密朋友木月的女友,两人因一直摆脱不掉的孤独和抑郁缠身,最后木月自杀在自家车库里,直子选择在精神疗养院阿美寮深处的森林里上吊。直子身心的分离,也造就了她性格的双重性,对于她来说,爱木月是一回事,和渡边保持特殊关系则是另一回事。初美则结婚两年后在德国自杀。整部小说是以近乎悲情但又具有一定诗意的残局收尾。因为村上春树认为:“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是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1]29}他对生死观的这种反转理解,同西方神学所宣扬的“天堂才是本质和永恒的,而生则是对于死的短暂背离”这一信条恰好是矛盾的,因为诗意现实主义文学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本质不同在于,前者恰恰是对未来生活抱着希望。小说结尾处,

收稿日期:2023-01-10

作者简介:芦丽红(1971—),女,河南许昌市人,上海电机学院外国语学院日语讲师,研究方向:日本文学。

同样患病在阿美寮治疗八年的玲子最终战胜抑郁，走出这家精神疗养院，重新回归社会，就说明了这一点。

二

《挪威的森林》是村上春树在南欧希腊的米克若斯岛和意大利的西西里岛动笔的，一年后封笔于罗马。之前他曾写过《海边的卡夫卡》，涉及的也是在现实中对生死自然法则的感悟。谈及《挪威的森林》，他说：“至于远离日本对（创作）这部小说有何影响，我无法判断。既似乎觉得有某种影响，又似乎无任何影响。”^{[1]359}实际上，熟悉欧洲文学题材的人几乎都能看得出来，除去宗教隐喻和教诲，这部小说受德国诗意浪漫主义及诗意现实主义影响的痕迹很重，是东西方诗意现实主义文学的混合体。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对田园情结的描写，可以说很多地方同19世纪德国诗意现实主义代表作家施笃姆的作品相似。例如，他回忆18年前和直子相识后，在草地上两人散步时的意境：“连日温馨的霏霏细雨，将夏日的尘埃冲洗无余。片片山坡叠青泻翠，抽穗的芒草在十月金风的吹拂下蜿蜒起伏，逶迤的薄云紧贴仿佛冻僵的湛蓝的天壁。”^{[1]2}之后的一年五月中旬，他在四谷车站和直子下车步行前往城里时，对天气的观察：“低垂的阴沉沉的雨云，也似乎被南来风一扫而光似无影无踪了，鲜绿鲜绿的樱树叶随风摇曳，在阳光下闪闪烁烁，太阳光已透出初夏的气息。”^{[1]20}

再看施笃姆的作品《茵梦湖》，主人公莱茵哈德去探望青梅竹马的恋人伊丽莎白时，对湖岸周边环境的描述：“坡前长着一些树梢差点跟坡顶一般高的百年老橡树，越过树梢再往前看，便是一片豁然开朗的天地。脚下远远地躺着一片湖水，宁静、湛蓝，四周几乎全让阳光朗照的绿树包围着。树林只在一个地方留着豁口，展现出背后远远的一带青山。”^{[2]23}这样的诗意描写是对伊丽莎白阳光、文静、性格温柔的陪衬。在施笃姆的《白衣骑士》中，他则将自然景色点缀入主人公霍克和艾尔凯日常生活的浪漫之中，“夜空中繁星闪烁，沼泽地里一派宁静。从东方刮来的阵阵夜风，仍夹带着料峭寒意。可两人慢慢走着……仿佛春天突然已经来临”^{[2]317}。“这些富有诗情的田园景色描写和对人心理的刻画犹如纯净的甘泉，会不知不觉渗入读者的心田中，跟着他们进入主人公所在的时空。”^{[3]178}

诗意现实主义的特征是什么？按照德国文艺理论家的观点，不是去探究人性变异的原因，而是尽力发掘对未来生活的期望，因为“即使在极其贫乏的

日常生活中也存在着一个个富于诗意的瞬间，作家就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些瞬间上，从而再现平庸社会现象中某个诗意的方面”^{[2]1}。在这种创作理念影响下，村上春树对其笔下的田园意境和人物心理也进行了大量诗化处理，甚至不少悲情的场面也用诗的语言进行描述，如渡边前往阿美寮探视生病的直子时，看到里面的“杉树简直像原始森林一般拔地而起，遮天蔽日，将万物笼罩在幽暗的阴影之中”^{[1]113}。这种描述，既展现了直子在阴暗环境中孤单无助的自我救赎，又从侧面暗示了渡边精神上的压抑。

追溯德国诗意浪漫主义的源头，和德国早期浪漫主义文学分不开。早期浪漫主义喜欢涉猎“幻想、伤感和渴望的题材”^{[4]165}，创作主旨在于赞美与世隔绝的宁静和夜生活。被称为“死亡诗人”诺瓦利斯的超验作品《夜之颂》和蒂克的童话《金发艾克贝尔特》都是这方面的名作。但这种远离社会现实、寻求世外桃源、盼望回归中世纪的潮流，到了19世纪中后期，随着德国工业化发展和社会矛盾的加剧，逐步走向了末路，取而代之的是浪漫主义作家不再把对生活的观察凝聚在幻想、伤感及夜的题材上，封闭在狭小的空间内沉思，而是纷纷走出去接近生活。他们热衷于到乡下采集民谣，搜集民间故事，观察和体验普通人生活，回归自然，借以慰藉自己空虚的心灵。这种新潮流，后来被称为诗意现实主义。

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这部小说，很多地方采用了类似于施笃姆的诗意表达手法。在选择描写对象时，他没有将目光放在循规蹈矩的青年人身上，也没有放在社会主流价值观上，更没有把描写对象锁定在有社会影响力的阶层和大人物身上，而是把目光定格在都市的四对年轻小人物平凡的生活上。即使渡边和直子看似非正常的情爱交往，村上也在极力把其中的诗意场景挖掘出来呈现给读者，运用抒情方式来释放自己对往事的眷恋之情。从这个角度来讲，把这部小说称之为东方的悲情诗意现实主义小说，一点也不为过。

三

《挪威的森林》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但却有着极大的文化含量，西方文化与日本文化大量并存、相互混杂是这部小说最显著的特征”^{[5]121}。除去诗意抒情外，小说表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文化潮流冲击的背景。那一代青年反战、任性、无所顾忌，同时生活也很颓废。除此之外，主人公渡边既受西欧青年反对越战思潮的影响，也深受西方性解放运动的冲击，使得他身上带有不少既反传统又反时代的

双重人格特征,强调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虚无主义,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日本融合西方文化的一部分。

因都是同龄人,又具有相同价值观,主人公渡边陷入几个年轻人之间混乱的性关系不足为奇,在他看来这些行为是极其自然的。这种对性伙伴不专一的态度,从表面看同那一代西方同龄人的行为颇为相像,但仔细观察,还是有某些区别的。西方性解放运动赋予了青年人自由选择非婚姻关系性爱伴侣的权利,但一般很少存在几个朋友共选一个性伙伴的现象,而他们之间却不忌讳这一点,有着各种道貌岸然的说辞去粉饰自己。

混乱的性爱关系固然是深受西方性自由和性解放的影响,但从几个女性心灵深处复杂的感受中多少还是能看出些日本妇女在现实社会中地位依然低下的影子,初美在德国割腕自杀就多少反映了她内心对这种现实的不满。日本学者山根由美惠甚至认为,渡边同直子、绿子的三角性关系,也是直子自杀的原因之一,是他对绿子的爱将直子逼到了自杀的境地,成了原罪。性解放在欧美国家民众眼里也许是正常的,被认为是文艺复兴运动以来人的思维从愚钝到理性的发展过程中,打破传统思想禁锢所必然出现的现象。但在重视礼义廉耻的东方儒教文化圈的日本社会发生这种事,却多少让人感到意外。因此村上春树在描写这几个人的混乱关系时,并没有把它视作淫乱,而是极力从背后挖掘那些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因素。

四

在《挪威的森林》中,渡边并没有去追逐豪华奢侈的生活,他的日常生活费用基本上靠打工挣来,过的是一种随遇而安且又自我放纵的日子,他追求的是自我精神解放和无忧无虑的生活方式。渡边既有脱离社会的一面,把自己禁锢在一个很小的人事圈子内,同时又有紧紧拥抱社会的一面,如按时完成学校布置的作业,准点去上课,遵纪守法。即便他和几位女性朋友关系相处比较随意,但基本上还是建立在已经发展起来的相互好感基础上。这种二元悖论造就了渡边的双重人格,他一方面追求音乐,喜爱文学,研究自己所喜欢的学问如西方戏剧史和德语等,在大众面前显示出时尚青年的形象;另一方面,他身上又有特定的反社会特质,如对学校升旗时的态度。原本奏国歌、升国旗仪式在各国都十分庄重,国旗在国歌奏响那一刻起顺着旗杆徐徐上升,代表了国家主权尊严和荣耀,而在他眼里学校升旗时国旗却是“一蹶一蹶地向上爬去”^[14]。但这样“故弄玄虚的升旗仪式也并非毫无用处”^[17],因为《君之代》国歌

声可以代替闹钟,唤醒他的室友“敢死队”从沉睡中按时醒来,在他看来,严肃的升旗和奏国歌仪式的作用大体也就如此了。他这样看待学校的升旗仪式,固然心中有反战思想,但玩世不恭的态度也显而易见。而永泽一方面在语言和衣着上都有着令人赞叹的高贵气质,一方面又是个无可救药的世间俗物,他那颗心同时又在阴暗的泥沼中孤独地挣扎。他们身上表现出的这种反传统、反社会倾向,也可以说是对现代主流社会的背叛,反映的是日本社会进入了后现代主义时期青年人理想的缺失、内心的迷惘和处世的孤独,这一点也同欧美以及其他经济发达国家的青年人在后现代主义时期的思想状况大体是相同的。

从严格意义上讲,日本文化自明治维新开始已在逐步脱离儒学文化圈,到了现代这一过程被加速,如汉字使用数量的不断减少,大量欧美国家外来语源源不断地被借入日本语言中。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可以说除了礼仪文化外,在许多方面日本基本上已摆脱了儒学文化的影响,尽管老一代人身上还保存着传统文化的影子。因此,日本青年人对生活的认知和行为,也同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发展中国家的青年相比有了很大的区别,他们更早地进入了后现代主义时期。

五

《挪威的森林》中,几个年轻人对物质生活基本上没有什么抱怨和过高要求,他们所抱怨的只是社会不重视他们,把他们看作另类,如校方请来平息学潮的机动队就一直对木月没有什么好印象,从而也激起他对社会更加反叛的心理,以至于他自杀身亡后,并没引起警察过多关注,只是前来简单查看一下现场了事。那么,生活中美的标准是什么?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中讲:“任何事物,凡是我们在那里面看得见依照我们的理解应当如此的生活,那就是美的。”^[6]换句话可以这样解读,人世百态中凡符合自己愿望的生活就具有美的特定含义,“这同黑格尔‘美的概念’只是绝对精神活动的结果这一唯心主义观点恰恰相反”^{[7]78}。

小说中的几个年轻人,在已经富裕起来的日本社会中很好地生存是没有问题的,他们随便找一个要求技能不高的工作便可以做到衣食无忧。依托着现代社会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他们在享受现代化生活的同时,也在追求着自我精神的解放,对这种生活方式他们是感到满意的,尽管其中精神快乐是以自我封闭、自我陶醉和反传统的消极形式表现出来的,也乐此不疲,他们认为的生活之美也许就在于此。

但是,这里不得不补充一句,渡边和身边的几个

年轻人之所以对生活采取这样一种逃离社会的消极态度,家庭关爱的缺失也是一个重要诱因。小说中真正出现的学生家长只有绿子的父亲,而且还是躺在医院病房里奄奄一息,无法与人正常交流。直子虽说还有一个姐姐在世,但也是抑郁症患者。永泽的父亲倒是位正常人,并且非常富有,拥有一家医院,但并不怎么关心儿子的成长,也只是把他往私立大学一送了事,从不来看望他。这后两者的身影都没怎么在作品中现身,而是被作者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了。永泽脱离社会,缺乏家庭关爱的游戏人生,在外人看来是消极的,不健康的,甚至是堕落的,但在他的眼里,却符合那一时代的生活潮流,达到了他所追求的否定自我、到达彼岸的精神解放目标。人活着追求享乐,是他奉行的行为准则,因为在他看来,其中也包含了美的内涵。

六

《挪威的森林》的叙事,处处表现着对日本传统小说文本的叛逆,大量采用抒情的表达方式,这同施笃姆的诗意现实主义作品描写极为相仿。叙事采用倒叙手法,内容按照时间节点顺序展开,不太强求文体篇章布局和句子规范。书中故事情节简单,语言简洁而明快,很少有晦涩难懂之处,读起来不让人感到压抑。特别是作者对自然的审美情趣和施笃姆作品有相似之处,有让读者在黑暗中突然看见了明媚阳光的感觉。

村上春树创作这部小说的思路是什么?他接受采访时说,一是“用彻底写实主义文体进行创作”,主要体现在几个年轻人的交往细节上,特别是用私人之间聊天、唱歌、打电话和性爱的直白描写等方式诉说自己的苦闷,并试图用自我救赎的方式解脱自己;二是“彻底直面性和死亡的本质”,写出后现代社会的青年人内心对性爱观念和死亡的认识,不必再对此遮遮掩掩,犹抱琵琶半遮面;三是弥补《且听风吟》这部作品在描写情爱情节时,因“过于羞涩的表达而造成的缺憾”。

《挪威的森林》描写的虽说只是几个年轻人普通的都市世俗生活,但从发生在他们身上的点滴生活小事中,作者暗示了日本社会存在的问题,并用细腻的笔调将青年人对生活认知的心理轨迹表现出来。尽管故事结局有浓重的悲剧色彩,但村上春树用诗意手法又表现得不那么悲怆,这是读者容易接受的。施笃姆早期的作品都在回避当时的社会矛盾,只突出平常生活中某个富有诗意的瞬间,因此他的作品多以家庭、乡村青年人情感为题材,缺乏现实

主义的批判力度,曾被评为“带有毕德麦耶派的特征,没有摆脱多愁善感的宿命论和情感宣泄的影响”^{[8]215}。直到后期他的作品才改变了这一倾向,用现实主义的批判目光审视当时德国社会的矛盾。这一转变在《白衣骑士》中明显地表现出来,如他描写与飓风代表的保守势力搏斗的场景,“唯有一道高过一道的浪峰,一条深似一条的波谷,争先恐后,前推后拥,向着夜空叫嚣,向着陆地猛冲!浪峰的尖头戴着白色的王冠,身体发出千百种怪声,恰似世间的野兽全在一起齐声嗥叫”^{[2]370},这里浪峰尖头上的白色王冠代表着当时社会的保守势力,而那些千奇百怪的嗥叫声则是旧势力的代表。

《挪威的森林》的语言风格与《茵梦湖》有相似之处,叙事又类似《白马骑士》,既具有大量诗意浪漫主义氛围,又有现实主义批判特征。虽然它以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为坐标,寻找隐藏于表面经济繁荣之下的日本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引起的社会矛盾最终导致了直子、木月和初美相继厌世自杀,对中国今天的青年人遇到此类问题时如何解决,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同时,这部小说中呈现的自然生态和生活细节美结合的诗意文体,又给读者带来了阅读上的清新感受,因此也可以将它视作诗意悲情现实主义在后现代主义文学中的再现。

需要提及的是,《挪威的森林》大量使用西方文化符号,如渡边爱听西方音乐,喜欢阅读西方文学作品,学习西方文学理论课程,日常生活喜欢照搬西方人的模式等,这些西方元素反映出日本年轻一代的精神追求,为后现代主义文学创造了土壤,如学者王向远所分析的那样:“除了有日本社会自身的发展逻辑外,战后美国后现代文化的大量输入和影响也是日本后现代主义文学形成的必要条件。”^[9]如果说美国文化为这部作品提供的是后现代主义生活元素,那么德国诗意现实主义提供的却是大量描写元素,村上春树将二者融合而成的这部独特小说文本,为东方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繁荣提供了新的营养成分。

参考文献:

- [1]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M].林少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 [2]特奥多尔·施笃姆.茵梦湖[M].杨武能,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 [3]皇甫宜均.诗意现实主义的感性体验[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09(1).
- [4]芦力军.先验哲学的超验意境[J].世界哲学,2009(5).
- [5]吴雨平.村上春树:文化混杂现象的表现者[J].外国文

学研究,2003(5).

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

[6] 车尔尼雪夫斯基. 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M]. 周扬, 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9] 向远. 日本后现代主义文学与村上春树[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4(5).

[7] 皇甫宜均. 德国诗意见现实主义的悲情倾诉[J]. 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12(1).

(责任编辑 刘海燕)

[8] 卡尔·海因茨·韦斯特. 德国文学简史[M]. 吴涵志,

The Intersection and Collision of Eastern and Western Poetic Realism

—On *Norwegian Wood* by Haruki Murakami

LU Lih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ghai Dian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1306, China)

Abstract: *Norwegian Wood* is a postmodernist literary work by Haruki Murakami, which uses a large number of Western cultural symbols, organically links poetic realism with the life artistic concept of the protagonist, and reproduces the romantic self – entertaining life spirit of the young people in Japanese urban life midst of hesitation, depression and self – isolation. The intersection and collision of the poetic realism of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West in this postmodern work allows readers to experience the romantic atmosphere of Western literature and to see the traditional imprint of Eastern culture on the young generation.

Key words: Haruki Murakami; poetic realism; postmodernism; narrative style

(上接第 21 页)

[3] 朱兆斌. 恶的辩证法与政治寓言:《金阁寺》的意蕴结构探析[J]. 名作欣赏,2021(24):12 – 16.

[7] 朱兆斌. 恶的辩证法与政治寓言:《金阁寺》的意蕴结构探析[J]. 名作欣赏,2021(24):12 – 16.

[4] 尼采. 善恶的彼岸[M]. 朱泱,译. 北京:团结出版社,2001:90.

[8] 吴义勤. 历史、暴力与诗的必要性:邓一光《人,或所有的士兵》论[J]. 小说评论,2020(3):113 – 125.

[5] 教爽. 小说《金阁寺》中的“大他者”:以“沟口”的人物言行为中心[D]. 南京:南京大学,2020.

[9] 周子琰. 冲破“日神”之“阁”的“酒神”之“火”:读《金阁寺》[J]. 青年文学家,2020(32):154 – 155.

[6] 武谢丽. 《金阁寺》沟口内心世界的冲突与重塑[J]. 戏剧之家,2020(6):205.

(责任编辑 刘海燕)

The Temple of the Golden Pavilion: The Narrative Features Against the Objects and Characters and the Artistic Presentation of the Aesthetics of Mono No Aware

WANG Yuntao

(School of Culture Communication,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The Golden Pavilion in *The Temple of the Golden Pavilion* is an important object image throughout the novel, which not only provides Mizoguchi with opportunities for beautiful imagination, ideal disillusionment, and self – destruction, but als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his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important others”. The multifaceted image of the Golden Pavilion reflects Mizoguchi’s psychological state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constitutes an ethical marker of Mizoguchi’s spiritual evolution; the multifaceted image of Mizoguchi echoes the multiple object image metaphors of the Golden Pavilion, becoming a participant and completer of the expression of the “object language” of the Golden Pavilion. The novel explores the “impermanence” of desire and temptation in the “joint progress of two lines” of writing characters and describing objects.

Key words: *The Temple of the Golden Pavilion*; narrative features; aesthetics of mono no aware

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王海霞¹, 黄潇², 张帅³

(1. 中国社会科学院 美国研究所, 北京 100732;

2.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经济学院, 北京 100102; 3. 郑州大学 商学院, 郑州 450001)

摘要:基于中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4—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各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提升能够有效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全方位提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对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实现社会收入分配公平、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全面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收入差距;共同富裕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3.04.005

中图分类号:F81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3)04-0027-07

一、文献综述

居民收入分配问题对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针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影响因素,国内学者从不同视角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研究表明,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因素大致分为三类:一是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二是制度或体制变革;三是政府政策(李实等,1999)^[1]。经济发展、经济改革和经济政策因素是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根源,加速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转换能有效地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充分发挥收入再分配调节作用(赵人伟等,1997)^[2]。从长期来看,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很大程度上依然需要经济发展带来的就业扩大和收入增加(王小鲁等,2005)^[3]。经济高质量发展,产业结构升级能有效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但是不同区域效果有差异。因不同区域资源禀赋不同,产业结构也不同,政府通过统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优化有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徐敏等,2015)^[4]。城镇化的发展对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发挥着积极重要的作用,郭军华(2009)^[5]分析认

为城市化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效果取决于居民收入差距水平,当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水平较低时,加速城市化可以有效地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而当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水平较高时,城市化将会拉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城镇化水平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倒U形”关系,城镇化水平达到49.26%—54.12%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出现缩小趋势(穆怀中等,2016)^[6]。对外开放促进了劳动力流动,影响了收入分配,拉大了城市高端和中端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同时也带来了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对外开放能在某种程度上缓解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其本身不必然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但是在市场化和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制度不健全、政府行为不规范和腐败导致的资源分配扭曲,是造成城乡居民收入分配不公的根本原因(韩军等,2015)^[7]。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对外开放拉大了地区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但这种拉大居民收入差距只是相对的。由于对外开放对不同区域和行业收入的推动作用的程度存在差异,造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相对扩大了(鲁晓东,2007)^[8]。财政支出有减少城乡居

收稿日期:2023-06-02

作者简介:王海霞(1987—),女,河南开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博士后,主要从事宏观经济与财政理论研究。

民收入差距和地区收入差距的作用,但作用并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财政分权的背景下,即使财政投入总量增加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并未缩小,但财政对于农业投入以及科教文卫支出有效地缩小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政府的财政支出倾向从偏向经济增长回归到偏向民生上来,国家提供的面向全民的较高水平的公共服务能有效地解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问题。转移支付是政府政策对低收入人群进行直接收入补偿改善收入分配的有效手段,近年来政府加大了转移支付的力度,但却未能在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方面起到预期的效果(李实等,2018;岳希明等,2020)^[1,9]。

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升级、城镇化、财政支出、转移支付支出、收入差距测算等多个角度研究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是再分配过程的重要工具,是缓解收入分配差距,实现社会公平的主要形式,步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按照中国式现代理念中共同富裕的标准,仍需大力解决城乡间、地区间和行业间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的差异。从作用机制来看,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对居民收入差距有间接和直接作用,有不少学者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角度讨论了其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路径。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进步,人力资本已超过物质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高春亮等(2022)^[10]从人力资本的视角间接分析了公共服务供给与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关系,认为公共服务供给对促进人力资本的提升具有关键作用,在人力资本对人均GDP贡献不断增大的背景下,地区间收入差距会因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差异而更加明显。综合多种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包括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研究其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直接关系,发现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城乡二元结构是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刘乐山等,2005;刘渝琳等,2012)^[11-12]。张子贤和孙伯驰(2022)^[13]则从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的角度研究了其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的提升能够显著抑制城乡收入差距,农村劳动力流动、职业培训的发展、防灾治理能力的提升是其中重要的中介机制。另有学者研究了公共服务差距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李丹、裴育(2019)^[14]从城乡教育差距、医疗卫生差距和社会保障服务差距三个维度分析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认为基本公共服务差距的扩大会加剧城乡收入差距。

总体而言,现有文献从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等方面分析了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并将基本公共服务作为切入点之一从理论和实证层面研究了其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但在基本公共服务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水平测算、基本公共服务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的异质性及传导机制分析等方面相对欠缺。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并基于2004—202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主要基于以下方面: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能够显著降低居民的刚性生活成本,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从内容来看,基本公共服务涵盖了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公共文化、生态环境等居民生活的基础需求,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意味着各项公共服务供给充足度的增加,能够有效降低居民(尤其是低收入群体)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刚性生活支出,并能够为居民提供免费或低价格的公共文化及生态环境资源,使得居民以较低的生活成本享受更高质量的生活,进而提高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缩小收入差距。

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提升能够为地区提供更加优质的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公共文化资源,为地区人才培养与发展创造更加良好的条件,从而改善地区整体人力资本水平,带动收入差距的缩小。从提高收入能力的视角来看,公共教育服务能够为中低收入群体提供更加普惠、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从而提高其知识与综合能力,带动人力资本的形成与积累,进而提升居民整体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医疗卫生服务能够提高居民健康水平,减少居民因疾病影响而减少的工作机会和时间,增加居民“可能工作”时间,提高收入能力和水平;从文化与收入差距的关系来看,文化会对人的思维模式、认知与行为产生重要影响,一是对劳动者“勤劳致富”“勇于创新”等思想观念的影响,二是对中高收入群体“义利观”的影响。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1: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负相关,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地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提升能够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假设2: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不仅会直接影响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还能够影响地方城镇化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进而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产生影响。

三、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一)模型设定

1. 固定效应模型

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为考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结合已有研究并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Gini_{it} = \alpha_0 + \alpha_1 BPS_{it} + \alpha_2 X_{it} + \lambda_i + year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 $Gini_{it}$ 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 BPS_{it} 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 X_{it} 为一组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产业高级化、对外开放水平、财政支出水平及人口老龄化水平, $\alpha_0, \alpha_1, \alpha_2$,为待估参数。通过豪斯曼检验,结果显示 $Prob. = 0.0000 (< 0.01)$,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因而将模型设定为固定效应模型, λ_i 和 $year_t$ 分别为省份与年份固定效应,以消除未观测到的省份与时间因素对实证结果的影响, ε_{it} 为随机扰动项。

(二)数据来源与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基尼系数反映了居民平均收入与期望收入的偏离程度,能够客观地反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等情况,是国际上公认的反映收入差距的权威指标。在我国的各省份统计年鉴中,提供了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分组数据,为此,可根据洛伦兹曲线中不平等面积与完全不平等面积的比值计算出基尼系数,计算公式为:

$$G = 1 - \frac{1}{PW} \sum_{i=1}^N (W_{i-1} + W_i) \times P_i$$

其中, P 为总人口, W 为总收入, P_i 为累积到第*i*组人口, W_i 为累积到第*i*组收入。

计算出城镇和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后,可借鉴 Sundrum(1990)的“分组加权法”计算全国的基尼系数,计算公式如下:

$$G = P_c^2 \frac{u_c}{u} G_c + P_r^2 \frac{u_r}{u} G_r + P_c P_r \frac{u_c - u_r}{u}$$

其中, G_c 为城镇基尼系数, G_r 为农村基尼系数, P_c 为城镇人口比重, P_r 为农村人口比重, u_c 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u_r 为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 u 为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

2. 核心解释变量

(1)指标体系构建

从概念和范围来看,对基本公共服务的界定大多基于满足人最基本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包括教育、

文化、医疗、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基本需求。基于《“十四五”规划》及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对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提出的新要求,结合《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2021年版)》的具体内容,本文主要基于代表性、综合性、可得性、可比性的原则构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评价的指标体系,由于受相关数据可得性、连续性的限制,指标选择仍不全面,但以求能够在较大程度上反映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基本情况。参考现有相关文件精神及研究文献,本文主要将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界定为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公共文化、生态环境五个维度,参考姜晓萍、康健(2020)^[15]、董艳玲、李华(2022)^[16]等人的细化指标选择方式,共选定16项三级指标,具体如表1所示。本研究借鉴现有研究的做法,将熵权法运用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测算与评价中。

表1 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单位	观测数	功效
基础 教育		普通小学生师比	%	510	负向
		普通初中生师比	%	510	负向
		普通高中生师比	%	510	负向
医疗 卫生		每万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张	510	正向
		每万人医疗卫生机构数	个	510	正向
		每万人医疗卫生机构人员数	人	510	正向
		人均农村医疗保健支出	元	510	正向
基本 公共 服务 供给 水平	公共 文化	人均图书馆图书藏量	册	510	正向
		每万人博物馆机构数	个	510	正向
		每万人艺术表演团体数	个	510	正向
社会 保障		每万人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万人	510	正向
		每万人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万人	510	正向
		每万人失业保险参保人数	万人	510	正向
生态 环境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公顷	510	正向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	千吨/日	510	正向
		污水日处理能力	百万 立方米	510	正向

3. 控制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ln pgdp$),经济发展能够扩大就业,增加劳动者收入,是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基础条件。为有效控制异方差的影响,本文选取平减后(以2004年为基期)各地区实际人均GDP衡量经济发展水平,并对其做对数处理;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advanced$),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则表明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越高。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一般包含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度化两个方面。本文以钱纳里标准衡量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以第二产业产值对第三产业产值的比率衡量。以霍夫曼比例衡量产业结构高度化程度,用轻工业产值对重工业产值的比

率衡量。本文中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是赋予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度化两个指标以相同的权重,该指标值越小,则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和高度化程度越大,表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了,则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越高(穆怀中等,2016)^[6]。对外开放水平(*open*),由于中国在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贸易开放有利于出口更多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更多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贸易的增加最终促使要素价格均等化,从而降低收入不平等的程度。此外,对外开放引入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外资企业支付的高工资使技术工人工资提高,从而扩大了收入差距。另一方面,如果中国进口更多资本和技术密集的产品,同时引入更多的外资,就会促进技术进步。本文选取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贸易依存度)来反映对外开放水平;财政支出水平(*fe*),本文采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与*GDP*之比衡量财政支出水平,比值越大,表明财政支出水平越高;人口老龄化水平(*old*),本文以老年人口抚养比衡量人口老龄化水平。

本文以我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研究样本,在数据可得与可比的基础上,为能从更长时期考察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最终效果及变动趋势,此处将研究样本期选取为2004—2020年,所用统计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极个别缺失数据用线性差值法补齐。由于西藏自治区、山东省和吉林省数据缺失较为严重,为避免因数据缺失对实证结果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本研究在省级样本中将其剔除,最终获得476个观测值,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i>Gini</i>	476	0.389	0.048	0.263	0.499
<i>BPS</i>	476	0.233	0.112	0.016	0.599
<i>lnpgdp</i>	476	10.187	0.646	8.366	11.701
<i>advanced</i>	476	1.091	0.631	0.494	5.31
<i>open</i>	476	0.318	0.378	0.008	1.712
<i>edu</i>	476	8.952	1.205	6.378	14.185
<i>fe</i>	476	0.225	0.099	0.087	0.643
<i>old</i>	476	0.135	0.033	0.06	0.25

四、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

基于前文的变量选择及模型构建,本部分采用固定效应模型(FE)检验了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首先,

本文将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这一核心解释变量对基尼系数进行单独回归,再逐步引入各个控制变量,以便于考察加入控制变量后基本公共服务对基尼系数影响的系数变化,同时有助于验证实证模型结果的稳健性。从模型(1)可以看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对基尼系数的影响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回归系数为-0.099,模型(2)到模型(7)依次将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城镇化率等控制变量逐一引入回归模型中,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对基尼系数的影响依然显著,且系数始终保持为负,表明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根据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越高,基尼系数越低,说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提高能够有效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这与于井远(2021)^[17]等人的研究结论一致,有效验证了前文的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说。其中可能的经济学解释为:一方面,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提高能够有效改善居民(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平,降低低收入群体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刚性生活成本,使其可支配收入水平相对提升,有利于缩小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另一方面,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基础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务供给的改善,而基础教育服务、文化服务的改善能够为低收入群体提供更优质的受教育机会,改善人力资本水平,拓宽低收入群体的就业面,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就业能力及收入水平。

从各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在未加入财政支出水平和老龄化水平两个变量前,经济增长水平对基尼系数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即随着经济增长水平的提升,基尼系数有所下降,但加入该两个变量后,经济增长水平对基尼系数的影响不再显著;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对基尼系数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系数为0.009,说明现阶段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拉大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可能的原因在于产业结构高级化过程中,淘汰部分落后产业和产能的同时,增加了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劳动力需求,使得部分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力群体就业难度增加,同时加剧了低收入群体劳动力之间的就业竞争,从而不利于低收入群体收入的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对基尼系数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系数为0.024,说明对外开放水平的提升拉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宋晓东和陈能军(2017)^[18]等人的研究结论一致。可能的原因在于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对外贸易的发展,而现阶段我国外贸行业更倾向

于在城镇特别是沿海地区的城镇发展,因而有利于提高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则会逐步拉大;财政支出水平对基尼系数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影响系数为-0.056,说明政府财政支出水平的提升能够有效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周力和张宁(2021)^[19]的研究结论具有一致性,其中可能的原因在于为矫正初次分配下城乡收入不平等的现实问题,政府通过扩大财政支出用于改善农村居民的生活和生产条件,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农村地区基础设施水平,有利于增加农村

居民的就业机会、提高农村居民收入,从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人口老龄化对基尼系数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系数为-0.092,即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使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所扩大,与宋佳莹等(2022)^[20]的研究结论一致。其中可能的原因是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会加重社会赡养负担,使得部分在外务工的农村劳动力需返乡赡养老人。此外,人口老龄化会使得劳动报酬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有所下降,不利于农村低收入群体收入的提升,拉大了居民收入差距。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7)
	<i>Gini</i>	<i>Gini</i>	<i>Gini</i>	<i>Gini</i>	<i>Gini</i>	<i>Gini</i>	<i>Gini</i>
<i>BPS</i>	0.099*** (0.007)	-0.040** (0.020)	0.075*** (0.023)	-0.051** (0.023)	-0.068*** (0.025)	-0.078*** (0.025)	-0.086*** (0.025)
<i>lnpgdp</i>		-0.013*** (0.004)	-0.010** (0.004)	-0.013*** (0.004)	-0.015*** (0.004)	-0.008* (0.005)	-0.009* (0.005)
<i>advanced</i>			0.009*** (0.003)	0.012*** (0.003)	0.010*** (0.003)	0.012*** (0.003)	0.010*** (0.003)
<i>open</i>				0.023*** (0.006)	0.021*** (0.006)	0.022*** (0.006)	0.019*** (0.006)
<i>edu</i>					0.004** (0.002)	0.003* (0.002)	0.003 (0.002)
<i>fe</i>						-0.057*** (0.021)	-0.050** (0.021)
<i>old</i>							0.083** (0.037)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476	476	476	476	476	476	476
<i>R</i> ²	0.919	0.921	0.923	0.925	0.926	0.927	0.928

注:***、**、* 分别表示在显著水平1%、5%、10%下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下同)。

(二) 稳健性检验

前文通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控制了个体差异对回归结果产生的影响,并通过逐步引入控制变量的方式控制了遗漏变量可能导致的估计结果偏误。为进一步检验回归结果的可靠性,避免因特定变量选择导致的估计偏误,本部分通过缩减样本量的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直辖市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政府治理能力、产业结构、政策优惠等方面存在的显著优势,此处采取剔除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及重庆市的估计策略,进一步增强样本间的可比性。在此基础上,再次通过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为节省篇幅,后文将不对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进行展示。如表4所示,剔除直辖市样本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对基尼系数的影响在5%水平下显著为负,影响系数为-0.090,核心解释变量的检验结果与前文保持一致,再次印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有效性。

表4 剔除直辖市后的回归结果

变量	<i>Gini</i>
<i>BPS</i>	-0.090** (0.032)
控制变量	是
固定效应	是
观测值	408
<i>R</i> ²	0.875

(三) 内生性检验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并引入相关控制变量,通过固定效应模型控制了地区及时间效应,以求排除部分内生性问题。为进一步排除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关系,参考王智波、李长洪(2015)^[21]的研究方法,此处通过将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滞后二期作为工具变量,采取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对基准回归结果进行检验。表5第(1)列报告了工具变量第一阶段回归结果,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二阶滞后项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第(2)列中工具变量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采用工具变量估计

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系数仍然显著为负,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了高度一致性。由此可见,在控制潜在内生性后,本文的估计结果是可信的。

表5 内生性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1)	(2)
	第一阶段回归	第二阶段回归
	<i>BPS</i>	<i>Gini</i>
<i>L2. BPS</i>	0.790*** (0.035)	
<i>BPS</i>		-0.099*** (0.028)
控制变量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观测值	420	420
R^2	0.98	0.727

五、对策建议

(一) 研究结论

步入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研究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利用我国省级面板数据深入考察了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及影响机制。主要结论有:第一,从整体来看,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提升能够有效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因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水平、人口密度、金融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存在异质性;第三,基本公共服务不仅会直接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还会通过影响城镇化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产生间接影响。

(二) 政策建议

第一,全方位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积极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善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条件、拓宽其增收致富渠道。一方面,健全公共财政体制,建立财政对基本公共服务的长效保障机制,并适度加大财政资源对贫困地区及农村的倾斜力度。另一方面,推动各项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发展。优化区域间、城乡间教育资源配置,提升义务教育发展质量及均衡性,大力发展职业教育,通过教育全面提升低收入群体的人力资本水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省级统筹并不断扩大覆盖面,强化对低收入群体的保障效力。加大欠发达地区的医疗卫生队伍建设,优化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在防止因病致贫、返贫等问题的同时,保障低收入群体可行能力的提升。注重农村、贫困地区的文化建设及生态文明建设,为促进低收入群体增收致富创造良好的文化及自然环境。

第二,促进共同富裕要以经济发展为基础,要着力提升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及能力,推动区域、城乡协调发展,为优化基本公共服务、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提供物质基础。基本公共服务对缩小东部沿海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起到了显著的积极作用,而在中西部地区尚未发挥明显作用。因而,应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帮助欠发达地区发展优势产业,提升欠发达地区的工业化水平,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升当地居民整体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与此同时,加大普惠金融建设力度,提升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机构及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及普及率,并将数字技术应用于普惠金融服务中,提高农村低收入群体融资的可得性与便利性,以金融发展水平的改善架起基本公共服务促进收入提升的桥梁,进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第三,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根据前文分析,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不仅会直接促进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还是基本公共服务调节收入差距的重要机制。虽然当前我国城镇化水平已达65%左右,但总体而言,仍存在农业转移人口权益保障不足、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充分、乡村生产生活条件改善不到位等问题。因而,应着力提升城镇化质量。一方面,增强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同步性,保障农业转移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权益,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和效率;另一方面,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除特大型城市外,逐步放宽城市落户限制,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公平的落户机会。此外,多渠道、多层面解决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教育、医疗、就业、住房等问题,降低其刚性生活成本,提高其可支配收入水平。

第四,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为广大农村人口提供更优质的生存和发展条件。一是立足于当地发展的有利条件,大力发展当地特色乡镇产业。不断提高农村就业人群的职业技术水平,以获得更高的劳动收入,提升农民的劳动技能,切实提高农民收入。二是持续推进土地制度改革。我国农民的收入结构中,财产性收入占比非常少。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农民没有从土地上获得直接收益。通过推进土地制度改革,让农民切实从土地承包权和使用权中获得收益,有助于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占比,增加农民的直接收入,从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三是持续增强对农村地区人力资本的投入,提高农村教育质量,提升农民受教育水平,增强农民的人力资本是提高农民收入最有效且长期可持续的最佳途径。

参考文献:

- [1] 李实, 朱梦冰. 中国经济转型 40 年中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J]. 管理世界, 2018(12): 19-28.
- [2] 赵人伟, 李实. 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及其原因[J]. 经济研究, 1997(9): 19-28.
- [3] 王小鲁, 樊纲. 中国收入差距的走势和影响因素分析[J]. 经济研究, 2005(10): 24-36.
- [4] 徐敏, 姜勇. 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能缩小城乡消费差距吗[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5(3): 3-21.
- [5] 郭军华. 中国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基于东、中、西部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 经济问题探索, 2009(12): 1-7.
- [6] 穆怀忠, 吴鹏. 城镇化、产业结构优化与城乡收入差距[J]. 经济学家, 2016(5): 37-44.
- [7] 韩军, 刘润娟, 张俊森. 对外开放对中国收入分配的影响: “南方谈话”和“入世”后效果的实证检验[J]. 中国社会科学, 2015(2): 24-40.
- [8] 鲁晓东. 我国对外开放与收入差距: 基于地区和行业的考察[J]. 世界经济研究, 2007(8): 3-10.
- [9] 岳希明, 张玄. 强化我国税制的收入分配功能: 途径、效果与对策[J]. 税务研究, 2020(3): 13-21.
- [10] 高春亮, 王业强, 魏后凯. 公共服务供给与地区收入差距: 基于人力资本视角的分析[J]. 中国人口科学, 2022(4): 44-59, 127.
- [11] 刘乐山, 何炼成. 公共产品供给的差异: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原因解析[J]. 人文杂志, 2005(1): 129-133.
- [12] 刘渝琳, 陈玲. 教育投入与社会保障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联合影响[J]. 人口学刊, 2012(2): 10-20.
- [13] 张子贤, 孙伯驰. 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提升路径[J]. 求索, 2022(1): 152-164.
- [14] 李丹, 裴育. 城乡公共服务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J]. 财经研究, 2019(4): 111-123.
- [15] 姜晓萍, 康健. 实现程度: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评价的新视角与指标构建[J]. 中国行政管理, 2020(10): 73-79.
- [16] 董艳玲, 李华. 中国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测度、来源分解与形成机理[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2(3): 24-43.
- [17] 于井远. 公共服务质量与城乡收入差距: 机制分析及中国经验[J].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2021(4): 75-88.
- [18] 宋晓东, 陈能军. 我国对外开放红利与城乡收入分配效应研究: 我国对外贸易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关系的实证研究[J]. 价格理论与实践, 2017(1): 157-160.
- [19] 周力, 张宁. 新型城镇化、财政支出与城乡收入差距关联性的统计检验[J]. 统计与决策, 2021(6): 87-89.
- [20] 宋佳莹, 王雅楠, 高传胜. 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 效应与机制: 兼论经济增长、人力资本积累与技术革新的不同作用[J]. 新疆社会科学, 2022(2): 75-87.
- [21] 王智波, 李长洪. 轻资产运营对企业利润率的影响: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 2015(6): 108-121.

(责任编辑 刘成贺)

The Influence of Basic Public Service Supply Level on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WANG Haixia¹, HUANG Xiao², ZHANG Shuai³

(1. Institute of American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Beijing 100732,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102, China;

3. School of Business,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45000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of 29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in China from 2004 to 2020, this research empirically studies the impact of the supply level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on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n each region using a fixed-effects model, and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improving the supply level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in China can effectively narrow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mproving the supply level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in all aspects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narrowing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realizing the fairness of social income distributio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continuously enhancing the people's sense of gain, happiness and security, comprehensively improving people's well-being, and soundly promoting the common prosperity.

Key words: basic public stock level; income gap; common prosperity

双重代理成本视角下 分析师关注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

——基于科创板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夏婷婷¹, 杨卓儒², 蔡新怡³, 赵毅^{1*}

(1. 河北工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天津 300401; 2.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 伦敦 WC1E6BT; 3. 南开大学 金融学院, 天津 300350)

摘要:基于科创板上市公司2019年至2022年数据,揭示并实证检验分析师关注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1)分析师关注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第一类代理成本对分析师关注促进企业研发投入产生了负向调节作用,且对低融资约束型企业的负向调节作用更强;(3)第二类代理成本在分析师关注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具有中介效应,且对于掏空能力弱的企业的中介效应高于掏空能力强的企业的中介效应。研究成果对完善分析师队伍、提高研发投入、加强公司内外部治理建设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

关键词:分析师关注;研发投入;代理成本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3.04.006

中图分类号:F2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3)04-0034-09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创新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强化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构建新发展格局。作为增强企业创新的有力保证,尤其是针对我国科技创新型企业而言,研发投入决策制定实施直接关系到其成败。如何加大企业研发投入,也一直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

分析师作为衔接企业内外部沟通的桥梁,不可否认会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影响。然而对于分析师关注能否有效促进企业研发投入,学者们各持己见。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分析师能够通过发布分析报告架构企业与投资者之间的桥梁,进而缓解企业研发创新面临的严重信息不对称问题。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分析师通过激励、监督双渠道降低代理冲突,

进而增加企业人财物上的研发投入^[1]。同时也有学者赞同分析师抑制论。He和Tian(2013)^[2]基于西方背景制度研究发现,分析师更倾向于预测企业短期业绩,从而引发管理层短视行为,导致企业削减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及高风险的研发投入。

我国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两类委托代理问题,然而学者大多只关注第一类代理成本^[3]。虽然已有研究表明,两类委托代理问题都可能影响研发投入,然而却没有学者将分析师关注、两类代理成本与研发投入放入同一框架研究,即从两类代理成本角度探究分析师关注究竟以何种渠道作用于研发投入^[4]。基于此,本文运用中国科创板上市企业2019至2022年样本数据,将分析师关注、两类代理成本和企业研发投入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剖析分析师

收稿日期:2023-03-12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青年拔尖人才项目“激励创新资本支持雄安新区科技自立自强的长效机制研究”(BJS2023033);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河北省区域创新驱动发展机制建设研究”(HB19ZD03)

作者简介:夏婷婷(1993—),女,河南信阳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风险投资与创新管理;杨卓儒(1998—),男,黑龙江哈尔滨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数字金融;赵毅(1987—),男,甘肃安西人,博士,河北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风险投资与创新管理。

通信作者:赵毅,Email:860147216@qq.com

关注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同时以第一类代理成本作为调节变量,第二类代理成本作为中介变量,探讨分析师关注和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内在机制,从公司治理这一新的视角为分析师关注与企业研发投入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相较已有研究,本文存在以下几点边际贡献:第一,分析师关注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机制有待研究,尤其是针对以我国科技创新型企业为代表的科创板上市公司,现有文献鲜有专门针对此类企业的分析师关注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关系的研究。因此,本研究可作为我国注册制背景下对此类企业分析师关注和研发投入相关理论的有效补充和相关问题的深入探讨,为后续进一步研究奠定理论基础。第二,首次基于两类代理成本视角,不同于以往文献从融资约束层面出发,而是从公司治理层面探讨分析师关注对企业研发投入影响过程中的作用机理。第三,对完善分析师中介队伍、提高研发投入、加强公司治理建设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为我国的创新性建设提供新角度、新启发。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 分析师关注与企业研发投入

具体而言,分析师关注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分析师关注的信息中介作用。分析师利用其行业专长,独立收集整理并深入挖掘分析上市公司公共信息和私人信息,进而发挥信息中介作用;尤其是分析师的专业性和独立性,使其能在解读具有复杂性和专业知识背景门槛的研发创新投入项目上更具有优势^[5]。一方面,分析师主要以研究报告为信息载体向市场传递上市公司企业研发创新方面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研发投入信息传递的广度和深度,减轻信息交流障碍,有效改善因欺诈舞弊错漏等引起的披露信息质量问题^[6]。另一方面,分析师更可能追随研发创新活动。基于分析师的专业性、独立性特点,当涉及极易产生代理问题的研发活动等事项时,相较于管理层、媒体等,分析师具有独特话语权,投资主体更加信任分析师提供的信息^[7]。分析师客观无保留地将信息传递给投资主体,帮助投资主体充分理解企业研发投入所创造的价值,避免创新企业价值被低估,从而提升企业研发投入。此外,研发投入项目的高度复杂性引起的逆向选择问题提高了企业资本成本,而分析师介入后,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企业融资约束状况,进而提高了研发项目投入概率^[5]。因此,分析师关注能够发挥信息中介作用,有效改善企业研发投入信息环境,降低研

发投入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进一步提高研发投入。

2. 分析师关注的监督作用。分析师关注也有助于强化对企业研发投入过程的监督治理,从而提升研发创新投入。一方面,分析师能够直接监督企业研发投入活动。分析师关注人数越多,对上市企业的监督越强。已有文献研究表明,基于声誉机制,为提高分析师绩效与高额投资回报,分析师有动机对上市公司研发投入活动形成监督。分析师通过实地调研、与管理层互动交流^[2]、开展会议等直接监督方式,提高分析追踪努力程度和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关注追踪公司的重大事项(如研发投入),进而震慑管理层、大股东,从而有效遏制管理层、大股东的投机冒险行为^[8-9],管理层、大股东不会过分关注企业短期目的而是转向企业研发创新投入。另一方面,分析师关注人数越多,越能显著提升企业的吸引力,其引致的监督集聚效应能够增加企业价值^[10]。这既能避免投资主体对研发投入的低估进而加大研发投入,又能降低资本成本,提高研发投入项目净现值,从而提升研发投入^[2]。故提出如下假设:

H1: 分析师关注能够促进企业研发投入的提升。

(二) 第一类代理成本的调节作用

作为企业的管理者和战略决策者,经理人应当代表股东利益。然而在契约不完全及道德风险背景下,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导致股东与经理存在利益相悖行为,尤其在涉及企业研发投入时,基于马科维茨投资组合理论,股东追求研发投入带来的长期利益;相反,经理人基于个人业绩、声誉、职业发展等考虑,会本能规避周期长、风险高的研发活动。与此同时,依据 Aghion et al.^[11] 懒惰经理人假说,懒惰的经理人不愿意付出更多时间精力去经营管理需要持续性付出的研发创新项目^[12]。分析师关注可能缓解第一类委托代理问题。一方面,分析师相较于个人投资者,其专业优势能够使其更好发挥信息中介作用,大大降低股东收集信息的成本,缓解股东经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进而降低二者之间代理冲突。另一方面,分析师能够发挥其监督功能,避免股东搭便车问题出现,抑制经理人在职消费等机会主义,降低其权力寻租成本,激发了经理人的管理能力和潜力,因此分析师关注能够平衡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利益,进而缓解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

第一类代理成本的高低反映了管理层与股东利益是否一致。基于此,在第一类代理成本低的企业,经理人与股东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比较和谐,双方

利益比较一致。当分析师介入第一类代理成本低的
企业,分析师能更有效发挥其信息中介的桥梁作用
和激励监督管理作用,使得经理人和股东利益更加
趋同,抑制经理人对研发投入的挤出效应,从企业长
远利益的角度出发提高其研发投入。故提出如下假
设:

H2:第一类代理成本弱化分析师关注对企业研
发投入的正相关作用。

(三) 第二类代理成本的中介作用

对于股权相对集中或高度集中的中国上市公司
而言,在我国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等背景下也滋生
了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第二类委托代理问题,
即大股东掏空行为,尤其是科技创新型企业。

具体而言,基于“隧道挖空”观点,拥有绝对话
语权的大股东基于自利天性和机会主义行为,通过
关联交易、恶意分红^[13]等方式剥削侵害中小股东利
益。大股东掏空行为往往会转移企业内部资金、降
低企业生产效率进而降低企业研发投入^[13-15]。与
此同时,大股东的非理性掏空行为降低了企业资本
配置效率。分析师关注在削减第二类代理成本过程
中有着积极的作用。

一方面,分析师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有效披露,
有效改善研发投入信息环境,既能够使大股东收敛
其机会主义行为,又能够降低中小股东监控成本。

另一方面,分析师关注能够有效督促大股东纠
正与中小股东利益相悖的掏空行为,促使中小股
东采取“用手投票”等积极方式保护自身利益^[16]。与
此同时,由于控股股东利益侵占行为较为隐秘,中
小股东无法及时有效分辨,而分析师能运用其专业
技能揭露控股股东利益侵占等隐秘行为。基于上述
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3a:分析师关注降低第二类代理成本。

H3b:第二类代理成本在分析师关注与企业研
发投入之间具有中介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文选取 2019—2022 年科创板上市公司作为
样本数据,该数据均来源于 CSMAR 数据库。一方
面,考虑到可靠性与可比性问题,本文①剔除 ST、
ST* 和 PT 类企业;②剔除金融行业样本;③剔除研
发投入等关键变量缺失的样本观测值。另一方面,
考虑到异常值问题,本文对主要连续型变量进行
1% 和 99% 水平上的缩尾处理(Winsorize)。

(二) 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本文选取企业当年研发投入金

额,作为衡量企业研发投入的代理变量。为降低异
质性影响,对研发投入金额做对数化处理。该数值
越大,表明企业研发投入越大。此外,本文在稳健性
检验部分采用研发人员数量的自然对数进一步分
析。

2. 解释变量。本文的解释变量是分析师关注。
参考李春涛等^[17]的做法,本文选用在一年内对企业
关注的分析师数量进行度量。同时在后面的稳健性
检验中,采用对企业发布的研究报告数量度量。为
降低异质性影响,取上述变量加 1 后取对数衡量分
析师关注这一变量。

3. 调节变量。本文的调节变量是第一类代理成
本。综观现有文献,大多采用管理费用率和总资产
周转率度量第一类代理成本。虽然总资产周转率是
从管理层生产经营角度反映第一类代理成本,然而
其受企业规模等影响较大,同时管理层相较于关注
公司盈利,更倾向于在职消费等。而管理费用率是
将管理层在职消费等包含进去,故更能进一步反映
第一类代理成本问题,其值越大,表明第一类代理问
题越严重。

4. 中介变量。参考王洪盾等^[18]的度量方法,本
文采用资金占用水平来反映第二类代理成本,大股
东通常通过关联交易及资金占用侵害中小股东利
益。相较于关联收益形成的隐蔽性应收账款,其他
应收款更能反映大股东的“隧道行为”,因此使用其
他应收款与总资产比值对第二类代理成本进行度
量。该比值越大,则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
冲突越严重。

5. 控制变量。借鉴以往研究文献,本文控制了
公司特征和其他相关因素可能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
的影响,特设置如下变量:资产负债率(Lev)、资产
收益率(ROA)、固定资产密集度(Tran)、资本支出
(Cap)、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企业规模(Size)、
流动比率(Liquidity)、净资产收益率(ROE)、管理
层持股比例(MRS)、是否四大(Big4)。同时在模型
中控制了年度效应(Year)和行业效应(Industry)。主
要变量类型、名称及定义如表 1 所示。

(三) 模型设定

为检验分析师关注如何影响科创板上市公司创
新投入,构建模型(1)进行检验

$$\begin{aligned} \text{LnRD}_{i,t} = & \beta_0 + \beta_1 \text{LnAna}_{i,t} + \beta_2 \text{Control}_{i,t} + \\ & \text{YearDummy}_{i,t} + \text{IndustryDummy}_{i,t} + \varepsilon_{i,t} \end{aligned} \quad (1)$$

其中, LnRD_{i,t} 为企业的创新投入指标, LnAna_{i,t}
为分析师关注。 YearDummy_{i,t} 和 IndustryDummy_{i,t}
分别表示年份和行业哑变量。

表1 主要变量表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符号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研发投入	LnRD	研发投入金额,取自然对数
		lnRdperson	研发人员数量,取自然对数
解释变量	分析师关注	LnAna	一年内对公司进行跟踪关注的分析师数量,加1取自然对数
		LnRep	一年内对公司进行跟踪分析的研报数量,加1取自然对数
调节变量	第一类代理成本	Chargerate	管理费用与主营业务收入的比值
中介变量	第二类代理成本	Occupy	其他应收款/资产总额
	资产负债率	Lev	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资产收益率	ROA	净利润/总资产平均余额
控制变量	固定资产密集度	Tran	固定资产/期末总资产
	资本支出	Cap	资本支出/期末总资产
	营业收入增长率	Growth	本年营业收入/上年营业收入-1
	企业规模	Size	员工人数,取自然对数
	流动比率	Liquidity	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净资产收益率	ROE	净利润/净资产
	是否四大	Big4	公司经有四大(普华永道、德勤、毕马威、安永)审计为1,否则为0
	管理层持股比例	MRS	管理层持股比例
	行业虚拟变量	Industry	按照行业生成虚拟变量
	年份虚拟变量	Year	按照年份生成虚拟变量

四、分析师关注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

(一)描述性统计

表2为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2研发投入数量和人员的均值来看,科创板上市公司对研发投入都很重视,但是从研发投入金额及人员数量标准差出发,可以看出各公司研发投入存在较大差距。分析师关注LnAna的均值为1.837(8人),但是标准差为0.88,这表明不同公司受分析师关注程度存在较大差异。

对于两类代理成本而言,第一类代理成本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相差较大,这表明不同上市公司面临的第一类代理问题严重程度不同。与第一类代理成本相似,不同上市公司面临的第二类代理问题也存在较大差距。

表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Variable	N	Mean	p50	SD	Min	Max
LnRD	500	18.380	18.200	1.065	16.440	21.310
LnAna	500	1.837	1.792	0.850	0.693	3.829
Chargerate	500	0.122	0.072	0.315	0.0128	3.169
Occupy	500	0.481	0.286	0.645	0.0033	4.120
ROA	500	0.063	0.064	0.0715	-0.308	0.360
Size	500	6.767	6.679	0.928	4.920	9.775
Big4	500	0.852	1.000	0.355	0.000	1.000
Liquidity	500	6.782	4.337	6.259	0.905	35.78
ROE	500	0.106	0.107	0.123	-0.623	0.655
Tran	500	0.112	0.086	0.0925	0.0027	0.428
Cap	500	0.0066	0.005	0.0056	0.0002	0.0259
Lev	491	0.234	0.200	0.161	0.0297	0.714
Growth	494	0.494	0.198	0.991	-0.885	10.690
MRS	484	24.340	23.110	20.550	0.000	72.570
SA	500	-3.681	-3.672	0.210	-4.428	-3.200
INS	500	49.37	47.43	24.13	4.124	99.620

在控制变量中,从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资产

收益率等均值与标准差可以看出,样本具有良好的代表性。

(二)回归结果与内生性检验

表3展示了OLS和固定效应回归结果。其中,第(1)列OLS结果显示分析师关注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回归系数为0.281, $p < 0.01$,第(2)列Fe结果显示分析师关注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回归系数为0.269, $p < 0.01$,表明分析师关注和企业研发投入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假设H1得到验证。

考虑到分析师关注可能受到研发投入的影响,为了解决这一潜在内生性问题,参考Yu^[19],引入预期分析师关注度这一工具变量并进行2SLS检验。工具变量构建方法如下:

跟踪的人数。Report_{*i,j*},0为0-1变量,*i*公司基年被隶属于*j*券商的分析师跟踪则取1,否则取0。Analyst Number_{*j,0*}表示基年*j*券商拥有的分析师人数,Analyst Number_{*j,t*}表示*t*年*j*券商拥有的分析师人数。

本文数据取自2019至2022年,科创板首批公司于2019年上市,故以2019年作为基年。最后,对*i*公司*t*年度所有券商的预期关注度进行加总,得到以下预期分析师关注度:

$$Expected\ Coverage_{i,j,t} = \frac{Analyst\ Number_{j,t}}{Analyst\ Number_{j,0}} \times Report_{i,j,0} \quad (2)$$

其中,*i*表示受关注企业,*j*表示证券公司,*t*表示年度数。Expected Coverage_{*i,j,t*}表示*i*公司在*t*年度预期被*j*券商分析师

$$Expected\ Coverage_{i,j,t} = \sum_{j=0}^n Expected\ Coverage_{j,t} \quad (3)$$

表4 内生性检验

	(1) LnRD
LnAna	0.433 0*** (0.083 8)
ROA	-5.066 8* (3.019 8)
Size	0.516 8*** (0.050 1)
Big4	-0.581 7*** (0.104 7)
Liquidity	0.012 8** (0.006 1)
ROE	2.158 0 (2.165 6)
Tran	-1.203 6*** (0.408 6)
Cap	-1.798 4 (5.343 1)
Lev	-0.191 4 (0.448 1)
Growth	0.076 1*** (0.027 4)
MRS	-0.005 4*** (0.001 4)
_cons	11.704 1*** (0.513 0)
r ²	0.683 0
Industry	Yes
Year	Yes

第二,替换解释变量。在前面的回归检验中,分析师关注采用的是一年内分析师对上市公司关注数量进行衡量。这一方面基于分析师以研究报告为载体向市场传递信息,另一方面同一分析师可能基于上市公司关注度差异也会对研发投入产生影响^[20]。因此本文采用跟踪分析一家公司的研报总数量(LnRep)来度量分析师关注,重新对模型(1)进行回归检验。表5列(2)结果所示,跟踪分析公司的研报总数量(LnRep)的系数仍然为显著为正,所以认为分析师关注对企业的研发投入仍然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研究结果保持稳健。

第三,滞后一期变量。考虑到分析师关注对科创板上市公司研发投入的影响可能具有滞后性,同时基于双向因果关系引发的潜在内生性问题,进一步以滞后一期的LnAna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分析,结果见表5列(3)。根据回归结果,发现LnAna的系数仍然为显著为正,所以认为分析师关注对企业的研发投入仍然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研究结果保持稳健。

第四,对内生性问题的再思考——通过估计残差代理分析师“净关注”来弱化内生性。分析师关注可能受企业规模、业绩等波动性影响,为了消除这

基于将分析师关注的外生部分剥离构建预期分析师关注,所得预期分析师关注与本期研发投入无关,与实际分析师关注相关,故选取该变量充当工具变量进行2SLS回归。此外,第一阶段回归的F统计量为86.717,远大于10,可以拒绝“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工具变量的选择是合适的。如表4的估计结果所示,在控制内生性问题之后,分析师关注系数显著为正,随着分析师关注的上升,企业研发投入越多,即分析师关注对企业研发投入起到正向促进作用,进一步验证了假设H₁。

表3 分析师关注对研发投入的影响

	OLS LnRD	Fe LnRD
LnAna	0.281 1*** (0.036 1)	0.269 7*** (0.044 7)
ROA	-2.142 5 (2.452 6)	-2.455 3 (3.247 9)
Size	0.592 2*** (0.047 4)	0.569 6*** (0.057 5)
Big4	-0.669 2*** (0.088 7)	-0.644 5*** (0.134 5)
Liquidity	0.009 6 (0.006 4)	0.017 6** (0.007 1)
ROE	-0.120 0 (1.790 1)	0.199 0 (2.402 1)
Tran	-1.761 5*** (0.402 0)	-1.437 6*** (0.457 7)
Cap	10.316 5* (5.976 1)	4.407 9 (6.291 7)
Lev	0.084 0 (0.356 9)	-0.011 7 (0.505 8)
Growth	0.055 9* (0.029 2)	0.058 3* (0.030 7)
MRS	-0.004 2*** (0.001 5)	-0.005 4*** (0.001 8)
_cons	13.022 4*** (0.370 3)	12.992 3*** (0.488 1)
r ²	0.655 2	0.695 5
Industry	Yes	Yes
Year	Yes	Yes

注:***、**、*分别代表1%、5%、10%显著性水平,下同。

(三)稳健性检验

第一,替换被解释变量。在前面的回归检验中,研发投入采用的是研发投入金额自然对数(LnRD)进行衡量,替换为研发人员数量的自然对数(LnRdperson)进行衡量,重新对模型(1)进行回归检验。由表5列(1)回归结果可知,当模型(1)中的被解释变量替换为研发人员数量自然对数(LnRdperson)后,分析师关注(LnAna)的系数仍然为显著为正,故可认为分析师关注对企业的研发投入仍然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研究结果保持稳健。

些因素进而弱化内生性影响,借鉴 Yu^[30]的做法,构建 LnNetAna 变量。首先对模型(4)进行回归,然后提取上述回归中的残差项将其作为分析师净关注的代理变量。

$$\text{Coverage}_{i,t} = \gamma_0 + \gamma_1 \text{Size}_{i,t} + \gamma_2 \text{ROA}_{i,t} + \gamma_3 \text{TobinQ}_{i,t} + \gamma_4 \text{INS}_{i,t} + \gamma_5 \text{Lev}_{i,t} + \gamma_6 \text{Growth}_{i,t} + \varepsilon_{i,t} \quad (4)$$

表 5 列(4)结果显示:模型(1)中, LnNetAna 回归系数在 1% 水平下显著为正,即本文假设 H1 的预期具有稳健性。

表 5 稳健性检验

	(1)	(2)	(3)	(4)
	lnRdperson	LnRD	LnRD	LnRD
LnAna	0.144 5*** (0.029 2)			
LnRep		0.219 7*** (0.036 5)		
lLnAna			0.254 4*** (0.067 3)	
lnNetAna				0.140 8*** (0.030 8)
ROA	2.354 2 (2.035 8)	-2.532 4 (3.298 0)	-0.432 0 (3.535 8)	4.990 4 (4.120 1)
Size	-0.211 6*** (0.042 6)	0.568 9*** (0.057 4)	0.570 3*** (0.089 1)	0.504 4*** (0.077 0)
Big4	-0.154 7** (0.071 7)	-0.632 1*** (0.136 7)	-0.575 9*** (0.172 6)	-0.763 0*** (0.202 9)
Liquidity	-0.004 5 (0.005 0)	0.018 3** (0.007 2)	0.013 1 (0.013 3)	0.008 7 (0.010 0)
ROE	-2.730 4* (1.564 3)	0.221 4 (2.437 0)	-0.002 2 (2.652 8)	-4.186 1 (3.056 7)
Tran	-1.293 9*** (0.310 6)	-1.428 8*** (0.455 1)	-2.222 8*** (0.735 3)	-1.765 5*** (0.643 0)
Cap	0.399 6 (4.465 2)	4.136 8 (6.290 1)	8.058 6 (9.981 8)	13.276 2 (8.848 1)
Lev	-0.245 1 (0.350 3)	0.024 4 (0.509 7)	0.002 1 (0.709 7)	0.352 0 (0.668 8)
Growth	0.045 5** (0.018 2)	0.061 2** (0.030 9)	0.062 8 (0.084 1)	-0.087 1 (0.063 7)
MRS	-0.001 0 (0.001 3)	-0.005 5*** (0.001 8)	-0.002 7 (0.003 2)	-0.005 2** (0.002 2)
_cons	4.037 9*** (0.305 4)	13.024 6*** (0.483 8)	12.977 7*** (0.694 9)	12.838 4*** (0.649 1)
r ²	0.484 0	0.695 1	0.678 5	0.757 9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text{LnRD}_{i,t} = \beta_0 + \beta_1 \text{LnAna}_{i,t} + \beta_2 \text{Chargerate}_{i,t} + \beta_3 \text{Chargerate}_{i,t} \times \text{LnAna}_{i,t} + \beta_4 \text{Control}_{i,t} + \text{Year Dummy}_{i,t} + \text{Industry Dummy}_{i,t} + \varepsilon_{i,t} \quad (5)$$

表 6 显示了第一类代理成本调节效应检验结果。列(1)结果表明:模型(5)中第一类代理成本与分析师关注交互项的系数均在 1% 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第一类代理成本弱化了分析师关注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正向促进作用,即代理成本越低的企业分析师关注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正向影响越强。故模型(5)存在调节效应,H2 得以验证,且分组检验在融资约束不同的企业第一类代理成本对分析师关注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调节作用上存在差异。

表 6 全样本第一类代理成本调节效应

	(1)
	LnRD
LnAna	0.307 9*** (0.038 8)
Chargerate	0.806 4*** (0.237 0)
c. LnAna_1#c. Chargerate	-0.462 9** (0.206 0)
ROA	-1.822 8 (2.328 3)
Size	0.575 7*** (0.045 1)
Big4	-0.577 1*** (0.087 7)
Liquidity	0.016 1** (0.006 3)
ROE	0.137 6 (1.687 4)
Tran	-1.356 2*** (0.388 3)
Cap	4.525 3 (5.704 9)
Lev	-0.072 8 (0.343 4)
Growth	0.063 1** (0.030 7)
MRS	-0.005 9*** (0.001 5)
_cons	12.748 2*** (0.367 7)
r ²	0.705 1
Industry	Yes
Year	Yes

表 7 显示了不同融资约束下第一类代理成本调节效应检验结果。结果表明,融资约束较低组企业的第一类代理成本与分析师关注交互项系数为 -0.542 4,且通过 5% 显著性水平检验。与之相比,高融资约束组第一类代理成本与分析师关注交互项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这是因为当企业面临较低的融资约束,公司资金受限制程度降低,有更

五、基于双重代理成本视角的影响机理

(一)第一类代理成本的调节作用

通过前文的文献梳理和理论分析发现,第一类代理成本可能弱化分析师关注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正相关作用。为检验第一类代理成本在分析师关注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过程中是否发挥了调节作用,建模如下。

强的意愿和能力加大研发投入,故强化了第一类代理成本对分析师关注与企业研发投入的负向调节作用。

表7 子样本第一类代理成本调节效应

	高融资约束 公司子样本 (1)	低融资约束 公司子样本 (2)
Ln Ana	0.367 9*** (0.071 0)	0.214 6*** (0.050 6)
Charge rate	0.118 4 (0.630 0)	1.050 4*** (0.257 8)
c. LnAna_1#c. Chargerate	0.031 0 (0.573 4)	-0.542 4** (0.220 8)
ROA	3.325 4 (4.076 3)	-3.659 5 (2.964 4)
Size	0.571 3*** (0.067 5)	0.600 3*** (0.060 9)
Big4	-0.602 4*** (0.129 4)	-0.470 3*** (0.123 0)
Liquidity	0.011 8 (0.008 2)	0.032 2*** (0.010 0)
ROE	-4.326 5 (3.060 5)	2.183 4 (2.104 5)
Tran	-1.940 5*** (0.563 5)	-1.137 6** (0.548 6)
Cap	-1.336 8 (7.961 0)	21.993 2** (8.481 3)
Lev	0.549 6 (0.587 9)	0.056 1 (0.438 5)
Growth	0.090 8* (0.050 8)	0.019 9 (0.038 9)
MRS	-0.003 7* (0.002 2)	-0.008 5*** (0.002 0)
_cons	12.854 7*** (0.550 1)	12.564 1*** (0.505 1)
r ²	0.729 2	0.721 1
Industry	Yes	Yes
Year	Yes	Yes

(二) 第二类代理成本的中介作用

通过前文的文献梳理和理论分析发现分析师关注可能通过降低第二类代理成本而提高企业研发投入。为了验证这种作用路径的存在,构建如下模型(6)和(7):

$$\text{Occupy}_{i,t} = \beta_0 + \beta_1 \text{LnAna}_{i,t} + \beta_2 \text{Control}_{i,t} + \text{Year Dummy}_{i,t} + \text{Industry Dummy}_{i,t} + \varepsilon_{i,t} \quad (6)$$

$$\text{LnRD}_{i,t} = \beta_0 + \beta_1 \text{LnAna}_{i,t} + \beta_2 \text{Occupy}_{i,t} + \beta_3 + \text{Year Dummy}_{i,t} + \text{Industry Dummy}_{i,t} + \varepsilon_{i,t} \quad (7)$$

表8显示了全样本下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8列(1)结果表明,分析师关注对研发投入的总影响效应显著,且两者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8列(2)结果显示,分析师关注与第二类代理成本的回归系数为-0.063 2, $p < 0.05$,表明分析师关注和第二类代理成本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H3a 得到验证。

表8列(2)(3)结果显示,第二类代理成本在金融发展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H3b 得到验证。

表8 全样本下第二类代理成本中介效应检验

	(1) LnRD	(2) Occupy	(3) LnRD
LnAna	0.269 7*** (0.034 7)	-0.063 2** (0.027 1)	0.261 3*** (0.034 8)
Occupy			-0.1317** (0.0602)
ROA	-2.455 3 (2.335 9)	-1.559 8 (1.824 7)	-2.6607 (2.3280)
Size	0.569 6*** (0.045 4)	-0.089 9** (0.035 5)	0.5578*** (0.045 6)
Big4	-0.644 5*** (0.086 2)	0.144 9** (0.067 3)	-0.625 4*** (0.086 2)
Liquidity	0.017 6*** (0.006 3)	0.001 3 (0.004 9)	0.017 8*** (0.006 3)
ROE	0.199 0 (1.707 2)	1.438 7 (1.333 6)	0.388 5 (1.702 3)
Tran	-1.437 6*** (0.392 1)	0.226 4 (0.306 3)	-1.407 8*** (0.390 7)
Cap	4.407 9 (5.769 8)	3.608 9 (4.507 0)	4.883 2 (5.749 7)
Lev	-0.011 7 (0.346 8)	0.005 0 (0.270 9)	-0.011 0 (0.345 4)
Growth	0.058 3** (0.028 2)	-0.010 3 (0.022 0)	0.056 9** (0.028 1)
MRS	-0.005 4*** (0.001 5)	0.000 5 (0.001 1)	-0.005 3*** (0.001 5)
_cons	12.992 3*** (0.365 8)	-3.478 6*** (0.285 7)	12.534 2*** (0.420 2)
r ²	0.695 5	0.544 1	0.698 7
Industry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为进一步厘清第二类代理成本在两权分离不同企业中中介效应的差异,将样本分为掏空能力强和弱的两组并再次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检验结果如表9所示。表9结果表明,不论是在掏空能力强还是在掏空能力弱的企业,第二类代理成本在金融发展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过程中发挥的中介作用都存在。但根据中介效应计算可得,掏空能力强的企业,第二类代理成本在分析师关注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中介效应占比: $(-0.0589) * (-0.1119) / 0.26 = 2.52%$ 。第二类代理成本在分析师关注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中介效应占比 $(-0.1025) * (-0.2964) / 0.3194 = 9.51%$,结果表明,掏空能力弱的企业第二类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高于掏空能力强的企业第二类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究其原因,在掏空能力弱的企业,大股东更多表现为壕沟防守效应,分析师关注增加能有效遏制大股东掏空行为,提高了信息透明度,促使企业完善治理结构,进而提高研发投入。

表9 子样本下第二类代理成本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掏空能力强公司子样本			掏空能力弱公司子样本		
	(1) LnRD	(2) Occupy	(3) LnRD	(4) LnRD	(5) Occupy	(6) LnRD
LnAna	0.260 8*** (0.039 3)	-0.058 9* (0.032 2)	0.254 3*** (0.039 4)	0.319 4*** (0.076 2)	-0.102 5** (0.048 3)	0.289 0*** (0.076 9)
Occupy			-0.111 9* (0.067 2)			-0.296 4* (0.154 1)
ROA	-3.804 7 (2.581 4)	-0.222 4 (2.118 5)	-3.829 6 (2.574 5)	-4.899 5 (6.435 1)	-1.848 3 (4.081 5)	-5.447 3 (6.358 0)
Size	0.537 5*** (0.054 2)	-0.053 2 (0.044 5)	0.531 5*** (0.054 2)	0.609 9*** (0.090 0)	-0.203 8*** (0.057 1)	0.549 5*** (0.094 3)
Big4	-0.700 1*** (0.099 1)	0.166 0** (0.081 4)	-0.681 5*** (0.099 5)	-0.494 1*** (0.181 8)	0.083 1 (0.115 3)	-0.469 5** (0.179 9)
Liquidity	0.023 0*** (0.007 0)	0.005 7 (0.005 8)	0.023 7*** (0.007 0)	-0.013 5 (0.015 1)	-0.024 9** (0.009 6)	-0.020 9 (0.015 4)
ROE	0.908 0 (1.861 6)	0.622 9 (1.527 8)	0.977 7 (1.857 0)	3.175 8 (4.929 0)	0.784 7 (3.126 3)	3.408 4 (4.866 6)
Tran	-1.164 6** (0.450 8)	0.151 8 (0.370 0)	-1.147 6** (0.449 7)	-2.224 3*** (0.845 2)	-0.178 3 (0.536 1)	-2.277 2*** (0.834 6)
Cap	1.776 6 (7.076 7)	-0.833 7 (5.807 8)	1.683 2 (7.057 8)	14.729 8 (10.833 7)	16.945 4** (6.871 4)	19.751 7* (11.007 3)
Lev	0.332 0 (0.385 7)	0.107 0 (0.316 5)	0.344 0 (0.384 7)	-2.111 9** (0.910 9)	-0.591 7 (0.577 7)	-2.287 3** (0.903 7)
Growth	0.063 8** (0.030 8)	-0.014 0 (0.025 3)	0.062 2** (0.030 7)	0.028 2 (0.072 0)	-0.017 1 (0.045 6)	0.023 2 (0.071 1)
MRS	-0.005 0*** (0.001 8)	0.000 6 (0.001 4)	-0.004 9*** (0.001 8)	-0.006 7** (0.002 9)	0.002 2 (0.001 8)	-0.006 0** (0.002 9)
_cons	13.261 9*** (0.426 9)	-3.810 8*** (0.350 4)	12.835 3*** (0.496 8)	12.703 7*** (0.754 6)	-2.325 8*** (0.478 6)	12.014 4*** (0.826 5)
r ²	0.712 7	0.546 2	0.715 1	0.705 0	0.662 2	0.715 4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 研究结论

本文以2019—2022年科创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两类代理成本出发,以第一类代理成本为调节变量,第二类代理成本为中介变量,从公司治理层面探讨了分析师关注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机理并得出如下结论:(1)分析师关注对企业研发投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创新效率;(2)第一类代理成本对分析师关注促进企业研发投入产生了负向调节作用,且进一步依据融资约束进行分组检验,结果发现低融资约束组企业的分析师关注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的负向调节作用更强;(3)分析师关注能降低第二类代理成本,第二类代理成本在分析师关注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具有中介效应,并且进一步依据掏空能力进行分组检验,结果发现掏空能力弱的企业第二类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高于掏空能力强的企业第二类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

(二) 管理启示

1. 政府及监管部门应大力完善作为企业内外部沟通中介的队伍建设,完善分析师关注对研发投入的引导机制。不仅强调分析师信息传递功能,同时

也要强调分析师关注信息传递的深度广度,保证实体经济研发创新活动持续平稳进行,有利于我国创新性国家战略落地转型。

2. 就企业自身而言,应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考虑到分析师促进不同公司的研发投入在第一类代理问题及第二类代理问题程度上的区别,企业应注重“管理层短视”与“大股东掏空”行为,使得管理层与股东、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利益趋于一致,从而让分析师发挥更加有效的信息中介与激励监督作用来促进研发投入。

3. 就市场而言,应完善市场信息披露机制。信息不对称是公司双重代理成本产生的缘由。科创企业面临的双重代理成本问题较为严重,更应注重信息披露,进而提升研发投入,保证科创企业可持续创新。

参考文献:

- [1] 韩松, 习媛杰. 风险视角下企业治理结构和研发创新: 基于委托代理模型的研究[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21, 41(4): 39-53.
- [2] He J, Tian X. The Dark Side of Analyst Coverage: The Case of Innovation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3

- [3] 吴先聪,张健,胡志颖. 机构投资者特征、终极控制人性
质与大股东掏空:基于关联交易视角的研究[J]. 外国经
济与管理,2016,38(6):3-20.
- [4] 李姝,翟士运,古朴. 非控股股东参与决策的积极性与企
业技术创新[J]. 中国工业经济,2018(7):155-173.
- [5] 余明桂,钟慧洁,范蕊. 分析师关注与企业创新:来自中国资
本市场的经验证据[J]. 经济管理,2017(3):175-192.
- [6] Cheng Q, Du F, Wang X, et al. Seeing is believing: Ana-
lysts' corporate site visits[J].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
ies,2016,21(4):1245-1286.
- [7] 陈钦源,马黎璐,伊志宏. 分析师跟踪与企业创新绩效:中
国的逻辑[J]. 南开管理评论,2017,20(3):15-27.
- [8] 杨青,周绍妮. 技术并购能够带来技术创新效应吗:收购
公司成长潜力视角[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19,36(24):
100-108.
- [9] Green T C, Jame R, Markov S, et al. Access to Management
and the Informativeness of Analyst Research[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14,114(2):239-225.
- [10] 刘柏,琚涛. “事前震慑”与“事后纠偏”:分析师关注对
财务错报和重述的跨期监管研究[J]. 南开管理评论,
2021,24(1):50-61.
- [11] Chen C, Lee H. Rigidity of Selling, General, and Adminis-
trative Costs and Managerial Incentives to Meet Earnings
Thresholds:Evidence from Conglomerates[J]. Review of E-
conomics & Finance,2019,15(1):46-56.
- [12] Bernstein S. Does Going Public Affect Innovation[J]. The
Journal of Finance,2015,70(4):1365-1403.
- [13] Duygun M, Guney Y, Moin A. Dividend Policy of Indone-
sian Listed Firms:The Role of Families and the State[J]. E-
conomic Modelling,2018,75:336-354.
- [14] YE Y, HUANG L, LI M. Negative media coverage, law en-
vironment and tunneling of controlling shareholder:Evidence
from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J]. China Finance Review
International,2015,5(1):3-18.
- [15] 翟士运,古朴. 关联担保与企业创新:基于双重视角的
分析[J]. 科研管理,2020,41(12):121-130.
- [16] 严若森,叶云龙. 证券分析师跟踪与企业双重代理成
本:基于中国 A 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中国软科
学,2017(10):173-183.
- [17] 李春涛,赵一,徐欣,等. 按下葫芦浮起瓢:分析师跟踪与盈
余管理途径选择[J]. 金融研究,2016(4):144-157.
- [18] 王洪盾,吴虹仪,岳华. 第二类代理问题与企业研发投入:
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J]. 工业技术
经济,2020,39(6):45-53.
- [19] Yu F. Analyst Coverage and Earnings Management[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8,88:245-271.
- [20] 周泽将,马静,胡刘芬. 高管薪酬激励体系设计中的风险补
偿效应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2018(12):152-169.

(责任编辑 吕志远)

The Impact of Analyst Attention on Corporate R&D Invest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ual Agency Cost: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Board Listed Companies

XIA Tingting¹, YANG Zhuoru², CAI Xinyi³, ZHAO Yi^{1*}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e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300401, China;

2.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UCL), London WC1E6BT, UK; 3. Finance School,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listed companies on the Chin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Board from 2019 to 2022, this paper empirically tests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analyst attention on corporate R&D invest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Analyst attention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corporate R&D investment. (2) The first type of agency cost has a negative moderating effect on analyst attention to promote corporate R&D investment, and it is further found that the negative moderating effect of enterprises in the low financing constraint group is stronger. (3) The second type of agency cost has a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analyst attention and corporate R&D investment, and it is further found that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of enterprises with weak hollowing ability is higher than that of enterprises with strong hollowing ability. Based on this, it provides practical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the analyst team, increasing R&D investment,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mpany's internal and external governance construction.

Key words: analyst attention; R&D investment; agency cost

商品同质是非自由竞争的前提研究

——兼论完全竞争与自由竞争的关系

郭强

(河南工程学院图书馆,河南郑州451191)

摘要:完全竞争是新古典经济学科学化的根基,商品同质是完全竞争的前提条件之一。商品同质要求商家在同质产品上进行竞争,自由竞争是法律范围内商家想生产什么就生产什么,是自由选择机制,商品同质不是自由竞争的前提。虽然完全竞争的一个条件是资源自由流动,但把完全竞争等同于自由竞争是错误的。商品同质导致商品只有价格竞争,忽视商品的质量竞争,以偏概全。人是趋利避害或理性的,只要人们有自由选择竞争的权力,就不会有完全竞争。

关键词:商品同质;自由竞争;完全竞争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3.04.007

中图分类号:F0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3)04-0043-06

经济学家倡导自由竞争,因为竞争是选择函数,对消费者来说,谁的商品好,消费者选择谁;对人来说,谁的效率高,企业选择谁。自由竞争是每个人都有参与任何竞争的权利,可以选择自己最擅长的工作或行业。所以,个人行为在没有负的外部性的情况下,自由竞争可以使每个人的效率最大化,进而提高全社会的经济效率。200多年前亚当·斯密就说:“一件事情若对社会有益,应当任其自由,广其竞争。竞争愈自由,那事情愈有利于社会。”^[1]随后的大卫·李嘉图也反对重商主义,倡导自由贸易、自由竞争。马克思也认为自由竞争提高了效率,“资本主义还不到一百年,它所造成的生产力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2]。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出现之前,经济学家们对自由竞争没有统一的定义或标准。新古典时期,经济学为了用数学证明市场是均衡的,提出了完全竞争理论。他们认为:同质化商品只存在价格竞争,完全竞争会使产品、劳动的价格和资本的利润达到最低,实现供求均衡及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完全竞争成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根基,新古典经济学也用完全竞争代替了自由竞争,并制定了相应标准(或前提条件)——商品同质为条件之一。完全竞争理论出现后,遭到熊

彼特、奈特、哈耶克等不少学者的质疑,他们批判完全竞争是静态的、不现实的,但学者们很少质疑自由竞争。对完全竞争和自由竞争的关系,法国学者克萊芒认为“自由竞争一词不应与纯粹的完全竞争的经济概念混淆,它是指法律上无法以禁止行为阻止的竞争,其中包括市场瓜分或企业的障碍性抵制。”^[3]斯蒂格勒认为,古典学派关于自由竞争的定义更多的是根据经济行为,而不是市场结构。但对完全竞争的中心地位,斯蒂格勒还是维护的,“对一个得到广泛应用的模型而言,只要它的定义的清晰度在可容忍范围之内,理论研究者就无需在每次理论扩展和应用时对它的科学基础进行争论”^[4]。张伯伦则是从商品同质方面认为完全竞争假设不切实际,现实商品大都不是同质的,他认为:“有差别则垄断发生,差别的程度越大,垄断的因素也越大。盖产品如有任何程度的差别,则可说该售卖者对他自己的产品拥有绝对的垄断,但却要或多或少遭受到不完全替代品的竞争。这样则每人都是垄断者,同时也是竞争者,我们可以称他们为‘竞争的垄断者’,而称这种力量为‘垄断竞争’特别相宜。”^[5]他实际是根据新古典经济学对完全竞争的标准,也即同质商品,一个生产厂家,这种市场结构为垄断;同

收稿日期:2023-05-12

作者简介:郭强(1972—),男,河南商水人,河南工程学院图书馆馆长、高级经济师,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

质商品、许多生产厂家,这种市场结构为完全竞争。但现实由于专利制度、商标、喜好等原因,工业品质量大都不同,但又相互竞争,所以称垄断竞争,而罗宾逊夫人认为除去完全竞争都应称为不完全竞争。哈罗德·德姆塞茨认为竞争可能发生的范围是:产量、价格、质量和创新,因而仅以厂商提供同质产品这一维度来衡量竞争强度肯定会以偏概全。^[6]张伯伦和罗宾逊夫人虽认为现实是不完全竞争的,但他们认为完全竞争最有效率,仍用均衡分析的方法分析垄断竞争。实际上商品同质不仅导致竞争分析以偏概全,而且商品同质否定了竞争自由。从竞争演变看,古代农业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只是完全竞争是无效率的,随着自由竞争的出现,完全竞争消失了。

一、商品竞争的方式

商品竞争有时比价格,有时比质量,比价格是价格竞争,比质量(含品牌、地域、功能等非价格因素)是质量竞争。

(一) 价格竞争(同质商品竞争)

价格竞争就是谁的商品价格低消费者选择谁,用竞价函数表示: $P = \text{Min} \{ P_1, P_2, P_3 \dots \}$, $P_1, P_2, P_3 \dots$ 为各商品价格,其隐含条件是商品同质。只有同质量的商品才能比价格高低,比如豪华奔驰和低端奔驰是不能比价格的。价格竞争主要表现为低端商品的竞争,市场专家曾说:“价格竞争主要表现为通过低价刺激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实现销量增加,企业的开拓创新能力不足。而非价格竞争策略所具有的创新能力更能满足消费升级的需求。”^[7]价格竞争的结果就是:商家想方设法降低成本,或者商家创新产品,提高质量,寻求质量竞争或差异化竞争,而后者是市场最终的选择。

(二) 质量竞争(差异化竞争)

质量竞争是商品比质量,谁的质量好消费者选择谁,用质量竞争函数表示: $Q = \text{Max} \{ Q_1, Q_2, Q_3 \dots \}$, $Q_1, Q_2, Q_3 \dots$ 为各商品质量,其隐含条件是价格相同。当然现实中,消费者也常常根据性价比选择,谁的性价比高选择谁,用函数表示: $Q/P = \text{Max} \{ Q_1/P_1, Q_2/P_2, Q_3/P_3 \dots \}$ 。与价格竞争不同,由于消费者需求的差异,质量竞争导致商家产品质量、性能的差异化。张伯伦认为,这种差异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是想象的,既有产品品质、设计、颜色、包装等的不同,也有专利、商标、信誉、服务态度等的不同。也就是说质量的含义很广泛,不仅仅是产品的性能指标和外观感知,还包括满足客户需求的所有产品属性。有学者把质量定义为一组固有特性满

足客户需求的程度,就是瞄准了产品的关键价值在于满足客户需求。^[8]现实中质量竞争是主要竞争方式,就如市场专家说的:“全球市场竞争力的核心体现就是质量竞争力。”^[9]每人的需求是不一样的,特别是随着生活水平提高,消费市场呈现出个性化、层次化、差异化的市场特征。单一的价格竞争以及同质化的产品难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比如一个普通皮包可能降到百元也没人要,但一个LV包上万元还抢着买。并且在质量竞争方面随着大数据的应用,商家可以更全面地了解消费者对需求的变化,根据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改进商品质量,改变销售策略,提供高质量的商品和服务,提高消费者的满意度与忠诚度。加之商标、专利等知识产权化,产权的排他性造成其他商家只能生产不同质商品,这样带来的结果是市场上产品品种更多,质量、性能更加多元化。

(三) 其他竞争

自由经济下,竞争是全方位的,比如电脑或数字技术淘汰纸张、互联网淘汰有线电视、数码相机淘汰胶卷等,这种竞争起初大家看不到,但随着新技术的应用,一个看似不相关、不同质的产品或技术淘汰了某类商品,这才是自由竞争的魅力。

二、自由竞争与完全竞争

所谓自由竞争,一般是指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在各企业或各行业之间可以自由转移为特征的竞争^[10],“完全竞争是以包括进入市场的众多企业产品无差别和买卖双方对于有关市场信息都具有完全知识等一系列严格假设条件为前提的自由竞争”^[11]。还有学者把完全竞争看作没有干扰的自由竞争。^[12]陶德清的《新编经济体制改革辞典》说“完全竞争也称自由竞争”,季德把完全竞争和自由竞争视为一体^[13],并且现代经济学教材只提完全竞争,不说自由竞争,说明许多学者把完全竞争等同于自由竞争。实际上自由竞争是指可以自由进行资本投入、转移和商品买卖的竞争,也就是法律范围内商家想生产什么就生产什么,是一种自由选择机制。而完全竞争是新古典经济学提出的竞争模型,只有标准,没有定义,其实质是要求大家在同质商品上竞争,是市场上某个商品的竞争情况。以下通过比较两者的前提条件和竞争模型等来看两者的不同和关系。

(一) 完全竞争和自由竞争的前提条件

新古典经济学主要思想一是经济学可以科学化;二是政府不干预市场会达到均衡。在这种思想下,古诺、杰文斯、瓦尔拉斯、马歇尔等用数学推理市场均衡或极值问题,后人或他们自己发现这些推理需要一些假设才能成立,比如马歇尔的均衡价格分

析隐含自由竞争和商品同质;古诺、埃奇沃斯认为竞争是单个生产者产量对价格没有影响,大家都接受一个价格,要求无数个竞争者;杰文斯排除了交易者价格不一致或共谋行为要求完全信息等。这样价格等于成本、大家都接受一个价格,大家都不赔不赚(有赔有赚都不能保证生产等于消费),保证了市场均衡,这就是完全竞争前提条件形成原因。这些学者在独自的数学推理过程中,隐含条件很多,熊彼得认为“对完全竞争所具备的条件,马歇尔和维克塞尔没有清楚地说出,甚至没有清晰地看到全部条件。”^[14]奈特总结完全竞争需要 11 个前提假设^[15]。后来的学者总结完全竞争的前提条件,虽各不相同,但都包含以下几点^[16]:

1. 大量的买者和卖者,任何一个买者或卖者都不会在市场上占有显著的份额,也就是说买卖双方都不能决定价格,是价格的接受者。

2. 资源完全自由流动,商家可以自由进入和退出该行业。

3. 同质商品。所有商家都生产同一质量的商品。

4. 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拥有充分信息。大家都掌握该商品信息,都能根据信息做出正确决策。

古典经济学家主张废除一切妨碍人们开展市场竞争的贸易壁垒,并在此意义上使用“自由竞争”一词。斯密的自由竞争是指私人经济体从国家的限制监督下解放出来,使他们具有自由开业,自由就业,自由选择消费的权力。^[17]李嘉图的自由竞争是主张对内对外商业不受任何限制,自由贸易。瓦尔拉斯的自由竞争(包括边际理论的学者)是为了保证均衡方程成立和商品价格等于成本^[18],要求竞争没有任何专利制度的限制,大家都能使用相同的生产技术。霍普曼的竞争自由是指市场上的经济主体具有实施私人决策的自由和形成决策的自由,也就是说涉及市场竞争过程实际参与者和潜在参与者的总体行为活动空间。其自由竞争的前提:第一,形成自由的竞争;第二,保持自由的竞争。他把竞争过程分为交换过程和平行过程,这两个过程的竞争自由才是自由竞争。衡量交换过程竞争自由程度的标准是消费替代性和生产替代性;平行过程的竞争自由包括三个内容:(1)实际竞争者具有竞争自由,潜在竞争者也有进入市场的自由;(2)竞争手段使用的自由;(3)创新产品、新生产方法和新市场的技术、组织进步的创新和突进的自由,追踪和模仿创新行为的自由。^[19]奥地利学派把自由竞争解释为自由行动,罗斯巴德认为在生产领域,“自由竞争,指在一个自由

市场中,任何人都能自由地参与其所选择的任意领域中的竞争和进行生产”^[20]。他把版权看作产权,把专利制度看作政府对自由竞争的干预。其实,古典经济学时期专利制度还未盛行,斯密认为,技术秘密带来的超额利润是给发明者私人劳动的高价报酬,他并不认为技术秘密是垄断。约翰·穆勒也认为专利权不是垄断权,他说“如果发明者付出劳动和金钱使其设想变为现实后,那些没有付出劳动和金钱的人也可以同时使用他的发明……谁都不会付出劳动和金钱来搞发明了”^[21]。到新古典经济学,自由竞争变成了无任何技术限制和商业秘密的竞争,以保证成本最低、价格等于成本和市场均衡。任何竞争者都可以使用与竞争对手相同的生产技术(保证商品同质),这样新发明新技术就没有意义。专利制度在新古典经济学里面与其说是对自由竞争的妨碍,倒不如说是对数学推理的妨碍,所以他们认为专利制度是垄断或非自由竞争因素(主流经济学始终认为垄断是非自由竞争)。实际上知识产权是财产权,本身具有排他性,不应该把知识产权的排他性作为非自由竞争的因素,因为自由竞争应该是生产者可以选择不同的专利技术,生产不同质量的产品,这样竞争者会不断技术创新。并且创新就是要打破原有的竞争均衡,有创新就没有均衡,所以在新古典经济学里是没有创新的。自由竞争是自由选择,为此,本文认为自由竞争的前提条件是:

1. 任何行业都无政策壁垒,为满足消费者现在或未来的需求,法律范围内资本想进入哪个行业就进入哪个行业;

2. 法律(专利制度)范围内每个人或组织都有参与任何竞争的权利。

从前提假设看,完全竞争要求商品同质,自由竞争不能要求商品同质,要求商品同质,比如要求大家都生产同一质量的电视,竞争就不自由了,所以商品同质不是自由竞争的前提条件。

(二)完全竞争和自由竞争的模型

1. 完全竞争下价格数量模型

由于商品质量无法量化,马歇尔在均衡分析中,假设商品是同质的,商品竞争只看价格,需求量或供给量只与价格有关,是价格的函数,能在一个平面上表示供给与需求(如图 1)。并且他的均衡分析还隐含一个条件,是无异质替代商品,因为异质替代商品价格变动,这个商品的均衡价格也要变动,这就变成多元函数,无法在一个平面上表示均衡价格。而假设异质替代商品价格不变,那这个商品的价格可能也变不了,涨价它的性价比低了,就没人买它,只有

降价,这样价格就不能上下浮动形成均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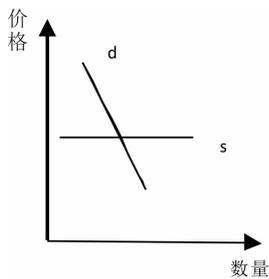


图1 完全竞争下的价格—数量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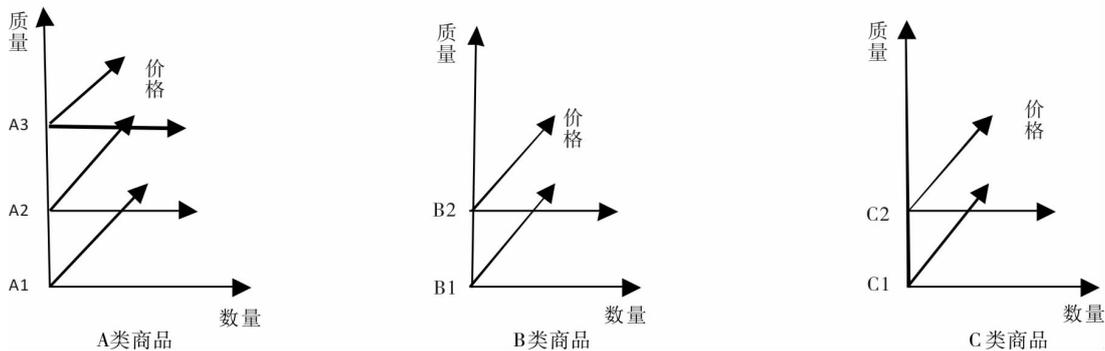


图2 自由竞争下的商品价格、数量、质量模型

在自由竞争模型中,质量轴从下到上按质量高低分 A1、A2、A3 等不同质量的商品,以此类推,B类、C类商品一样分很多不同质量的商品。就A类来说,同质量商品在一个平面,价格和数量之间的关系在同质量平面上反映出来。并且同类商品 A1、A2、A3 的价格不是孤立的,市场会根据质量不同确定不同的价格(竞争导致性价比相同 $Q_1/P_1 = Q_2/P_2$,推出 $Q_1/Q_2 = P_1/P_2$),高质高价、低质低价,相互联动。

对比完全竞争模型和自由竞争模型,完全竞争只是一个平面,不能代表整个市场竞争情况。而完全垄断商品是无替代商品,都是一个质量(因为有选择就有竞争,如果一家垄断企业生产的两种不同质量的商品,这两种商品是存在竞争,比如盐业公司的加碘盐和非加碘盐),所以完全垄断与完全竞争模型一致。并且,有选择才有竞争,在完全竞争下,商家价格一样($P_1 = P_2 = P_3$),质量相同($Q_1 = Q_2 = Q_3$),性价比相同($Q_1/P_1 = Q_2/P_2 = Q_3/P_3$),消费者没有选择的余地,所以完全竞争条件下没有竞争,商品同质也是完全垄断(非自由竞争)的前提。

可见,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代替自由竞争是错误的,企业只能生产同质商品,这不是自由竞争。哈耶克也认为“这种完全竞争理论的内容,几乎根本不能称为‘竞争’,其结论很少能用来作制定政策的指导”^[22]。现实中,消费者不是同质的,需求也不是同质的,供给是为了满足需求,需求千变万

2. 自由竞争下价格数量模型

自由竞争是全方位竞争,商家看好或擅长哪个商品就在哪个商品上竞争。市场上商品是无数的,并且是不同类、不同质。比如商品分 A类(汽车)、B类(电视)、C类(白酒)……A类又按质量分 A1、A2、A3 等,其他类商品一样,以此类推。自由竞争不是仅仅在 A类商品上竞争,也不是只在同质的 A1商品上竞争,而是可自由生产 A类、B类、C类……自由竞争下价格和数量模型如图2所示。

化,供给也是千变万化的,商家在不违法的情况下想生产什么就生产什么,商品差异化更是自由竞争的例证。据统计,我国商品种类大类 72 种,小类 18000 多种。截至 2021 年底仅白酒企业 19 万家,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品牌,种类层出不穷,价格从几元到几千元不等,并且不同厂家商品质量不同。新古典经济学定义的完全竞争不是自由竞争,张伯伦所说的垄断竞争是自由竞争。所以丁冰教授说:“所谓垄断竞争,也不过是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11]

(三) 完全竞争与自由竞争的效率

1. 完全竞争的效率

新古典经济学(包括哈耶克等批判完全竞争的其他经济学家)认为完全竞争配置效率最高,其效率标准是商品价格、成本最低,无利润或亏损等,实现帕累托最优。其实,完全竞争下资本家利润为零,生产成本最低,工人工资最低,资本家和工人的收入都仅够维持生活,生产要素所有者的收入全部消费完所生产的产品(只能是生活必需品),生产和消费达到完全均衡,所以不会剩余。没有剩余,也没有资本积累,也不会有经济增长和衰退,经济就如驴拉磨一样原地打转,对社会发展来说是没效率的。完全竞争的生产效率是数学推导下的效率——成本最低,其条件是任何生产者的边际技术替代率相等,要求不能有技术秘密和专利保护,没有专利保护就没有人发明提高效率的新技术,资源不会流到新技术

开发上,也就没有资源的最优配置效率。熊彼特也认为完全竞争没效率,他认为企业家的创新活动破坏的经济“循环流程”或称“创造性破坏”,对经济福利的重要性远胜于传统的配置效率(熊彼特,1942)。并且诺德豪斯、Klempere等学者认为:强大的专利法能促进一国创新的数量,从而提高生产力水平,促进经济增长。^[23]

还有,完全竞争要求大量的竞争者(Edgeworth,1881),目的是充分竞争,价格最低,等于成本,达到所谓消费效率最高。实际上市场存在的就是最有效率的,这是市场选择的结果,效率低的已被该产品市场所淘汰,不需要大量卖者去竞争。比如上述商品A中,效率最高的商家为A1、A2、A3等几家,其他再多的商家因效率低被淘汰,潜在竞争者如果效率达不到前几家的水平,它们也不敢进入这个行业,被淘汰的资本在自由竞争下会进入其擅长的行业。所以,在自由竞争下,企业会趋利避害,规避竞争,某个行业如果有大量的竞争者且无利可图,企业就不会进入这个行业。可见,完全竞争和资源自由流动或自由竞争是不相容的。

2. 自由竞争的效率

自由竞争是人们根据自己喜好自由选择,其重要作用是通过消费者选择喜好的产品以及有效率的技术,引导企业或个人提高效率,创新产品、降低成本或提高质量。因为,经济竞争是由第三方选择的竞争,比如甲、乙两企业竞争,甲只需要在提高产品品质或降低成本方面比乙企业好,消费者才会选择甲。就如李嘉诚所说“要成为领袖,无论从事什么行业,都要比竞争对手做好一点”^[24]。这样,在自由竞争的引导下,企业或个人都会不断创新,寻求新产品、新技术,提高效率,社会效率也会得到提高。

三、经济竞争的演变——从完全竞争到自由竞争

“只要私有制存在一天,一切终究会归结为竞争。”^[25]从历史上看,竞争从私有制出现以来就已经存在,早期的市场结构是完全竞争。因为在私有制出现后的自然经济时代,人类处在不文明社会,科学技术不发达,生产力低下,人们只能从事两种行业:农业和畜牧业。农业有大量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当时的农产品都是自然育种、自然生长,是同质商品;市场信息完全,每年生产多少大家基本知道,种植技术大家都会;没有大公司或农场主从事大规模生产、控制市场,大家都接受一个价格。当然,受交通、社会制度以及生产力的影响,社会资源不能自由流动。除此之外,古代农业符合完全竞争的条件(肉类能

够替代农产品,农业也不完全算)。经济学的完全竞争假设是所有行业的产品、资本和劳动都完全竞争^①,这只有古代农业社会才可能存在。古代农业社会是自然经济,每个人或家庭既是资本所有者,又是劳动者,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价格为零,效用最大;小农经济,自产自销,产品不会过剩,符合帕累托最优。为什么完全竞争现在消失了?主要原因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比如中国,受重农抑商政策的影响,禁止竞争;西方等级制度更严,普通人不自由,人们可供选择的分工领域十分有限,分工简单化导致了处于同一分工状态下的产品同质程度很高。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资本主义制度建立,自由竞争出现,商品贸易得到发展,交易手段不断提高,出现大量分工,加上专利制度、商标保护等,人类创新不断,出现了许许多多行业 and 不同质量的商品,人们不再从事一两个行业,自由竞争使人类逐渐从完全竞争市场演变为无数个不完全竞争市场。可见,完全竞争是在人们的商业竞争和自由受到限制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和自由竞争完全不相容。

四、结论

商品同质是比价的前提或均衡分析的前提,不是自由竞争的前提条件,有差异才有创新,商品同质限制了创新,也限制了自由。如果把自由竞争比作无数个立体,完全竞争就是一个平面,根本不能解释很多现实问题。

竞争的重要作用是通过选择好的商品和有效率的人,引导人们提高质量,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只要公平竞争都能达到这个要求,不需要完全竞争假设。完全竞争是用数学推理经济均衡的结果,既没有竞争性,也没有激励性,而人需要公平竞争的激励引导,这是经济学脱离现实的根本原因。新古典经济学为了经济学的科学化,提出完全竞争理论或不受专利制度限制的自由竞争理论是毫无意义的,这种自由竞争是会不会有人投巨资搞新发明和新技术,有效的自由竞争是受专利保护的自由竞争。

只要自由竞争或自由选择机制存在,就不会有完全竞争。因为人是理性的,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作用下,人们或商家都会选择竞争小的行业。

注释:

①假设产品或资本完全竞争是自欺欺人,因为竞争的根本是人的竞争,首先人是不同质的,不会完全竞争。其次,人的竞争是分层次的,资本家或技术专家是强者,生产别人不能生产的商品,处在人类竞争的顶端,并控制弱者的竞争,竞争者很少,比如比尔·盖茨,只有没有技术的工人才会

有无数竞争者。

参考文献:

- [1] 亚当·斯密. 国富论[M]. 郭大力, 王亚楠,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311.
- [2]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36.
- [3] 克拉芒. 自由竞争[M]. 黄传根,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1.
- [4] Stigler G J. Perfect competition, historically contemplated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57(1): 1-17.
- [5] 张伯伦. 垄断竞争理论[M]. 郭家麟,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58: 7.
- [6] 德姆塞茨. 竞争的强度与广度[C]//企业经济学. 梁小民,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167-206.
- [7] 杨震, 褚婷婷. 非价格竞争的思考与探究[J]. 价格理论与实践, 2019(9): 117.
- [8] 李堂, 刘倩. 中国汽车品牌的竞争之路[J]. 上海汽车, 2021(8): 68.
- [9] 龙羽, 王景. 哈佛模式与企业竞争全集(上)[M]. 延吉: 延边人民出版社, 2002: 468.
- [10] 刘诗白. 简明政治经济学小词典[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6: 108.
- [11] 丁冰. 垄断竞争为什么可以说是不完全竞争: 答傅晨同志《垄断竞争不是不完全竞争和自由竞争》一文[J]. 经济与管理研究, 1991(2): 58-60.
- [12] 欧俊. 经济常识一本全[M]. 南昌: 江西美术出版社, 2017: 60.

- [13] 季德·利斯特. 经济学说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6: 618-619.
- [14] 熊彼特.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M]. 吴良健,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141.
- [15] 奈特. 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M]. 安佳,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72-76.
- [16] 黄亚钧, 郁义鸿. 微观经济学[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104-105.
- [17] 斯蒂格勒. 斯蒂格勒论文精粹[M]. 吴珠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367.
- [18] 瓦尔拉斯. 纯粹经济学要义[M]. 蔡受百,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277-278.
- [19] 陈秀山. 现代竞争理论与竞争政策[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2: 77-78.
- [20] 罗斯巴德. 人、经济与国家[M]. 董子云, 等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5: 640.
- [21] 约翰·穆勒. 政治经济学原理[M]. 胡企林, 朱泱,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524.
- [22] 哈耶克. 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M]. 贾湛, 等译. 北京: 经济学院出版社, 1989: 87.
- [23] 赵莉. 专利的制度经济学分析[J]. 山东财政学院学报, 2005(1): 84-87.
- [24] 禾田. 华人首富李嘉诚生意经[M]. 北京: 中国商业出版社, 2009: 148.
-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458.

(责任编辑 刘成贺)

Homogeneity of Commodities as the Premise of Non-free Competi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fect Competition and Free Competition

GUO Qiang

(Library, Henan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Zhengzhou, Henan 451191, China)

Abstract: Perfect Competition is the foundation of neoclassical economics. Commodity homogeneity is one of the prerequisites of perfect competition. The same quality of goods requires the merchants to compete on the same quality products. The free competition is what the merchants want to produce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law. It is a mechanism of free choice. While a condition of perfect competition is the free flow of resources, it is a mistake to equate perfect competition with free competition. The homogeneity of commodities leads to the price competition of commodities, neglecting the quality competition of commodities. As long as people have the right to freely choose competition, there will be no perfect competition.

Key words: homogeneous goods; free competition; perfect competition

比较法的造法功能:比较方法角度

徐小庆

(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研究院,北京 100088)

摘要:比较法的造法功能体现在司法和立法两个方面。在司法上,比较法能通过学理或原则、立法或司法直接承认比较法等方式成为一国法源。比较法的结构方法系法学方法论上的体系方法,是有效的法律解释和法律漏洞填补手段;比较法的诠释学方法在一国实在法下虽超越了法律解释的限度,但仍可用于填补实在法漏洞;功能比较法在法律发现中是一种后果论证、是实质推理,具有特定限度。为发挥比较法的造法功能,研究者须根据研究目的、研究对象的特征、研究方法的要求,决定选取宏观/微观、内部/外部、共性/差异、概念/类型视角;明确方法的局限;以融贯性作为验证研究结论的标准。

关键词:比较法;比较方法;法律解释;法律漏洞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3.04.008

中图分类号:D9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3)04-0049-05

19世纪,比较法学在民族国家法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其对象即为各国、地区、法域的法律体系。如今,关于比较法系研究方法还是一门独立学科的争论已经尘埃落定,比较法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得以确立,但比较方法和比较法学是密不可分的,比较法学甚至被誉为“羊皮纸上最现代的科学”。^[1]可以说,比较法学成为一门科学的标志在于具备成熟的方法论。因而本文主要从比较法方法角度认识比较法的造法功能并探讨如何发挥比较法的造法功能与积极意义。

本文所说的比较法造法广泛地包含比较法在促进国内法律解释、国内法律漏洞填补、国内立法、国际规则制定等方面的作用。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分析了比较法造法功能的体现并说明了其造法的正当性。第二部分专门分析了三种比较方法是一种有效的法律解释和法律漏洞填补方法。第三部分对如何发挥比较法的造法功能从视角选取和检验标准两个面向提出了方法论上的建议。

一、比较法造法功能

“比较法是对不同国家(或特定地区、法域)的

法律制度和规则的比较研究。”^[2]虽然现在比较法作为独立学科的地位已经确立,但当谈论比较法的造法功能时,“比较法”具有三层可能的含义。一是作为独立学科的比较法学,但不像民法学、刑法学、诉讼法学、行政法学等学科,比较法学并不拥有自己专门的实在法对象。二是比较法律方法。三是外国法律、判例等在其管辖范围内具有规范约束力的规则。

立法者可以制定法律,法官在必要的权限内亦能造法。此处谈论的“法”是一国内有效的能作为裁判依据的规范。而作为一门学科,比较法主要是“法学家法”,一般并不具有规范约束力。至于作为外国法律体系、规范、规则、原则等的总称的比较法,由于外国法并不具有普世效力,所以其对管辖范围外之人、物、事不具有规范性约束力。所以,从作为学科和作为外国法指代的比较法层面上谈论比较法的造法功能看起来是很古怪的事情。

实际上,各法律秩序并非完全互相独立,而是相互影响的,且都追求“较好的问题解决方案”这一目标。所以,通过学理、司法和立法的直接认可等途

收稿日期:2023-06-06

基金项目:中国政法大学2023年博士研究生创新实践项目“数字贸易融资实践的演进及其规范应对”(2022BSCX26)

作者简介:徐小庆(1996—),女,重庆丰都人,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研究院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民商法。

径,比较法可以拥有法源的“规范约束力”。且这三个层面上的比较法能通过促进立法和国际规则等共同规则发展等方式发挥造法功能。本部分先讨论作为学科的比较法和外国法总称的比较法成为一国法源的方式,后介绍三种含义比较法在立法和共同法制定方面的作用。本文第二部分将对作为比较方法的比较法如何发挥造法功能进行专门探讨。

(一)作为法源的比较法

法的渊源,简称“法源”。虽然法源的定义及其范围仍然存有争议,但可以明确的是,法源是从法律适用的角度观察的结果。基于此,我们认为法源是可以作为“裁判依据的来源”的规范的总称。而法源的范围,一般包括制定法、判例、习惯法、契约或协议、学说、国际法等。从各国立法和司法实践来看,比较法成为法源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作为“权威学说”“公认的学理”成为一国的法源;二是一国立法、司法直接承认“比较法作为法律发现的方法”。在这二者中,比较法学对司法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学说、学理这一媒介发挥作用的,且大多数情况下比较法的影响可能是隐而不彰的。

第一,比较法通过“权威学说”“公认的学理”间接成为法源。在法律史上,狄奥多西二世和瓦伦提尼安三世皇帝的《引证法》、注释法学家和后注释法学家继受时期、德国19世纪潘德克顿法学派时期等,学说曾经具有过规范性约束力。^[3]现代司法实践中,学说对法院裁判的影响也很大。比如,苏格兰法院十分重视“制度派学者”的权威著作;德国法院在判决中会对理论进行讨论;在美国,法院通常也采纳一流法学院学者的观点。^{[4]340}可以说,在承认学理、一般原则等为法源的法域,比较法都有可能通过这种途径成为法源。

第二,立法、司法实践直接承认“比较法”作为法源。前者如瑞士《海运法》第7条明确要求“法官应使用比较方法填补法律漏洞”。后者如列支敦士登公国最高法院的规定,“适用被继受的法律时,原则上就像来源国的最高法院一样解释他们”^{[5]234}。

需要特殊说明的是,虽然比较法能够成为法源,但其不同于立法的“形式权威”,比较法一般只具有“事实权威”,也就是说其权威来自内容具有的说服力。

(二)服务立法与构建“共同法”的比较法

除了在法源意义上,比较法的造法功能还体现为比较法可以作为立法的辅助工具。甚至现代比较法学在19世纪兴起的主要目的实际上是为制定、修改本国法建言献策。比较法学在立法上的应用是历

史悠久且地域普遍的。茨威格特和克茨甚至断言:“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没有一部伟大的立法计划不是或多或少地带着广泛的比较研究的。”^[5]

在服务于国内司法、国家立法的制定或修改之外,比较法作为一门科学还致力于寻找各法律体系的“共同因素”“一般规律”。比较立法协会的第一届大会上,R·萨莱伊(Saleilles)即宣称“比较法学的目标在于,从各种特定的法律制度中发掘出一个共同的基础,或者至少是找出一些连接点,以便能够指明一个世界性法律的基本同一要素”^[6]。尽管从历史上看来,普世主义传统是失败的,但欧盟、国际私法统一协会、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会、国际海事委员会等国际组织制定区域或者国际规则的实践表明,比较法促进各国立法统一、创造共同法的目标仍然具有实践价值和理论价值。

立法广泛依赖比较法研究的主要原因在于比较方法是科学的研究方法。比较的方法,在语言学、人类文化学等科学中被广泛成功地使用。比较常被比作社会科学中的实验,通过比较法研究,能够寻求“较好”的法律问题的解决方案并避免本国的试错成本。

二、比较方法与法律发现

在立法或司法实践未直接承认比较法作为法源,也无法间接通过学理等媒介成为法源的地方,鉴于比较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法院是否能够将比较作为一种有效的法律解释方法和法律漏洞填补方法呢?要明确的是,比较法方法并非是一种方法而是多种方法。比较法方法包括功能主义方法(functional method)、结构主义方法(structural method)、诠释学方法(hermeneutical method)等。结构也就是体系;而诠释方法则是指在特定限制下创造性地去理解“情景化”的文本。而如后文所示,由于多种并不兼容的功能概念的存在,难以对功能方法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故下文将通过关键特征的方法来描述功能方法。

须先予说明的是,在法律发现时适用比较法的正当性在于寻找和适用最佳和最公正的法律解决方案。

(一)结构比较法

体系是一种被认可的法律解释方法。在法学方法论上,体系解释被用于确定“制定法的脉络意义”,也就是“上下文含义”^{[7]409}。但是作为比较法研究方法的“结构主义方法”比法律方法论上的“体系解释”具有更广泛的含义。比较法学上的结构主义方法受到社会学结构主义思想的较大影

响,而社会学上的结构主义又要归功于语言学家的成就。语言学家索绪尔提出了两个革命性的命题:一是语言符号的“所指”(所指向的对象)与“能指”(其内容能指什么对象)是任意地由社会惯例所决定的;二是语言是符号系统,只能通过符号的关系才能解释其意义。受此启发,社会学者认为“所有人类行为和心智背后都存在某种结构”^{[8]311}。结构不仅体现了其中各个要素间的关系,还具有创造新要素的功能,不只是对对象进行简单的分类。

在法学中,塞缪尔(Samuel)认为盖尤斯的“人、物、诉讼”,凯尔森的由基本规范生发的“规范金字塔”,哈特的承认规则,霍菲尔德的八个基本法律概念,都是这种结构观的体现。^[9]那么,这种结构主义比较是否能够成为法律发现的有效手段呢?法学方法论上承认的体系解释,目的在于“避免评价的不一致和目的不一致”,其所说的体系包括法律形式构造的“外部体系”和作为一致的价值判断的“内部体系”。虽然其中所说的整体法秩序主要是指在一国主权范围内法秩序,但是,正如拉伦茨所言:“整体法秩序或法秩序的大部分都受到特定主导性法律思想、原则或者普世性的价值标准的支配。”^{[7]548}在这个意义上,比较方法可以被承认为一种有效的法律解释和法律漏洞填补的方法。

(二) 诠释比较法

比较法中的诠释学方法不仅是一种法学方法论上的解释方法。诠释学方法允许在语言、道德、宗教、法律等限制下建构最佳的文本含义。法学方法论中所指的解释是指在“可能文义范围”阐明文本意义的活动。当然,这点是受到了实证主义观点的影响。对于德沃金这位偏离实证主义的哲学家而言,其寻求的“最佳解释”就和诠释学无异了。因此,对于比较法的诠释方法是否属于法律解释方法的理论分歧,其答案取决于对法律解释性质的认识。而在一国实在法下,比较法的诠释方法超越了法官解释的权限,属于立法权的范围;但对于文义范围外但仍在法整体秩序范围内的立法漏洞填补而言,法官可以使用比较法的诠释方法。

(三) 功能比较法

功能比较法由拉贝尔在回应冲突法中的识别问题时引入比较法中。茨威格特和克茨在其权威论著《比较法导论》中将“功能方法”作为比较法基本方法。功能方法在比较研究中,主要用于确定比较对象和比较范围。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功能比较法是事实问题导向的,能够解决比较法学面临

的不同法律体系中具体制度、规则、原则等不具有可比性的问题。该方法的运用必须先提出一个“纯粹功能问题”,这要求比较者摒弃一切本国法的“前见”。第二,功能比较法是非教义的,更关注的是规则的后果。因此,功能比较法常常考虑外国法院的判决如何应对某一事实问题。第三,功能比较法可能并不限于法律制度、规则或规范、法律原则的比较,非法的问题解决方案也在功能比较法追求的范围内。

功能方法在20世纪兴盛,但随后其受到很多批评。一是功能方法本身的含义是模糊的,拉夫·迈克尔斯(Ralf Michaels)总结了至少有7种不同含义的功能方法被比较者不加区分的使用:目的论、适应论、古典功能主义、工具主义、改善的功能主义、认识论功能主义、等同功能主义,而这些功能方法之间并不具有兼容性。二是能否提出“纯粹功能”的问题?考虑到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习俗、民族精神,不同法律体系之间,是否具有同质性的“事实问题”?同时,即使忽略受“制度事实”影响的法律领域,各国不同的诉讼程序和证据法也将导致不同法域的所说的相同事实可能不同。

功能比较法有助于促进比较法的造法功能。原因如下:第一,因为功能比较拓宽了比较研究的范围,由于各法律体系形式差异带来的规范比较不可能的情况因而得以避免,从而可以促进各国立法的统一;第二,功能比较注重社会事实问题对规范的需要,这种“由下至上”的视角不同于规范比较下从“规范到事实”视角,有助于立法适应社会功能的需求。

(四) 三种比较法的推理特征

和比较法的结构方法相比,功能主义忽略了法律秩序的结构;而和诠释方法相比,功能主义无法看到文化、历史、思维方式等对一国法律秩序的影响。从推理特征上看,功能主义方法具有典型的实质推理特征,而结构方法是典型的形式推理,诠释方法则兼具形式推理和实质推理。此外,将功能主义运用到法律解释或者法律漏洞填补中,可能被贴上“后果主义”的标签。可以说,比较法的结构方法和诠释方法联合削弱了功能比较法的基本方法地位。

实质推理与形式推理相对,二者的关键不同在于推理的依据是法律规定及其他法律事实还是未被形式化表达的道德的、经济的、政治的、习俗的或者其他社会因素等实质性依据。形式推理的权威性依据来自有效的法律规则或其他法律事实等形式性依据;而实质推理的说服力,或是来源于其所支持的规

则或判决将有助于一个有益的社会目标,或是来源于符合一条正当的社会道德规范。形式推理以法律规定为重,同法教义学的立场一致;而实质推理,尤其是取向社会效果的实质推理,同社会科学的立场一致。

形式推理具有有序地定纷止争、成本效益、错误风险最小化、尊重个人的选择自由、追求和谐安全和平、法律确定性和可预测性、具有较高内容形式性的规则适用起来比具有较低内容形式性的规则更加容易等优点。但法律规则等形式依据的不确定性、指引的有限性(法律漏洞)、可争辩性导致疑难案件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导致法律规定不能直接适用于眼前案件或者适用会产生不被认可或者不公正的后果,即形式推理或者法教义学立场的后果难题。此外,法律思维是价值导向的思维过程,价值判断贯穿裁判工作始终,只不过在简单案件和疑难案件中有弱价值判断与强价值判断之别。对法律进行扩大或缩小解释,甚至目的性扩张或缩小时,追溯其调整意图以及客观目的时,便是形式推理中的实质推理。因而可以说,实质推理与形式推理并非截然对立,所有的法律形式都渗透着实质依据,实质推理构成形式推理的必要辅助。实质推理将适用规则的后果,尤其是社会效果纳入考量,有助于解决形式推理的后果难题。

三、造法功能对比较法方法论的要求

比较法对方法论的关注不能陷于方法论的争论而一事无成。科学的方法是保障科学的比较法结论的必要条件,但比较方法并不是唯一的,也无法事先即完全确定有效的研究方法。因此,在对比较法内容进行研究时,需要根据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对方法进行调整。且如果比较者清楚自己所使用方法的局限,便不会犯方法盲目主义的错误。

(一)认识的要求:视角的选择

对不同法律体系为最精确的了解被视为比较科学最重要和最基本的目标。但科学不是纯粹的知识形式,而是需要建构抽象的图式或者模式以对经验作出说明和预测。在比较法中,关于如何认识法存在以下四组辩证的观点。

第一是“宏观视角”与“微观视角”的争论。宏观比较着眼于整体法律秩序,而微观比较则以具体法律规范或规则为研究对象。^[10]这一对争论的主要目标在于通过强调宏观比较视角对比较法的必要性,获得法律知识的体系化知识,其杰出成果为法系论。法系论是关于对世界各国法律秩序的进行分类及其分类标准的理论。此外,宏观比较还从文化背

景、立法技术、法典编纂技术、法律解释、法律执业者的地位等具有一般性的角度对不同法律秩序进行比较。但宏观与微观比较是相辅相成的,不可偏废一方的。

第二是“内部视角”与“外部视角”的争论。法哲学家哈特区分了规则的内在面向和外在面向。外在面向表现为能够为观察者记录的一种规律,而内在面向则要求至少有某些人必须将这种行为视为整个群体所必须遵从的普遍标准。比较法学者如果不能满足规则的内在面向要求,其所做的就仅仅是对某法律秩序内行为规律的记录而已,因为比较法学者必须从内在视角才能理解外国法律体系的思想观念。但问题在于,比较法学者能够真正进入规则的内在面向吗?如果不能,比较法学者以一种“局外人”的视角能够获得对外国法律体系的正确认识吗?这就构成了内在视角与外在视角关于认识外国法律体系的可能性的争论。本文认为比较者不可能完全采取内部视角,并且采取完全的内部视角也是不必要的。正如皮埃尔·勒格朗(Pierre Legrand)所说,处于“他者”一定距离之外的人能看到内部人可能忽略之事。

第三是“差异推定”与“类似推定”的争论。这一争论的焦点在于比较法学者应当关注各法律体系之间的差异还是共同之处。茨威格特和克茨认为人们不能够对不可能比较的事物作出有意义的比较,而在法律上只有那些完成相同任务、相同功能的事物才是可以比较的;进而他们提出的一条经验命题是每个社会的法律实质上面临同样的问题,虽然其采取不同的解决方式,但最后结果是相同的。可以看出茨威格特和克茨从功能角度,对世界不同法律体系采取了相似推定。但是,勒格朗认为比较是衡量差异的而不是推定类似。^[11]而根据尼尔斯·詹森(Nils Jansen)的观点,差异才能建构身份,正确理解相似必须容纳差异的可能性;并且相似还是不相似不能仅用是否具有共同属性来定义,因为更准确的相似的概念不仅包括具有相同属性还包括其程度是相似的。

第四是“抽象概念思维”与“具体类型思维”的争论。类型是一个被广泛使用,且具有多层含义的词语。类型和概念都是对具体事物的抽象的特征共同体,但概念是非此即彼的、封闭的,而类型是开放的、有意义关联的、整体的。^[12]类型与概念系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为规范现实化上的不同。将规范适用到生活事实时,概念思维采取演绎的涵摄模式,而类型思

维乃通过个案比较。^[13]另一方面概念思维表现为法律体系是由形式逻辑连接的“概念金字塔”。若以概念思维观察外国法体系,比较法学者更倾向于关注概念、规则、原则之间的相互关系。类型思维下结论可能是大胆的、不确定的,但能产生新知识、提供新的洞见。

在这些或多或少对立的视角中,比较法学者的选择不是任意的,也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何种视角,无法事先开出“万能药”,而是要视比较的目的、比较对象的特征、比较方法的要求等综合决定的。

(二)建构的要求:以融贯性为检验标准

比较法不仅具有认识的作用,还具有意义建构的功能。比较的意义建构功能体现在其通过对不同法律体系的比较有助于发现其间的共同要素或规律,并对其进行归纳、概念化为本学科的规范体系。在这个过程中,何以验证比较法学者的结论的正确性呢?想在法学中解决此问题,还必须先回答规范命题是否存在正确与否的标准的问题以及规范命题的正确性的含义为何的问题。对此,罗伯特·阿列克西梳理了既有的理论观点并已经给出了清晰的答案。他主张,规范命题的检验是一个在法律、法教义学等限制条件下理性论证的事情,而非证实百分之百确定的事情。^[14]

在科学中,大致有三种验证方式。第一种是相符论,即主张的观点与事实相符合;第二种是融贯论,即主张同所在的知识体系融贯、不矛盾;第三种是共识论,即主张在二人及以上人之间达成一致见解。比较法研究对象决定了其无法采用事实相符论作为检验标准。在比较法中,发挥验证主张有效的标准只能是融贯论和共识论。

体系不仅是抽象的逻辑的概念体系(外在体系),还是评价一致、融贯价值秩序(内在体系)。融贯性标准和法律平等原则相同,都是形式理性的要求。立法者将法律理念或者法律原则现实化为法律规范时,一方面意图使法律规范表现出的评价观点与法律理念或法律原则一致,另一方面还要使所有法律规范相互之间表达的评价观点协调。^[15]麦考密克提出两种融贯性标准,可作为评判法律续造之结果的融贯性标准:“其一,一组规则能够有助于增进某种相关的价值或多种价值,并且能够减少其他相关价值的冲突;其二,一组规则如果能够满足或符合某种单一而又更加一般化的原则,或成为某单一而又更加一般化的原则的例证。”^[16]

四、结语

比较法没有专门的实在法作为其研究对象,而是以各国法秩序、具体法律制度、规则、原则作为其研究对象。比较法以其独特的研究方法与其他法学科相区别,成熟的研究方法是比较法独立为一门学科的标志之一。比较法不仅有助于完善立法,在司法中也对法律解释和法律漏洞填补有重要作用。而比较法的造法功能是以比较法学科发展为依托的。因此,发挥比较法的造法功能和积极作用,一方面要探明比较法造法功能的路径或体现,另一方面则要探究比较法在造法上作用的方式及其限度。

参考文献:

- [1]大木雅夫.比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19.
- [2]高祥.比较法学原理[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9:41.
- [3]恩斯特·A·克莱默.法律方法论[M].周万里,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9:222-223.
- [4]PS阿蒂亚,RS萨默斯.英美法中的形式与实质:法律推理、法律理论和法律制度的比较研究[M].金敏,陈林林,王笑红,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 [5]茨威格特·克茨.比较法总论[M].潘汉典,米健,高鸿均,等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18.
- [6]罗道尔夫·萨科.比较法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8.
- [7]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M].6版.黄家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409.
- [8]汉斯·约阿斯,沃尔夫冈·克诺伯.社会理论二十讲[M].郑作彧,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 [9]Geoffrey Samuel. An introduction to Comparative Law Theory and Method[M]. Hart Publishing, 2014: 96-108.
- [10]米健.比较法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96-100.
- [11]皮埃尔·勒格朗.共性与差异[C]//皮埃尔·勒格朗,罗德里克·芒迪.比较法研究:传统与转型.李晓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217.
- [12]阿图尔·考夫曼.类推与“事物本质”:兼论类型理论[M].吴从周,译.台北: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2016:109.
- [13]阿图尔·考夫曼.法律获取的程序:一种理性分析[M].雷磊,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146-150.
- [14]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作为法律证立理论等理性论辩理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224.
- [15]劳东燕.功能主义刑法解释的体系性控制[J].清华法学,2020(2):22-49.

智慧法院视野下司法公信力建设的困境与出路

陈禹竹

(互联网法治研究院(杭州),浙江 杭州 310000)

摘要:司法公信力是公众在司法运作过程中感知到程序正义进而认同司法、信任司法的结果。智慧法院的建设推进了在线诉讼的运行,但由于公众对在线诉讼了解程度较低、当事人与法官难以在线诉讼中充分交流、诉讼进程容易受到技术因素影响,公众对司法的认同度不高,司法公信力建设面临困境。公众能否感知到程序正义,与其对程序正义感知能力的高低、在司法运作中是否具有尊严感与控制感相关。公众在智慧法院中感知能力薄弱、尊严感不高、控制感不强是其难以感知程序正义,进而信任司法的主要原因。扩充诉讼服务的内容、重视当事人的情绪、提升当事人有效参与诉讼的能力能够增进当事人对司法的认同,提升司法公信力。

关键词:智慧法院;在线诉讼;司法公信力;程序正义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3.04.009

中图分类号:D9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3)04-0054-05

一直以来,加强司法公信力的建设是司法工作的目标之一。我国智慧法院的建设通过技术赋能深化司法公开,制约司法恣意,促进司法便民,对提升司法公信力大有帮助。但在此过程中,技术不断嵌入司法运行,并通过司法过程场景化、司法决策智能化不断重塑着司法过程,也改变了司法公信力的塑造机制。司法公信力建设面临新的问题与挑战,亟需高度重视并积极采取措施应对。

一、司法公信力的概念界定与现状分析

(一)司法公信力的概念辨析

对于司法公信力这一概念,学界的解读可分为客观说、主观说、混合说三类。^[1]客观说认为司法公信力是一种能够引起普遍服从、普遍尊重的能力。^[2]主观说认为司法公信力是群体对司法认同的一种心理反应。^[3]混合说则结合了客观说与主观说的观点,认为司法公信力既反映司法运行中客观存在的能力,也反映群体对司法的主观认知。^[4]

从本质上来说,司法公信力由公众对司法的信任不断积累而成,而司法信任来源于群体内心对司法的认可与信赖。从目的解释的角度出发,“司法

公信力”一词所要解决的是公众对司法的信任问题,评估公众对司法的信赖程度和认同状况。因此,司法公信力的评判应采用主观说,司法公信力体现的是公众对司法的主观认知及态度,是公众内心深处信任司法的心理反映。

(二)司法公信力的意涵阐释

司法信任的建立受多重因素影响,其中重要的一点便是公众是否感受到公平正义。如果说公平正义是司法意欲实现的价值,那么让公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则侧重公众在司法中对公平正义价值的主观认知。公众的这种感受与体会进而转化为对司法的认同。通过司法认同感的持续提升,公众对司法产生信任,司法公信力得以塑造。因此,让公众感受到公平正义是司法公信力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

公众对公平正义的感知可分为对实体正义的感知和对程序正义的感知。相比之下,公众对程序正义的感知显得更为重要,因为程序正义的感知能够让人们感受到司法运作过程的公正性,提高其参与诉讼的满意度与认同度。人们能够因此感受到司法

收稿日期:2023-06-22

作者简介:陈禹竹(1997—),女,浙江金华人,互联网法治研究院(杭州)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法学理论,数字法治。

的正义,即使最终判决结果对其不利。研究表明,人们在司法运作过程中的感知能力、尊严感与控制感影响人们对程序正义的感知。^[5]具备感知能力是人们能够感知程序正义的前提。而根据 E. Allan Lind 与 Tom R. Tyler 提出的自利模型(The Self - Interest Model)与群体价值模型(A Group Value Model)^[11],让当事人能够参与诉讼程序进而掌控程序的推进,让当事人在司法运作过程中获得充分尊重,有助于提升其对公平正义的感知,促进司法信任的形成与司法公信力的塑造。

(三)智慧法院视野下我国司法公信力建设的现状

当今,法院工作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智慧法院的建设旨在通过信息化手段促进审判体系与审判能力的现代化,是我国信息化规划的一环。智慧法院的建设正在向全业务网上办理、全流程依法公开、全方位智能服务迈进。智慧法院不仅通过平台整合资源,实施在线立案、举证质证、庭审等诉讼环节,还利用人工智能为法官审判案件提供智力支持,为公众提供智能诉讼服务。智慧法院的建设使司法运作从传统法庭中的“司法场域”转变为在线诉讼中的“司法场景”。

目前的实证研究多是通过考察公众对在线诉讼的态度来了解公众对智慧法院的评价,这些研究表明多数受访者认为在线诉讼的效果不如传统庭审^[6-7],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公众对在线诉讼的了解程度处于较低水平。由于公众对在线诉讼的运行及操作规则的不熟悉,相较于传统庭审,在线诉讼的时间成本反而增加,降低了公众对在线诉讼的满意度。第二,双方当事人与法官难以在诉讼过程中充分交流。在线诉讼过程中,屏幕上出现的其他主体之间的交流可能会分散双方当事人的注意力,也可能出现杂音遮蔽交流双方的话语声,从而阻碍沟通交流的顺利进行。第三,在线诉讼进程易受技术因素影响。在线诉讼过程中,电子设备运行问题造成的画面延迟、声音卡顿等状况会延缓诉讼进程。在线诉讼并非传统庭审的同比复刻,公众认为在线诉讼的效果不尽如人意是其对在线司法运作认同感降低的表现,司法公信力建设面临困境。

二、智慧法院视野下司法公信力建设面临困境的成因

在智慧法院的建设中,现代信息技术嵌入司法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公众对程序正义的感知,改变了传统庭审下司法信任感的生成逻辑,由此带来了司法公信力建设的困境。

(一)技术嵌入司法运行要求公众提升感知能力

传统庭审模式下,公众能否感受到司法的公平正义受限于其对法律及司法运作的理解。而在技术嵌入司法且嵌入程度逐渐深入的今天,公众对技术的认知与理解也会影响其对公平正义的感知。

智慧法院中有关诉讼的全环节都可以在线办理,从立案到提交证据、再到线上审判等环节都需要当事人具有良好的在线操作能力及信息处理能力。应当认识到,即使拥有网络接入,部分群体仍缺乏相应的检索、选择、处理、应用信息的能力。前述研究表明,部分群体担心在线诉讼软件在使用上存在困难而不愿意参与在线诉讼。对于那些没有代理律师的当事人而言,这一司法上的数字鸿沟难以跨越。对在线诉讼程序及操作缺乏完整认知的情况下,公众无法感知在线诉讼程序及操作带来的正义,司法信任的建立也就无从谈起。

此外,随着智慧法院智能化建设的推进,利用人工智能助力法官审判案件将加剧公众对技术的陌生感。算法黑箱的存在使人工智能决策具有不可解释性,人们无法理解其中逻辑,更难以提出有效抗辩^[8],进而导致司法决策的可信度降低,公众难以感受到公平正义。

(二)技术嵌入司法运行未给予公众充分尊重

公众在司法案件中感受到的公平正义往往在当事人与法官的互动中形成。在互动的过程中,法官通过角色扮演、情绪把控等方式^[9]让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拥有尊严感,感受程序正义进而建立对司法的信任。然而,智慧法院中在线诉讼的适用使言词交流从“面——面”转向“面——屏——屏——面”,阻隔了上述信任的生成。

在角色扮演方面,法官失去了其扮演角色所需要的“剧场”。当法官与当事人同样通过在线方式接入庭审网络时,法官的视频窗口与当事人的视频窗口大小往往一致,且视频窗口中的法官可能只呈现出上半身或者只呈现出脸部,有时候甚至连法官的脸部都无法完整看见。审判的庄严感被弱化,随之带来的是司法仪式感缺失。而部分公众将传统庭审下具有庄严感、仪式感的司法运作视为司法审判的“唯一正解”,缺少仪式感的在线诉讼并不符合其预期,甚至会认为在线诉讼剥夺了其应享有的程序公正。在情绪把控方面,技术原因带来的画面延迟、声音卡顿使当事人无法在在线诉讼中充分表达自己,法官也无法有效聆听,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沟通交流存在障碍。如果当事人觉得自己表达的观点没

有被认真倾听,那么其便无法感受到获得了充分的尊重。

此外,有研究发现人类存在“算法厌恶”现象,即人们厌恶看到算法运作。在算法决策与人类决策中,人们通常更倾向于人类决策,即便很多情况下算法作出的决策比人类作出的决策更加高明。究其原因,人工智能审判不会像法官审判一样对案件进行“情理法”结合说理,人工智能审判下算法自动运行也无法与当事人进行互动交流,无法在审判过程中对当事人倾注人文关怀,当事人可能无法在司法运作中获得尊严感。

(三)技术嵌入司法运行导致公众控制感降低

控制感是当事人能够参与庭审,进而影响审判进程与结果的内心确信。缺乏控制感时,当事人往往会感到无力,即无法凭借其自身努力改变或影响某件事。在智慧法院建设过程中,技术不断嵌入司法运作使技术对诉讼进程的控制逐渐增强,间接削弱了当事人对司法运作的控制力。

一方面,当事人在庭审过程中能够感受到技术介入对其参与诉讼的影响。在线庭审中当事人时常担心法官是否已经听清自己的表达。因为只有法官清楚知己方事实与观点,当事人才会感觉到自己可能能够影响法官对案件的看法。但在线诉讼中,当事人往往无法掌控网络设备的运行,当事人也因此明显感受到技术对其观点表达的限制。

另一方面,当人们使用技术时,技术同时也在塑造人们的行为。研究表明,当使用者在线决策时,屏幕界面上呈现内容的详略、呈现的方式如字体大小、字体颜色鲜艳程度、选择项中供选择的数量等会将使用者往不同的方向引导,从而对其决策产生助推。由此,智慧法院平台化建设中,诉讼流程的界面设置对当事人的决策会形成“电子助推”。此外,在线庭审过程中屏幕上呈现的当事人镜像会分散当事人的注意力,导致当事人无法全身心投入诉讼过程。同时,透过屏幕获取信息需要更多注意力,在线诉讼使人们容易产生疲惫感,对人们在诉讼过程中维持稳定情绪及持续专注力带来挑战。技术对司法的嵌入削弱了当事人在庭审中的参与能力和对诉讼进程及裁判结果的影响能力,降低当事人对在线诉讼的评价。

随着司法智能化的建设,算法对司法审判的控制将更为深入。当算法逻辑在司法运作中自主运行,算法自身具备的查明事实、适用法律的能力能够使其实现对司法审判过程的控制,自行完成诉讼流程,甚至可能不需要当事人进行辩论。^[10]公众影响

司法运作的能力也因此被削弱,公众无法获得程序公正所给予的公平参与机会,难以建立对司法运作的信任。

三、智慧法院视野下提升司法公信力的路径

司法公信力的提升需要加强公众在智慧法院中对程序正义的感知,进而增进其对司法运作的认同。因此,感知能力、尊严感、控制感的提升将为司法公信力的构建提供路径与方向。

(一)提高公众的感知能力:扩充诉讼服务内容

提高诉讼服务水平是保障当事人获得公正审判的必经之路。诉讼服务的目的在于提高公众对司法运作的理解力与感受力。因此,智慧法院建设应将相应诉讼服务转化为对诉讼流程与技术操作的双重指引,促使公众形成对司法与技术的信任。

根据《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第四条,法院开展在线诉讼应征得当事人同意,并告知当事人在线诉讼的相关事项。但在线诉讼作为数字时代司法运作的新形态,当事人存在对相关技术使用及操作认知的不足,故相应的诉讼服务应始于诉讼开始前。目前法院将在线诉讼的相关介绍置于当事人选择在线诉讼后,不仅不利于消除当事人对技术的陌生感,使当事人对在线诉讼产生抵触情绪,还增加了司法人员庭前准备的工作负担。智慧法院的诉讼服务需要考虑技术对公众感知能力的影响,并将在线诉讼的特质融入诉讼服务。

首先,在顶层设计层面,法院官方网站的界面设计应当对用户更为友好,特别是对老年人这一类特殊群体,应当增加适老化措施,比如网站字体放大、界面设计更加简洁、指引更加清晰明确、安排志愿者进行指导等。数字时代,仍有部分群体存在数字鸿沟,司法部门应当给予其方便快捷的“接近”司法的渠道。其次,在服务内容层面,法院官方网站应当提供在线诉讼全方位、全流程指引,例如通过提供视频演示或在线模拟诉讼等方式使公众知晓在线诉讼在立案、提供证据、庭审、执行等方面的技术操作。此外,法院还应当提前告知公众在线诉讼的注意事项,如需要准备的网络设备、庭审中摄像头的摆放位置、眼睛注视方向等。此类技术指引能够让社会公众充分知悉在线诉讼的方方面面,帮助公众形成合理预期,提高公众对在线诉讼程序正义的感知能力。

(二)提升当事人尊严感:重视当事人在在线诉讼中的情绪

虽然诉讼理性主义排斥诉讼过程中的情绪流露,但若弱化智慧法院建设中不断增强的工具理性,增进当事人在庭审过程中的尊严感,让当事人对

司法运作的过程及审判结果产生信任,就必须认真对待当事人在线诉讼中的情绪表达。在智慧法院建设中,技术应用的范围越广,人际互动和交流就越少,当事人面临被技术“驯服”的危险。^[11]司法机关与公众不应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应当是主体间性关系,司法人员应当与公众建立联系,回应公众需求。情绪是需求的出口。可以认为,认真对待当事人的情绪便是认真对待当事人的需求。当法官知悉当事人需求,法官便能找到与当事人共情的说理方向,达致情理法圆融,与当事人达成公平正义的共识,增进当事人对司法的认同。

首先,对于一个案件能否适用在线诉讼,法官应当充分考量当事人希望以何种方式进行交流,有无相关情绪需求^[12]。应当认识到,并非所有案件都有情绪抒发的必要。当发生重大案件、复杂案件,当事人具有强烈的情绪抒发需求,需要法官认真倾听其诉求时,法院应慎重考虑是否以在线诉讼形式审理。其次,在线庭审过程中,法官应高度重视屏幕另一端当事人的状态,在认真倾听当事人陈述的同时加强眼神交流,注意当事人的表情和动作。在当事人确有需求时,法官应及时与其沟通,用当事人能够理解的语言解释并给予其充分表达的机会。同时,未来在线诉讼可充分利用3D技术还原司法“剧场”的布局,给予法官及当事人“身临其境”之感,促进法官与当事人的沟通交流。上述目标的达成需要法官与当事人进行双向互动。然而,在目前的在线诉讼中,时常出现当事人擅自关闭摄像头的现象,这不利于法官及时捕捉当事人的情绪波动,也不利于法官掌控庭审。对于此类行为法官应当在宣布法庭纪律时予以明确,即当事人关闭摄像头需经过法官同意。

(三)加强当事人控制感:引导当事人有效参与在线诉讼

帮助、引导当事人加强对司法运作的掌控,让当事人有效参与司法过程,对司法信任的形成至关重要。首先,当事人能够有效参与在线诉讼的前提是其网络设备良好,网络连接顺畅。当事人选择在线诉讼时,司法人员应提醒当事人评估自身网络情况。其次,当事人有效参与在线诉讼需要其在庭审过程中保持专注力。鉴于透过屏幕交流相较于面对面交流更消耗精力,法官应当适时考虑休庭。再次,当事人有效参与在线诉讼意味着其能够自主作出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而流程化的界面设计更倾向于促成快速决定,使用者可能未经深思熟虑便作出选择以推进下一步流程。因此,智慧法院建设中在线系统的设计应当充分考虑对当事人行为可能带来的影

响,引导当事人作出符合自身利益的决定,提升其在司法运作中的参与感和控制感。

四、结语

智慧法院并非传统法院的线上运行形态,而是在技术塑造下的一种全新变革。技术对司法的重塑效应同样体现在司法公信力的形成方面,技术嵌入司法给人们心理与行为带来的影响不容忽视。智慧法院视野下司法公信力的建设需要考虑公众的需求与感受,将客观的可视正义转化为主观的感知正义,形成数字正义的主客观统一。智慧法院的建设应当始终尊重当事人及法官的主体性,将司法关怀倾注于每一个案件的审理过程,让公众感受到司法公平正义,促进司法公信力的形成。

注释:

①在自利模型(The Self-Interest Model)中,人们对程序的关心出于对结果的注重,希望通过对程序的掌控进而追求自己想要的结果。在这种模型下,提高当事人的控制感有利于其对正义的感知。在群体价值模型(A Group Value Model)中,人们对程序的关心出于对群体身份及该身份被赋予的价值的在意。当在群体中个体的表达能够被认真考虑、个体能够获得尊严的对待,个体更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参见: E. Allan Lind, Tom R. Tyler.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Procedural Justice*[M]. Plenum Press, 1988: 222 - 231.

参考文献:

- [1] 孟祥沛. 司法公信力的本质属性及其对评估指标的影响[J]. 政治与法律, 2021(12).
- [2] 郑成良, 张英霞. 论司法公信力[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5).
- [3] 毕玉谦. 司法公信力研究[M].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9: 1.
- [4] 安哲明. 法官司法公信力评估的两个维度[J]. 人民论坛, 2019(25).
- [5] 郭春镇. 感知的程序正义: 主观程序正义及其建构[J].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17(2).
- [6] 杨继文. 在线诉讼场景理论的建构[J].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23(3).
- [7] 左卫民. 中国在线诉讼: 实证研究与发展展望[J]. 比较法研究, 2020(4).
- [8] Katherine Freeman. Algorithmic Injustice: How the Wisconsin Supreme Court Failed to Protect Due Process Rights in *State v. Loomis*[J]. *North Carolina Journal of Law and Technology*, 2016(18).
- [9] 黄瑞. 立信持疑: 法官视角下司法信任的生产逻辑[J]. 法学家, 2023(2).
- [10] 范明志. 智慧司法的基本逻辑: 数字技术与司法如何对

The Dilemma and Way out of Judicial Credibility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mart Courts

CHEN Yuzhu

(Internet Nomocracy Institute (Hangzhou), Hangzhou, Zhejiang 310000, China)

Abstract: Judicial credibility is the result of the public's perception of procedural justice in the process of judicial operation, and then recognition and trust in the judiciary.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courts has promoted the operation of online litigation, but due to the low level of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online litigation, the difficulty of parties and judges to fully communicate in online litigation, and the influence of technical factors in the litigation process, the public's recognition of the judiciary is not high. The construction of judicial credibility is facing difficulties. Whether the public can perceive procedural justice is related to their ability to perceive procedural justice and whether they have a sense of dignity and control in judicial operation. The public's weak perception ability, low sense of dignity and weak sense of control in smart courts are the main reasons why it is difficult for them to perceive procedural justice and trust the judiciary. Expanding the content of litigation services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emotions of the parties, and enhancing the parties' ability to effectively participate in litigation can improve the parties' recognition of the judiciary and increase the credibility of the judiciary.

Key words: smart court; online litigation; judicial credibility; procedural justice

(上接第 53 页)

The Law – Making Function of Comparative Law: A Comparative Methodological Perspective

XU Xiaoqing

(College of Competitive Law,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0088, China)

Abstract: The law – making function of comparative law is reflected in both judicial and legislative aspects. In the judicial aspect, comparative law can be directly recognized as a source of law in a country through doctrine or principles, legislation or justice. The structural method of comparative law is a systematic method in jurisprudence methodology, which is an effective means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and filling legal loopholes; the hermeneutic method of comparative law is beyond the limits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under the positive law of a country, but it can still be used to fill the loopholes of positive law; the functional comparative law is a kind of consequential argument and substantive reasoning in legal discovery, which has specific limits. In order to perform the law – making function of comparative law, the researcher must decide to choose macro/micro, internal/external, commonality/difference, and conceptual/typical perspectives according to the purpose of the researc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research method; the limitations of the method should be clarified; and coherence should be used as a criterion to verify the research findings.

Key words: comparative law; comparative method; legal interpretation; legal loopholes

技术与干部:陕甘宁边区传染病防治的主要抓手

——以《林(伯渠)主席指示各级政府扑灭病疫为当前急务》为中心的考察

胡安徽¹, 杨萍²

(1. 临沂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临沂 276000;

2. 普洱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云南 普洱 665000)

摘要:医疗技术和干部素质是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防控传染病的主要抓手,这在《林主席指示各级政府扑灭病疫为当前急务》中有鲜明体现,该文一方面介绍了伤寒、霍乱等传染病发生的原因,即胡宗南部队带来的人祸和旱涝霜冻等造成的天灾,一方面介绍了防控传染病的医疗技术,在此基础上,特别指出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是影响抗疫的重要因素。反对官僚主义的主要举措有:表彰传染病防治中的优秀干部以树立榜样,批评传染病防治中某些干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不作为、乱作为以警示告诫,通过对比,强调干部必须扫除官僚主义思想和作风才能真正做好防疫工作。

关键词:传染病防治;医疗技术;干部素质;官僚主义;陕甘宁边区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3.04.010

中图分类号:D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3)04-0059-07

陕甘宁边区由于经济、文化和医疗卫生相对落后,以及自然灾害频发、封建迷信盛行、不良的卫生习惯等原因,致使疫病肆虐,在中央红军到达之前传染病的死亡率高达60%。^[1]党中央和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采取多种措施防治传染病,取得了积极成效。学界关于陕甘宁边区传染病研究主要集中在抗战时期边区传染病发生的内部原因和具体应对措施等内容^[2-4],对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传染病防治的研究相对薄弱,尤其是传染病产生的原因和防治的技术因素,以及传染病防控中的干部素质,仍有较大的探讨空间。在有关陕甘宁边区传染病防治史料中,《群众日报》所刊《林主席指示各级政府扑灭病疫为当前急务》^[5](以下简称“当前急务”)具有重要史料价值,既介绍了传染病种类及其发生原因,又介绍了多种医疗防控技术,同时也明确指出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是传染病防控的主要危害,为此必须提高干部素质,将反对官僚主义作为防控传染

病的重要抓手,这些信息颇值得深究,但学界对其鲜有关注。本文以“当前急务”为中心,探讨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传染病防控及其相关问题,以期了解该时期边区政府应对传染病的方法和理念,又能丰富中共医疗卫生史及传染病史的研究内容。

一、人祸与天灾:边区传染病发生的双重因素

边区政府双管齐下,将医疗技术和干部素质作为传染病防控主要抓手,这与边区存在多种危害严重的传染病以及传染病发生的原因有密切关系。“当前急务”记载边区当时传染病主要有伤寒、霍乱、麻疹、痢疾、天花、疟疾、回归热等7种。民国政府规定全国性传染病有伤寒或类伤寒、斑疹伤寒、赤痢、天花、鼠疫、霍乱、白喉、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猩红热,另有地方性传染病如沙眼、疥疮、头癣、花柳病、疟疾、回归热、麻风、血吸虫病、钩虫、黑热病、甲状腺肿、重要营养缺乏症、胃肠系统传染病等^{[6]164,273}。由此可见,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既有全国性也有

收稿日期:2023-05-19

基金项目:2021年度贵州省哲社重点项目“贵州传统医学疫情防控史料搜集、整理与研究”(21GZZD031)

作者简介:胡安徽(1971—),男,河南南阳人,历史学博士,临沂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主要从事中共医疗卫生史和历史医学地理研究。

地方性传染病,这表明传染病在边区种类颇多且颇为常见。如果按照现代传染病类别划分,边区既有甲类传染病如霍乱、天花,也有乙类传染病如麻疹、痢疾、伤寒、疟疾、回归热。这些多是烈性传染病,危害较大,如霍乱,传播速度快、传染力强、病情剧烈,若治疗稍有延误则极易造成死亡,在中国又被称为“虎狼病”或“虎烈拉”,足见其危害之重;再如麻疹,如果患者有严重基础疾病、重度营养不良和免疫力低下,则其死亡概率特别高。这些烈性传染病不仅给边区军民的生命健康带来严重的危害,而且给群众生产生活造成了严重负面影响。“疫区内有些村子半数以上劳动力因病不能上地生产,特别是老弱妇孺、移难灾民,身体衰弱,死亡率更为惊人。”^[7]据当时的调查数据,甘泉县第一区发生急性流行瘟疫,儿童死亡尤其厉害,一个小学死了10多名学生,学校已无法开课^{[8][112]};延川禹居区因传染病死亡人数占人口总数的8.6%,蟠龙、永坪一带出生的婴儿十有八九活不下来^[9];临镇县金盆区原有4千多人,春秋两季因传染病造成各5百余人的病逝,死亡率达25%^{[10][162]},足见当时传染病给群众带来的危害之惨烈。

任何一种疾病的发生都有其必然因素。“当前急务”指出了边区传染病发生的原因:一是“胡祸天灾对于边区人民所造成的严重饥荒”,二是“在胡匪侵扰期间,灾民被迫转移深山旷野,饥寒交迫,风雨侵袭,致身体衰弱,抵抗力锐减”,故而导致“春暖以来,各种传染病疫即潜滋暗长”^[5]。中医认为,疾病的产生与“正气”和“邪气”有关,风雨寒湿容易造成人“正气”不足、“邪气”上升。营养元素是生命活动的基础,人只有通过从外界各种食物摄入营养元素才得以生存和从事各种生产活动。各类营养元素符合人的生理需求时,人体才能保持健康。边区百姓躲藏于深山旷野,受风雨和寒湿侵袭,又没有足够的饮食供应,营养不足,饥寒交迫,抵抗力减弱,极易患病,尤其是传染性疾病。

所谓人祸即“胡祸”“胡匪”,指的是胡宗南及其指挥的军队。抗战结束后,1947年2月,国民党发动对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胡宗南所属国民党军在边区烧杀抢掠,大大加深了灾荒的严重性。资料显示,因胡匪的烧杀抢劫,整个边区损失公私粮食25万石、牛驴6万余头、农具23万件,减少耕地360余万亩,青苗被践踏摧毁者50余万亩,生产基础被大量破坏,造成了40万人没饭吃的大饥馑^[11]。1947年12月25日《边区政报》发表的“生产救灾专号”详细报道了胡宗南军队给边区带来的危害:“胡

匪盘踞了一百九十天的赵家沟,二十五孔窑洞和十二间厂棚上的门窗木料全被烧光,果树被砍光,院中长满蒿草,常年种的三百二十八垧地荒了三百二十一垧,种上的几垧地亦被匪军喂了牲口,全村一百二十只鸡吃个精光,十户人家被抢去麦子二石六斗,毁坏家具六百九十五件。此类被匪军长期盘踞及敌大军践踏损失惨重地区,约有三十七个区,灾民达四十万人。一般经敌军骚扰的地区,根据四千三百个村庄的调查(分布于延安、安塞、延长、延川、志丹、子长、绥德、子洲、佳县、米脂、吴堡、新正、淳耀、赤水及靖边等十五个县),三十万七千二百零六人蒙受粮食、牲畜、农具的损失。”^[9]

从上述文字看,胡宗南部队给边区的农民生活和农业生产带来了极其严重的灾难:粮食、鸡、猪、羊的损失使农民无粮更无肉可食,37个区40万人沦为灾民。牲畜既是农民从事养殖业的资本,又是农民耕地种田和从事交通运输的主要工具。农具是农民收种和管理庄稼的必备用品。它们大量被损,不仅增加了农业生产的难度,大大降低了劳动生产效率,严重破坏了粮食生产的基础,而且直接损害了养殖业、纺织业、交通运输业以及商业的可持续发展,造成农村经济恢复乏力、农民生活难以为继。另外,胡宗南部队破坏窑洞,制造无人区,致使大量土地荒芜,许多民众流离失所、居无定所。

由于陕甘宁边区地处西北高原,气候干旱,雨水稀少,特殊的自然环境和连年不断的战争使边区的自然灾害尤为频繁严重。20世纪三四十年代,边区自然灾害呈现出多样性、普遍性、高度频发性和群发性、损失严重性等特点^[12]。1947年以来,陕甘宁边区自然灾害连续不断,普遍的春旱、秋涝、霜冻及部分地区遭受雹灾、水灾、虫灾。这些灾害因“胡祸”而导致更加严重。边区耕地面积减少约350万亩,收成不及上年的一半;夏秋耕地1100余万亩,收获不过80万石,加上边区原存粮食和除去“胡祸”造成的损失以及其他粮食支出,存粮约90万石,延属、绥属、三边3县125万人口存粮不足40万石。更糟糕的是,灾害又导致1947年的粮食质量较往年差,以往一斗粗粮能碾6升米,而今只出4升米,往年一斗米30斤,而今只有26至28斤。灾害导致生产基础与生活资料遭到严重破坏,给边区人民生活带来很大影响:在灾民中,马上断粮的约4.56万人,能吃到年底者约1.56万人,能吃到次年二月者约6.43万人,能吃到次年夏收者约2.45万人。灾民的食物多以杂粮或野菜为主,在重灾区如永坪,灾民主要食物为棉蓬、灰条、罗莲、沙蓬、荞麦叶、秕谷、

谷莠子和糠。这些杂粮和野菜含有的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较少,营养价值有限,自然无法满足群众身体所需的必要营养元素。在子洲石窑区,不少灾民每天吃清水煮白菜,营养不良导致很多人面部浮肿。在纺织发达的延川县禹居区,冬天还有人穿着露出肉身的破烂单裤。边区不少地方百姓的门窗坏了也只好用席片、死牛皮来堵塞门窗^[7]。综上所述,胡宗南部队的破坏和自然灾害导致边区饥荒极为严重。

饥荒恰恰是传染病流行的重要原因。由于饥荒,百姓抗病能力差,无暇顾及卫生,导致卫生条件极为糟糕,加速了传染病的蔓延。1948年2月,边区政府在给各专员和县长的指示中指出:“边区在胡匪骚扰厉害和灾情严重的地方,目前已发现了流行性病疫,这是因为作战区域尸体没有掩埋好和到处遗弃脏物所引起的;加上群众生活条件很差,抵抗力薄弱,入春以后可能扩大蔓延。”^[13]这里明确了边区传染病发生的原因:一是“胡匪骚扰厉害”即战争破坏严重;二是“灾情严重”即饥荒程度深;三是“尸体没有掩埋好和到处遗弃脏物”,意即卫生条件差;四是“群众生活条件很差”,造成了民众抗病能力低下。这与“当前急务”所载传染病发生原因不谋而合,故而传染病在边区的发生成为必然。

天灾和人祸共同导致的传染病危害极大,若不迅速控制,不仅给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带来严重危害,而且会影响人民群众对党和边区政府的信任、对解放战争的支持。同时,如果不杜绝天灾人祸尤其是胡宗南部队制造的人祸,则传染病必将继续发生和蔓延。而要控制传染病并铲除其根源,不仅需要行之有效的医疗技术,还必须要有高素质干部去推动医疗技术的实施,否则再好的技术也难以落实,这也是边区政府为何特别强调在传染病防控中既要重视医疗技术又要关注干部素质的深层次原因。

二、技术与干部:边区政府防控传染病的两个主要抓手

为防控传染病,中共西北局于1948年7月12日发布了《扑灭时疫紧急指示》^[7](以下简称“指示”),主要内容包括以下5点:

(一)做好传染病防控的动员工作

“指示”明确指出,1948年入春以来,边区各地不断发生时疫,不仅已蔓延到绥德、延安等十余县,而且死亡率很高,因此,做好传染病防控是边区党和政府的紧急重要任务,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显而易见,动员的目的是要让干部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性,克服麻痹思想和官

僚主义,以积极行动投入防疫工作中去。

(二)以医疗为主多措并举做好传染病防控

“指示”对成立传染病防控的组织机构相当重视,首先要求各地各级生产救灾委员会迅速加强扩大成为生产救灾防疫委员会,领导和开展以下工作:一是深入调查,了解本地区传染病的类型和蔓延情况;二是组织紧急治疗,动员公立医院和私人诊所的中西医生携带药品,深入疫区治病救人,如果在实际治疗中被证明有特效的单方、有特效的药物及救治成功的经验,要随时向生产救灾防疫委员会详细报告,以便更大范围地推广采用,如果遇到疑难杂症,也要随时详细报告,尽快研究出治疗方法;三是团结农村民间医生,注意搜集土单方,对其加以改造和提高,让医方为防疫工作服务;四是提倡预防工作,先选择几项简易切要的工作去做,如不喝生水、对传染病者隔离、掩埋死物和打扫垃圾,开展群众性防疫卫生运动;五是区县干部必须积极帮助和领导疫区开展防疫工作,要根据实际需要进行防疫活动,如宣传好的防疫经验,帮助请医生、采购必需药品和解决患病贫苦群众的困难;六是在做好上述工作的基础上,教育群众破除迷信,取缔各类巫神欺骗群众的不法有害活动。^[7]中共西北局采取了综合的疫情防控举措,既有具体的医学技术又有必要的社会变革。

(三)机关、部队和学校要做好表率

“指示”要求,“县以上党政军领导机关及部队和学校,除了做好本单位防疫工作外,还要直接领导驻地附近区域的疫情防控工作,派出医务人员专门负责附近居民的疾病治疗,对已发生的病疫要采用多种医疗手段迅速扑灭,未发生的则要切实做好预防,对过往患病的灾民要随时予以免费治疗,树立边区防疫的良好表率”^[7]。要做好表率,就必须深入疫区、接触患者,脚踏实地做好防疫工作,这自然要求高素质的干部去落实相关工作。

(四)查摆问题并及时总结汇报

“指示”指出了一些地方干部防疫工作存在的问题,如“未加重视或空喊防疫,流于形式;不作具体工作,或遇到困难自己不主动想办法而是单纯依靠上级解决,致使已发生的传染病未能及时扑灭,使本来可以减少或完全可以避免的损失未能减少或避免”^[7]。为此,中共西北局特别要求边区各地党政主要干部,“必须直接参加边区防疫工作并加强对防疫工作的领导,要把防疫情况作为检查各地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各疫病区要把最近一个月的防疫情况认真总结,就如何进行疫情防控向上级作详细的专门汇报”^[7]。

(五) 摆正思想并克服官僚主义

针对疫病造成边区军民的死亡，“指示”要求每位党员、干部和医疗战线的同志，“发扬对人民爱护、热忱和负责的精神，树立信心，反对向任何困难屈服的思想，摒弃那种认为现有物资和技术不能有效防止或扑灭疫情的消极观点”。“指示”特别明确了当时工作中真正的缺点是官僚主义，“指示”最后强调：“只要把我们本身存在的官僚主义这个缺点纠正了，全党动员起来了，干部素质提高了，坚决执行党的指示，对人民负责，积极提高医疗技术，全力向病魔发起进攻，积极领导人民开展群众性的防疫救护运动，我们就一定能胜利。”^[7]

综上，在应对传染病过程中，防控技术的运用和干部素质的提高并重，而提高干部素质的重点是反对官僚主义。只有通过摒弃官僚主义以提高党政干部素质，才能积极行动、多措并举提高传染病防控技术，才能避免流于形式地空喊防疫，才能动员一切力量和采用一切技术和办法开展防疫工作。

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根据中共西北局7月12日的“指示”，第一时间向记者发表了紧急谈话，《群众日报》7月14日即以《林主席指示各级政府扑灭病疫为当前急务》为题刊登在该报头版头条，这不仅表明了《群众日报》对该谈话的重视，更表明了边区政府对群众生命安全的高度重视。就“当前急务”所载疫情防控内容看，主要有4点：一是明确目标任务，二是树立疫情防控工作的典型，三是力戒疫情防控中的官僚主义，四是今后疫情防控的工作要求。

首先是明确传染病防控的目标任务。“当前急务”指出：“各级政府要切实负责，紧急动员全体人民，迅速阻止病疫蔓延，抢救生命，保证夏种工作顺利进行，争取秋收后彻底消灭饥荒，此为边区当前最紧急最重要的任务。”^[5]这里明确疫情防控要由各级政府负责，依靠对象是全体人民，最紧急最重要的任务是抢救生命、消灭饥荒。由于饥荒是造成病疫的重要因素，而且民众要生活下去就必须发展农业生产，所以，在防控疫情、抢救生命的同时还要发展农业生产。换言之，要防疫与生产两不误，而依靠的对象是全体人民，这对反对官僚主义无疑具有积极作用。

其次是树立传染病防控工作的典型。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当前急务”对病疫流行期间主动采取行之有效措施的单位和个人作了表扬，单位如延属专署、绥德专署、米脂县府、垦区区政府；个人如亲自用药医治患病群众的华池白马区六乡指导员吕文佐、救济患病群众粮食的米脂河岔区区长常迎吕、帮

患病群众锄草的龙镇区八乡乡长李树明、亲自护理患病群众的十里铺区青年主任杜兴平、随时到各区防治传染病的安塞招安保健药社医生郭连玉。^[5]这些干部的职业、职务和工作区域、工作性质不同，但都能深入一线、深入基层为患病群众服务，边区政府对他们均给以赞誉，称其是对人民对上级高度负责的优秀干部，具有深入实际亲自动手、关怀与解除群众疾苦的优良作风，不仅自己动手，还要宣传组织群众，形成群众性的防疫治病运动。“当前急务”之所以要表扬这些干部，一是因为他们素质高，没有官僚主义思想，能够深入抗疫一线，俯下身子用医疗技术和热心服务帮助患病群众渡过难关；二是要为其他干部树立正面榜样，教育和引导他们免受官僚主义影响，提高自身素质，组织民众打好群众性的传染病防控战。

再次是列举干部素质低的表现并严厉批评。一是部分地区的干部对严重威胁群众生命的传染病，采取漠不关心和熟视无睹的态度；二是有些干部不根据本地具体情况去研究扑灭病疫的办法，单纯等待上级发药品、派医生解决困难；三是有些干部不研究上级的防疫指示，不深入农村检查，敷衍了事任其自流；四是有些干部不将防疫工作配合救灾工作进行，对于群众因病致死毫无感觉，认为饿死人自己有责，病死自己无责；五是有些干部畏惧困难，认为在现有的物质技术条件下，不能有效地扑灭病疫，消极应付并向困难低头；六是有些干部思想麻痹，自己不但对病疫蔓延不管不问，而且不向上级反映报告。^[5]造成上述问题的根源在于部分素质低的干部官僚主义严重，脱离了群众、脱离了实际，不积极主动作为。另从所用笔墨的多少和措辞语气看，“当前急务”对官僚主义者的表现大写特写，字里行间充满痛恨痛斥。由此而言，“当前急务”报道边区传染病防控中存在的问题，实际是对有官僚主义作风和习气的干部的严厉批评。

最后是传染病防控的工作要求。林伯渠对干部的思想认识作了统一要求：“每个干部要在思想上认识到目前病疫的流传是边区人民最大的灾难，要发扬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热忱，接受救灾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扫除估计不足、熟视无睹的麻痹现象，克服夸夸其谈、不着实际的官僚主义作风，认真负责地组织与领导群众紧急开展自救和救人活动。”^[5]很明显，边区政府是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坚决摒弃官僚主义思想和作风，踏踏实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为此，“当前急务”提出了4点要求：第一，各级干部要立即动员组织当地民间中医医生下乡防疫，一方面

教育医生自动寻找病人,为病人服务,一方面减少医生在服务期间的战勤负担,并酌情解决其家庭困难,帮其解决后顾之忧,同时迅速审慎配制在实际治疗中被证明有效的各种单方,无代价发给患病群众服用,其费用如果当地政府无力负担,可呈报各专署向边区卫生署报销,各地保健药社更应团结与说服各私营药铺,减价或赊账向患病群众卖药,严格取缔乘机抬高药价的不法行为;第二,联卫、边卫协同派出救治组分赴病区进行紧急救治,各级政府卫生机关与驻军机关医务人员组织临时防疫治病小组,在驻地附近区乡进行防疫工作,派出医务人员专门负责附近居民的病疫治疗;第三,机关学校与群众团体利用集会开会、交往等各种机会,利用黑板报、标语、传单、讲话多种形式,向群众宣传防疫知识,开展群众卫生运动,耐心说服群众破除迷信,禁止巫神的骗人活动;第四,边区干部要坚决执行中共西北局《扑灭病疫紧急指示》,及时检查执行的经过,研究检讨经验教训,把防疫情况及时报告上级。林伯渠还以1948年春生产救灾的经验教训为例,痛批干部官僚主义作风造成的危害:“在某些轻灾地区,开始灾情并不严重,但后来由轻微发展到严重,主要是由于官僚主义作风所造成的恶果。而在某些重灾地区,开始灾情虽然严重,但由于当地干部对人民的高度负责,坚决执行了西北局及边区政府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使得灾情逐渐减轻或消灭。因此,目前防疫治病工作成败的关键决定于每个干部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心及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同时关怀与解除群众的疾苦,是测量每个干部的标准尺度,谁对党忠诚?谁对人民负责?将会从目前的防疫治病的实际工作中得到正确的证明。因之,每个干部都应坚决执行中共西北局、边区政府历次的防疫指示,与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作风进行严密的不调和的斗争。”^[5]只有这样,才能展开群众性的防疫治病运动,才能胜利扑灭传染病的蔓延与流行,才能保证复种工作的顺利进行。

边区政府既细化了防疫的技术方法,又明确了反对官僚主义以提高干部素质。为此,边区政府通过树立正面典型和列举官僚主义若干表现,教育和引导干部同工作中的官僚主义进行斗争,以对党忠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提高自身素质,积极组织和领导广大军民开展群众性的传染病防控运动,既要坚决扑灭传染病又要扎实推进夏种工作。为强调和突出对官僚主义的批评,“当前急务”专门加了副标题“成败关键决定于每个干部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心及对人民负责的精神”,这既表明当时官僚主义在

防疫中的危害又彰显了中共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对干部素质的高度重视,以及旗帜鲜明的政治态度。边区政府对官僚主义的反对是一贯的。林伯渠1948年2月27日所作《革命战争中一年来的政府工作》即明确了战争中还存在某些干部不负责任的渎职现象与脱离群众的严重倾向,已对官僚主义提出了严肃批评^{[10][53]}。“当前急务”则更进一步鞭挞了官僚主义者的丑陋行径。毫无疑问,通过反对官僚主义以提高干部素质,中共西北局和边区政府为做好传染病防控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和组织保证。

纵观本时段陕甘宁边区政府对传染病的防治,成效显著,既降低了疾疫发病率和死亡率,又提高了群众卫生防疫和科学就医意识,促进了边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还一定程度改变了边区城乡的环境卫生面貌,促进了边区社会的进步。不仅如此,边区卫生医疗防疫事业的发展,进一步巩固了中国共产党在边区的政权,为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及当下社会卫生防疫事业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经验。^[14]更重要的是,通过反对传染病防治中的官僚主义作风,边区干部素质得到了提高,干部队伍进一步纯洁,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增强,为树立良好的党风政风提供了有利条件。

三、历史与启示:提高干部素质是中国共产党防控传染病的一贯作风

陕甘宁边区政府通过提升防控技术和提高干部素质以做好传染病防治工作,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精神特质。这种精神特质是一贯的、持之以恒的。1932年初,江西富田和闽西地区传染病流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举行常委会,专门讨论防疫问题,决定“举行全苏区防疫卫生运动”并“责成军委军医处拟定办法和条例”,以便迅速扑灭疫情^[15]。为压实防疫的领导责任,1933年10月,中革军委颁布《暂定传染病预防条例》,对如何应对传染病作了明确规定,其中第十条强调:“凡不依条例规定之(者),不依该管卫生机关所指定之期限内施行应办事项者,各级卫生机关得请各级首长以相当处罚。”^[16]为加强对防疫工作的指导以保障工农大众的生命安全,临时中央政府于1934年3月10日又成立了“中央防疫委员会”,16日至23日即在疫区举行防疫运动周,领导干部率先垂范,和军民一起参加大扫除活动,洗通沟壑,深挖水井,灭蚊灭蝇,封塞鼠洞,修建土厕,掩埋死尸^[17]。红军到达陕北后,大力开展卫生防疫工作,发现传染病流行时,立即采取相关措施消灭疫情,防止蔓延。如1941年,甘泉县发生流行

性瘟疫,民政厅便迅速派出医务人员,携带药品前往救治^[8]¹¹²。中央医院1941年至1943年收住了患有痢疾和伤寒的病人101人,由于积极治疗,患者很快返回了工作岗位^[18]。除了积极救治,1945年中央军委总卫生部还组织专家克服重重困难研制伤寒、副伤寒、牛痘等血清疫苗^[19],为防治传染病作出了重要贡献。党的领导躬身践行,既为防疫工作树立榜样,又对提高干部素质起着积极的示范作用。1937年3月,延安开展卫生运动周活动,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亲自参加大扫除,毛泽东还讲了话,他指出:“注意卫生,健康身体,就是增加国防力量”,“卫生运动不是一个的人,要大家来做。”^[20]毛泽东关于卫生运动的讲话和亲身实践,为抗日根据地领导干部高度重视和积极投身卫生防疫工作既明确了卫生的意义又提出了具体要求,还树立了讲卫生的榜样。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对传染病防控同样高度重视,本文所列“紧急指示”“当前急务”外,还有很多此类实例,如1948年6月14日《群众日报》发表题为《肃清官僚主义,迅速扑灭灾荒》的社论,要求各机关、部队、学校和各级政府坚决克服官僚主义,立即投入疫情防控工作^[21]。1948年2月,边区政府在发现流行性病疫后立即要求各专署、县府把传染病防控作为救灾工作的重要任务,切实组织各级卫生机关参加各地的救灾委员会,领导各地疫病防治工作;区县医务人员组成的防治工作组,要直接到农村去开展防治工作;各级政府和救灾工作组、土改工作组的同志,也要利用一切机会在群众中进行防治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总之,各位专员和县长就是要很好地把群众组织起来,同灾荒瘟疫作斗争,不仅要“不饿死人,也要防止病死”^[8]²⁸。新中国成立后,这种精神特质被继承和弘扬。1949年10月初,察哈尔省察北专区发生肺鼠疫并蔓延,毛泽东对此高度重视,特别指示周恩来连夜召开国务院紧急会议,迅速成立了中央防疫委员会。察北专区地委也迅速作出反应,要求全区党员干部要对人民生命高度负责,发扬沉着顽强精神,动员群众战胜灾难。在各方共同努力和苏联防疫队的协助下,疫情得以控制,11月5日即无新增病例,12月初,察北专区鼠疫彻底绝迹。^[22]1951年9月,卫生部副部长贺诚向中央报告新中国成立以来卫生工作取得的成绩和缺点时指出:“不少省县以下的党、政领导干部,只把不饿死人是政府的责任,对因不卫生而病死的人则重视不够,认为是难以避免的‘天灾’。”毛泽东看到报告后,马上以中央名义指示:“中央认为各级党委对于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的缺乏注意是党的工作

中的一项重大缺点,必须加以改正。”^[23]大多数传染病是可以预防的,但为何未能预防?个中缘由应该很多,但一些党政领导干部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是重要原因。毛泽东的指示,正是对各级党委避免在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卫生工作中犯官僚主义错误而提出的明确要求。1958年11月,河北省邯郸专区伤寒病流行,痢疾、肠胃炎等传染病时有发生,原因主要是某些干部存在着官僚主义思想,只注意生产,忽略了对人民生活的关心,群众吃不到热饭、睡不上好觉,身体抵抗力下降。毛泽东看到这个消息后批示:“很值得注意,是一个带全国性的问题,注意工作,忽视生活,必须立即引起全党各级负责同志,首先是省、地、县三级的负责同志的注意,方针是:工作生活同时并重。”^[24]显然是要求各级领导要坚决杜绝官僚主义,像重视生产那样重视群众生活,让他们吃上热饭、睡上好觉,通过增强自身抵抗力以战胜伤寒、痢疾、肠胃炎等传染病。总而言之,党和政府一方面积极采取切实有效的医疗措施,坚决遏制疫情蔓延,一方面提高各级干部素质,让他们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防控第一线,为战胜疫情提供了重要的组织纪律保证。

总结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防治传染病取得成功的经验,最大的亮点是既重视医疗技术又重视干部素质,某种程度而言,后者较前者更为关键,故而,边区政区在增进医疗技术的同时,将提高干部素质作为传染病防控的重要抓手。为提高干部素质,边区政府把反对官僚主义作为突破口,因为官僚主义是领导干部最容易犯的一种政治病,同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优良作风格格不入,是我们党的大敌、人民的大敌、干部的大敌。中国共产党在传染病防控中与官僚主义进行的坚决斗争,彰显了作为百年大党在千方百计提高医疗防疫技术的同时,始终如一注意通过提高干部素质来做好传染病防控,以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执政理念。

参考文献:

- [1]叶晓东.陕甘宁边区传染病防治工作的历史经验[J].陕西党史,2020(2):19.
- [2]卢希谦,李忠全.陕甘宁边区医药卫生史稿[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
- [3]秦爱民.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医疗卫生工作[J].宁夏社会科学,2003(5):56-60.
- [4]温金童,李飞龙.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卫生防疫[J].抗日战争研究,2005(3):153-173.
- [5]林主席指示各级政府扑灭病疫为当前急务[N].群众日

报,1948-07-14(1,2).

- [6]张在同,咸日金.民国医药卫生法规选编(1912—1948)[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
- [7]中共西北局.为扑灭时疫紧急指示[N].群众日报,1948-07-12(1).
- [8]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3辑)[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7.
- [9]生产救灾专号·灾情概述[N].边区政报,1947-12-25(2).
- [10]《红色档案 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编委会.红色档案·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2卷)[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
- [11]陕甘宁边区政府、中共中央西北局开展一九四八年春耕运动的指示[N].群众日报,1948-02-14(1).
- [12]冯圣兵.陕甘宁边区灾荒研究(1937—1947)[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1:10-11.
- [13]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2辑)[M].北京:档案出版社 1991:28.
- [14]冯静静,袁文科.20世纪40年代陕甘宁边区的卫生防疫事业探析[J].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0(5):29.
- [15]高恩显.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工作历史简编[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1987:514.
- [16]中革军委.暂定传染病预防条例[C]//高恩显,等.新

- 中国预防医学历史资料选编·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8—1937.6),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1986:150.
- [17]翰文.瑞金的防疫运动[J].红色中华,1934(1):1.
- [18]刘亚利.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医药卫生工作概况[C]//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延安市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延安文史资料(第2辑),出版地不详,1985:98.
- [19]武衡.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第3辑)[M].北京:中国学术出版社,1984:316.
- [20]毛泽东.在延安大扫除时代的讲话[N].新中华报,1937-03-23(1).
- [21]张俊南.陕甘宁边区大事记[M].西安:三秦出版社,1986:280.
- [22]陈辉.新中国第一次防疫战:察哈尔省察北专区抗击鼠疫回眸[J].党史博览,2020(3):10.
- [23]毛泽东.中央关于加强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指示(一九五一年九月九日)[C]//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951年1月—1951年12月)(第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446.
- [2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三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513.

(责任编辑 谢春红)

Technology and Politics: the Two Grips of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the Shanxi – Gansu – Ningxia Border Region Government

—A Study Centering on President Lin Boqu's Instruction to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to Fight the Epidemic as Their Current Urgency

HU Anhui¹, YANG Ping²

(1. School of Marxism, Linyi University, Linyi, Shandong 276000,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Puer Normal Univeristy, Puer, Yunnan 665000, China)

Abstract: Anti-bureaucratism is the political focus for the Shanxi – Gansu – Ningxia Border Region Government to prevent and control the epidemic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War of Liberation, which is clearly reflected in *the President Lin Boqu's Instruction to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to Fight the Epidemic as Their Current Urgency*. This instruction, on the one hand, introduces infectious diseases such as typhoid fever and cholera and their causes, which include natural disasters caused by droughts, floods and frosts and man-made disasters caused by the invasion of Hu Zongnan's troops. On the other hand, it introduces the medical technology and political focu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based on this analysis, it clearly points out that bureaucracy is the greatest harm of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this border region, and states the measures against bureaucracy, which includes commending outstanding cadres in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o set an example and criticizing the inaction and disorderly actions of some cadres to warn, whose actions are divorced from reality and the masses. This sharp contrast aims to emphasize that leading cadres must eliminate bureaucratic ideas and styles, organize and lead the military and civilians in the border areas to carry out mass epidemic prevention work.

Key words: prevention of infectious diseases; medical technology; anti-bureaucratism; Shanxi – Gansu – Ningxia border region government

中共抗日根据地医疗卫生工作历史经验

叶宗宝

(信阳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南信阳464000)

摘要:中共抗日根据地医疗卫生工作坚持“政治坚定、人民至上”原则,以“预防为主、救死扶伤”为方针,通过“中西结合”实现“技术优良”之追求。这些经验发源于土地革命时期,影响着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医疗卫生工作的民本宗旨。在传统中医药与近代西医的关系上,中国共产党反对厚此薄彼,努力探索中西医相结合的实现途径,把传统中医药从濒临危亡的困境中解救出来,完成创造性转化,产生国际影响。这在中国医学发展史乃至人类卫生健康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医疗卫生工作;历史经验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3.04.011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3)04-0066-07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医疗卫生工作在中国医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中国传统医学经过数千年发展,取得长足进步。但随着西方近代医学传入,传统中医学的影响力减弱,生存空间为近代西医所挤压,以致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通过了废除中医案,在中医学界引起轩然大波^{[1]115-121}。然而,就在传统中医学存亡绝续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已开辟革命根据地,建立工农武装割据政权,在保卫苏区军民生命健康过程中,将传统中医药与近代西医相结合,开创中国医学发展新格局,为传承祖国医药、促其创造性转化、指导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积累了实践经验。中国共产党领导医疗卫生工作始于土地革命时期,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实战历练,经验不断丰富。尤其抗日战争持续时间长,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叠加,战斗激烈,条件艰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医疗卫生工作经验日趋成熟的关键阶段。鉴于学界围绕抗日根据地^[2],尤其陕甘宁^[3]、太岳^[4]、太行^[5]、竹沟^[6]、晋察冀^[7]等根据地对之已研究较多,而对其历史经验尚未全面总结分析。本文在此基础上以相关资料,把这一经验概括为:政治坚定,人民至

上;预防为主,救死扶伤;中西结合,技术优良。并结合时代背景,指出这一经验对推进中国医学发展的重要历史意义。

一、政治坚定,人民至上

抗战时期,中共抗日根据地面临着极为严重的疫病挑战。其突出表现,一是军民营养补给困难,抗病能力不强。中原根据地士兵平均体重才90多斤^{[8]118},伤病员只能以稀饭、水芹菜、地连皮、野菜、酸枣、糖梨、山楂、莱菔梨、杨桃、花托板、河虾河蟹等补充营养^[9]。冀中村民常住山洞、地洞和荒郊野外,食野菜、树皮、树叶。因频繁转移,风餐露宿,烂脚(脚打泡)、冻伤、感冒、消化不良、急性胃肠炎等很常见。传染病主要有疟疾、伤寒、副伤寒、斑疹伤寒、回归热、痢疾、疥疮等^{[8]121-123}。士兵常吃萝卜干、干菜,缺乏维生素A,还多发夜盲症^[10]。二是扫荡与反扫荡战争引发疫情。在晋察冀边区,1942年“五一一大扫荡”后疫情严重^{[11]617},平山民众十之八九患病^[12]。沦陷区居民则被集中关押在窝棚、马棚、猪圈和磨道里,苍蝇、蚊子、老鼠、臭虫、虱子活动猖獗,疫死率极高^{[13]336}。三是日军施放细菌病毒。在

收稿日期:2023-05-19

基金项目: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百年医疗卫生史料收集、整理与研究”(21&ZD036)

作者简介:叶宗宝(1973—),男,河南固始人,历史学博士,信阳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医疗社会史、灾荒史。

晋察冀边区的正定、无极、深泽等地，日军释放病鼠、疫蚤^{[14]93-94}。1941年，敌寇在大清河沿岸散布霍乱、伤寒等菌，杀死不少无辜同胞^{[11]100}。日军施放芥子气、发射糜烂性毒气弹，使人打喷嚏、流泪，皮肤生泡、破烂，气喘闷死^[15]。日军还沿平汉路廉价出售“小洋猪”，导致平、津、保、石等地大猪发瘟^[16]。另有繁峙、应县等地发牛瘟，病牛不吃草，气短，死后全身血液变黑，死牛皮肉粪便都传染该病^[17]。

抗日根据地的医疗卫生条件也极其落后。起初，奎宁、止血剂、麻醉药奇缺，酒精、镊子、橡皮膏、骨锯、肥皂、毛巾等无法保障，仅靠战斗缴获应急^{[18]531}。战场急救方面，起初沿用“一战”时不做初期清创、不用石膏绷带的做法，等伤员送到后方手术，多人已伤口感染化脓，或并发骨髓炎致残死亡^{[8]109,125}。在河南抗日根据地，诊断起初只有体温计和普通听诊器，手术仅有剪、钳、镊子、注射器和一般手术刀，纱布、脱脂棉、绑带主要靠自制。在睢杞太根据地，医疗物资只有棉花、纱布。1942年前，冲洗创口以自制盐水代替红汞，稀布代替纱布，竹签代替镊子；还以棉花轧后用水洗，棒槌砸、漂白粉煮，代替脱脂棉^{[19]51-53}。边区居民卫生观念也很落后。曲阳游击区“老乡迷信很深”，因小孩多病，谣传“谁家孩子因为洗洗脸、扫扫地就死”，结果村民再不敢洗脸扫地，“一闹病就到处拜神求医”^[20]。

面对根据地严峻的疫病形势，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医疗卫生工作的领导。军委总卫生部颁布《暂行卫生法规》，要求各部队、边区仿照中央设总卫生处，军委设总卫生部，边区政府设卫生处（科），领导组织卫生防疫^{[21]518}。延安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要求区、乡、村设立卫生防疫小组^[22]。在晋察冀边区，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把设立卫生专门机关写进纲领，要求县、区、村建立大众互助的储蓄救灾组织，提倡清洁运动，改良公共卫生，预防疾病灾害^{[23]85}。1942年后，山东军区还抽调卫生干部帮助鲁中、鲁南、胶东成立行署卫生处，由各军区卫生部长兼行署卫生处，领导建立地方各级卫生组织和医院。在华中，新四军于1938年在南昌成立军医处，下设医政、保健、材料、总务等科。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在苏北盐城重组军部，成立军卫生部，开设黑热病专科医院为苏北群众免费治疗^{[21]521}。

在党的领导下，抗日根据地首先解决医药短缺问题。一是因势利导，积极采购。晋察冀边区从河北村爱卿医院购买碘酒、医疗器械、绷带、纱布，成立永茂贸易商店联系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邢台等城市，组织定县商人何树凯利用与北平震华、利华医

疗器械行和天津舒奚记医疗器械行的关系为边区采购医疗物资^{[24]736-737}。易县每村组织扁担队，多次从敌占区运回盐、粮、布、药^{[18]691}。二是卫生统战，支持边区。冀中小樵镇延寿堂药房向吕正操部献出全部药物，治疗伤员。饶阳柳枝桥、安国南关和广安镇的开业医生王育容、刘亚夫、王道建及阜平城平民医院院长李铁亚等人也全部贡献药品器材^{[24]596}。胶东军区以军民合办、公私合办、中西合作等形式成立医药合作社。在晋察冀，除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带来药品和美制小型X线机外，尚有国外记者在阜平城外河滩空投药品器材支援^{[24]776}。三是自己动手，发展制药。陕甘宁边区将中草药加工成丸、散、膏、丹和酊剂。睢杞太根据地自制阿片酊、阿片末、大荒末、土纱布、棉花、绷带、盐水、脱脂棉和蒸馏水，到抗战转入反攻时已拥有医学显微镜和手术床，不仅能用乙醚麻醉做截肢、植皮、骨折石膏固定和铁夹子固定等较大手术，还能治疗肺结核、胃病、肠炎、痢疾、疟疾、感冒、疥疮等病，包括注射破伤风抗毒素、帮助地方种牛痘等^{[19]51-53}。冀中军区制药总厂能制造福百龙、扑疟母灵、黄芩碱等六种解热药，像妇科药、强心剂、消化健胃药、镇咳药、泻下药、外科用药等数十种均能生产^{[25]9}。抗战期间，伯华制药厂至少能生产7种卫生敷料、21种医疗器材、119种药品和140余种医药器械^{[24]735}。

中国共产党还领导根据地军民因地制宜保障民生。晋察冀边区提倡在沙地、坡地、沟沿、河滩种植容易活、且“一百斤能榨四十多斤油”的大麻子以自救^[26]，指示各县在不能种植五谷之滩地、高地、林边、路边多种旱种耐旱耐涝、容易栽培、不用耕锄上粪的大蒜子和北瓜^[27]。针对夜盲症，鼓励多种蔬菜，给部队发豆子、做豆腐、食用生豆芽以补充“维生素A”^[10]。边区儿童保育院增加医药费，减少儿童疾病^[28]。牛是农耕重要工具，对牛瘟，边区政府及农会不仅设法救治^[17]，还组织防治牛疫委员会，印发《牛疫防治法》，严禁病牛区与健牛区往来。病牛死后，深埋八尺。病牛区内，病牛与健牛隔离，用石灰水消毒，不准病牛在河内饮水^[29]。针对日寇施放鼠疫菌和糜烂性毒气弹，边区不仅发动群众饲猫捕鼠灭蚤^[30]，还由军区卫生机关派防疫小组前往研究治疗^[31]。冀中军区则自上而下建立卫生组织，开展防疫教育和卫生运动，其《告全世界全国人士书》说，“我们有坚强的决心击破敌寇恶毒手段，保障人类的健康”，直到“光明的实现”^[32]。

二、预防为主，救死扶伤

中共抗日根据地医疗卫生工作主要是疫病预防

和医疗救治。疫病预防首先是加强卫生保健。陕甘宁边区要求士兵到宿营地后用热水烫脚,对脚泡用酒精消毒,引出积液。行军路上设饮水站,士兵以咸菜补充流汗缺盐。对冻伤“以动制冻”,尤其全身寒冷或脚部麻痛时,要求原地踏步或继续行军,经常摩擦耳面手等最易冻伤的部位。为防感冒,要求控制行军速度,减少出汗;途中休息时,不准睡觉;汗后不许脱衣摘帽;天冷抵宿营地后喝热姜汤,或在面糊汤内放姜、辣椒、葱、花椒等做成“五虎汤”用于发汗。严防病从口入,禁吃生冷瓜果,剩饭剩菜须加热蒸煮后食用^{[8]119}。晋察冀边区还通过调查登记医生、制定组织简章、健全区级组织,发起成立医生抗日救国会开展卫生宣传^[33]。

其次,实行防治结合。冬季防气管炎、冻伤。生产劳动时,防擦伤、眼病、中暑和肠胃病^{[8]106}。对疟疾,用常山、柴胡、砒石、黄芩、花椒等制成的疟疾丸内服,或在发作前4—5小时于第一、二颈椎间进针约0.5厘米,挤出少许血液^{[8]121}。对流感,以柴胡汤、姜汤、阿司匹林、托氏散、解热丸、止咳片^{[8]91},或双花、连翘、甘草、生姜等防治^{[8]141}。对回归热,注射有机砒制剂。对痢疾,用黄连、黄柏、黄芩、白头翁,或采食马齿苋、铁苋菜防治,1945年开始用磺胺类药物。对疥疮,以凡士林或雄黄、硫黄、苏合香、松馏油等配成软膏,或用猪油、麻油、硫黄加米粉、水杨酸配成水剂,涂擦外用;甚或购回少量硫化钾,制成水溶液擦澡;冬季,先以柴火烤疥15分钟,再以硫黄擦剂涂之^{[8]123}。对黑热病,用锑剂治疗,多数病人用三价锑,重症用五价锑^{[8]141}。

第三,接种、隔离和体检。春季接种牛痘,夏秋注射霍乱、伤寒疫苗。晋冀鲁豫边区接种霍乱、伤寒、副伤寒三联疫苗,1941年后虽因日军“大扫荡”造成疫苗购买困难,但仍以酌减接种剂量、改皮下注射为皮内注射维持接种。在隔离方面,要求疥疮患者不与健康人同炕、同被,眼病患者不与人共用毛巾脸盆。传染病人出院后对住地消毒。病人厕所专用,用后撒生石灰,走后填土深埋。病人治愈后,必须观察10余天出院。要求集体烫衣,灭虱,灭疥;做好疫情调查;不住疫病流行的村庄,不入有可疑传染病之家。胶东军区对每批新兵进行7—10天的体检。1943年针对投诚士兵35%患淋病梅毒、70%患疥疮、50%患痔疮、20%营养不良,军区专门制定了卫生保障计划^{[8]137}。新四军军医处制定《保健员三大任务》,凡心脏病、沙眼、肺癆、下肢静脉曲张、年久痔漏、夜盲、双侧疝气、精神失常等患者不准入伍^{[8]155-156}。

第四,卫生建设和个人防护。营房装纱窗门帘;厨房厕所设暗道;剩食盖纱罩;设置垃圾坑、修建深坑厕所、改造畜圈、用堆肥法处理粪便、改善水源、挖排水沟。驻地50米以内清除垃圾污物,每家每户要水满缸、庭院净。水井由专人看管,防止敌特投毒。反“扫荡”期间,卫生员每人携漂白粉一小瓶,对饮用水净化消毒。炊事员要接受教育和健康检查。碗筷洗刷干净,蒸煮消毒。米饭蔬菜用纱布盖好。中毒后以重碳酸钠液洗鼻、漱口,以硼酸溶液洗眼,或以大蒜液煮沸作饮料。重伤者移送医院。预防中毒方法是:用冷水或尿浸湿毛巾掩口鼻,用冷水漱口;服浓茶,吃大蒜;服苏打水,用硼酸洗眼;用冷水擦背;速将中毒伤员搬离染毒区,静心休息。卫生学校增加防毒课程^{[8]113}。个人卫生强调定期理发、剪指甲、洗衣、洗澡、晒被褥,不与人共用毛巾^{[8]106}。陕甘宁由机关、部队、学校、群团组成防疫委员会,每个居所设一个厕所,每村挖一口水井,每天洗一次脸;不喝生水、不吃不洁食物;勤洗衣,常晒铺盖,防寒防湿;有病请医生,不请巫医。白塬村卫生公约说:“碗筷锅盆勺,饭后要洗净;剩饭和剩菜,不让苍蝇叮;若要不得病,不吃生和冷;人人手和脸,每天洗两遍;要将脚和衣,每月洗四回;厕所经常扫,牛圈两次垫;人人能做到,年年不生病。”^{[8]69}

第五,办卫生杂志,传播卫生知识。陕甘宁中央军委总卫生处创办《国防卫生》杂志;卫生合作社选编卫生宣传册;《解放日报》设“卫生”专刊56期。晋察冀《卫生建设》刊出卫生业务技术资料数百篇,卫生、防疫、防毒、传染病防治和初步疗伤等题材占三分之一^{[8]97}。山东创办《卫生半月刊》,印发《卫生管理规则》《夏季卫生常识》《大练兵卫生教育参考资料》《冬季防病常识》等资料。《晋绥抗战日报》辟有卫生专栏,《晋绥日报》《胶东前线》《大众报》《胶东大众》也刊登卫生专文^{[8]136}。新四军编印季刊《夏季卫生》《秋季卫生》,发行《大众卫生》10期,宣传个人卫生、集体卫生以及如何防治甲状腺肿、天花、疟疾、疥疮、夏季传染病和冬季常见病等^{[8]157}。豫皖苏根据地藉《拂晓报》交流卫生常识和妇婴工作,形成早晚刷牙、用公筷、剪指甲、不喝冷水、大便后土掩、痰入盂等卫生习惯^{[34]355}。针对日寇散播鼠疫,《晋察冀日报》刊文宣传鼠疫杆菌、老鼠与人群的关系,要求隔离病人,严格消毒^[35]。

第六,多渠道卫生宣讲。晋察冀成立军民卫生委员会,向群众讲述什么是瘟疫、怎样预防肺炎,向小学生讲解天花预防知识^{[8]100}。晋冀鲁豫边区把卫生列为连队军政训练科目定期授课。新四军军区门

诊不仅为军民上卫生课,还利用体检、预防接种机会宣讲天花和肠道传染病预防常识^{[8]166-167}。对炊事员,讲解炊事卫生的重要性及消化系统生理解剖概要、寄生虫与细菌、传染病常识、食物选择与烹饪方法、厨房卫生管理等^{[8]158}。陕甘宁边区八路军军医处、中国医科大学多次举办卫生展览会^{[8]168}。山东一一五师用图表及实物宣传防病原理、展示病人形象,讲解疾病传播和预防办法。胶东第五旅的连队组织战士用放大镜看苍蝇,讲解其携带细菌、传播疾病的道理。新四军借“七七”纪念活动制作卫生统计表、卫生宣传画,在王村、中村、土坑、云岭等地展览,军民参观累计达10719人^{[8]157}。山东军区在水井旁、宿营地和临时休息地,写上“井水虽然凉、病菌里面藏”,“为了防中暑、休息找阴凉”,“为了防感冒、不要随便脱衣帽”等标语,同时结合快板、对口词、歌曲等宣传卫生知识。陕甘宁边区编演的《卫生歌》《李大旺看病》《劝婆娘》等幽默风趣,颇受群众欢迎^{[8]167}。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还分层次宣讲:基层干部侧重于认识和贯彻卫生制度与防病的关系;一般战士,宣传不讲卫生的害处;炊事员、司务长和管理员,着重讲解食物烹饪对营养损失的影响,防止发生营养缺乏和肠道传染病^{[8]136}。

此外,根据地还开展卫生检查。内容包括:室内外保持清洁;挖深坑小口厕所;门口挖痰盂;分水洗脸,不共用盆水;实行分菜制,不乱用碗筷。每年4月12日至5月12日为卫生运动月,清除杂草,排放污水,填平沟坑。建立个人、饮食、环境卫生制度,开展连、团、村、户不同层面卫生检查评比,表扬先进,带动一般^{[8]145}。避免人畜杂处,消灭蚊蝇、跳蚤、臭虫、老鼠。家具炉灶保持清洁^[36]。打通阴沟,掩盖茅坑,打扫村前村后,埋好人畜尸体。家具不粘尘土^[37]。议定村民卫生公约,一切卫生机关及中西医生都参与“卫生突击运动”^[38]。

在医疗救治方面,首先推广“初步疗伤”法,对伤病员实行24小时内清创^{[8]192}。晋冀鲁豫军区学习白求恩《游击战中师医院的组织和技術》,将救护延伸到火线,尽快输血输液清创,防感染,促自愈^{[8]125}。伤势轻、能早愈者经火线治疗后随卫生队活动。伤势重者经处理治疗脱离危险后,转送休养所或后方医院治疗。不能及时转运的伤病员,则安置在地下医院、梯田医院或堡垒户的家中疗养。群众不仅组成担架队,把伤兵“甲村送乙村,乙村送丙村”,交替辗转送到目的地,还腾出房子做病房、手术室、换药室、配药室和医生护士的宿舍等^{[39]21}。1944年秋攻打东平时,即便仅有胺苯磺胺(S.N),

也成功救治了很多伤员^[40]。

其次,收治或巡回治疗疫病患者。抗战期间,晋察冀军区共收治病员216000人^{[21]521}。其中1941年秋,边区派出104人共20个防疫组分赴384个村庄,治疗63403人次,治愈率达71.6%^{[24]407}。阜平县军区派医疗队88次,治愈疟疾、流行感冒、痢疾、回归热、伤寒等4521人^[41]。1941—1946年,晋绥边区收治10732人,治愈率达81%^{[8]111}。阜平马县长针对疟疾、痢疾、流行感冒等疫情,提出“到病灾最为严重的阜平去”。总计88个中心村、7074个病员得到治疗,治愈4521人,含疟疾1979人,流行感冒785人,痢疾193人,回归热6人,伤寒594人^[41]。冀北办事处平西卫生事务所不仅免费施种牛痘,注射防疫药针;而且登记中医,成立医师组织,采制平西土药;通过组织医疗突击队、卫生检查宣传队分赴各地和成立门诊部为民众义务诊疗等途径,成功解决了边区民众面临的疾病、医疗与卫生难题^[42]。

最后,提倡互助友爱,设法治疗。各地全力组织中西医和药品,通过流动医疗队或固定医疗所,定时为群众义务治疗;反对遇病不治或对严重的疾疫漠不关心;有计划地将工作、学习、休息适当分开,合理通过游戏和休息,保持身体健康^[43];实行防疫贷款,克服医药困难^[44]。在易涞,各级政府号召各村组织互助小组,看护有病而无人照管的患者,医药合作社设法搜集药品,分区司令员令分区卫生部组织医疗队携带医药分赴银坊、管头、易县六区一带诊治病者^[45]。平山以简单处方治疗疟疾,“收效甚大”^[46]。

综上所述,中共抗日根据地通过加强卫生保健、实行防治结合、传播卫生知识,落实接种、隔离、体检,以及强化个人防护、卫生建设、卫生宣讲和卫生检查等多种途径预防疫病。同时还将收治患者与巡回、互助治疗相结合,对伤员实行“初步疗伤”和24小时内清创。这样,就把传统中医学“治未病”与“治病”的优良传统,辩证灵活地落实于抗战时期保卫生命的伟大实践。

三、中西结合,技术优良

抗战初期,能打针、开刀、调药的西医在根据地非常紧缺,治疗主要靠土方草药^{[47]550}。加以敌对势力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党中央号召中西医团结合作共渡难关。

其一,开发中药。根据地选择土单验方,结合实际自制陈皮、苦味、辣椒酊。用曼陀萝花、阿片、樟脑制成十滴水。对具体疾病,像疟疾,用血竭泡老醋,或柴胡配常山与其他药配伍制成柴胡丸或柴胡散治疗;针对关节痛,用防风、黄芩、桂枝、升麻配药;治伤

风咳嗽或祛痰,以桔梗、半夏做成丸剂;治小疔肿、消炎止痛,用荆芽叶捣碎掺食盐;利尿,用车前子、瞿麦等^{[9]46}。条件最艰苦时,探寻替代药物。像止血,用木炭制成木炭末,或烧野生毛腊灰代之;发汗,用小谷子代替阿司匹林;泻药,用硝土熬成硝酸盐代芒硝;润肠通便,用蓖麻子轧成蓖麻油;冲洗创口,以自制盐水代替红汞。类似还有:以米壳浸泡代阿片酊;用南瓜瓢作止血药;猪油加黄蜡代替凡士林;枸树皮代替绷带;树叶代替纱布敷料等。

其二,中西互补,土洋结合。睢杞太根据地起初药物只有石碳酸、碘酒、依比膏、凡士林、雷夫奴尔、苏打、大黄末、阿司匹林、十滴水、次苍粉等,不足药品以姜汤、大葱、土黄连、土生地、车前子、公英、槐末、椿牌、菊花、柳叶等弥补^{[19]50}。还曾将纯盐酸奎宁或纯奎宁粉制成注射剂应对疟疾^{[9]47},并配以艾烟驱蚊^{[9]41}。外科小手术,像割脓疮,用磨利消毒的割脚刀;大中型手术,用木工锯、锉、屠刀。条件最苦时,以铁丝当探针、丝线代肠线;竹片削薄,烤握成弓形,代金属镊子。手术刀具用后生锈,经除锈、煮沸、消毒后再用。抗战后期,医疗条件改善,中西医结合深度发展。根据地医院已有显微镜、手术床,不仅能自制蒸馏水、给战士注射破伤风抗毒素,而且能用乙醚麻醉进行截肢、植皮、骨折石膏固定和铁夹子固定大手术^{[19]50-51}。工作上,中西医团结协作。如平山县,参加医生抗日救国会成立大会的有中医、西医、兽医,针对时疫、瘟疫、痢疾和扫荡中可能发生的疾病研究良方,准备药物^[12]。

其三,卫生工作指导。在孤悬敌后的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留守处的竹沟镇,党中央从延安派朱直光、林士笑、李毅、钟毓、钟华、翁林、林之径、张永远等同志,将《内科学》《外科学》《药理学》和中药汤头歌等书籍带至竹沟,为鄂豫边、豫皖苏抗日根据地培养输送了一批批卫生人才^[6]。在晋察冀边区,中央军委先后派来延安卫生学校毕业生和江一真带领的延安前方医疗队^{[24]391,393}。在冀中军区,延安总部和一二〇师选派王恩厚、谢建益、何权轩、徐选河、方中贤、高洛良等卫生干部前来支援^{[25]5}。在党中央组织领导下,通过技术人员传帮带和战争环境历练,抗日根据地医疗卫生工作不仅后备队伍充实,而且技术水平不断提高。

其四,卫生战线扩大。在第一二九师及晋冀鲁豫根据地,1940年成立有模范医院(晋冀鲁豫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野战医院、附属医院、兵站医院和残废疗养院。各旅及分区卫生处设2—3个医疗所,收治伤病员200—300名。截止1940年12月,

该区有旅卫生处13个、军区卫生部4个、分区卫生处16个、团卫生队33个、师卫生部直属医疗所5个。加上该区建立的制药厂、绷带材料厂、酒精厂、玻璃厂等,基本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医疗卫生体系。虽然1941年入秋后医疗队伍在日寇“扫荡”下被迫缩编,但1943年战略反攻后又迅速扩大,晋冀鲁豫全区设军区卫生部、纵队卫生部各4个,军分区卫生处21个,旅卫生处14个,团卫生队118个。军区还设有制药厂^{[8]116-117}。

第五,聚焦问题解决。晋察冀边区举办看护、司药、调剂、医助、医务管理等训练班^{[24]585},仅第三军分区举办的看护员、卫生员、医助、司药、调剂员等训练班,每期就有50—80人不等^{[24]607}。水东分区卫生处培训班,学期半年一年不等,教材有《简明外科学》《简明内科学》《战地救护》《医药手册》等,由军区卫生处编写油印^{[19]53}。1942年,抗大培养51个卫生干部。太行根据地针对战场救护和疫病流行,开设药理学、救护学、生理解剖、微生物学、消毒、常见病护理、常规伤包扎等课程,要求学会治疗疥疮、疟疾、痢疾、伤寒、蛔虫等农村流行病,懂病理,能预防,并且会用中药、西药,会注射疫苗、血清、六零六等^[5]。学员课一上完,就由老师带至门诊病房从事包扎、换药、消毒、注射、护理等业务^{[9]41}。与此类似,竹沟根据地成立中原卫生队,培训青年卫生人员^{[9]40}。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医生训练队,后扩大为卫生学校^{[8]116}。

第六,卫生技术提高。在河南抗日前线,起初几乎无输血输液疗法^{[9]48},只规定了止血、固定、消毒、裹伤、搬运等火线救护技术要求^{[8]93-94}。但到战争胜利后,卫生学校已开设有外伤包扎、外科学、内科学、生理学、药理学、拉丁文等课程^[40],根据地不仅门诊制度、休养所制度健全,而且卫生、护理、司药专业分工明确^{[9]41}。在晋察冀边区,军区卫生部副部长杜柏华(1904—1941)以科学方法探索中医,创造有解热、利尿、防腐、健胃、镇咳化痰、镇痛、抗疟等几十种药方,救治伤病无数^[48]。聂荣臻还专门为此签发《关于自制代用品问题的训令》,指出西药购买与输入日益困难,“边区土产原料炮制之各种药品”虽“外观不若舶来西药之精致”,但采用原料亦多含西药成分,或按中医验方配成,“均极有效”。他在《科学地大量运用中药》一文中号召根据地军民自力更生,大量采用中药,代替西药^{[49]97-98}。

四、结语

中共抗日根据地医疗卫生工作历史经验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工作原则,即政治坚定、人民至

上,体现了医疗卫生工作的革命性、民族性和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宗旨。二是工作任务,即预防为主、救死扶伤,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治未病”与“治病”相结合的实践探索。三是工作依靠,即中西结合、技术优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成功化解中西医冲突、复兴传统医学,以及治病救人、救死扶伤的政治智慧和技术追求。这些经验源于土地革命时期医疗卫生实践,影响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医疗卫生工作。早在红色革命根据地时期,毛泽东就主张用“中西两法”治疗工农兵疾病。1950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上,毛泽东题词要求“团结新老中西医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50]213}。在题词精神指导下,形成了全国卫生工作四原则: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与群众运动相结合^{[51]54}。在对待传统中医药与近代西医的关系上,中国共产党坚持唯物辩证和实践的观点,既承认“新医”比“旧医”高明,又认为仅靠“新医”不可能解决实际问题,并努力探索中西医相结合的现实途径。1954年7月毛泽东提出“首先要西医学中医,而不是中医学西医”的具体要求^{[52]621-622}。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医学”,即:“具有现代自然科学基础,吸收了古今中外一切医学成果的新的新医学”^{[52]619,623}。20世纪80年代,中国继承发扬传统医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引起了世界关注。世界卫生组织专门设立传统医学处推广中国经验^{[53]759-760}。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不仅在革命时期把祖国医药从濒临危亡的困境中解救出来,而且促成其创造性转化并产生国际影响。这在中国医学发展史乃至人类卫生健康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赵洪钧. 近代中西医论争史[M]. 北京:学苑出版社, 2012.

[2] 王元周. 抗战时期根据地的疫病流行与群众医疗卫生工作的展开[J]. 抗日战争研究, 2009(1).

[3] 温金童, 李飞龙.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卫生防疫[J]. 抗日战争研究, 2005(3).

[4] 郝平. 太行太岳革命根据地的医疗卫生建设与改造[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9).

[5] 刘轶强. 革命与医疗:太行根据地医疗卫生体系的初步建立[J]. 史林, 2006(3).

[6] 叶宗宝. 抗战初期竹沟根据地卫生战线的创建[J].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6).

[7] 邓红, 郑立柱.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疫病及其防治

[J].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4).

[8] 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经验编委会. 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经验:第一卷[Z].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1.

[9] 中原革命根据地卫生工作史料汇编[C]//河南省卫生志参考资料(二十九). 河南省卫生志编辑室, 1984.

[10] 从夜盲症说起[N]. 晋察冀日报, 1942-02-26(04).

[11] 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 冀中平原抗日烽火[C].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7.

[12] 平山成立医生抗日救国会[N]. 晋察冀日报, 1942-07-29(01).

[13] 李秉新, 徐俊元. 侵华日军暴行总录[C].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5.

[14] 郭成周, 廖应昌. 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历史上被隐瞒的篇章[C]. 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7.

[15] 今春敌扫荡华北[N]. 晋察冀日报, 1942-03-28(01).

[16] 敌人卖的小洋猪[N]. 晋察冀日报, 1942-08-25(01).

[17] 繁峙、应县一带发生恶性牛瘟[N]. 晋察冀日报, 1942-08-21(01).

[18] 杨成武. 杨成武回忆录[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87.

[19] 睢杞太革命根据地卫生事业在杞县的建立与发展[C]//河南省卫生志参考资料(二十四). 河南省卫生志编辑室, 1984.

[20] 白冰秋. 曲阳游击区麻疹调查[N]. 晋察冀日报, 1945-05-27(04).

[21] 邓铁涛. 中国防疫史[M]. 南宁: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6.

[22] 陈松友, 杜君.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疫病防治工作[J]. 中共党史研究, 2011(6).

[23] 魏宏运. 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一编[G].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4.

[24] 北京军区后勤部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晋察冀军区抗战时期后勤工作史料选编[G]. 北京:军事学院出版社, 1985.

[25] 吕正操. 抗战一周年总结冀中平原区游击战的经验教训[C]//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8期. 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办公室, 1984.

[26] 多种大麻子[N]. 晋察冀日报, 1942-03-17(04).

[27] 卫生运动一角[N]. 晋察冀日报, 1942-03-21(03).

[28] 边区儿童保育院[N]. 晋察冀日报, 1942-08-16(01).

[29] 二专署防治牛瘟[N]. 晋察冀日报, 1942-08-28(01).

[30] 敌寇已在定县大放毒鼠[N]. 晋察冀日报, 1942-02-28(03).

[31] 狗急跳墙:敌在我根据地到处放毒[N]. 晋察冀日报, 1942-04-05(01).

[32] 关于预防敌散放鼠疫菌之紧急通知[N]. 晋察冀日报, 1942-03-07(03).

[33] 平山抗援会讯[N]. 晋察冀日报, 1942-06-28(01).

[34] 中共河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纂委员会. 豫皖苏抗日根据地(一)[C].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5.

- [35] 预防鼠疫[N]. 晋察冀日报, 1942-01-01(03).
- [36] 全边区开展卫生防疫运动[N]. 晋察冀日报, 1942-03-08(03).
- [37] 认真干防疫卫生运动[N]. 晋察冀日报, 1942-03-10(04).
- [38] 迅速展开防疫卫生运动[N]. 晋察冀日报, 1942-03-11(01).
- [39] 白冰秋. 华北军区卫生建设史料汇编: 干部类[G], 华北军区后勤卫生部出版社, 1949.
- [40] 回忆我省老根据地医药卫生工作片段[C]. 河南省卫生志参考资料: 活页十七号. 河南省卫生志编辑室, 1983.
- [41] 奔驰在阜平的军区卫生部医疗队[N]. 晋察冀日报, 1942-01-11(04).
- [42] 平西成立人民卫生事务所[N]. 晋察冀日报, 1941-07-19(03).
- [43] 广泛开展卫生运动[N]. 晋察冀日报, 1941-10-22(01).
- [44] 平山各村人民开展防疫运动[N]. 晋察冀日报, 1941-10-31(03).
- [45] 易涑满瘟疫流行[N]. 晋察冀日报, 1941-12-04(03).
- [46] 某团医生发明治疟疾简单处方[N]. 晋察冀日报, 1941-10-31(03).
- [47] 邓铁涛, 程之范. 中国医学通史: 近代卷[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0.
- [48] 军区卫生部副部长杜柏华同志病逝[N]. 晋察冀日报, 1941-07-29(03).
- [49] 江涛. 吉林党史人物: 第十卷[C].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4.
- [50]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中国中医药学科史[M]. 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
- [51] 孙隆椿. 毛泽东卫生思想研究论丛(上)[C].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8.
- [52] 马伯英. 中国医学文化史(下卷)[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 [53] 李经纬, 张志斌. 中医学思想史[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6.

(责任编辑 谢春红)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Medical and Health work in the Anti – Japanese Base Areas of the CPC

YE Zongbao

(History and Culture Department, 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 Xinyang, Henan 464000, China)

Abstract: The medical and health work in the Anti – Japanese base area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called political firmness and people first, whose task is directed by so – called “give priority to prevention and save lives”. Through combin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al treatment, the CPC pursues for excellent medical technology. These experiences originated from the land reform period influenced the medical and health undertakings in New China and reflected the people – originated medical and health work of the CPC. As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modern western medicine, the CPC opposes the preference of one over the other, and strives to explore a realistic way to integrat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ith western medicine, so as to rescue the Chinese medicine from the predicament of being on the brink of extinction since modern times, complete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gain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Thi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al development and even in the history of human health.

Key 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Anti – Japanese base areas; the medical and health undertakings; historical experiences

除旧布新与治病救人：山东根据地的疫病防治

白春霞¹, 王宏华²

(1. 临沂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临沂 276000; 2. 赤峰市档案史志馆, 内蒙古 赤峰 024000)

摘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山东根据地多种疫病流行, 给人民群众身心健康造成严重危害。中共把保障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工作首位, 建立了多层次卫生行政机构, 组建巡回医疗队和宣传队, 创建医疗救济联合会和医药合作社等群众医疗组织, 集中根据地分散的医疗资源治病救人。同时在疫情信息上报、破除迷信思想、防疫知识、健康生活方式和科学卫生观念宣传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 积极治病救人与移风易俗相结合的疫病防治举措, 有效阻止了传染病的大规模流行, 密切了党群关系, 实现了广泛的社会动员, 为山东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和革命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山东根据地; 疫病防治; 移风易俗; 防疫体系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3.04.012

中图分类号:K2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3)04-0073-07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山东根据地多种传染病呈现季节性交叉流行特点, 传播范围广、病因复杂, 较高的致死率严重威胁群众生命健康, 悲观、恐惧气氛蔓延, 损耗劳动力, 影响生产建设和革命战争进程。为保障群众健康, 山东根据地根据传染病发生和流行规律, 开展了广泛的公共卫生运动, 采取了行之有效的疫病防治措施, 包括集中有限且分散的医疗资源治病救人、宣传科学的防疫知识和卫生观念移风易俗双管齐下, 有力推动了根据地的疫病防治工作。学界目前对根据地疫病防治研究主要集中在陕甘宁边区和晋察冀根据地等区域, 多注重对党领导疫病防治的经验及启示的总结, 有关山东根据地医疗卫生史研究相对较少, 且仅限于山东抗日根据地部队防疫工作和军民疫病防治等方面, 主要包括卫生防疫面临的问题、成因、防疫举措、成效及经验等。从医疗社会史的角度看, 此课题仍有深入研究的空间。基于此, 本文主要从生活方式、文化习俗和传统观念的更新与疫病防治手段改进入手, 关注山东根据地疫病防治的过程和经验, 对深化中国共

产党百年医疗卫生史和山东根据地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为认识革命战争年代山东根据地的社会动员、乡村社会变迁等提供新视角。

一、山东根据地疫病的流行与原因

山东根据地多种疫病的交叉流行和广泛传播, 既受生物学因素和地理环境的影响, 也与战乱背景下人们的生活方式、文化习俗和传统观念密切相关, 是自然因素与社会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 山东根据地疫病的流行及危害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山东根据地连年暴发季节性疫病, 主要包括麻疹、天花、回归热、脑膜炎、伤寒、猩红热、疟疾、黑热病、痢疾、霍乱等达“四十种之多”^{[1]352}, 文献对此多有记载: 1943年春, 沂蒙根据地赣榆金山区徐埠一带脑膜炎、流行性感暴发流行; 春末莒中汪町区李官庄一带, 猩红热流行, 小学多半停课; 1944年春, 痧子、斑疹、伤寒、回归热、流行性感等多种春季传染病在滨海区大范围流行, 仅日照西朱睦一个360人的小村庄, 从过年到3月底就病了192人, 死亡12人, 这个村庄的庄

收稿日期:2023-05-24

基金项目:2022年度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山东抗日根据地疫病防治中的社会动员研究”(22CDSJ03); 2021年度全国高校思政建设课项目“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临沂大学)”(21SZJS37010452)

作者简介:白春霞(1978—), 女, 内蒙古赤峰人, 历史学博士, 临沂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主要从事中共医疗卫生史和妇女疾病史研究。

稼也因此晚种了半个多月^[2]；1945年初，鲁中临朐全县因疫病死亡1059人，占病人的13%，米山区坦岗庄一个患疟疾的病人，因身体过于虚弱，竟被老鼠咬死^[3]；1946年2月，临沂城西兰岗店子庄暴发回归热病，传染速度快，发现时已有9人染病，6人死亡^[4]；1947年3月上旬，历城县发现严重的脑膜炎传染病及麻疹、肺炎、重感冒等流行病，从柳埠区的岱密庵村和卧龙的玉皇庙村逐渐蔓延到周边14个村，染病者349人，死者39人，“病灾严重的村庄已停止了支前和生产”^[5]；1948年3月，滨海区天花、麻疹、回归热、黑热病、伤寒等病疫流行蔓延，整个莒南的患者不下2万人^[6]；1949年的传染病报告显示，在鲁中鲁南等区蔓延流行的疫病中黑热病最为顽固难治，患病人数约有38万之多，占全区总人口数1570万的2.4%，且患病人数持续增加，山东全省当时黑热病患者共约70万人。^{[1]352,354,436}季节性疫病频繁而大范围的流行，群众焦虑恐惧，身心健康受损，部分地区学校停课，农业生产难以按期开展，支前和抗战事业深受影响。

（二）山东根据地疫病流行的原因

山东根据地大范围、经常性的疫病流行，主要与战争、群众的医疗卫生观念和医疗资源匮乏等因素密切相关。

1. 战争导致疫病流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随时到来的敌人扫荡，使群众时刻处于紧张状态，加之食物匮乏和营养不良，人的免疫力下降，极易感染疾病。战争期间，频繁的人员流动，导致某些区域性传染病的传播范围随之扩大。国民党山东省机关部队内曾流行疟疾，其所驻村庄的病情特别严重，探源发现，这种华北地区少见的恶性疟疾为国民党通讯联络人员从湖北大别山一带带来的病原虫所致。^[3]

在侵华过程中，日军还丧心病狂地发动细菌战，加剧了传染病的扩散蔓延。1943年9月上旬，日军独立步兵44大队长中佐广濑利善组织500人在鲁西发动霍乱战，仅在馆陶、临清等地因霍乱死亡人数就达25291人。据日军供述：“在梁水镇附近，小岛龙男（在押708号）曾目睹40名中国中年男女死于霍乱。他还直接听到有人讲，在梁水镇附近的所有村庄都有很多中国人患霍乱或因霍乱死去。……柿添军医中尉说：‘这一带地区无论走到哪个村子都在流行霍乱，连宿营的地方都找不到。’”^{[7]248,272}这就足以证明中国人受害人数之多了。据片桐济三郎笔供交代，为了扩大霍乱病菌散布后的效果，日军还将临清附近的卫河河堤扒开三处，杀害了两万多中国人（只是第44大队调查的数字）^{[8]35}。日军攻击

村庄时，患有霍乱的居民四处奔逃，致使疫病随之蔓延。

2. 落后的卫生观念。山东根据地疫病的普遍流行，很大程度上与群众居住环境卫生条件差、不良生活习惯和卫生观念淡薄有关。群众中普遍存在着“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吃灰眼明”等错误观念，日常生活中不注意饮食卫生，随意饮用渠水、河水等可能含有致病细菌的生水，吃蚊蝇爬过的食物，乱扔死猫死老鼠，不加掩埋，这些都是可能导致疫病暴发的因素。1945年5月11日至13日，河南区蒜庄湖同时暴发急性慢性脑膜炎、流行性感、热性麻症三种急性传染病，仅三天时间，全庄就病倒200多人，其中陈记须9岁的女儿染上暴发性脑膜炎，在24小时内就死了，村民非常恐慌。调查之后得知，该村发生疫病的主要原因是市面街道不清洁，吃水不干净，患者未与健康的人隔离等^[9]。类似群众不注意日常生活中的饮水和饮食卫生导致疫病暴发的情况比较常见。1946年临沂朱陈镇大肆流行的霍乱疫情，主要是盛夏时节百姓贪凉饮用不卫生的渠水导致^{[10]68}。

3. 迷信思想盛行。受传统观念和生活习俗影响，群众迷信思想极为严重，很多人认为疫病是瘟神作祟所致，一旦得病，要么归于“命里该”而不做医治，要么求神问卜，这些迷信行为极易延误治疗时机，致使疫病大面积蔓延。像在鲁中山区，老百姓得了疟疾，一般不去求医问药，却把一个蛤蟆放在病人身上“挡灾”^[11]。1944年，莒南县山底村因水源污染而发生伤寒病，病人数量多，甚至有全家病倒的。有的村民到村后庙里烧香祈祷，结果导致4名僧人染病，2人死亡^{[12]103}。1946年7月，临沂朱陈镇暴发霍乱疫情，抗疫最大的阻碍就是封建迷信思想。当疫情大肆蔓延流行时，群众中谣言四起：“镇西南的桥是龟脖子，因为大家踩了，所以有病”“有五百瘟鬼在南庙开会”，所以有瘟疫。大多数群众家门上贴着纸剪的狗，上写“神狗，神狗，把着门首，瘟神一见，回头就走”，甚至有人相信“阎王爷点了谁的卯簿，一定活不了”，干脆坐以待毙^{[10]72}。这些迷信思想和行为，不但伤财误病，还给防疫工作带来极大的困扰，医疗队配合着科学防疫知识宣传，破除了群众的迷信思想，才把这场霍乱扑灭。

4. 医疗资源匮乏。据1948年的卫生调查报告，像拥有900万人口的渤海区，只有三十几个医师从业，医患供求缺口巨大^{[1]203}。山东根据地的广大农村，医疗资源匮乏和私人医生治疗成本高昂，导致群众生病时不敢进行正规治疗。如1937—1940年，莒南多居官庄有多人患黑热病，虽有有效治疗之药物，

但私人诊所费用太高,每治疗一人就需要250—500公斤粮食或者2.5—5公斤生丝^{[12]102},最少的也要75公斤以上的粮食,因而胶东、莱阳一带的群众称该病为“倾家病”或“荡产病”。鲁中南地区,因群众生活困难无力医治而使这种病的死亡率较高^{[1]428}。1946年3月,莒南筵宾区尹家钓鱼台村民尹至桂全家因伤寒病倒,吃药加上埋葬父母一共花费了两万多元,手里余钱花光,还卖了五亩地;本来日子已经宽裕的尹文动,也因为全家得病钱尽粮光,欠下外债,生活十分困难。^[13]高昂的治疗费用使群众对私人诊所望而却步,普通个体难以抵御频繁的时疫疾病的侵袭。

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迷信思想盛行,医疗资源稀缺和私人医生治疗费用高,为传染病防治带来相当大的困难,但中国共产党千方百计采取措施,保障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

二、山东根据地的疫病防治措施

面对疫病给群众生命和生产带来的巨大危害,党始终把群众卫生健康事业作为工作重点。1940年,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发布《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指出:“加强健康教育,厉行卫生行政,逐渐建立保健制度。广设平民医院,对于抗日军人家属及贫民之伤残疾病,予以免费治疗。”^{[14]136}1945年8月9日,根据地政府总结滨海区两年来的群众卫生工作,针对战争中各类疾病给人民群众带来的痛苦,明确指出:“根据地群众生理的解放,已成为迫切的要求。”^[15]为解除群众的疾病痛苦,在疫病防治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逐渐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防治措施。

(一)加强卫生和防疫知识宣传

疫病防治重在预防,预防的关键在于广泛宣传,最大限度地让群众了解卫生防疫知识,提早对疫病保持警惕性。

疫病救治的过程是科学卫生知识和健康生活观念深入人心的过程,亦是深刻的群众卫生教育过程,其中《大众日报》成为山东根据地宣传疫情防治信息的主阵地。1945年3月19日,《大众日报》创办《大众卫生》专栏,由山东军区卫生部医务杂志社主编,是服务群众的专业性栏目,主要任务是教育群众讲究卫生、传播卫生常识、交换民间验方和治疗经验等,特别是在时疫流行之时介绍简便易行、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1946年7月,临沂朱陈镇暴发的霍乱疫情,得以迅速扑灭,报纸,尤其是《大众日报》“及时通报信息,戳穿谣言,传播科学知识,公布救治办法”^{[10]70},发挥了重要的宣传作用。山东根据地还创办《山东医务杂志》《山东卫生》《战士卫生》《医务生

活》等医疗卫生期刊,专门致力于传播普及卫生知识。其他刊物报纸也不定期刊登药方和卫生常识,如1945年6月1日创刊、定位于村干部和具有一定阅读能力的农民刊物——《滨海农村》,在第一期“卫生常识”中就介绍了几种简单易得、行之有效的消毒消肿,治肚痛、疥病,解毒等小药方,对于觉得生病吃药花钱太贵的老乡来说,这是非常好的替代药方。

与专业防治知识普及宣传相配合,大众化、社会化的防疫知识传播活动亦广泛开展。根据地政府一般会对将要暴发流行的时疫进行预测,提前张贴标语、发放传单告知,号召百姓提高警惕,提前注射疫苗,增强免疫力。《山东卫生历史报刊资料选编》对此有两处记载:1940年5月,山东省公署确定五月下旬为“防疫旬”,编定标语、传单等稿分发至各县。盛夏酷暑,正是疫病滋生蔓延之时,1940年7月31日,山东省公署印制传单,分别为“虎列拉最可怕”3000张和“疫病传染可怕”2000张^{[16]164},借此唤起民众的特别注意以切实防范。1945年,山东省关于公共健康的指示强调,要运用报纸、戏剧、教育等各种文化宣传方式,“共同努力,完成反掉群众脑子里愚昧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1]65}。为此,根据地政府用百姓喜闻乐见的秧歌、戏剧、漫画、标语等形式,宣传卫生常识和防疫经验。1947年扑灭鲁中疫病的医疗队在总结经验时指出,治病和宣传同样重要,须同步进行,“演戏宣传,用黑板报宣传,画漫画贴标语宣传,人人都要宣传。宣传瘟疫来源,宣传卫生常识”^[17]。各地亦通过小学、识字班、工农青妇等各种群众团体,灌输以科学的卫生常识。多种方式的宣传,对于增强群众卫生意识、提高疫病警惕性极为有益,有力地配合了医疗队的救治工作。

(二)逐步建立科学有效的疫病防治体系

1. 设立卫生行政机构。为及时有效地防控疫病,山东抗日根据地专署设立卫生科,行署设立巡回医疗队,县设卫生所,逐步建立起各级卫生行政机构,统筹疫病防治工作。1942年12月,鲁中区行政联合办事处在沂水县设立卫生处,这是沂蒙抗日根据地成立的第一个地方卫生行政管理机构。从1943年始,山东根据地各行署、专署普遍设立了卫生科。另外,公安机关在疫病防治宣传、公共卫生治理等方面亦承担部分具体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山东根据地卫生行政机构进一步完善。1946年,山东省卫生厅建立,政府拨出专款做群众防疫治疗之用。党的卫生行政机构的设立是开展疫病防治工作的根本依托。

2. 创建公立医院。公立医院是为群众提供低廉甚至是免费医疗服务的载体。1943年7月,沂蒙抗

日根据地第一家由地方政府创办的公立医院滨海平民医院在莒南成立,之后陆续建立的公立医院有鲁中联办地方医院、滨南医院、临沭县平民药房等,为群众看病用药提供了极大便利,亦为日常防疫抗疫做出了巨大贡献。山东根据地各公立医院除了常规机构设置外,还设有巡回医疗队,由队长、医师、护士、药剂生等人组成,巡回医疗队机动灵活,深受群众欢迎,在疫病防控中发挥了巨大作用。1944年6月,蛟龙区一些村庄有伤寒病流行,根据县委指示,临沭县药房立即组织医务人员全力抢救和治疗,使患者全部痊愈,无一伤亡,同时还为患病的二三百人注射了疫苗。同年八九月间,蛟龙区一些村庄又发生霍乱,药房组织医疗队抢救了500余名患者,并为5300多人注射了疫苗,有效阻止了霍乱的蔓延^{[18]461}。

3. 整合医疗资源。山东根据地医疗卫生事业面临的主要困难是医生人数少、药品短缺、疫病频发,扭转困境的办法之一就是要把社会上有限的医疗资源集中整合起来,发挥最大效能。山东根据地已经建立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各级医疗机构和医疗行政体系,需与当地存在的传统意义上的民间关系网络建立起合理联系,才能在乡村社会有效发挥作用^{[19]21}。根据地政府通过宣传、教育等动员方式把分散的社会医疗资源组织起来,以抗击大规模流行蔓延的疫病。

建立医疗救治的社会组织——医药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医救会”),这是医药界爱国人士自发组织起来的群众性团体。1939年,郯城县医救会在马头镇成立,主要承担宣传抗日救国、开办诊所或小型医院、为抗日军民治病疗伤、监管乡村防疫等工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各地医救会为保障军民身体健康做出了积极贡献。1943年,莒南县成立医救会,随之组建巡回医疗队、救护组等,对各地传染病进行抢救治疗;同时宣传卫生知识,开展卫生清洁运动,破除封建迷信,使群众初步建立起卫生防疫意识。1945年8月9日,滨海区在总结两年来群众卫生工作中指出:医救会完成了拥军优抗的任务,抢救了各地传染病,完成了三个春季的种痘防天花的工作,还通过宣传推动了群众卫生清洁运动,打破了群众的疾病迷信观念,完成了民兵战斗中的救护工作,解决了反扫荡中群众负伤治疗和药品供给等问题^[15]。医救会是民间医生、药店主、药材供应商等群体组成的社会组织,本身就来源于群众,熟悉农村疾病情况,因而能够更有针对性地提供医疗服务。

成立医药合作社是集中医疗资源、保证药材供应和价格公道的有效举措,亦为根据地建立卫生医疗体系的重要一环。1944年,山东根据地政府协助

各医界通过聚资集股、吸收群众资金入股等方式成立群众性的医药合作社^[2]。滨海专署动员群众入股,建议每个区办一个卫生合作社,路镇区大众卫生合作社率先成立,之后各地积极响应。1945年3月,广饶县第一个医疗合作社即广济医药合作社开张,至1946年4月底,该县已有36个合作社,另有联社28个。1945年12月,沂北崖庄区成立了中医合作社,以“群众需要什么,合作社就办什么”为宗旨。合作社医生改变坐等病人上门被动服务的惯例,主动下乡巡回治疗瘟疫,群众用药药价比私人药房平均低20%^[20],深受群众欢迎。医药合作社在抗疫治疗、降低药价、防疫宣传和提高医疗技术等方面成绩突出,大大改善了根据地缺医少药、不良药商投机取巧等现象,保证了疫病救治中的医药供给。

4. 严格有效的隔离。隔离是疫病救治的第一步,发生疫病的村庄要隔离,病人更要隔离。1945年3月,日照纸房区横沟村发生疫病,医疗队在救治的同时要求群众不要随意流动,病人家属不串门、不赶集,“如果需要买东西托别人捎,病人吃水给他指定一个井,……本庄不上外庄走亲戚,外庄也不到这庄来”^[21],隔离七天后,疫情即得到控制。《大众日报》1945年3月19日发表《春季传染病预防要点》指出,一经发现传染病的村庄,“应立即制一红色木牌,上写‘当心!时疫病’,挂在庄头大路口”^[22]。1946年7月,临沂朱陈镇暴发霍乱疫情为县政府知晓后,首先即采取措施封锁疫区,“发动民兵在村庄路口站岗,不准走亲戚,也不准赶早集”^[10]。事实证明,及时有效的隔离是切断疫病传染渠道的首要之举。

5. 建立快速反应的疫病上报情报网。为了保证随时发现疫情、及时组织救治,1945年4月,鲁中区成立卫生情报网,便于随时发现和急救^[23]。1946年,在救治鲁中麻疹和流行性脑膜炎过程中,山东省卫生总局指示,各地应设防疫通报网,当地一旦发生疫病时,各庄医救会会员或教员、卫生工作人员或其他热心卫生工作的,都可以通过电话、电报、通信等方式向上级卫生机关报告。各行署专署卫生机关亦应切实组织,经常通报卫生总局^[24]。解放战争时期,山东根据地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疫病信息上报系统。实践证明,建立快速上报、及时反应的疫病信息上报系统,是疫病防治的关键之举。

(三) 改变落后的治疗理念,提高治疗技术水平

1. 增强医生的服务意识。山东根据地各级政府在领导疫病防治过程中,还对社会医生进行了深刻的群众观教育,打破了普遍流行的“医不叩门”“请医如拜相”“三年不开市,开市吃三年”“宁帮十吊

钱,不把手艺传”等被动、保守陈旧思想。如碑廓区址房医救会规定:“十里路内出诊,不吃病家的饭,不坐车骑驴,不收病家礼物酬谢;穷人有病,在医药上应多予照顾;尽可能主动下乡出诊找病人”,认为这才是医药界的美德。医生的服务意识提高了,医患关系融洽了。群众赞叹说:“根据地一切都变了,治病的先生也比以前好求了,药价也和平了。”^[15]广饶县的群众普遍反映:“现在的医生,不和过去一样。”有的说:“医生们人没换,心换了。”^{[1]207}1945年年底,在扑灭临朐的病灾过程中,涌现出了一批舍小家为大家、带病为村民治病的医救会员,群众异常感激,说:“这些先生以前牵着驴都请不来,现在自己病了,还给别人治,这是民主政府领导得好。”^[25]1949年的种痘注射和治疗黑热病的号召中,胶东牟平县医联会的一位青年医生,曾参加十多次抢救,每次三天至两个月不等。鲁南莒县医生王安乡一人即注射三千多人,自带煎饼,任劳任怨^{[1]433}。针对于此,政府制定了积极的团结和补偿措施,进一步调动医生主动服务的积极性。

2. 提高治疗技术水平。为保证治疗效果,山东根据地实行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针,在医疗实践中努力实现中医科学化和西医中国化。在1944年10月31日的文教会医药卫生座谈会上,李富春发言强调“帮助中医整理其经验,使之科学化,能以现代科学知识为基础,及如何丰富西医经验,使之中国化(能吸收中国医药成果)”^[26],是需要重点关注的两个问题。各地积极贯彻“中西医结合”的方针,一些制药厂采用科学的方法自行研制各类药品。在病情诊断治疗方面,西医的诊断方式、器材和药品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医开始接受西医理论。1945年,鲁中临朐发生疫病时,因为病情复杂,运用中医理论难以确诊病情,西医用显微镜检查到了疟原虫,才确定了病因和治疗方针,参加救治的十几位中医,也相信了血球、细菌等科学道理^[3]。中医科学化和西医中国化理念在根据地疫病救治过程中初见成效,为确诊病情、挽救生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山东根据地疫病防治的效果及意义

党和各级政府在疫病频繁暴发、病因复杂、医疗资源紧缺的情况下,医治病人与移风易俗双管齐下,迅速扑灭疫病,保障了根据地人民的生命健康,稳定了社会秩序,密切了党群关系,推动了革命进程。

(一) 减少了染疫死亡,保障了群众的生命健康

山东根据地政府密切关注群众疾病痛苦,组建医疗队,竭尽全力救治病人,节省了群众的治疗费用,保障了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1945年3

月,鲁中区即已流行麻疹和流行性脑膜炎等传染病,莒南莒宾区尹家钓鱼台村群众偷偷求神拜佛,结果花钱很多,却毫无效果,“全庄老百姓都叫苦连天,连生产都没有心肠了”^[13]。民主政府得知疫情后,迅速抽调卫生干部赴各地抢救,山东卫生总局军区卫生部联合组织巡回医疗队救治,在多方共同努力下,到4月中旬,鲁中部分地区的传染病已终止传播,挽救了大批群众的生命。治疗队高超的医疗技术和负责任的态度,还救活了不少濒死等死的病人,“益都嵩山区一个病人因无钱医治,已死过去三回,送老衣裳都穿上身了,听说民主政府的医生来了,赶忙抬来就医,经医生耐心诊治,一天看五六次,到第三天就能说话了”。为了使这位病人更好更快地恢复健康,医疗队的同志还把节省下的粮票送给他。又历城县西营区十余村发现麻疹,仅西营一村即死亡60余人,专署抢救队到达三天内即停止死亡,十天内治好135人^[27]。1946年,县立济民医院和西海军区的一个医疗组到北掖吴家茶村救治猩红热和脑膜炎等传染病,“救活了垂死病人21人,其中吴有顺的姐姐,送死的衣服都穿上了,全家都准备埋葬了,吴松云之女,拾下三次,都经治活。在13日内,共治活234人”^[28]。1946年,山东省卫生总局医疗队在沂源淄博等地治疗时,患大叶肺炎的翟克荣已经被抬上灵床,穿上了送老衣裳,治疗队奇迹般地治好了他的病。医疗队的同志秉持“哪里人民有疾病,我们就到哪里去”的信念,始终奔波在各个村庄,所以在群众中流行着一句话:“咱们民主政府来了救命,顽固派来了要命!”^[29]根据地政府还通过降低治疗费用保障群众生命健康,治疗队按群众家庭情况收费,家庭贫困者及抗属一律免费,大大减轻了群众的医疗费负担。使群众倾家荡产的黑热病,山东根据地各县区的大众诊所收费在30斤小麦以下,各县医药合作社的收费一般不超过40斤小麦的市价,各地医救会和后来的医药界联合建国会会员治疗黑热病的收费平均不超过50斤小麦市价,都远远低于私人诊所。^{[1]292,293,295}

(二) 革除了陈风陋习,树立了科学防疫观念

根据地在疫病防治过程中破除了群众的迷信思想,显而易见的防治效果和科学卫生健康知识的宣传使神婆巫医骗人的鬼把戏纷纷现了原形,从而大大提高了疫病治疗效果和进度。巫婆神汉也认为生病要找大夫看了,如1945年,壮庄的一位顽固老神婆的3个儿子因患痞病死去了2个,医救会治好了她最后一个儿子,老神婆便坦白地说,“谁再说谁有神,那是哄人骗人,我这个小孩若再靠神那也就剩不

下了”^[15]，并主动拆除了神桌香炉。1946年，由山东省卫生总局派至邳县的时疫医疗队，仅用一个月就治好了450人。香水溜子的妇救会长说：“先生真灵，俺庄治一个好一个，也无人再去烧香求神了。民主政府真给老百姓解除痛苦。”^[30]1946年，临沂城西兰岗店子庄发生回归热疫情，卫生总局巡回医疗队边救治边宣传，由医生讲解病源及防治办法，“同时叫老百姓看显微镜下的少汉病菌”^[4]，大家才恍然大悟，从此不再信奉瘟神。1947年底，鲁中山区流行恶性疟疾，医疗队治愈群众2万多人，群众在感谢共产党和民主政府的同时，疾病观念发生显著变化，南峪一个老大娘说：“这回俺可认透了，生病带个蛤蟆不如吃丸药，请到妈妈不如请医生。”^[17]破除迷信思想，推动群众形成科学的卫生观念，使根据地的社会风气焕然一新，对疫病防治起到了极大的配合推动作用。

（三）密切了党群关系，实现了有效的革命动员

党和根据地政府在救治时疫疾病过程中赢得了群众的心，密切了党群关系。1942年冬，鲁中军区泰山分区司令部机关的部分同志和一个连队到达临朐、沂水、沂源、博山交界处的“无人区”，此地普遍流行疟疾、伤寒、疥疮等传染病，人们的生命健康面临严重威胁，连队把带来的粮食、药品都分给群众，还帮他们挑水、做饭、治病。群众感动的流着眼泪对机关和连队的同志说：“你们这样厚的恩情，我们怎么报答呀？”同志们说：“救国救民是共产党、八路军的职责，用不着报答。只要你们能过好日子，能对抗战贡献一部分力量就行了。”^[31]⁷⁵⁵1943年春，栖霞、莱阳、牟平、海阳一带，天花、回归热先后流行，某兵团卫生机关分头下乡治病，仅用半个月的时间，就从139个庄子里，抢救出1457个病人。老百姓感动的颂祝八路军的同志“都活八十八岁！”^[32]朴实的语言，表达出了群众对党和人民军队最真挚的情感。胶东军直医生姜铁川关心群众的疾病痛苦，1944年，有一次部队驻扎在栖霞某庄，一户贫农母子染上了伤寒，病情严重，姜医生的及时救治使二人转危为安，乡邻说他“慈悲”，他给他们说明“八路军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33]，很好地教育了群众。1946年3月，鲁中巡回医疗队到沂源县三岔店抢救传染病，短时间内治愈不少病人，在欢送医疗队的会上，一位窦姓老乡说：“以前吴化文在这时，咱靠近他还嫌汗臭味，现在民主政府听说咱有病，几百里路赶来给咱治病，天下哪有这样好的政府啊！”^[27]根据地政府全力救治疫病的决心和行动深深地感动感染着群众，生理上获得解放的老百姓纷纷用实际行动支援革命，

参军参战、拥军支前的热情高涨。医救会员鲁从人先生给张进、张升路两个青年治好了痞病不收药费，动员他们参加了主力部队。延边医救会动员了6人参军，大店医救会动员了2人参军。在十字路拥军大会上，医救会向新参军战士提出对其家庭医药的保证，给予他们实实在在的鼓励^[15]。1948年，山东和平医院、白求恩医学院、华东医科大学附设卫校与省府卫生科医疗队组建防疫队到鲁中山区治疗，防疫队在沂水城附近的庄子给群众治病时，治好了五里沟一个16岁的男孩子，男孩说：“俺病好后，不当八路也当民兵。”^[17]党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全心全意为群众谋利益的过程就是成功的革命动员过程。

四、结语

山东根据地疫病防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疫情暴发时，中国共产党依靠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调动组织起最大范围的社会医疗资源，与移风易俗、破除迷信双管齐下，迅速扑灭疫情。中国共产党一方面从思想观念上教育群众改变不良的卫生观念和习惯，提高疫病防治警惕性；进行群众观教育，改变医生被动保守发财的治疗观念和行。另一方面，对传统分散匮乏的社会医疗资源进行了有效的整合动员，建立医救会、医药合作社等群众性卫生防疫组织，最大程度地减轻了疫病对群众健康的危害。中国共产党强调医疗卫生工作作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思路，对于密切党群关系、革新根据地社会风气、保证大生产如期开展、动员群众拥军支前参加革命都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 [1] 山东省卫生史志办公室. 山东卫生档案资料选编[M]. 内部资料, 1986.
- [2] 开展社会卫生运动[N]. 大众日报, 1944-06-21(03).
- [3] 国民党制造下空前大病灾, 省政委会派员抢救临朐人民, 热望各界同胞能多捐助棉衣[N]. 大众日报, 1945-01-23(01).
- [4] 临沂城西兰岗店发现回归热, 巡回医疗队、临城医救会赶往抢救[N]. 大众日报, 1946-02-27(04).
- [5] 历城县抢救病灾, 二十二天治愈二百余人[N]. 大众日报, 1947-04-24(03).
- [6] 滨海卫生工作会议布置大力扑灭病疫疫苗已发到各县[N]. 大众日报, 1948-03-29(03).
- [7] 郭成周, 廖应昌. 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 历史上被隐瞒的篇章[M].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7.
- [8] 崔维志, 唐秀娥. 鲁西细菌战大屠杀揭秘(修订版)[M].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3.
- [9] 海陵县卫生所治好蒜庄湖二百病人[N]. 大众日报, 1945

[10] 于岸青. 扑灭朱陈霍乱疫情始末[J]. 沂蒙史志,2020(1).

[11] 省府医疗队鲁中抢救中四个区治好九千人研究利用土药食物医病[N]. 大众日报,1948-01-22(03).

[12] 莒南县卫生志编纂委员会. 莒南县卫生志[M]. 深圳: 深圳特区出版社,2001.

[13] 山东卫生总局军区卫生队联合组织巡回医疗队[N]. 大众日报,1946-03-15(04).

[14] 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五辑)[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

[15] 滨海区两年来的群众卫生工作[N]. 大众日报,1945-08-09(03).

[16] 山东省卫生史志办公室,济南市卫生局编志办公室. 山东卫生历史报刊资料选编(第三辑)[M]. 内部资料,1986.

[17] 迦南. 鲁中防疫记述[N]. 大众日报,1948-02-05(02).

[18] 临沂市地方史志办公室. 沂蒙革命根据地志[M]. 北京: 中华书局,2014.

[19] 杨念群. 防疫行为与空间政治[J]. 读书,2003(7).

[20] 张惠胜. 沂北崖庄区成立了中医合作社[N]. 大众日报,1946-09-29(04).

[21] 横沟村疫病已被治之 现在全村都不信神[N]. 大众日

[22] 春季传染病预防要点[N]. 大众日报,1945-03-19(04).

[23] 沂南流行脑膜炎病,鲁中联办组织急救并成立卫生情报网[N]. 大众日报,1945-04-03(04).

[24] 山东省卫生总局对目前防疫紧急指示[N]. 大众日报,1946-03-27(04).

[25] 民主政府抢救临朐病灾,二十天救活一万五千人[N]. 大众日报,1945-12-01(04).

[26] 中西医合作与改造中医是卫生建设的基本方针:李富春同志在座谈会上的发言[N]. 大众日报,1944-11-11(2).

[27] 鲁中滨海医疗队抢救下部分地区传染病已告停止[N]. 大众日报,1946-04-10(01).

[28] 西海军区医疗组帮助吴家茶群众扑灭时疫治活二百余人[N]. 大众日报,1946-04-10(01).

[29] 卫生总局医疗队归来[N]. 大众日报,1946-05-25(04).

[30] 江达. 卫生简讯[N]. 大众日报,1946-08-23(02).

[31] 临沂地区行政公署出版办公室. 忆沂蒙[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

[32] 八路军给老百姓治病 去年治好两万多人[N]. 大众日报,1944-05-07(01).

[33] 为战士为伤病员服务,卫生工作涌出模范[N]. 大众日报,1944-05-07(01).

(责任编辑 谢春红)

Removing the Old and Repairing the New, Treating Diseases and Saving People: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Shandong Base Area

BAI Chunxia¹, WANG Honghua²

(1. School of Marxism, Linyi University, Linyi, Shandong 276000, China;

2. Chifeng City Archives and Records Museum, Chifeng, Inner Mongolia 024000,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the War of Liberation, various epidemics in the Shandong Base Area caused serious harm to people'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rioritizes the protection of people's life safety and physical health in its work, established multi-level health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s, formed itinerant medical teams and propaganda teams, created mass medical organizations such as medical relief federations and medical cooperatives, and concentrated scattered medical resources in the base areas to treat diseases and save people. At the same time, beneficial explorations have been made in the fields of reporting epidemic information, breaking superstition, epidemic prevention knowledge, healthy lifestyles, and promoting scientific and health concepts. Actively combining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with changing customs had effectively prevented the large-scale spread of infectious diseases, strengthened party mass relations, achieved extensive social mobilization, and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and growth of the Shandong Base Area and the victory of the revolution.

Key words: Shandong Base Area;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hanging customs and changing customs; epidemic prevention system

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与“多元一体”民族共同体意识

刘鹏昱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文化传播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6)

摘要:对人类与环境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从“环境决定论”到“文化生态学”的发展历程。文化生态学的研究,为明晰文化生态保护区的保护对象和内容提供了思路,确立了文化生态保护的主要内容,从而区别于常规的单项非遗项目保护。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区域文化的认同往往是国族认同的基础;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从总体上激活族群的历史记忆、维护平等互利的族群生态,通过文化资源转化、文化交流,促进我群和他群的相互理解、彼此尊重,共享资源环境和文化,从而促进“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塑造。

关键词:文化生态保护区;族群认同;民族共同体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3.04.013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3)04-0080-06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19年10月《关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指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本质上,“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种文化认同,其重要基础是共同的历史记忆和共享的文化传统。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由各族人民创造,并世代传承、享用的活态文化,蕴含着民族文化的基因。我国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正是以非遗为中心,将非遗及与之相关的物质文化遗产、自然环境整体保护起来,提供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延续活态的民族文化。自2007年第一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设立至今,已有15年的时间,在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文化生态保护区是一个具有地方性、文化特色鲜明、空间分散的区域文化保护举措,而维护地方文化生态、凸显地方文化特色的保护区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如何协同?这一问题需要从建设逻辑上辨析文化生态保护区的保护对象和内容,也需要从文化生态学的理论架构

和研究方法上,辨析区域文化生态的生成机制,并分析其与维护族群生态、促进国族的认同的关系。

二、文化生态的动态延续性是区域文化认同的基础

(一)从“环境决定论”到文化生态学

人类关于文化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的第一阶段,可以回溯到古希腊时期的“环境决定论”。这种观点认为环境机械的“决定”了文化怎样去适应,早期将该观点运用于人类学的理论常被称为“人类地理学”。

第二阶段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产生的“可能论”。可能论源起于“历史特殊论”的博厄斯(Boas),其主要观点是环境只是一种限制或许可的因素,“环境的重要作用在于解释一些文化特质为什么没有出现,而不是说明它们为什么一定会产生”^[1]。

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文化生态学是文化与环境关系研究的第三阶段。“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科学”,这一概念被引入人文学科。1955年,文化生态学的先驱斯图尔德发表《文化变迁理论》,把说明不同地域的、各具特点的

收稿日期:2023-04-20

基金项目: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国家社科基金培育项目“说唱文化(宝丰)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研究”(803282)

作者简介:刘鹏昱(1985—),男,河南信阳人,文学博士,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文化传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非物质文化遗产学。

特殊文化和文化类型的起源这一领域定义为文化生态学。

他将“生态适应”(人类以其生产技术开发环境资源以谋社会生活的过程)引入人类学的研究,特别注重解释环境资源、利用环境资源的工具与知识(技术)、使技术与资源结合的社会组织等三者间的互动关系。并提出“文化核心”的概念,指“与生产与经济活动最有关联的各项特质之合”^[2]。并将“其他与文化核心关联较弱的文化特质,称之为次要特质”^[2]。当然,无论是核心特质还是次要特质都是相互依赖的,只是在研究中,他将社会结构、政治组织、思想意识等放在次要地位。

从“环境决定论”到“文化生态学”,都指出环境的客观基础作用,只是文化生态学更精确地指出“特殊环境”与“特殊文化”的对应关系。如梅州客家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围龙屋建筑,客家文化(闽西)生态保护区的土楼建筑,都是以不同的山区丘陵环境为基础的;再如海洋渔文化(象山)保护区,以海洋渔业资源形成了核心生计方式,与之密切相关的则有“开渔节”、鱼灯、渔鼓,特色饮食等非遗,与农耕文化迥异;再如景德镇陶瓷文化生态保护区则以陶瓷文化为特色。

从上述的文化生态保护区看,人类对自然环境创造性的利用,是区域文化形成的基础;斯图尔德指出文化生态学旨在寻求“特殊的自然环境和文化是如何协同共变的”^[2],这一视角为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特色呈现”^[3]提供了理论与方法上的启示,而区域内的特色文化往往是凝聚文化认同的纽带。

(二)文化生态学的研究与族群生态

如前所述,早期文化生态学关于区域文化的形成,关注的“核心”是一定环境中资源被利用的技术手段和过程。但由于各种文化特征是相互联系的,因此斯图尔德所指出的“文化核心”就有与整体化为一体的危险。“马文·哈里斯的‘文化唯物主义’避免了这一困难。他通过追溯各种文化特征——它们不仅包括技术,还包括居住模式、宗教信仰和礼仪——同环境因素的联系来论证它们适应环境的、唯物的合理性”^[4]。

事实上,即使在同一区域内的不同族群的生计方式和文化习俗不尽相同。如黔东南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以苗族、侗族为主,境内还有汉、水、瑶、壮、布依族、土家等民族。这些“临近的人群”既相互区分又密切交流,形成不同的节日、舞蹈、音乐文化,正是在“彼群”与“我群”的区分与交流中,产生了既彼此区隔又相互联系的地地区族群。

就全国而言,不同地区的不同族群是构成中华民族的实体。如客家文化(梅州)生态保护实验区、客家文化(赣南)生态保护实验区、客家文化(闽西)生态保护实验区,三者是在粤、闽、赣三省交界处人口的流动和文化交流中形成的区域文化;武陵山区(鄂西南)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武陵山区(渝东南)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则以土家族、苗族文化为主;其他则有汉族、藏族等不同地区的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在中国整体大区域的视角上看,上述这些不同地域文化生态区的形成,是中国南北文化交流的结果,是人口流动、汉族、各少数民族竞争与交融的结果。这些不同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族群,实际上也是彼此互为生态环境的。

总的来说,拉帕波特、R·内亭推进了文化生态学的研究,将“环境”的外延扩展,不再局限于自然,而是将相邻人群的影响纳入环境要素。也即在同一区域内,不同的族群互为彼此的“生态环境”,可以称之为“族群生态”,族群生态也是文化生态的一个部分。

(三)文化实践与文化生态的动态延续性

虽然,文化生态学的先驱之一拉帕波特已经注意到同一地域不同人群之间的相互影响,R·内亭也将“邻近的人群”纳入“环境”的范畴。但是,“斯图尔德的研究关注的重点既不是自然,也不是负载着文化的人,而是资源被利用的过程”^[5];而拉帕波特、马文·哈里斯等则尝试通过数据的收集,按照生物学的方法研究人类生态系统,这种机械唯物主义的研究受到批评。

在20世纪60年代,人类学“结构主义”“象征(符号)主义”“文化生态学”三个理论流派中,符号人类学与文化生态学之间针锋相对:“文化生态学者认为符号人类学者采取主观的阐释途径既不科学,又无法验证;而符号人类学者则认为那些文化生态学者都是唯科学主义者,只知道计算卡路里,测量降雨量,就是不肯正视人类学迄今所能确立的唯一真理,那就是:文化是人类所有行为的中介。”

而区域内的文化实践并不是被动受制于文化结构的约束,在结构二重性的观点看来,“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循环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结构并不‘外在于个人’:从某种特定的意义来说,结构作为记忆痕迹,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内在于’人的活动”。

因而,在文化实践的角度上,特定区域内的文化生态是不同文化和人群的交流互动中产生并发展变迁的。现在的文化生态,是在过去文化生态变迁的基础上形成的,文化生态是动态延续的。例如,海洋

渔文化(象山)保护区内的渔民,自古以来就有开捕祭海的习俗,表达了出海平安的祈愿;当地政府将该仪式上升到一个盛大的典礼,祭海、开船等仪式传承了中华传统的“顺时取物”^[6]思想;而其中有政府、渔民、游客、商业人士等不同人员的参与,并利用互联网采用了“云开渔”的新形式,其仪式内涵已经集文化、旅游、商贸为一体。新的开渔节并非简单地复刻传统,而是不同行为主体通过自身的文化实践形成的“传统的发明”,其组织逻辑、文化内涵、仪式形式都已发生变迁。因此,在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中,注重人的作用,鼓励民众自觉参与建设是十分必要的。

而从整体论的角度看,保护区内文化、经济与社会相互依存的文化生态,又是在不同人群的文化实践中,形成的“区域再结构与文化再创造”。而区域文化的认同,是建立在对共同文化传统、区域文化整体面貌的认识上的,因而,也就要求文化生态保护的**整体系统性**。

三、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整体系统建设激活地域文化认同

(一)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历程

2004年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公布了《关于实施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通知》(文社图发[2004]11号),其附件《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实施方案》提出“在民族民间文化形态保存较完整、并具有特殊价值、特色鲜明的民族聚集村落和特定区域,分级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

2006年,《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中规定了设立10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目标,2007年我国第一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设立(建设成熟后正式更名保护区)。

2010年文化部办公厅下发了《文化部关于加强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指导意见》(文非遗发[2010]7号),确立了设立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条件。随后,2011年文化部发布了《文化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总体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在规范工作和规划编制方面做到了相对统一。

2019年3月又颁布了《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管理办法》,指出:“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应坚持保护优先、整体保护、见人见物见生活的理念,既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保护孕育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实现‘遗产丰富、氛围浓厚、特色鲜明、民众受益’的目标。”至2022年,我国已建立23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其中七个已经正式更名为保护区,如表1所示。

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命名类型有以民族区域、区域文化命名的;也有以文化类型、特色文化命名的;有跨省区的也有不跨省的,研究者多有分析,不再赘述。而如何整体上保护文化生态,使其区别于对单个非遗项目的保护,则需要从文化生态学的理论、方法上进行分析,明晰保护对象和内容,并形成系统建设模式。

表1 文化生态保护区

名称	设立时间	地区	类型	是否更名
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2007年6月	福建	地域	保护区
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2008年1月	安徽省、江西省	地域	保护区
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2008年8月	青海省	区域文化	保护区
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2008年11月	四川省、陕西省	民族	保护区
武陵山区(湘西)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2010年5月	土家族	民族	保护区
海洋渔文化(象山)生态保护实验区	2010年6月	浙江省	文化类型	保护区
齐鲁文化(潍坊)生态保护实验区	2019年12月	山东省	区域文化	保护区

(二)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整体系统建设

文化生态保护区建立的目标,是为了延续非遗的生命力,也即“非遗的活态传承”;而从文化生态的系统性来看,其保护对象应是整体的文化生态。将前述斯图尔德、马文·哈里斯、R·内亭等的研究视角结合起来,我们可以明确文化生态保护区具体的保护内容。

第一,是与非遗紧密相关的“有效环境”。包括:

(1)生计活动所依赖的环境资源、传统古建筑、文物古迹周边的环境等。福建客家的土楼、梅州客家的围龙

屋,都是与山地、丘陵的自然环境相依存,聚族而居且具有防御功能,其周边的自然环境应统一保护。

(2)与非遗直接相关的自然资源。自然物质如石头、泥土、金属、木材、毛皮、纤维等被手艺人拿来加工改造。饮食制作代表地方特色,与物产、水土、气候等密切相关;而各类中药材的生长也需要特定的水土条件。具体到文化生态保护区,如海洋渔文化(象山)生态保护区的海盐晒制技艺、闽南的制茶技艺、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徽州三雕、宣纸制作、歙砚制作、徽墨制作”等。

(3)文化生态保护区内的不同族群及其生产、生活空间。非遗产生于民俗生活中,因此族群的生活空间、居住模式都应得到保护。如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内既有藏族、羌族还有回族;迪庆文化生态保护区是多民族共存的范例,境内有藏、傈僳、纳西、汉、白、回、彝、苗、普米等九个世居民族,对这些不同族群的生产、生活空间都应加强保护。与非遗文化产业相关的,则是对古镇、古街区的保护,并引导、鼓励非遗传承人入住。

第二,保护与非遗紧密联系的文化空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指出,文化空间是“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兼具空间性和时间性”。这里包括传统节庆活动、民俗活动,也包括一些信仰、仪式举行的场所,如古庙宇、祠堂等。

第三,保护民间信仰。在生态人类学的研究中,信仰与仪式具有调节社会关系、调节资源利用的功能。而作为象征的秩序,信仰与仪式更多的是具有一种凝聚人群或族群,激活集体记忆,调节社会关系的作用。其意义往往通过非遗的展演呈现出来。

第四,鼓励民众参与,保护与非遗相关的社会组织。文化是由人来传承和创新的,除常规的传承人保护制度外,还需要重视社会组织的作用,一是恢复或支持传统的行业组织、民俗活动组织,二是引导建立新的文化保护组织。

以上几个方面是相互关联,综合在一起构成非遗的文化生态环境的,因此,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工作不再是针对特定非遗项目的保护措施,而是综合运用积极的和消极的文化政策,形成系统的建设,在对“自然——文化——人”三位一体的整体保护中,激活文化认同和地域认同,如图1所示。

四、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地域文化认同是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

“地域认同是一种动态的、不断变化的过程,又往往是族群认同乃至国家认同的基础。”^[7]不同的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立是中国文化多样性的表现,在多样的地域文化生态保护中,如何促进统一的民族共同体认同,还需进一步探究。

(一)激活族群的历史记忆

一个区域的文化生态是在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形成的,其文化传统、民俗风貌,也会受到外来文化、全国性文化制度的影响。

以客家梅州文化生态保护区为例,在清康熙以前,在粤东梅州地区的三类人群区别明显:一类是定居农耕的土民,也即王朝治内的编户齐民,占据着适合农耕的山谷盆地;一类是以游耕、狩猎采集为生计方式的獠、畬人群,占据着山区林地;一类是以捕鱼为业的水上居民(文献称之为疍民或疍户),以舟为家,占据着河流。

上述三类人群,分别占据着不同的“生态位”,彼此交流竞争。从明代开始,政府就已经开始对獠人、疍民进行“编户齐民”的过程,至清雍正时推行“摊丁入亩”,发布上谕令疍民上岸,削去疍民的贱籍。成为编户齐民,获得合法的地位,就要追溯祖先的历史,编纂族谱。

随着明清时期对闽赣粤交界处的进一步开发,儒家文化和国家礼制的影响,明清庶民化宗族建设的进程也扩散到梅州地区;在这一过程中,该区域内的人群已经在风俗习惯、语言等方面形成了某些同质性。当18世纪以后,粤东梅州的“客人”向珠江三角洲一带发展,与“广府”人竞争生存资源,矛盾积累激化,引起了19世纪的“土客械斗”,反向促成了客家人族群自觉意识。强调祖先的迁徙史和“中原正统”成为客家人的普遍认同。

而建立客家文化生态保护区后,粤东梅州的以围龙屋为代表的传统民居、祠堂、名人故居、书院得以修复,与之相关的宗族祭祀、丧葬礼俗中“香花佛事”仪式,祠堂修复时“安龙转火”的民俗仪式通过非遗保护获得合法途径。民间艺术如客家山歌等,也成为地域文化的代表性符号。兴建的客家博物馆、非遗展示馆都是透过“地方的生产”建构记忆。而无形的非遗通过对器物、物质空间的激活,使物质遗产与仪式产生联结,最终成为仪式意义的一部分。也使得祖先、宗族的历史,村落以至区域的整个历史记忆被激活。

一个地域文化的空间,具有空间性、社会性、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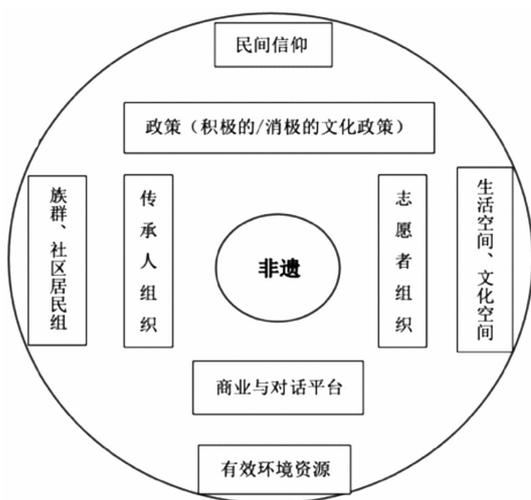


图1 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内容

史性,通过文化生态的综合保护,不同时代、社会下产生的空间遗迹与活态的非遗一起,再现了村落、区域、族群的历史,伴随着客家宗族活动、民俗仪式形成新的社会互动和空间的再生产,从而凝聚了客家作为汉族一个民系的族群认同。

(二) 维护平等互利的族群生态

在23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中,少数民族居住地区有14个,这些区域内是多族群共生的,不同族群形成了各有特色又相互交流的历史、文化。文化生态学家拉帕波特曾提出“地区人群”的概念,认为“尽管通过借用动物生态学的标准来指定一个地方群体所在的地域是一个生态系统是可能的,但千万别忘了任何地方人群的环境都可能不止包括紧邻的地方实体……我们应该认识到当地人同样可能参与地区系统……这些系统包括他们最重要的要素中在常规地区中占据独特地区的几个地方人群。这些独特的当地人的总和可称为‘地区人群’”。

在同一区域内,不同的族群占据不同的资源环境,同时这些处于“当地”的不同族群也彼此互为社会生态环境,相互交流文化、互换资源产品。例如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区中,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县、汶川、理县,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是羌族的主要聚居区。汶川、理县都是汉、羌、藏、回四族混居的地方;茂县羌族人口比例最高,北川则汉化程度较高。羌族生活的生态环境是在高山间的深谷中,称之为“沟”,羌族的村寨建在沟两边的半山坡。他们农牧兼营,也与其他族群货物交易。

在这种多民族共处的族群生态中,羌族在文化上形成汉与藏之间的过渡形态;在文化认同上,邻近汉族的羌族认同汉族,邻近藏族的羌族则更认同藏族。羌族也通过追溯同姓的祖先、迁徙历史,或在传说中将远祖追溯到炎帝、大禹,来获得对等的族群地位。^{[8]74}

在全球化、市场经济、外来文化的影响下,羌族的村寨逐渐空心化,民族语言、文化受到冲击。特别是震后,很多羌族村寨坍塌、废弃,居住环境和文化受到严重破坏。而其震后的家园重建“融入了以保护非遗为核心的文化生态建设,羌族民众的居住空间、文化空间、精神空间得以重建”^[9]。典型的传统村寨如理县桃坪羌寨、茂县黑虎寨等得到修复;北川新县城的建设融入了羌族传统文化元素;建设传习所丰富了非遗的传承空间;发展文化产业,羌绣、羌族草编技艺等促进了经济发展。这些措施都起到提升族群文化自信的作用,既维护了羌族的文化传统,又实现了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从而维护了平等互利

的族群生态。

(三) 文化资源转化与资源环境共享

现代化、都市化的过程已经以一种新的、陌生的方式将全球和地方区域联系起来,区域内的城镇、乡村都不能避免这一趋势。国家、资本和技术科学引导的全球化策略,导致日益明显的“去地域化”效应,也即全球化忽略了地方的、区域文化的特殊性。

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倡的“文化多样性”旨在重申地方特色的重要性。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是重视地方文化生态系统的独特性,接合地方市场而非全球资本的需要。“而矛盾的是,依赖地域、文化、生态的在地化策略,在遇到经济发展的问题时,依然需要将自己投射到资本与现代化的全球尺度上。”这就要求文化生态保护区中的非遗的产业化、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必须以地方的真实性为基础,充分认识到“以地方为基础的文化、生态和经济实践,是重构地方与区域世界的另类视野和策略”。

《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明确了传统工艺振兴应以传统技能为基础,地方文化旅游业的开发必须依赖地域特色。将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和乡村振兴、扶贫脱贫、地方经济发展结合起来,从而实现基于文化本真性和地域文化特色的文化资源转化。

从生态人类学“族群生态”的角度看,不同的族群占据着不同的“生态位”,也即占有不同的生态资源、空间,因而形成地域特色文化。费孝通先生曾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历史过程中形成的。”^{[9]1}而不同地域、族群的区分和认同之生态背景是“人类的资源分配、分享与竞争”。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这一时期的政策主要是对少数民族居住地区、经济落后区域的政策扶助,如“西部大开发”等。而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则是在全国范围内各区域族群共享资源环境的一种新的举措。通过生态修复和文化再造,不同区域族群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地方特色为“他者”所理解、共享;而反观“他者”的文化,也使自身的文化自觉得以明晰。如此一来,使得“我群”和“他群”对彼此的文化、生活方式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形成彼此尊重、彼此欣赏的格局。

五、结语

将“人类的资源分配、分享与竞争”作为不同族群的形成和族群认同的生态背景,是历史人类学的

一种观点。文化生态学关于“族群生态”和“地区族群”的研究,也指出不同的族群占据着不同的“人类生态位”,在族群生存、发展的过程中,彼此互为社会生态环境,产生交流与竞争。也就是说,在区域文化的形成和族群认同上,历史人类学和文化生态学的视角是一致的。全国性文化制度在不同层面、不同历史时期对不同区域形成整合的力量,也使不同区域的历史进程嵌合在国家发展历程中。中国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是通过区域文化生态环境的修复和文化传统“再造”,充分维护区域的地方特色,在面对现代化、全球化的影响时,激发区域自身的文化自信和创造力,形成不同民族、不同区域文化、资源环境共享的良好格局。在这一过程中,国家与地方也是双向互动的:在国家层面,为维护文化生态平衡,弘扬民族文化传统,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文化生态保护区政策,与地方政府开发利用文化资源、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等目的结合起来,形成了影响地方社会的合力。最终,通过对区域文化传统的发掘、文化生态整体的保护,激活了区域的历史记忆,在传承中创新文化,促进区域文化自信的同时也促进了“多元一体民族共同体”的意识。

参考文献:

- [1][美]唐纳德·哈蒂斯蒂.生态人类学[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4.
- [2][美]斯图尔德.文化变迁的理论[M].张恭启,译,台湾:远流出版事业公司,1989:45.
- [3]陈华文.特色呈现:文化生态保护区实践的核心场域[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5):49-50.
- [4][英]凯·米尔顿.多种生态学:人类学,文化与环境[J].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98(4):35-54.
- [5]庄孔韶.人类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202.
- [6]毕旭玲.象山开渔节祭海、开船仪式的传承发展[J].赣南师范大学学报,2020(41):81-85.
- [7]赵世瑜.在空间中理解时间:从区域社会史到历史人类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356-357.
- [8]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川西藏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8.
- [9]林继富.家园重建与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研究[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7):33-37.

(责任编辑 吕志远)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Ecological Protection Area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Pluralistic Unity” Ethnic Community

LIU Pengyu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He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s, Zhengzhou, Henan 450046, China)

Abstract: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the environment has experienced a development process from “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 to “cultural ecology”. The study of cultural ecology provides ideas for clarifying the protection objects and contents of cultural ecological reserves, and establishes the main contents of cultural ecological protection,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conventional protection of a single ICH item. The Report to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tresses the importance of cast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identity of regional culture is often the basis of national identity;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ecological reserves generally activates the historical memory of ethnic groups, maintains the equality and mutual benefit of ethnic ecology, and promotes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respect between our groups and other groups through the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al resources and cultural exchanges, and shares resources, environment and culture, thus promoting the formation of the “pluralistic unity” Chinese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Key words: cultural ecological protection area; ethnic identity; pluralistic unity

报纸新闻标题制作中成语运用的量化与质性研究

孙彦川

(中国社会报社,北京 100032)

摘要:研究成语在新闻标题制作中的运用情况和运用方略,可以为新闻工作者在标题制作中更好地运用成语提供参考借鉴。但通过文献调查、统计分析和逻辑分析发现,新闻工作者在报纸标题制作中运用成语的意识有待提高;新闻工作者在报纸标题制作中提高成语运用意识和能力的途径是,在阅读中储备,平日经常温习,在智力游戏中提取,在模拟训练中活学,在实战中运用。

关键词:新闻标题;制作;成语;报纸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3.04.014

中图分类号:G2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3)04-0086-05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

成语源于文学经典、历史故事、寓言故事、生活实践等方面,脍炙人口,有的甚至可以说是妇孺皆知。它简洁凝练,文采斐然,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党的十九大报告、党的二十大报告等重要文件,对成语给予了广泛运用,既严肃又生动、既严谨又简约、既有力又自然。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成语大会”节目当年的高收视率,也有力地展现了成语的魅力。

由于成语和标题同样追求简短、生动,它天然地适用于多种文章的标题中。研究发现,在标题中恰如其分地运用成语,能达到提纲挈领、化繁为简、引人注目、意趣兼得、感人至深的效果。

为了解成语在新闻标题制作中的运用情况,笔者在中国知网进行了一系列检索。结果表明,近十年来专家学者和新闻工作者针对标题制作中的成语运用的研究数量很少。

十年来,数以千万计的报纸文章陆续刊发,信息检索技术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检索速度成倍提高,为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极大的便利。因此,有必要开展新一轮的研究,为新闻工作者在标题制作中更好地运用成语提供参考借鉴。

(二)研究对象和目的

限于精力和研究手段,本研究聚焦于中国知网收录的纸质报纸,考察其标题制作中的成语运用现状,报纸标题制作运用成语的方法。同时,探索和开发新闻工作者扩大成语词汇量,在标题制作中提升成语运用意识和能力的策略。

(三)文献综述

1. 新闻作品标题的价值

新闻作品的标题需要具备导向正确、用词精炼、旗帜鲜明、有语言张力、有情绪感染力特征,因为新闻传播是媒体向社会发布新闻以及受众通过传媒获取信息的双向选择过程。新闻作品不像教材那样是学生必须学的作品,也不像小说那样具有消遣性,能令人爱不释手。要想受到读者喜爱,新闻作品必须在真实、严密、独特之外另有其吸引人的特质。党报党刊和行业报刊以党政工作、专业领域的业务文章为主,其从业者更是常常面临与各路媒体争夺注意力的挑战,唯有通过提升标题和正文的文采,才能吸引本系统更多的党员干部和职工来阅读业务文章。在信息社会,如果新闻标题制作得当,容易被检索和关注到,能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2. 新闻标题的具体特点

在构成上,新闻通讯和新闻消息的标题往往需要

收稿日期:2023-04-28

作者简介:孙彦川(1979—),男,河北邢台人,硕士,中国社会报社记者,主要研究方向:新闻传播理论。

简要交代新闻事实,也就是常说的“6W”中的 who(什么人)、when(在何时)、where(在哪里)等要素。在规格上,无论是新媒体还是传统媒体,新闻作品的标题都应该简短,如果字数太多,既浪费版面、难以排版,也令人眼晕。

在事实概括上,新闻标题既可以求实,也可以虚化。例如,《漫天飞蛾原系江淮黏虫南来北往只是“过路借宿”》。在意向传达上,新闻标题既可以金刚怒目般表达态度和感情,也可以提醒、暗示,点到为止。例如,《“梁山伯”新婚燕尔 “祝英台”快做母亲》。在修辞手法上,可以采用省略、提炼、比拟、借代、引用、对比等方式。例如,《多米尼加独裁者黔驴技穷》。

在功能方面,新闻标题可以在叙述新闻事实的时候通过不同词语进行评价,还可以通过对新闻事实直接发表评论进行评价。楚军和周军表示,报纸新闻标题是语义、语用和美学功能的完美结合。彭化义认为,消息标题的功能包括标出事实、标出导向、标出主题、标出焦点、标出状态、标出结果、标出动感、标出悬念、标出数字八大类。

(四)标题制作在新闻学研究中的地位

从标题的维度看,新闻作品尤其是报纸新闻的传播效果如何,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其标题思想是否重要鲜明、标题语言是否生动、标题内容是否吸引人、标题大小是否醒目等。彭化义认为,一篇好的消息标题未必能面面俱到,但起码应当回答读者关心的一个或者几个问题。所以,标题制作应该成为新闻学的重要研究内容。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彭朝丞也深感开展标题研究意义重大,对此给予倾情投入,不但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新闻标题的文章,还先后出版了著作《标题的艺术》《新闻标题学》《标题的制作理念与艺术技巧》等专著。彭朝丞的文章和著作主要探讨了新闻标题学的研究任务、标题的内涵和历史沿革、标题的作用、标题的种类与特色、标题制作的原则和技巧、标题的辞格艺术等。

(五)新闻标题制作的实际价值

新闻标题的上述特点决定了它的实际价值。历任新闻总署署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共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职务的胡乔木同志指出:“有时候想一个好标题,等于写一篇文章所用精力的三分之一。”新闻界知名人士徐铸成曾说:“一个好标题,可以代替一篇评论。”人民日报原社长兼总编辑邓拓生前曾诙谐地说过:“谁要给我出一个好标题,我给他磕三个响头。”可见,标题制作在新闻工作中具有战略性地位,也极具挑战性,新闻工作者

必须迎难而上。

几十年前,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范敬宜在《总编辑手记》一书中的多篇文章里论及新闻标题。例如1997年1月7日,他在手记《理论宣传是人民日报的优势》里写道:“今天理论版刊登的刘国光等同志写的《论“软着陆”》是一篇好文章。朱镕基同志看了这篇文章的送审样后批示:‘这是迄今为止论述软着陆文章中最好的一篇。’”范敬宜紧接着又写道:“该文的好处在于:(一)题目好。抓住了国内国际都十分关心的经济问题……”

二、成语的特点及其在新闻标题制作中的功能价值

(一)成语具有极强的张力

成语的简洁、精炼常常无法超越,如成败得失、唇亡齿寒、庖丁解牛等,除了代之以同义的成语,再也无法用更少的词给予形象描述。成语在生动形象方面一骑绝尘,比如画蛇添足、海市蜃楼、扬汤止沸;成语的绝妙使其过目难忘,比如入木三分、晴天霹雳;成语的语言张力使其胜过千言,比如似水流年、寸草春晖、碧血丹心、白驹过隙、白云苍狗。

在标题制作实践中,成语的张力可以大到成语即标题。例如,“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业精于勤”“欲速则不达”“解铃还需系铃人”都曾作过新闻作品的标题,其中前两例为通讯标题,后两例为言论标题。

(二)成语的文化魅力巨大

成语来源于武术、军事、农业生产、寓言故事、社会文化、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包含着丰富的文化意蕴、客观的规律、奇妙的灵感及深厚的文化思想,是汉语词汇中最富魅力的部分之一。如刻舟求剑、买椟还珠、叶公好龙等源自寓言的成语;牛刀小试、蛛丝马迹等和动物有关的成语;唇亡齿寒、燃眉之急等与人体有关的成语;一鼓作气、背水一战等与军事有关的成语;拳不离手、左右开弓等与武术有关的成语。

此外,十二生肖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意义在成语中有着鲜明的体现,有来自儒家、道家、法家等诸子百家学说的成语,还有有关书法、国画、中华传统艺术的很多谚语等也由后人凝练为成语。

文化气息浓厚的成语用于新闻标题制作,能丰富标题内涵、提升标题价值、助力文化传承。

(三)成语的语用功能强劲

如上所述,消息的标题应该有标出状态、标出结果、标出动感等八种功能,而具备这八种功能的成语比比皆是。例如,“悲痛欲绝”可以标出状态,“背井离乡”可以标出结果,“卑躬屈膝”可以标出动感,

“背道而驰”可以标出导向。而这四则成语,都在《多功能成语词典》(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出版)的同一页。成语的强大功能,由此可见一斑。

综合新闻标题的特点、成语的特点和新闻工作者在标题中使用成语的范例,可以明确,新闻工作者在新闻标题制作中应当注重运用成语。

三、对新闻标题制作中成语运用的量化研究

(一)新闻工作者在标题制作中运用成语的状况

1. 经济类新闻标题中成语严重缺位

我国经济学家薛兆丰教授曾说过,经济学是“一门专门研究事与愿违规则的学问”。从概率上讲,从2000多个县级行政区到4000多家A股上市企业,谁在经济活动中都难以杜绝“事与愿违”问题的产生。然而,在中国知网(CNKI)上进行查询发现,从2012年10月1日到2022年9月30日(注:本文随后列举的中国知网检索结果,均限制在这个时间范围),仅有8篇经济方面的报纸文章标题中包含“事与愿违”,平均每年0.8篇。查询同期发表的标题包含“适得其反”“南辕北辙”“事倍功半”和“缘木求鱼”(事与愿违的近义词)的经济类报纸文章,分别查到11篇、9篇、2篇和5篇。

经济领域最基本的关系是供求关系,“供不应求”“供过于求”和“供大于求”是最常见的现象。检索结果表明,报纸文章题目中包含这三个词的文章依次有70篇、21篇和31篇,平均每年分别约有7篇、2.1篇和3.1篇。

经济学的另一个重要研究主题是均衡,“冷热不均”是最常见的现象之一,以为标题检索关键词在报纸文章中查询,共查到经济领域的文章58篇,平均每年5.8篇。

市场竞争的诸多乱象中,“以次充好”“坐地起价”屡见不鲜,这理应是新闻工作者关注的焦点。但在知网检索的结果显示,标题中包含的报纸文章分别只有10篇和4篇。

通过以上检索发现,一些与重要经济现象相关的成语在新闻标题中出现频次较低。

2. 政治类新闻标题善用成语

和一些与重要经济现象相关的成语在新闻标题中很少使用相反,新闻工作者在标题中对一些时政类成语的使用频率高数倍到数十倍、上百倍。例如,知网检索发现,同一时期标题中包含“真抓实干”和“攻坚克难”的报纸文章分别有1241篇和858篇,包含“实事求是”和“脚踏实地”的报纸文章分别有178篇和197篇。

通过比较不难发现,新闻工作者要么是对“事

与愿违”“供不应求”等经济现象关注不足,要么是在制作此类文章标题时缺乏使用成语的意识。为了弥补短板,撰写和编辑经济类文章的新闻工作者应该多关注相关的重要成语。

为了进一步调研和了解现状,本研究选取知网收录的《人民日报》2019年1月1日到2019年6月30日所有文章的主标题,《解放日报》《湖北日报》《新华日报》2019年1月1日到2019年12月31日所有文章的主标题作为考察对象。

研究发现,2019年上半年,中国知网收录《人民日报》371篇文章,主标题中出现成语的频次为20次,包括为“登高望远”“矢志不移”“上下同心”等。2019年全年收录《解放日报》236篇文章,主标题中出现成语的频次为14次,分别为“前途未卜”“口腹之欲”“精益求精”等;收录《湖北日报》396篇文章,主标题中出现成语的频次为22次,有“不折不扣”(出现2次)、“无中生有”“熠熠生辉”等;收录《新华日报》216篇文章,主标题中出现成语的频次为6次,包括“腾笼换鸟”“一成不变”“姗姗来迟”等。

虽然这项对比在严格的统计学意义上有失严谨,但透过巨大的差异仍然可以明确,《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湖北日报》在标题制作中运用成语的频次远高于《新华日报》。

综观此例和前例不难发现,在标题制作中使用成语和修辞格的能力可以通过锻炼得到提升。

3. 具备“标出”功能的成语使用率下降

如前所述,消息稿件的标题应该具备标出事实、标出导向、标出主题等功能。但通过在知网的检索发现,以成语“稳操胜券”标出导向的文章只有2篇,以成语“论功行赏”标出主题的文章为0篇,以成语“十拿九稳”标出概率的报纸文章为0篇,以成语“十万火急”标出状态的文章只有1篇,以成语“十万八千里”标出差距的文章为0篇,以“万众瞩目”标出焦点的文章只有5篇。

但如果在中国知网查询所有时间段的报纸文章,以“万众瞩目”标出焦点的文章有51篇,以成语“十万火急”标出状态的文章有27篇,以成语“稳操胜券”标出导向的文章有15篇,以成语“论功行赏”标出主题的文章只有11篇。而且,各个成语都在全国性报纸的标题中得到使用,无一例外。

可见,不是成语不合用,而是近年来记者和编辑的运用意识不够强。

(二)新闻工作者在标题制作中巧用成语的常见技法

在新闻标题中运用成语的主要目标是,增大标

题的信息量,丰富标题的内涵,提升标题的吸引力、震撼力或新奇性、趣味性,引发丰富联想,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文献检索和逻辑分析的结果表明,基于这些目标,在报纸新闻标题中活用成语的主要技法有直接引用法、单字替换法、成分替换法、中间嵌字法。此外,还有谐音翻新法、易位法等。

1. 直接引用法

直接引用法,即成语本身就是标题。新闻标题制作中,采用这种方法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绝处逢生》《海枯石烂》,等等。其中,标题包含成语“八仙过海”的报纸文章有13篇,涵盖金融、参赛、参展、招商、营销、继续教育、电视节目制作等多个领域的报道,其中不乏中央媒体和省级党报。标题包含“绝处逢生”的有11篇,涵盖军事、金融、民营书店、戏剧等多个领域的报道。

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范敬宜在《总编辑手记》一书中著有《把“题眼”拎出来》这个章节,其中的10篇手记中就两次提到了成语在标题中的运用——他在1993年10月16日的手记中,表扬了《昔日势不两立 今朝共享殊荣》这篇文章的标题;在1995年11月8日的手记中,表扬了一篇短评的标题《山高水长五十年》。

2. 单字替换法

单字替换法,即在成语中巧换一字,形成近义、反义或新义,以表达新内容。其作用主要在于吸引读者、设置悬念、启迪思考。例如,从成语“相见恨晚”申发出的“知情恨晚”“合作恨晚”“悟道恨晚”等词语;从“利令智昏”申发出的“情令智昏”“赌令智昏”“酒令智昏”等词语;基于成语“见义勇为”,申发出的“见义勇智为”“见义勇巧为”等词语。

再如,2019年8月14日,中国政府网的微信公众号刊发了一篇《成语新解,你的2019上半年有“新意”~》的文章,以“一(医)心一意”“事(时)半功倍”“助(住)人为乐”“一帆(车)风顺”为子标题,分别介绍了医保医改、简政放权、住房改革、公共服务、车辆管理等方面的新政和成效。

由此可见,在适当的地方对成语略加改造,使之更贴合文章主旨,为文章画龙点睛,是让文章更精彩的好办法。

3. 成分替换法

成分替换法,指的是用新内容替换成语的某一语法成分,如《吴孟超“窥豹”》《管中窥豹 举一反三》《管中窥豹 时见一斑》。对于介宾或动宾结构的成语,替换动词或宾语是常见用法。例如,《梧桐引凤——兰州市党政代表团从福建引资138亿元》

(其原型成语为“筑巢引凤”);《与金融风险“谋皮”者众》《与“狼”谋皮》(其原型成语均为“与虎谋皮”)。

而对于后两个字是中补关系的成语,拆解使用或替换中心词也是一种常见做法。检索结果表明,包含“水涨船高”的报纸文章标题共有36则。从这个成语引申出来的标题有《资金池“水涨”A股重心有望“船高”》《人气“水涨”股指“船高”》《航道管理“智”涨船高》《水不涨船难高》等。

4. 中间嵌字法

中间嵌字法,指的是在成语前两个字和后两个字中间填充新成分,例如《扬善必须惩恶》。标题制作中经常嵌入成语中间的词,多是“何必”“何妨”“不”等疑问词或表示肯定、否定的词,比如《忠言何必逆耳》《“班门”何妨弄“斧”》《良药不苦口》,等等。

5. 翻造使用

即通过更换一个语素,使翻造的成语跟原成语大相径庭甚至截然相反。比如《近水楼台不得月》(原成语为“近水楼台先得月”);《提倡“精官简政”》(原成语为“精兵简政”);《人走茶不凉》(原成语为“人走茶凉”)。

(三)标题制作中提升成语运用能力的策略

1. 阅读名作储备成语

毛泽东主席、习近平总书记等国家领导人的著作和讲话中有很多经典范例,值得深入学习。

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梁衡在《毛泽东怎样写文章》一书中说,毛泽东是既多读书又长期生活在人民群众中的人,所以他的文章中修辞手法运用极多且很自然。梁衡在该书中援引的毛泽东《复李济深等五十六人电》一文中,正文仅312字,就运用了“前仆后继、锦绣山河、同德同心、再接再厉”四个成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时,大量地运用成语典故阐释现行的方针政策等,例如:古为今用、恰如其分、不拘一格、深入浅出、余音绕梁,展现了非凡的思辨能力和成语典故运用能力,为活学活用成语树立了榜样。鉴于此,人民日报社特别组织编写了《习近平用典》一书,于2018年正式出版,该书由敬民篇、为政篇、立德篇等13个篇章组成,是宝贵的“活教材”。

2. 学习同行运用成语的经典范例

学习历届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等主流媒体评奖评优中获奖作品的标题。例如,《风雨无阻向前进——写在中国人民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之际》《美在南海的军事挑衅注定徒劳无功》《资溪“两山银行”：存储“绿水青山”收益“金山银山”》。

3. 在模拟训练中活学善用成语

由于经常受截稿日期限制,新闻工作永远是门遗憾的“艺术”,难以像精英射击运动员那样追求完美。但乒乓球、羽毛球精英运动员通过模拟训练消灭运动能力短板的做法,新闻工作者可以模仿。其中之一就是在阅读同行撰写的文章时,通过模拟训练进行“二次加工”,把最有价值的成语变成“活跃词汇”,做到活学善用。

4. 循着关键词查词典学成语

普通成语词典收录的成语约4600个,可以从头到尾浏览。此外,新闻工作者可以循着兴趣或职业领域的关键词去查阅词典。例如关注经济学的人,可以查阅包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亿”的成语有哪些,包含“倍、半、得、失”的成语有哪些,与禀赋、盈亏、供给和需求有关的成语有哪些。

四、讨论与建议

通过本文援引的例子和在日常阅读中见到的范例不难发现,成语能为报纸新闻标题增容、添彩、“瘦身”“提味”,使标题更加凝练、传神、活泼、难忘,其作用弥足珍贵,有时甚至是无可替代。

国内媒体新闻作品标题中成语使用得多不多、好不好,值得进一步研究。但从本研究抽样统计分析的结果来看,标题制作中成语运用的情况不尽如人意,新闻工作者亟须熟读精思、日积月累,扩大成语储备;时常温习、模拟运用,降低成语提取难度;在

工作中有意识地强化训练和应用,为文章添彩。

绝大部分记者和编辑都受过具备相当水准的高等教育,之所以统计结果显示有些记者和编辑在标题制作中运用成语的意识相对较差,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时间压力,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缺乏强烈意识和实用的方法。新闻工作者应当提升探究意识。首先是要通过阅读专门的著作和文章,学习策略、举一反三。其次是通过更广泛的阅读,翻阅成语词典,熟读、牢记成语,并体悟其精妙之处。再次是要联想哪些成语揭示了哪些重要现象和规律,并形成便于查询的资料库。最后是在阅读新闻作品时以其标题为“对手”,适当做一些模拟训练。

参考文献:

- [1]徐盛恒. 相邻与补足:成语形成的认知研究之一[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6(3):107-111.
- [2]杨文清. 巧用成语制新题:报纸新闻标题中的成语运用初探[J]. 新闻世界,2017(10):16-19.
- [3]楚让蕊. 诗情画意 分外美丽:《平顶山晚报》用诗和成语“亮化”标题和说明[J]. 城市党报研究. 2021(1):50-51.
- [4]杨浩然. 构式语法视角下汉语成语2+2结构的认知阐释[J].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2):112-114.
- [5]石化龙. 借用成语制作文章标题(下)[J]. 中国财政,2008(6):80.
- [6]王存方. 成语在标题上的妙用[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2(1):98-99.

(责任编辑 吕志远)

A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Study on Idioms' Utilization in Newspaper Headlines

SUN Yanchuan

(China Society News Agency, Beijing 100032, China)

Abstract: The importance and current status of idiom utilization in news headlines were examined through document analysis, data analysis and logic analysis. The result shows that idioms are indispensable components for news headlines, but the sense and ability of using idioms in newspaper headlines should be improved, studied and developed with effective strategies. Based on relevant theories and past experience, practical ways of improving the sense and ability of using idioms in headlines include reading widely and memorizing diligently, constantly reviewing good idioms and examples, learning idioms through educational games, using idioms dynamically in virtual training of making news headline, and using idioms in practical work of headlines.

Key words: headline; writing; idiom; newspaper

唐诗宋词与音乐演唱的融合发展及其影响

李 优

(沈阳音乐学院 民族声乐系, 辽宁 沈阳 110818)

摘要:在中国古代,文学与音乐演唱往往融为一体同步发展。将唐诗宋词与音乐演唱融合发展作为研究对象,分析阐述其表现和形成原因,总结其中所蕴含的文学与音乐演唱融合发展相关的理论和规律,挖掘古典文学与音乐演唱融合发展传播的意义价值,也可为今天流行歌曲的创作和演唱提供参考和启发。

关键词:唐诗宋词;音乐演唱;融合发展;流行歌曲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3.04.015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3)04-0091-04

在中国古代,文学与音乐演唱往往融为一体同步发展。这种情况从先秦时代“诗三百”即已开始。发展到唐诗宋词时代,文学与音乐融合发展的情况仍突出地存在。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上,唐代是古代诗这一文学体裁的高峰期,宋代是古代词这一文学体裁的鼎盛期,而唐宋时期也是音乐演唱艺术发展的辉煌时期。因此,无论从文学史还是从文学与音乐演唱融合发展史的角度看,唐诗宋词与音乐演唱融合发展都是一个值得重视、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本文将唐诗宋词与音乐演唱融合发展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表现和形成原因,总结其中所蕴含的文学与音乐演唱融合发展相关的理论和规律,以便为当今音乐演唱汲取古典文学精华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唐诗与音乐演唱的融合发展

唐诗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本文基于对诗歌体裁表达方式的考察,探讨唐诗与音乐演唱的融合发展。时至唐朝,文学领域的诗仍有很大一部分是要通过音乐演唱的方式实现表达和传播的^[1]。显而易见,此时的诗通过音乐演唱予以表达是对此前诗歌表达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从先秦时代的“诗三百”,到汉魏六朝乐府诗和南北朝乐府诗都是配乐演唱的。但是与此同时,诗的表达也在另一条发展道路上谋求发展,即逐渐脱离音乐演唱向格律诗方向推进。这条发展道路起始也较早,从汉

朝起,我国就产生了五言诗和七言古体诗,发展到两晋南北朝时期,在诗歌创作上又出现了“声律说”等关于诗格律方面的创新与改革,并因此逐渐形成了近体诗。近体诗在表达方式上与其前诗歌的最大区别是,诗不必通过演唱加以表达。律诗发展迅速,到了唐朝就成为当时文学的主要体裁,甚至唐朝诗人通过拟乐府古题与新乐府题所创作的诗,也都不再通过演唱加以表达^[2]。然而这种情况并不等于说唐朝的诗已经完全与音乐演唱分道扬镳,事实上,仍有很大一部分采用音乐演唱的方式进行表达,尤其是唐诗中的很多五言绝句和七言绝句,它们不仅大都可以配乐演唱,甚至其中很多作品是特意为音乐演唱而创作的。这种特意为演唱而写作的唐诗,即“唐人乐府”。另外,值得特别提及的是,唐诗用于音乐演唱的那些名为《阳关曲》或《杨柳枝》的五言、七言绝句,其名称还大多作为词的调名而流传下来,刘禹锡的《杨柳枝》即是此种情况的典型例证。另外,学界许多学者为了证明唐朝时期还有很多诗是通过音乐演唱表达,他们更愿意举出唐代文人薛用弱《集异记》所记载的“旗亭画壁”故事。这则故事很好地说明,在诗风日盛的唐朝开元年间,不分朝野无论官民,人们都喜欢吟诗唱诗,而当时很多名气颇大的诗人如王之涣、高适以及王昌龄所创作的诗,也大多是供人歌唱的歌词。易言之,唐诗有一部分是

收稿日期:2023-04-14

作者简介:李优(1984—),女,辽宁沈阳人,沈阳音乐学院民族声乐系副教授,研究方向:民族声乐演唱表演。

作为歌词创作并通过音乐演唱加以表达的。

唐诗与音乐的融合发展还体现在唐朝文人所创作的词。因为在唐朝人观念中,词是“诗余”。词作为一种新文体肇始于隋朝,起源于俗世民间,并逐渐形成模式,引得许多文人创作,便逐渐演化为诗歌中的一个种类或者一个分支。词因为是伴随着音乐的歌词,所以又有很多其他的别名,如曲子词、乐府、乐章、长短句、诗余、琴趣等^[3]。词到唐朝以后逐渐走向定型化,许多文人也热衷创作词。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是中唐大历十才子中的韩翃,据说他在怀念失散的小妾柳氏时曾写过一首《章台柳》,这首词的词牌原本叫《潇湘神》,然而韩翃依照这个词牌填写的《章台柳》感情深沉、意境婉丽,因此后人反倒将原来词牌《潇湘神》弃之不用,而把《章台柳》作为词牌名。尽管这是个故事,也能说明当时依照乐曲格式的词牌写词的风气已然在诗人中兴起。而且根据相关的文献记载,其时张志和、韦应物和戴叔伦等诗人,在填写歌词方面都是佼佼者。尽管中唐以来文人按词的曲调进行词创作的文学活动比较普遍,但当时他们填词所使用的曲调,亦即后来的词牌数量,却极其有限。根据相关统计大概只有《一七令》《忆长安》《调笑》《三台》等十几个。唐朝文人的这种热衷填词的活动,造就了当时文学与音乐的融合发展,并且在此过程中出现了晚唐温庭筠这样卓有成效的词人^[4]。温庭筠的词成就巨大,即便从现存的近70首词中也可以看出他的出类拔萃。他填写过19种词牌曲调,而且其创作的词大都脍炙人口,广泛传唱,他在词与音乐演唱融合发展方面成就不俗。

唐诗与音乐融合发展的成就,以及涌现出像张志和、温庭筠这样一些推动词与音乐融合发展并卓有成效的文人,这除了表明其时文学与音乐演唱融合达到一定的高度之外,也使得宋朝的词乘势而上,创造出中国文化史上又一个文学与音乐演唱融合发展的繁荣期。

二、宋词与音乐演唱的融合发展

词发展到唐朝的中后期以后,势头劲健,到宋朝时便发展到最高的程度。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继唐诗之后的又一种达到发展顶峰的文学体裁。宋代文人依照乐谱声律节拍写词,叫做“填词”或“依声”。词的原形态实际是诗,从这个角度看,词其实是为了配合音乐而形成的一种句子长短不齐的格律诗。既然是诗的一个种类,创作词自然也要讲求意境、韵律和对仗词采等。但是词与诗更主要的区别在于它是一种通俗的大众文学艺术形式,而诗则是一种高雅的文人阶层的文学艺术形式。正因为这样的区别,宋词与音乐演

唱的融合发展首先表现在把词这种文体,推广到社会的下层,并在那里得到广泛传唱。

由雅入俗,把高深典雅的作品转化成能够被大众接受的艺术,是很值得称颂的文化功绩。在宋朝,随着商业贸易的繁荣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文人需要把文学转化成文化商品以换取生活资源,宋词就成为当时许多像柳永一类文人的选择。如前所述,词出身低微,起于民间,再加上这一文体在晚唐、五代、宋初的时候,主要被当做酒席宴前娱宾遣兴之文学佐料,所以在传统的观念中词是“小道”,属于“艳科”,“诗庄词媚”烙印深深,尽管词在后来的发展中,经过欧阳修、苏轼等人在题材和意境方面做出提升,又被辛弃疾等一些杰出作家提升到表达爱国情怀等同传统“诗言志”的高度,成为与诗歌地位完全等同的文学体裁,但是词与生俱来的低俗特征,以及可以被俗世大众接受的品质,却始终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因此,在宋代,柳永等词作家便把词普及向俗世大众,并在与音乐融合发展方面作出了极大贡献。柳永是宋代将词进行通俗化并传播到大众层面的最典型作家。他因为钟情追求华丽辞藻和对细腻情感的抒发,写了许多缠绵婉约的爱情词而被宋仁宗所知,所以在参加科举考试时直接被皇帝取消了录取资格。这也使得他从此便把大部分人生流连在歌坊青楼之间,把给歌妓们写词唱词作为谋生的核心工作,全力以赴地进行创作,写出了很多情真意切、感人肺腑的词。他不仅靠着给底层歌妓写词支撑自己的生活,还把词与音乐演唱融合予以通俗化努力,他的词普及到“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程度。他的词被广大的市民阶层所接纳,实现了世俗文学与音乐演唱的完美融合。

在宋代比柳永还早一点、创造婉约词并卓有成效的是晏殊。他的词也影响到自己的儿子晏几道,父子俩的词也大都在民间广泛传唱,做到了词与音乐演唱的高度融合。除此之外,南北宋之交的李清照更是在“词别是一家”理论支持下,创作了一大批婉约词,其作品也广为传唱,使她成为当时广为人知的女词人。这样,自柳永以来到李清照的一批词人,所创作的那些既含有深刻意境,又带有深情厚谊的词,因为与音乐演唱完美融合,体现出高度艺术性,并为大众喜闻乐见。这对于当时文学与音乐演唱的融合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因为宋词艺术家的努力,雅致的词作品又能够进行通俗化的艺术处理,尤其是与音乐演唱融合发展,遂被底层大众所接受。如柳永的《雨霖铃》“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等词句,不仅婉转绮丽,

声情并茂,而且感情率真,语言质朴自然,意境雅致细腻,这样的辞章,配上悠扬婉转凄清悠长的曲调演唱,必定为广大的俗众所喜爱;与此相近,他那首《八声甘州》,语浅而情深,融写景、抒情为一体,通过描写羁旅行役之苦,表达了强烈的思归情绪,写尽了古代知识分子怀才不遇的感受,同时也仍能够与普通大众的思想情感产生共鸣,成为传诵千古的名篇,在配乐演唱之后,成为千古绝唱。李清照的《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写清秋时节的新婚小别,为排遣愁怀独上兰舟,西楼望月而恨雁来无书,然后用“花自飘零、水向东流”比喻无由消除的两地相思,呈现出婉约清新的格调、优美的意境和工致精巧的艺术性。尽管这首词出自上流社会知识女性,但其词却不加雕饰,明白如话,在配乐演唱之后,也能够为广大受众所接受。

宋词和音乐演唱关系更为密切,宋词是与音乐演唱融合发展更具典型意义的文学体裁。这一点在有宋一代婉约派的词上有充分的体现。柳永之后,有秦观、周邦彦等在词创作的作风和主题体裁等方面,继承了婉约派^[5]。其中,周邦彦的词格律精严、风致醇雅。其规范化的格律表现与技巧的纯熟,使得时人无出其右。他不仅是当之无愧“词林正宗”,还成为集婉约派之大成的作家,同时他的词在与音乐演唱融合方面更臻于完善。

值得注意的是,宋词与音乐演唱融合发展并不止于婉约派词人,在豪放派词人那里,也有同样的表现。在宋代,因为苏轼的出现,打破了宋词领域婉约派一派独尊的格局,他以《东坡乐府》突破了“词为艳科”的窠臼,写出了一系列黄钟大吕瓦釜雷鸣般的词,开辟出词动人心魄的另一空间,拓展出宋词的另一流派“豪放派”^[6]。该流派的词大多不再抒发离愁别恨儿女情长,也抛弃了卿卿我我缠绵悱恻的风格基调。尤其是在主题题材方面,凡怀古咏史、说理谈玄、议论时事均可入词。苏轼以及当时追随者对词这种大刀阔斧的改革,获得了许多词人的积极追随,如以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苏门四学士为代表的响应者。这些人在此领域的创作成就,开辟出宋词的另一条战线。到了南宋,词风又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李纲、张元干等写出了一大批爱国词,稍后则有辛弃疾,他以踔厉风发的积极心态,写了大量激情荡漾、气吞万里的爱国词。步其后尘的则有张孝祥、陈亮、刘过等辛派词人,而陆游作为一个同时代的爱国诗人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在宋词发展过程中,词与音乐演唱的融合发展一直若影随形且更为密切。词本来就是歌曲的一种,是合乐演唱的歌

词,词被称为曲子词、乐府、乐章、琴趣等别名,也凸显着它跟音乐演唱的天然关系。这决定着词与音乐演唱的融合发展有着天然的基础和优势。

宋人作词,词必依照词牌填写,词牌就是词调,词牌名称决定着词的格式和演唱曲调。如《雨霖铃》和《水调歌头》,因为词牌不同,其演唱曲调自然也就不同。所有的词都是按照具体词牌规定的曲调进行演唱的。

三、唐诗宋词与音乐演唱融合发展的影响

唐诗宋词作为古代文人抒发感情的方式,其美感效果不仅在于表达自己的志向情怀,同时,还能引发别人的共鸣,诗词的用典对偶等修辞形式和韵脚平仄变化,也能使感情的表达变得更丰富细腻或动人心魄,在此基础上,诗词与音乐演唱的融合发展,更因为音乐节奏和乐器的配合,以及演员演唱声调和技巧等艺术因素的参与,使得诗词作品动人心扉,其传播效果也更加突出。音乐演唱推助了诗词表达和传播方式,也正是由于音乐演唱的融入,古典文学中的唐诗宋词,不但在当时获得广泛传播并造成深刻影响,同时也得以流传后世,传唱不绝^[7]。直到今天,这种影响还方兴未艾。当代的音乐演唱也特别注重对传统文化的吸纳,其中很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当今音乐演唱领域对于唐诗宋词的借鉴和萃取,这种情况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当下许多歌曲创作和音乐演唱特别注重借用和借鉴唐诗宋词的内容和意境,往往取材于唐诗宋词,或者将整首诗词纳入歌曲中,或者截取其中的名段佳句,或者在诗词的启发下加以创作。台湾的琼瑶和大陆的陈小奇就是采取这类歌曲创作形式的代表者。琼瑶的歌词创作惯于将唐诗宋词入歌,作为其歌词的核心内容,如李清照的《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临江仙·庭院深深深几许》等。李清照那些描述少女情愁的词非常适合琼瑶塑造的古典型婉约淑女形象,歌词演唱所形成的氛围也有助于作品人物的情感表达;陈小奇是当下流行歌曲创作阵营中岭南一派的领军人物,也是颇有影响的歌手,他所创作并由毛宁演唱的《涛声依旧》、廖百威演唱的《白云深处》和李进演唱的《巴山夜雨》,都是以唐诗作为核心内容和歌曲境界的,仅从歌曲的名称就可看出它们对唐诗思想意境的继承与创新。第一首歌词是以唐人张继《枫桥夜泊》为基础的拓展和创新,第二首则是对杜牧《山行》一诗的演绎和展开。陈小奇的贡献在于把唐诗的语句世情化、感情化和烦琐化,而《巴山夜雨》的歌词则是摘取李商隐《夜雨寄北》第二句,然后予以化用,借助诗歌两地相思的意境来表达歌曲

的主题。此外,陈小奇还曾创作了由吴涤清演唱的《烟花三月》《朝云暮雨》,以及由毛宁演唱的《大浪淘沙》,其中也明显有着对唐诗宋词思想境界的继承与创新,并以此表现当下人们的悲欢离合和人情冷暖,由此形成唐诗宋词进入流行歌曲的创作模式,形成作者独特的风格,为唐诗宋词融入当今流行歌曲创造了很好的样板。其次,当今音乐演唱领域的歌词创作中盛行以唐诗宋词名句或诗词作为流行歌曲名称的热潮,比如内地校园歌手刘海波所演唱的《人面桃花》,就是从唐代诗人崔护的《题都城南庄》“人面桃花相映红”中化出的歌曲名称;白雪的《声声慢》则是从李清照《声声慢·寻寻觅觅》中采取的歌名;而 AGIN 乐队的《烽火扬州路》的歌名,则是从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摘取,陈明演唱的《回首灯火阑珊处有你》、唐朝乐队演唱的《梦回唐朝》《月梦》等歌曲名也都基于唐诗宋词,尽管这些歌曲的名字不一定完全是唐诗宋词的原句,但其中的思想和境界情怀却毫无疑问源自唐诗宋词。最后,央视综合频道重点打造的大型音乐文化季播节目《经典咏流传》,进一步凸显了唐诗宋词与音乐演唱融合发展对今天音乐演唱领域的影响。该节目从 2018 年的第一季到 2022 年的第五季,历时四年,其中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但每一季都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并在央视文化综艺扎堆的情况下,同一档节目仍然能持续保持高热度。这也进一步说明唐诗宋词与音乐演唱融合发展的影响力。节目中

谭咏麟演唱的《定风波》、胡夏和郁可唯演唱的《知否知否》,以及汪苏泷演唱的《少年狂》等歌曲,它们都体现了宋词与音乐演唱融合发展的影响。总之,唐诗宋词与音乐演唱的融合发展,不但在当时创造了文学结合音乐演唱艺术的辉煌,而且对今天流行歌曲创作和演唱仍然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通过继承和创新,很好地服务于新时代的音乐演唱艺术。

参考文献:

- [1] 吴相洲. 论初唐近体诗律的形成与歌诗入乐的关系[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2): 65-69.
- [2] 冯伦. 《史记》的抒情性与歌诗音乐的作用[J]. 宁德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2): 48-51.
- [3] 伍振戈. 古典诗词语言的弹性美[J]. 益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6(2): 58.
- [4] 赵敏俐. 关于加强中国诗歌与音乐关系研究的几点思考[J]. 文艺研究, 2002(4): 97-99.
- [5] 谢桃坊. 宋词的音乐文学性质[J].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4): 115-120.
- [6] 苟德培. 从音乐文学的角度看古诗歌之兴衰[J].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学报, 2007(3): 58-62.
- [7] 张晋俐. 古典诗词音乐艺术的历史衍变与现代复兴[J]. 中国音乐学, 2006(4): 68-71.

(责任编辑 谢春红)

The Fusion and Development of Tang Poetry and Song Poetry and Music Singing

LI You

(Department of Ethnic Vocal Music, Shenyang Conservatory of Music, Shenyang, Liaoning 110000, China)

Abstract: In ancient China, literature and music singing often developed together. The study of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ang and Song poetry and musical singing is not only designed to explore the significance value of the integr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classical literature and music singing, but can also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and inspiration for the creation and singing of today's popular songs.

Key words: Tang and Song poetry; music singing; integrated development; popular songs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谱写新时代高校育人工作绚丽华章

甘 勇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党的二十大精神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新要求,谋划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使命任务,为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作为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机构,高校需要深入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基本原理指导学校高质量发展,在实践中贯彻会议精神要求,谱写新时代高校育人工作绚丽华章。

关键词:党的二十大精神;新时代;高校育人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3.04.016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3)04-0095-05

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初步实现了满足人民对高等教育的基本需求,但距离对更高质量的高等教育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要实现我国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需要高等院校深入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以会议精神为指引,在实践中坚持守正创新,多途径结合谱写新时代高校育人工作绚丽华章。

一、深刻理解党的二十大精神的主题要求,坚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理想信念

党的二十大报告从5个层面阐释了大会的主题,突出强调了要团结奋斗,形成共创强国业、共圆中国梦强大合力的目标要求,提出“三个务必”的要求。“用众人之力,则无不胜也。”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无一不揭示出“团结才能胜利,不团结就会一事无成”的深刻哲理。新时代,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重任,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的历史重任,更需要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共筑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在全国上下深入学习宣传、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之际,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栋梁之材重任的高等教育,更需要

以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为契机,通过多样的学习方式,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走深走实、入脑入心,在高校师生员工中落地生根,指导学校的人才培养工作。需要学校上下坚定理想信念、明确奋斗目标、上下一心,团结奋斗,学用结合,把党的二十大精神贯彻落实到学校改革发展、教学管理的全方面、全过程,踔厉奋发、奋楫笃行,共同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更好地为国家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智力及人才支撑。

二、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理论为指导,扛牢“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两化两结合”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创新发展的内在机理,是继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要求,也为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高等教育的发展,把握好、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

(一)坚持学生至上的育人理念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人奋斗的根本目标,也是中国共产党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的密码。学生是高等教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对象,也是高质量教育的体

收稿日期:2023-06-20

基金项目: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重点项目(2021SJGLX292)

作者简介:甘勇(1965—),男,广西兴安人,博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教授,主要研究党建思政和计算机应用。

现,高校坚持以生为本的育人理念,要面向全体学生,关注每一位学生的成长,发展学生个性,全面把握学生的愿望,尊重学生的主体作用,努力营造有利于学生全面发展的育人环境。

(二)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创办高等教育的指导思想,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的显著特征。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性质和办学宗旨决定要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树立马克思主义坚定信仰,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坚定信仰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三) 坚持守正创新

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守正才能鉴往知来。社会主义高校必须要守正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坚持党对高等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牢固树立党对高校的领导地位,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创新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根源,是顺应时代潮流、适应时代需求的前提。马克思主义原理与高校育人实际的有机融合需要强化创新理念,紧跟时代步伐,顺应高等教育发展方向,不断深化对高校育人工作的广度和深度,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创新高校“立德树人”工作理念、优化育人方式方法,以新的理论指导新时代高校育人实践,解决新问题、探索新路径,进一步完善高校育人工作。

三、以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指导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建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跨越了精英教育,正逐步实现大众教育的阶段,在校生人数稳居世界第一,人口素养得到较大提升。但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所确定的高等教育质量愿景仍存在不小差距,与人民对高质量高等教育的需求还存在矛盾。而解决这些矛盾、实现目标愿景的正确方式就在于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理论来源于实践。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在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践上总结出来的理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既有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同样,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也必须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个最大特色,坚持“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个根本要求,时刻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立足于中华民族优秀教育思想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积极吸收其他国家优秀教育理

念与创新科技,不断提升完善我国的高等教育质量,培养出大批具有世界眼光、中国意识和强烈文化自信,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人才。

(一) 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稳步推进高等教育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同样,我国高等教育人口规模同样巨大,截至2021年底,我国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院校共有3012所。在学总规模达到4430万人^[1]。而且学历层次上看,我国高等教育既有研究生、普通本科生,也有职业本科、高职高专,还有成人本专科及网络本专科。同时,国内的高等教育还存在着区域差异、办学水平差异、生源质量差异等问题。面对多层次、多形式的复杂现状,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需要立足国情,各院校也要立足自己的实际情况,坚持中国国情这个逻辑起点,从实际出发发想问题、作决策,绝不能简单照搬国外其他院校的办学经验,要结合自身特点,坚持稳中求进,按照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制定符合学校实际需要的教育管理制度,循序渐进地推进学校的发展。

(二) 坚持均衡原则促进高等教育全面发展

共同富裕是五千年中华民族伟大理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与鲜明标志。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高等教育同样要遵循这一要求,经过70多年发展,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2022年我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4655万人,毛入学率达到59.6%。^[2]基本上满足人民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但同样面临着一些迫在眉睫的矛盾,主要体现在人民对于更高质量高等教育的需要和当前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同时,我国高等教育还存在着优质资源供给总量不足,而且布局不均衡的现状。当前,从地域上看,我国的优质教育资源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而中西部地区则成为高质量高等教育的洼地,严重影响了教育资源均衡发展。为满足人民对优质高等教育的需求,促进教育的公平发展,需要将更多教育资源投入薄弱地区,提升该地区的教育质量,不断缩小高等教育的区域差距,实现高等教育均衡发展,使更多人可以享受优质高等教育。

(三) 坚持协调发展原则,实现高等教育物质与精神文化协调发展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两大

伟大成果,两者互为条件、互为目的,共同推动社会发展进步。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只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得到极大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3]。高等教育作为可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智力及人才支持的专业机构,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高质量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需要从物质与精神文化两个层面提升高等教育环境,共同推动教育质量提升。物质形态的文化“具有直观可视性强、历史价值与文化价值兼具、艺术价值与教育价值并重的优点,成为高校校园文化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载体”^[4]。

需要各高校划拨专项经费,在学校物质形态文化建设中加大投入,通过建设相关的专题展馆、文化雕塑、文化墙、校园景观,构建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实习实训设备,完善学校教育基础设施等,构建符合学校教育文化体系的器物文化,不断提高学校“教育文化硬实力”。把地方优秀传统文化和先进文化浓缩于这些物化载体之中,进一步提升学校的文化特色和品位,潜移默化中提升学校的育人质量。同时,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强化目标引导,紧紧围绕“立德树人”这一德育的根本任务,通过开展系列思想文化教育活动,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教育文化发展的引领,树立积极向上的教育核心价值观。

(四)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教育原则,提升受教育者“和合”意识

“施教导民,上下和合。”以“和平、和谐、合作”为核心的“和合”理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贯穿中华文明几千年发展的始终,成为中华民族统一、长盛不衰的精神力量,也是新时代中国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的智慧。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等论断,和谐、和平的论断揭示出我国现代化的精神内涵,就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自然观、人与人和谐共处的社会观。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源远流长并传承有序的中华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生态自然观,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态文化,并成为中国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生态文化基因^[5]。中华民族一贯坚持睦邻友好、和平共处,在对待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关系上,历来崇尚和平,主张天下为公、讲信修睦、亲仁善邻、协和万

邦。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就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发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历史发展规律及其大势的科学认识和自觉顺应”^[6]。作为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机构,需要在教育教学中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和平意识融入教育教学活动中,通过理论学习、实践教学、社会活动等方式培养学生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现代化人才。在生态文明教育中需要从培养目标、培养体系、学科建设、教学内容等方面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教学中,“从生态责任教育、生态伦理教育、生态安全教育、生态法制教育等方面全视角建设生态文明教育的知识体系”^[7]。在教育中融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强化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理念,致力于推动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价值观,构建符合时代要求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四、以党的全面领导和全面从严治党强化高校党建工作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在中国高等教育进入新时代的今天,同样需要坚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核心力量的要求。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以全面从严治党提升高校党建工作来实现新时代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一)强化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确保高等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

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必须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不仅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根本原则,也是确保教育方向的必然要求。我国高等教育从少到多,从弱到强的历史性转变,从有学上到上好学的需求变化都显示出在党的领导下我国高等教育取得的巨大成就。而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高质量高等教育的需求,更需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管教育、党管人才的工作原则,把牢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政治方向,确保党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领导地位,动员、组织和协调各方力量,强化高校党的组织、政治、制度建设,提高高等教育治理能力,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共同推进教育现代化事业。

(二)强化党的理论学习,提升党性修养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思想是行动的指南。高等

教育需要深刻领会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等相关理论,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二十大精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凝心铸魂,确保高校全体师生员工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增强“四个意识”,自觉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实践者,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奠定坚实理论基础。

(三)加强成果转化,落实主体责任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强化高校党建工作需要自觉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思想自觉,落实到具体工作,不仅要强化相关责任人的主体责任,明确领导责任,还要做好执纪监督,确保学校各项工作在公开公正公平下开展,并以常态化的监督检查,促使各级领导干部严格遵守规章制度,形成自上而下、层层负责全面从严治党局面,为高校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四)加强基层党支部建设,筑牢组织堡垒

党支部是党的基本组织,是党在群众中的形象,也是党建的组织血脉与战斗堡垒,做好基层党建工作有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高等教育基层党支部需要发挥高校党建工作主阵地作用,严格执行“三会一课”、主题教育等制度,开展支部专题学习、主题活动,起到凝聚的作用,最大限度发挥好党支部的带头作用,夯实党的组织基础,发挥坚定有力的全面从严治党作用,组织引领全校党员、群众,听党话、跟党走,成为党员、群众的主心骨,促使学校党建取得良好成效。

五、妥善应对风险挑战,谱写高等教育更加绚丽的华章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国内看,在基本满足人民对物质文化需求的同时,经济社会发展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风险挑战,经济问题、民生问题、安全稳定问题日益凸显,各领域都还存在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也有不少风险隐患。国际上同样存在敌对势力的打压、围堵、渗透、制裁、断供、脱钩、抹黑等各种挑战。面对风险挑战,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丢掉一切幻想,增强斗争本领,战胜各种风险挑战”。

作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高等教育院校,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道路上同样面临着学科专业建设质量不能有效满足人民对高质量高等教育的需要,“自由主义、享乐主义”等不良文化倾向的负面影响仍然存在,“四个自信”的有效落实也遇到挑战,影响了“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高质量实现。为加快建设

教育强国,提升高等教育质量,满足人们对高质量高等教育的需求,实现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必须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同时要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谋而后定。同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坚定理想信念、坚持锐意进取,主动防范化解风险,从供给侧加快建设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体系。

(一)加强思政教育,树立牢固的政治方向

青年大学生正处于“三观”逐步成熟期,在这一时期必须要加强思政教育,占领高校意识形态战场,帮助他们铸就坚定的理想信念、锤炼高尚品格,为今后成长成才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不仅要筑牢思政理论课这个主阵地,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立场、观点、方法入脑入心,指导行动。还要让各类专业课程、公共课程、实践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各自“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增强青年学生“四个自信”,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二)加强优秀文化教育,补足精神之钙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高校在育人工作中,要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守正创新,创新育人载体与方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机融合到教学、管理、服务与社会实践中去,引导学生自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心与自豪感,正心明德、正本清源,将文化自信贯通于实际行动中,自觉抵制不良文化的侵蚀。

(三)加强教育教学改革,提高育人质量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高校提高育人质量,必须要顺应历史发展需要,从教育教学改革入手,不断调整专业结构与人才质量,进而更好地担负起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

首先要优化教师队伍,提升育人能力。高质量大学首先要有高质量的师资队伍。高校需要通过引进高层次人才充实师资队伍力量;选派骨干教师赴高水平大学访学提升教育教学能力;深入企业实践提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能力;创立名师工作室,发挥优秀教师的传帮带作用等方式优化教师的专业素养,为更好地开展教育教学工作奠定基础。

其次要深化高校专业改革。专业建设是高等教

育育人的主要途径,也是高等教育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式。为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高校需要根据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深化专业改革,构建以需求为导向,自主、灵活的专业建设模式,建立健全专业动态调整机制,根据人才需求预警以及学生就业状况,及时调整专业设置,打造特色优势专业,淘汰与经济社会需求脱节专业。

(四) 强化社会实践锻炼,深化育人成果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社会实践锻炼是提升大学生综合素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也是高等教育深化供给侧改革的关键环节,也是知行合一,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重要载体。

首先要强化制度,加大资源与组织建设,为社会实践提供有力支持。高校应当建立完善的社会实践制度,将社会实践纳入学生评价体系,切实将实践表现优异的学生作为评优评先、推优入党的重要参考,将指导教师指导学生社会实践情况纳入业绩评价、职务晋升、职称评聘等方面的重要依据。同时,要不断开发新的社会实践基地,将红色教育基地、劳动教育基地、全国青少年教育基地等多类型的教育场所纳入实践范围,并创新技术支持,利用网络、多媒体技术全面记录实践活动并扩大活动的影响力。

其次要聚焦主题,树立大局意识。参加社会实践锻炼的根本目的在于知行合一,提升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促使大学生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重要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全国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之际,高校的社会实践活动需要聚焦主题,采用丰富多样的活动深化对党的二十大精神的理解,进一步筑牢思想基础,不仅要利用好红色资源、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开展实践活动,还要聚焦主题,强化宣传作用,利用各种媒介资源将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头脑,使广大青年学生深刻领悟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自觉树立大局意识,以积极的态度投入学习生活、社会服务中去。

参考文献:

- [1] 教育部. 2021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EB/OL]. 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fztjgb/202209/t20220914_660850.html. 2022-9-14.
- [2] 叶雨婷. 教育部: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 59.6% [EB/OL]. http://edu.youth.cn/wzlb/202303/t20230323_14405081.htm. 2023-03-24.
- [3] 李玉举,肖新建,邓永波. 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看中国式现代化[J]. 红旗文稿,2023(1):30-33.
- [4] 吕村. 万物皆媒视域下高校器物文化的传播价值研究[J]. 中州大学学报,2020(6):68-72.
- [5] 耿步健,张晨.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态文化基因[J]. 云梦学刊,2023(1):19-25.
- [6] 何怀远. 战争与和平的世界之问与中国答案[J]. 思想理论战线,2023(1):26-34.
- [7] 张晨宇,于文卿,刘唯贤. 生态文明教育融入高等教育的历史、现状与未来[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21(2):59-68.

(责任编辑 吕志远)

Further Study and Implement the Guiding Principles of the 20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to Write a Splendid Chapter for Talent Cultivation and Educational Work at Universities in a New Era

GAN Yong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ased on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both our economy and society in a new period, had set the Party's central tasks in the new era on a new journey and clarified the developing course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o, teachers at highe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shall further study and learn the guiding principles of the 20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and carry forward high-quality educational construction with the basic guidelines of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the needs of the times, while maintaining firm ideals and convictions. Only by implementing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20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in reality can we write a splendid chapter for talent cultivation and educational work at universities in a new era.

Key words: the 20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new era; talent cultivation in universities

基于产教融合的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课程体系构建的实践探索

苏玉¹, 黄继海¹, 刘秋菊¹, 李井竹²

(1.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4; 2.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针对教学与产业发展结合不够紧密、专业特色与地方产业难以实现对接等问题,提出以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为抓手、人才培养定位为核心、教学定位为举措,研究了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的设计原则、标准、目标;制定了5项课程体系的构建措施,形成了基于产教融合的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的课程体系结构构建模式,为促进地方应用型高校人工智能类专业建设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产教融合;应用型;课程体系;人才培养模式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3.04.017

中图分类号:G642;TP1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3)04-0100-05

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指出,地方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不同于高职教育,高职教育侧重的是针对具体工作岗位的应用,例如成熟的操作方法、技能应用、操作步骤的应用等。随着新方法、新技术、新工艺的不断涌现,解决这些新问题,不但需要既有较强的实践能力,而且需要一定的专业理论知识,这样的应用型人才能够将所学的新理论、新知识进行综合运用^[1-4]。

近年来,地方高校非常重视学生就业率,更多关注“是否就业、如何就业”等问题,而对专业特色与地方产业如何实现对接、培养模式如何满足地方经济发展等问题研究不多。高巍巍指出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信息技术类专业如何在工程教育认证与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机制的共同驱动下实施以学生为中心、面向产教融合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设计,培养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并提出了基于产教融合的应用型人

才培养创新策略^[5]。目前从产教融合角度构建人才培养体系结构研究深度不够,对于专业特色与地方产业难以实现对接、培养模式难于满足地方经济发展要求等问题缺乏研究;对如何适应地方产业经济需要的人才培养模式研究较少,将产教融合、学生动手能力和高素质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课程体系创新相结合的研究尤为缺乏。

一、拟解决问题

(一)专业特色与地方产业难以实现对接

我国地方本科高校的教育供给与地方产业需求的结构性矛盾突出,表现为人才培养结构不完整、专业设置不协调,难以满足地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需求。为了更好地服务地方产业经济,我们采取的措施有:(1)以师资队伍建设和通过招聘和培育等多渠道引进急需人才;学院扶持和激励课程教学团队建设;专业教师每人每年到企业学习2—4周。(2)以改革授课方式为抓手,在课堂教学中融入创新元素,构建线上线下混合授课

收稿日期:2022-06-17

基金项目: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重点项目“新时代公共课、专业课与思政课协同育人体系研究与实践”(2021SJGLX292);“基于产教融合的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的探索实践”(2021SJGLX295);“基于常态监测数据的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专业建设研究与实践”(2021SJGLX293);“基于OBE理念的鲲鹏产业学院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20215JGLX286);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智能+’时代高校虚拟教研室建设模式研究与实践”(ZGJG202111B)

作者简介:苏玉(1967—),女,河南商丘人,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智能信息处理与智能系统、教育大数据分析等。

模式,充分利用国内优质慕课资源,全方位促进专业知识的有效传承和学生的创新能力。(3)进一步聘请企业工程师给学生上实践创新课程。(4)校企合作编写教材,编写融入企业真实项目的教材,把企业项目按模块分布到教材的章节中,有机地将知识与技能结合在一起,并且在组织结构上以实践为主线,强调要想学好编程就要多实战。

(二)培养模式难于满足地方经济发展要求

当前许多应用型院校的培养模式过于陈旧,且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程度较浅,毕业生的专业能力和素质与市场需求相差甚远。基于此,我们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1)为了适应信息社会和行业的快速发展,通过邀请学科专家、企业工程技术人员参与修订人才培养方案。(2)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学科竞赛、项目需求相关课程为抓手,基于两个方面做好课程体系的设计,培养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人才,在这两类课程基础上适当开设专业方向课程,比如机器学习、模式识别等。(3)通过与企业基于“互惠互利,合作共赢”原则进行深度产教融合。智能科学与技术是跨学科的专业,需要学生综合运用计算机、电子信息、自动化等学科的知识,更侧重于应用型研究和实践,需要为地方培养有一定综合能力的应用型人才。所以,在课程设置上,采用阶梯式实践教学体系,把纵横科研项目、企业的项目分模块穿插进实践教学的过程中,提升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

二、基于产教融合的课程体系构建模式

通过对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内涵的深入剖析和国内行业人才需求的全面分析,明确学生应当具备的专业核心技能,形成专业课程体系构建理念(如图1):为满足产业对信息技术应用型创新人才“厚基础、强实践”的需求,基于产业需求优化理论课程体系,基于企业项目重构实践教学体系,在学科竞赛和企业真实项目训练的基础上,让学生重点掌握大数据处理、智能控制、图像识别、计算机视觉等技术的实践实训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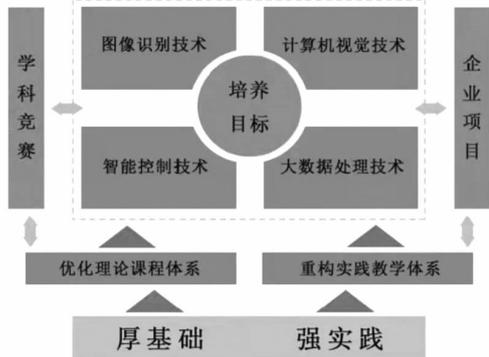


图1 专业课程体系构建理念

(一)以产业需求为抓手,确定专业定位

人才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工科人才,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和创新精神,掌握较扎实的科学基础理论知识。坚持立德树人,培养爱国进取、创新思辨,厚基础、强实践,具备扎实的人工智能基础知识、专业技能和优良的综合素质,掌握数学、统计、计算机和控制等多学科交叉知识,能够无人机技术、健康与医疗数据处理、智能交通和智能控制等技术领域从事智能信息处理与智能感知相关工作,培养具有计算思维的人工智能应用型人才。专业定位:立足郑州面向河南,培养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应用型本科人才。

我们坚持教学工作中心地位,以教学研究和教学改革为先导,坚持长效机制,着力内涵建设。日常教学中注重深化教学内容改革,创新教学模式,确保教学质量的提高,2022年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获批河南省(与百度)共建人工智能专业。结合行业相关技术日新月异的现状,对一些专业课程,更新教学内容,突出学科前沿性、实用性和针对性。

针对教学与产业发展结合不够紧密、专业特色与地方产业难以实现对接等问题,我们通过改进课程体系、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产教深度融合等方式,设计理论课程体系(如图2)。



图2 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理论课程体系

(二)以持续提升为核心,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主动适应时代发展对人才培养的需求,不断探索,实行多样化的人才培养模式,探索并建立了一种全程、全链条式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遵循1234的设计理念:一个主线:厚基础、强实践;二个基础:数学基础和程序设计基础;三个支柱:计算机、电子和智能;四类实践:图像识别技术、大数据处理技术、计算机视觉技术和智能控制技术实训。

建立兴趣激发、实践创新和助研提升为一体的

全程、全链条式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如图3)。第1学年,兴趣激发、夯实基础:以“趣味编程”为切入点,引发兴趣,打牢学科专业基础;第2学年,提升理论,培养能力:以课程设计为依托,培养系统开发能力;第3学年,灵活运用,深入学习:深入学习机器学习以及统计原理等算法基础;第4学年,实弹演习,持续提升:通过企业实际项目实训,全面提升就业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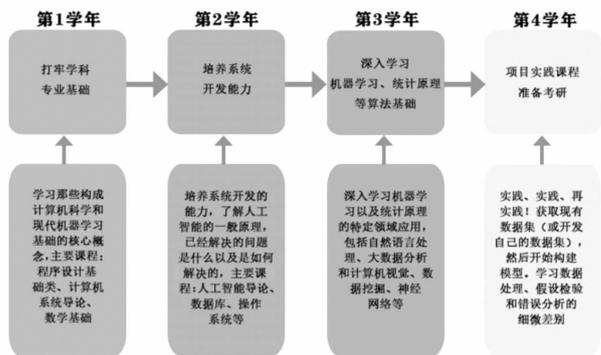


图3 全程全链条式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图

日常教学中注重深化教学内容改革,创新教学模式,确保教学质量的提高。为了适应信息社会和行业的快速发展,要求行业人士和学科专家参与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在2022版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修订过程中,百度等行业、企业的专家全程参加了该版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在传统教学的基础上,采用案例分析、任务驱动、小组讨论等多种教学方式;采用真实的企业项目、行业经典案例,依项目功能划分模块、依据模块组织知识,面向工作过程依据企业真实组织分配角色、依据项目实际开发流程实施教学。采用形成性评价(期末考核、实践报告等)与过程性评价(案例实施过程中的具体表现)的考核方式,并通过鼓励学生参加学科竞赛、项目开发和参与教师科研等将职业与创新能力纳入考核体系,培养学生的组织管理、团队协作和自主学习能力。

推进教学方法改革,引导学生主动、有效学习。在“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教学理念下,注重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和综合运用能力,引导学生主动学习,通过教学方法的改进带动学习方式的改变,要求学生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动手实践等方式完成课后作业,提高对关键知识的理解与掌握,学生从被动式的接受逐渐向主动参与转变。

(三)以强化应用为举措,重构实践教学体系

梳理整合实践教学各环节要素,构建了实践教学目标、教学环节、学科基础、专业技能、创新教育相互衔接的多元化实践教学体系,并与理论教学体系

相辅相成,成为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桥梁。

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需要学生综合运用计算机、电子信息、自动化等学科的知识,更侧重于应用型研究和实践,需要为地方培养有一定综合能力的应用型人才。所以,在课程设置上,采用阶梯式实践教学体系(如图4),把科研项目、企业项目分模块巧妙地穿插进实践教学的过程中,提升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解决实际应用场景中问题的能力。比如,引入实际生活生产中配置药品的情景,结合配置药品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带领学生分析如何高效配置药品,利用该专业课程中所学的知识点或技能如何有效地规避问题、如何减少差错率、如何提高配置药品的智能化程度。通过举一反三,促进学生发散思维、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图4 阶梯式实践教学体系图

(四)以实际(生产)项目为教学案例,产教融合 强能力

在教学实践的过程中,由教师进行引导,让学生参与企业的合作项目。其中包括与企业共同研发的项目“医用智能配药机”,该项目经河南省人民医院等多家三甲以上医院应用,效果良好。与北京来驾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开发的“共享电动汽车运营管理平台”,为郑州市城管局开发的“基于生物电子标识的城市养犬管理数据平台”、为国家体育总局开发的“自行车运动员机能状态数据采集及分析平台”等,这些项目的成功运行不仅丰富了实际教学案例,也进一步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了学生的参与度,铺设了产教深度融合、专业特色发展之路。目前,由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牵头,与中原鲲鹏生态创新中心合作,成立了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鲲鹏产业学院,期待在大数据与云计算、鲲鹏移植应用等方面开展合作,校企共建专业、共担课程、共享师资。一直遵循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接轨的原则,深度开展产教融合,对接产业需求,培养能可持续发展的、高质量就业的、具有一定学习能力的学生。

在课堂教学中,注重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以提高学生的达成度。在设计任务时结合教师参与的实

际项目让学生进行拓展训练,项目选取的是课程组设计的一款智能化产品——医用智能配药机。目前静脉用药调配中心主要靠配药人员使用注射器配液,劳动强度大,效率低,急需一种可以缓解劳动强度,提升工作效率的机器。基于 STC15F2K60S2 单片机配合上位机系统做出的一套新型医用蠕动泵配液机。该医用智能配药机是依据“药品集中配置理论”模型和“静脉用药配置工艺标准化”概念研发而成,能够通过无线模块多机联合使用,具有快速、精准、安全、轻松配药的优点。可以把项目的软件部分提取过来让学生进行创新训练。

与东方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河南云和数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和河南数字经济产业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等 15 家公司签订实习合作协议,在实习、实践的教学任务中展开合作。除此之外,邀请企业专家进校园,作报告、兼职授课、实行预签式培养、顶岗实习等,培养更贴近企业需求人才。智能科学与技术系 2020 年和河南云和数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联合申报并获批河南省云和数据校外大学生实践实训基地,2021 年与东方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作申报并获批河南省大学生校外实践基地——河南省新工科(智能科学与技术)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进一步促进了教学与产业发展的紧密结合,使专业优势逐步得到进一步发挥。

(五)以 OBE 理念为指导,改进课程教学

以提高学生的达成度为目标,提供的设计任务结合教师所参与的实际项目,遵循学生的自身特点,同时注重提升学生思维创新能力,充分挖掘学生的创新创业潜力。根据“一主线、二基础、三支柱、四实践”的课程体系规划,把智能配药机控制系统和空中机器人等的实训案例进行任务划分,每个任务对应课程相关的知识点,使学生很容易理解课程中学习的知识点与实际中的应用对接,在加深对知识的理解的同时增强实践动手能力,并能利用已学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最后根据学生的反馈再反哺专业课程体系,使课程教学得到持续改进。

坚持成果导向教育的教学理念,以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为达成度,并创设具体的生产生活情境对教学内容进行设计,提高学生分析、提出假设、解决问题的能力,初步具备创造性思维的能力。因此,基于此情景设计了智能配药机控制系统和空中机器人等作为实训项目案例,根据专业课程体系规划,把相关课程中的知识点于与项目进行有效的融合,让学生边学边做,在

实践中加深对知识的理解,综合利用已学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在深入研究和综合分析智能配药机控制系统和空中机器人需要实现的相关功能所对应的知识结构后,融合了 8 个子模块于综合项目中,涵盖了对应的 8 门课程的知识,如表 1 所示。

表 1 课程模块化教学任务表

项目任务模块	对应课程
模块一、界面设计	Andriod 开发基础
模块二、网络通信	计算机网络
模块三、指令管理	C 语言程序设计
模块四、系统模块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模块五、压力测试	传感器原理及应用
模块六、主板系统	电子电路基础
模块七、数据处理	数据库原理及应用
模块八、电机模块	信号与信号处理

三、结合课程思政开展产教融合

(一)以产教融合为基础,进行课程内容重构

在产教融合的背景下,构建全面系统的课程思政体系,首先需要将产业项目融入课程内容中,对课程内容进行重构。例如,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标准的基础上,课程“计算机视觉”通过导入产教融合、企业真实项目“基于深度学习的无人机风电叶片巡检技术”项目,将该项目与图形图像处理相关技术内容相结合,重构课程内容,使产业项目与课程教学内容灵活对接并融为一体。重构后的课程内容包括五大模块,即图形图像采集模块、数据预处理模块、模型训练模块、模型部署模块和缺陷检测模块,学生可以全面了解计算机视觉的各个方面,并将其应用到实际的产业项目中。此外,根据重构后的课程内容,将企业真实项目分模块贯穿整个教学过程,并在重构内容中融入思政元素,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推进“三全育人”。

为了充分利用企业资源,可以邀请企业专家参与课程设计和教学,注重教学内容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通过与企业的合作,可以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此外,企业专家的参与还可以为学生提供职业规划建议,提升学生的职业竞争力。

(二)以团队协作为途径,融入实践教育理念

在开展“产教融合”教学的过程中,要以学生为施教主体,充分考虑学生的需求,充分发挥产教融合的优势,保证育人效果。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对学生的实践过程进行指导,也可以让学生相互协作、相互配合、相互借鉴,及时分享实践感悟。通过合作

学习,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课程内容,提升学习效率,并且培养自己的团队协作能力。此外,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提高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创新能力。

(三)以项目实践为契机,增进师生交流互动

教师在组织学生进行实践时,应将结果与过程统筹结合完成对学生的评价,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职业观、价值观。教师开展现代产教融合教学时要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充分把握学生的心理状态,积极与学生进行交流和互动,可以依据学生能力、素质、喜好、优缺点的不同,让学生进行的分组合作,分配不同的教学任务,在提升学生学习效率的同时保证学习效果。通过应用实践活动,学生可以更好地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应用,并且在实践过程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高自己的实践能力。此外,教师还可以通过应用实践活动,增进师生之间的交流互动,促进学生的自我认知和自我提升。

在产教融合过程中,引入新的教学方法和技术手段,如在线课程和虚拟实验室等,以提高课程质量和教学效果。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各种新的教学方法和手段逐渐被应用到高校教学中。利用这些新的教学手段,可以提高课程的吸引力和趣味性,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进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和成绩。

四、教学效果

(一)贴近产业一线实施专业教学,学生学习兴趣浓郁

为了让学生能够“动起来”,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对接人工智能、软件开发等核心岗位要求和任务特点,重构6门专业核心课程,将教学任务项目化。校企共建校内项目工作室和校外生产性实训基地,遴选开发20多个生产性项目,有效解决真实项目教学资源短缺问题。

通过对智能配药机控制系统和空中机器人的分析,引导学生注重身边存在的实际需求,培养学生的创新性思维,通过程序调试,测试机器的功能等过程,让学生有满满的成就感,也会极大的激发他们自主学习的兴趣和对专业知识领域的探索欲望。利用以学生为中心的课中授课,有效解决了学生的疑问,培养了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从而提升课程的高阶性。与此同时,增加课程的创新性、实践性、趣味性、挑战度,让学生从自己动手完成实验的过程中对知识与技能融会贯通^[7]。实验教学通过形象直观的实验过程调动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加深了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也培养了学生的实践动

手能力和创新思维。

(二)实践创新能力增强,国家级、省级竞赛频频获奖

学校师生实践创新能力均得到显著提升,获得各类教育教学比赛奖励,取得的成绩得到省市媒体报道。学生在各级各类学科竞赛中表现优秀,在近两届“机器人”“挑战杯”“互联网+”等大赛中,学校连创佳绩,多项作品入围并获奖;三年累计获得各级各类国家级学科竞赛一等奖60余项,二等奖85项,三等奖近百项,充分显示了学校的实力和水平,实践创新能力逐年提升,如图5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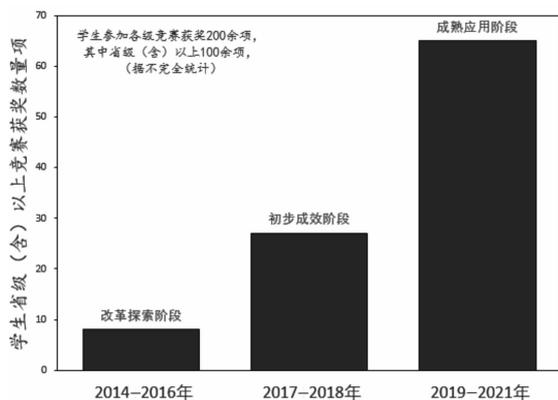


图5 学生竞赛获奖变化图

五、结语

为满足产业对信息技术应用型创新人才“厚基础、强实践”的需求,基于产业需求优化理论课程体系的思路,构建了基于产教融合的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的课程体系。本文基于地方产业经济需求,设计了5项课程体系的构建措施,探索了基于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特点的产教融合人才模式。从而有效解决了教学与产业发展结合不够紧密、专业特色与地方产业难以实现对接的途径等问题,为更好地开展产教融合工作,培养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应用型本科人才提供借鉴思路。

参考文献:

- [1]黄继海,刘秋菊.新工科背景下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课程体系建设研究[J].软件导刊,2020(11):252-255.
- [2]张其林,赵永标,项东升.地方本科高校IT类专业产教融合人才培养[J].计算机时代,2021(9):112-115,119.
- [3]郭媛,敬世伟,魏连锁,等.“新工科”建设背景下地方高校产学研合作协同育人模式的研究[J].高师理科学刊,2019,39(6):85-88.
- [4]徐晓飞,沈毅,钟诗胜.我国高校新工科建设与教育模式创新实践的探索与思考[J].计算机教育,2021(2):99-103.

(下转第110页)

产教融合背景下新型电商人才培养路径研究

陈 华,白卫星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传媒学院,郑州 河南 450044)

摘要:关注电商新业态发展趋势下电商人才需求与跨专业人才培养路径变化,在梳理电商特色模式现状及问题的同时,探讨产教融合下构建电商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为研究电商人才培养及产教融合中存在的问题提供对策和措施。

关键词:产教融合;电商人才;培养路径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3.04.018

中图分类号:G712;F713.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3)04-0105-06

电商新生态已然成为我国经济的新动能。电商新生态有几个工程,第一是电商示范平台、第二是拳头产品上线、第三是转型打造、第四是电商跨境升级、第五是电商惠农。

2020年上半年起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官方政策《关于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20]16号),并多次指出要充分发挥直播带货的精准对接消费需求的特点,鼓励外贸企业充分利用的网上销售以及电商直播带货和场景线上体验等各种新业态及模式,大力发展促进线上与线下的融合与发展。

截至2021年12月,中国电子商务直播用户达到3.88亿互联网用户,对比2020年初增长39%。疫情三年以来,伴随全球市场脚步,大陆国内市场中尤其是社交媒体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社交媒体与跨境贸易展开合作推出跨境电商的相关直播业务。中国电子商务市场有望突破1000亿元。作为新型消费模式,直播电商体量全面爆发增长,同时直播助农也开始成为主流,随着直播领域政府全面入场,直播涉及领域越来越广泛。

一、产教融合背景下新型电商人才现状

(一)电商新模式导致电商人才缺乏

跨境电商人才缺乏的重要原因与行业转变有

关。传统电商模式是B2B,属于批量采购,跨境电商属于新型贸易模式是B2C,属于零售行为模式。由于消费对象在习惯行为和整体流程上的改变,要求消费技能也发生较大改变。随着跨境电商的迅速发展,网络平台商品展示上国内外要求的差异,加上语种与语言习惯的限制,电商行业的门槛进一步提高。电商平台、模式和流程的迅速更新与变化的同时,学校人才培养方案与课程体系却未能及时更新,使得人才与市场的需求相互脱节,最终导致了人才的缺乏与错位。

(二)现有电商人才类型与市场需求不匹配

首先,在保持对传统电子商务人才需求的基础上也产生了大量新需求。易观国际发表于2021年中国电子商务研究报告指出:当前新形势下出迫切需要新的商务趋势,其中46.94%的企业承认需要借助网络或电子商务平台来丰富自己的社区零售。其次,电子商务、智能物流等也在寻求新型商务模式的快速发展,并面临由于缺乏新型电商产业等因素的影响面临诸多困难。其中新职位和旧职位的变动加速了对知识和能力的需求。当下诸多企业面试通常要求求职者具备短片拍摄制作能力,并在规划或拍摄完成后编写脚本。最后,更多公司也着重强调电子商务或电商整体的有效运作及综合能力,要求

收稿日期:2023-06-03

基金项目:河南省重点研发与推广专项(软科学研究)项目“电商新生态背景下产教融合模式创新耦合路径研究”(212400410328)

作者简介:陈华(1978—),女,河南郑州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传媒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新媒体理论及当代文化。

操作者在掌握新技术新设备的同时,不仅需要熟悉平台操作,还要具备后台抓取智能大数据的能力,并持有国际视野及娴熟的英语表达能力。任何行业人才都需要经历初级、中级与高级这三个阶段,然而对照一下招聘的内容要求,当下更多企业需要的人才已是具备专业知识和技能且有经验的中、高级人才。这就出现了以下的悖论:中高级人才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经验去磨炼,无法速成;而用人单位招聘时却常常直接跳过初级直接锚定中高级人才。国内的新型电商兴起将近5年左右,与电商的从业人员或人才的培养需要一定周期形成错位,造成现有人才类型与市场之间需求不匹配。

(三)人才培养体系与电商行业发展速度不一致

随着移动技术的不断升级,一方面是当前市场上新型电商行业呈现爆发式增长,另一方面有经验的电商从业人员缺口明显。人才培养体系与市场需求难以相适应,尤其是二者的发展速度不一致导致的人才缺口问题尤为突出,导致高薪也难求电商人才的尴尬境地。

(四)缺乏准确有效的校企联合人才培养

由于新型电商行业与电商市场的长期共生性,即使电商渠道、媒介、行业规则等会渐渐变化,但电商自身本质属性并不会改变。这同时也意味着,新型电商所需的人才是电商市场长期的重要“元素”,并且不可替代。各地新型电商虽然有加紧人才引进到培养的自觉行为,但由于电商发展和高校人才培养目标不完全一致,校企人才培养的周期相对较长;相对企业来说,时间与金钱成本较高,也导致很多中小企业不愿参与其中。另外,电商人才的培养需要各地政府或行业的引导,政府要从多方政策入手,行业也要牵头有能力的企业与高校对接,使电商行业和高校能从资源到资金甚至宣传能得到更有力的保障,真正推动专业与人才链和产业链的同频共振。

(五)人才培养体系不够完善

电商是跨专业的学科,尤其是跨境电商和新媒体专业,至少要掌握电商、外语、贸易等多学科领域的基本知识与技能。跨境电商专业和新媒体等都是近几年新增设的专业,相关的人才培养方案处在不断完善阶段,因而会出现人才培养方案目标定位不够清晰、师资的定位和整合有待加强、实用权威教材的到位等相关问题,直接影响校企合作开展的深度与广度,不利于对于产教融合背景下电商人才的培养体系的形成与完善。

二、产教融合背景下的新型电商人才培养问题

目前,我国电商行业处于迅速增长阶段,跨境电

商和电商直播等虽只经过短短几年的发展,但无论是商品的交易额还是活跃的主播数量,无论是网络平台开直播的场次、上架的商品数,还是观看的人次都在快速增长。与此同时,国内各大院校尤其是综合性高校也关注到网上商务平台及整体趋势,从教育部公布的2022年本科专业招生成绩来看,跨境电商、新媒体已成为高校招生的热点,自然新型电商人才培养也面临诸多问题。^[1]

(一)人才培养机制不完善

根据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发布的《2021年度中国电子商务人才状况调查报告》,人才问题持续8年作为电商企业首要问题稳居榜首,中国服务贸易协会调研中看到企业发展压力的主要因素人才问题占65.35%,远抛市场竞争和供应链诸多其他因素。

如何将各相关专业的课程资源有效整合和充分利用,推进电商学院的建设和发展一直是困扰人才培养的大问题。虽然中国传统电商的发展历史比较久远,但人才培养机制却不够完善,多数电子商务人才培养模式特别是新型跨境电商教学仍停留在教学+平台操作阶段,对交易技能和技术知识的跨学科综合培训非常有限。

(二)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定位不准确

在人才培养中,现有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缺乏明确的地域性,再加上网络交易平台更新速度快,书本知识更新和迭代相对滞后;多数高校人才培养方案中缺乏专业课程的规划和组织,实际教学中认识不到位,教育资源的不足等都限制了商务平台整体的基本应用。跨境电商和直播电商人才培养方案急需按照行业发展现状和趋势及时完善改进,并尽早投入使用。

(三)人才培养实践教学体系缺乏有效融合机制

实践教学体系中,校企合作期望以提高学生运营岗位技能和提升创业能力为核心目标,打造真实电商实践生态圈,通过将电商的多种形态整合为直播专创工作室,开展全闭环实训教学,助推高校在产教融合创新也包括在人才培养模式、专业教学、就业创业等方面进行创新和融合。在电商实践教学基地,为培养实战型的电商创新创业人才,企业或搭建完整直播实训基地,需要多方联动,各方均需提供强有力的保证。产教融合本质上是政府支持,企业与高校或培训机构共同完成的培养新模式。但在实际操作中存在双方诉求和着力点不一致的情况,也是需要平衡和解决的问题。

(四)电商师资队伍亟须加强校企深度融合

电商人才缺口较大,但依靠高校教育出来的知

识与技能是远远不能满足企业与市场需求的。当下的高校,教师和引进的人才都是博士,学历高科研能力较强,但实战经验比较薄弱,尤其是在电商运营平台或实际操作能力上。虽然一些高校会选派教师去企业进行实际锻炼,但由于评价系统不够完善,导致脱岗的实际效果和行业知名企业的选择和把控上有待检验。其次,校企开放办学,面向社会企业聘请行业导师,借助政校行企各方力量协同育人,不断探索新形势下产教双方师资的融合培训体系,同时在评价体系方面建立相应的标准与机制,进一步保证和推进产教的深度融合。

(五) 电商人才专项技能培训标准化有待加强

传统电商绩效性强,高校学校课堂上只能为学生提供电子商务的模拟环境,缺乏真正的实战性。结合新时期发展,校企合作需要调整优化专业结构和人才培养结构,高校跨境平台无法产生真正的订单,没有实际的第三方。目前产学研结合中,校企合作对所有或大部分直播电商及相关电子商务工作能力培养的深度和广度不够。在深入的人才培养过程中,容易引发许多不可避免的社会问题和管理问题。如何规范化推进技能培训,需要有相关的考核与制度相配套。

(六) 电商专业人才培养路径及办学评价体系更需多元化

直播电商或电商合作主要以联合专业课程或研究性课程形式出现在课程教学计划中,无法贯穿于电商或直播等商务人才培养的全过程。现有的校企合作模式包括企业培训课程、导师工作室和资源共享院校实习订单,资源整合尚处于起步阶段,没有形成双赢的模式。新形势下,培养真正的电商或直播类电商人才尤其是跨境商务人才都只能依托学校作为第一教育的主要出发点。创设真正的工作环境加强校企合作,实现电子商务产学研结合,使理论教学融入实际是当下面需要面对的问题。由于电商的独特性和时代性,全国针对电商尤其是直播职业扶持政策也相继出台。以往一线城市的引才模式中,大城市大都紧盯高学历、专家人才、学术学者、专业技能人才,卖力开出条件以期人才引进。新形势下,电商直播人才也成为各地方争追捧的对象,也显示了时代发展下人才观念的多元,相应的,电商专业人才培养及办学评价体系更需多元化。

三、产教融合背景下新型电商人才培养路径

当下发展中跨境电商中人才培养模式当然是以共赢为基本标准。学校与用人单位首先要有双向信息与资源的有效沟通:学校必备匹配的师资和本地生源,用人单位输出相应的电商技术或项目建设必

备的场、景、物等,建立标准的培养机制和动态的校企机制,将校方的信息和教育资源整合,并针对教育的实际需求和计划,对实际开设的电商人才培养课程的应用评估体系进行合理化改造。^[2]

(一) 探索学院改革模式,实现资源整合,构建产教融合下的电商人才培养体系

2020年起,直播电商的全面上位,使得直播电商产业及企业的融合更加深入,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足够的基础环境。直播助农开始成为电商主流,直播领域政府全面入场。后疫情时代的消散,大众消费习惯的改变也加速了更多的企业选择电商模式的进程,生产与新型商业模式的突变,造成供给侧与需求侧链接更紧密和快捷,并产生多方位黏合性。有权威研究机构预计,伴随5G时代的呼啸而来,电商直播效益将会在突破万亿元级市场规模后不断飙升。

站在培育人才的教育机构等视角,建立区域经济及其结构调整与产业快速发展整体趋势,跨境人才培养的新需求,加大专业技术人才和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力度,以创业学院为主导,联合其他学院共同培育数字创业新风。通过职业技能数据分析建立一套职业技能标准。

表1 电商人才职业能力一览表

类型	主要技能
语言表达能力	良好语言(包括多语种)理解表达、准确描述产品、熟悉掌握当地惯用表达及时在线沟通、正确理解问题应对自如
电商运营能力	逻辑思维能力、协调能力、规划能力、产品策划能力、市场推广、数据分析、成本意识与监控
市场分析能力	掌握电商规则、市场调研、竞品分析、用户画像
电商营销能力	产品布局、网络销售、整体策划执行、商品推广、商品运营、数据分析、网络编辑前端及后台设计

从表1可以看出电商人才培养与教学必须是以行业需求为导向,结合实际,开展实践教学的新形势,实现学生的角色转变。针对电商企业新趋势,邀请业内知名导师进行指导教学,设立专门的企业实践基金,为学生提供有效支持,同时尝试与业内专家合作完成媒体行业大数据行业的研究报告和分析。利用网络平台,开展有针对性的个性化培训是产教融合的大趋势。

总之,产教融合背景下的电商人才培养体系,首先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注意电商课程体系与新形势课程思政相结合,强化新常态下课程思政和三观教育;其次要以能力增进为主线,推进工学结合、知行合一,实施分层次和精细化人才培养,实现人才培养质量的全面提高;最后还要以提高质量为核心,优化完善课程体系,将职业道德、核心素养、工匠精神

等内容融入课程体系,改革教学组织形式、加快信息化课程资源建设,在专业核心课程中全面推行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进一步突出实战性。

(二)完善人才培养体系,衔接职业教育“1+X”证书政策,开发校企“课+赛+证”合作课程体系

高校可以依据行业、企业技术标准及国际通行的职业资格标准,结合本地地域经济发展需求,深度进行产教融合,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探索以项目为引领,以工作室为平台,实施“底层互选、中层共享、顶层融合”的课程体系,体现分层次和精细化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现人才培养质量的全面提高。

推动专业课程体系改革,以创新能力引导电商特别是跨境电子商务实践和文理结合课程,添加跨境电子商务政策和电子商务团队运营规范管理电子商务业务策划课程,校企合作开发跨境电子商务专业课程和评估方法,构建培养人、理念、创业等跨境电子商务应用要素的综合课程体系,构建新型教学体系。

建立校内外培训职业化模式,建立跨院校跨专业的专业培训,提高学生专业能力,把控从商品介绍到与消费者的互动规范化,尽可能从专业视角对产品或商品进行全面、系统化讲解与介绍。职业院校应将1+X认证研究标准与人力资源需求相结合,在课程设置上采用信息教学资源进行模块化混合教学改革,以符合教师与学生逻辑能力的新课程与教学服务等资源相结合;教学内容基于跨境电子商务认证,以及认证1+X增强发展能力对于学生能力的培养。事实证明,仅依靠传统的课程规划,已经不能满足电子商务人才的多样化培养需求。课程需要有效结合新的技术岗位信息、能力和素质三个维度的要求,这也要求高校教师要与业界专家合作共同,针对未来工作的实际情况,能从研究开发相应的项目教学内容到实施项目教学方法;实施项目教学设计,确保学生与专业需求;并在指导学生参与相关的系列竞赛,如国际创业技能竞赛及网上的竞赛,让学生在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等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类比赛适时参与竞争和磨炼。

(三)加快专项工作室建设,完备实训融合体系,增强电商的实战化模式

依据国内领先的规范培训体系IVISION和跨境电子商务平台创建创新运营中心,旨在建立电子商务与教育整合的新模式,逐步完善学校培养体系,让学生直接连接到移动互联网和新的模型平台。同时再还可以充分利用与企业需求直接相关的各种教学和网络资源,开展常规化与数字化相结合教学改革,

构建校内课程与校外特别是企业课程相结合的专项工作室等实训教学体系。通过教学过程与实践过程相结合,实现市场实践与商务实践、基本功培训与专项技能培训等产学研真正相结合,最终形成仿真的环境和项目运作。

我们以电商中直播电商的产教融合创新来看教学变革。直播电商在2020年迎来井喷式销售,由于2021年疫情催生出“网上云经济”让直播带货火爆,直播人才一时间也被推上了风口浪尖,随之也催生出相关高校一些人才培养和产教融合的新思路。有高校实时组建了直播电商相关学院,有高校也尝试在相关专业增加了直播电商的课程,还有资深高校播音与主持专业和行业结合,直接线上与直播行业讨论专业趋势与发展,以及相关人才培养新思路。

电商直播带货已步入鼎盛期,据专业咨询公司数据显示,在2021年的中国电商直播业整体规模已经达4338亿元,当时专家就预测2022年后突破9000亿元。在后疫情的背景下,由于实体经济所受到的震荡,电商直播对实体经济将起到至关重要的推进作用。另外,高校联合直播带货在扶贫各公益类型中的出色表现,其对脱贫攻坚,精准扶贫的作用不容小觑。

应该说所有新兴行业的发展,都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都会经历先“自发”然后“自觉”的一个过程。自觉阶段通常依赖于各行业自身的人才培养,例如,像曾经的头部主播李佳琦、薇娅这些顶级网红,很多所谓的头部主播或关键意见领袖并非学校培养而来,但行业和个人若要取得更大发展,走得更长远,即:若要更加专业化和职业化,达到规范与规模化,必然离不开高校的加持,这就是其背后偶然中的必然。

对于新型电商交易平台,大家的关注点都在台前的主播身上,而直播一次完整的带货是一个强大团队在发挥作用;一个成功主播的背后往往有完整的流程及各部门统筹协调。电商直播行业缺人才,不仅仅缺优秀的带货主播,更缺少大量各部门的专业人才,例如广告行业的文案策划、新媒体和营销行业的运营人才等。有数据显示,受疫情影响传统行业招聘需求持续低迷,而直播行业的招聘需求却逆势增长呈现之前的近两倍,平均招聘薪酬月薪一万元,市场的需求度也可见一斑。服务社会一直是地方高校的核心职能,积极了解和应对这种市场需求的存在是高校不可回避的责任。

产教融合是政府政策支持,校企联合培养的新模式。由于实际执行中存在多方诉求和着力点不统

一的情况,行业中企业追求短平快、投入产出比高,人才一专多能等,而高校严格按照人才培养计划、注重教学,注重学生自身发展规律。可由双方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整合完善各方资源,形成文字协议,形成服务的购买方式,出具解决方案或共同建设专业教学公共服务平台,探索新的产教融合模式。

中国服务贸易协会总结出“政行学用”多方参与方式值得借鉴:以行业人才标准委员会制定的行业标准为“参照”,以教学质量委员会开发教学内容、教学平台、认证的教师资格为依托,协调协会与跨境电商会员企业开放内部测试或真实平台技能实操,以及与地方政府综试区共建校外教学与产业孵化基地,形成电商人才培养闭环新模式。免费向高校开放教学资源,重点解决高校双师型师资建设、教学内容与产业同步解决高校教材课程老化问题,学生实操仿真平台体验感差和学生实习实训和就业等问题。

(四)打造产教融合的电商双师型教学团队,探索新模式下的师资培训体系

产教融合就是要打破专业界限,优化师资队伍,融合构建师资共同体互补机制。在学院与企业合开始,学校教师联合业界专家可以形成交流互助教学团队,在常态化教学、实践教学、技能大赛、创新创业项目教学、顶岗实习等不同层次和内容,分工协作,积极联动,建立导师制等个性化教学。^[3]

新兴行业的发展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基础性的工作往往是高校承担完成的。高校内在吸引具有电商经验的一线高素质人才培训现有教师的同时,实施教师招聘全日制培训计划;另一方面,促进学校教师与企业高技能人才的双向沟通;符合校企合作,把握学校产业发展的新形势,学习新的企业标准;符合校企合作,专业教师,通过轮岗换岗,分批回归企业;继续组织教师,培养具有行业技术开发和企业资质的留学等国际化视野教师,培养两支不同的队伍。坚持两手抓,一方面为电商龙头企业建立兼职教师队伍,提高兼职教师的就业能力;另一方面建立兼职教师队伍,教师队伍建设技术建设、教材建设,提高学生技术能力,教学质量培训,就业服务评估,教师业务能力培养,充分明确学生专业水平及配套能力,提前预判与衔接社会就业对毕业生的需求,真正达到校企有效互动与共建。

(五)推进电商技能培训的规范化,建立新型教学质量考核和保障机制

根据各自不同发展定位与自身实际,结合现代教育信息化技术,打造互联网+教学质量平台,把教

学的完整过程与重点环节以及相关资源和主体有机整合在一起,形成教学过程和结果完整的监督评价体系,构建形成一个分工明确、教学环节环环相扣、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良性闭环,达到教学管理整体过程的可视化与实时化、现代化、有效化的线上线下新交互。尤其在专业核心课方面,优先使用筛选推荐教材,严格按照专业课程标准教学,利用互联网平台进行统一考试,实现教考分离的过程化、信息化考核,保障教学效果的真实有效性。

(六)研究直播电商生态与专业人才培养的耦合路径,推进多元化人才培养的办学评价体系

国新办针对新形势下电子商务人才尤其是跨境电商人才培养的要求,建立以企业教师为考核主体,结合“专业技术素质提升1+X”能力认证等方面的考核体系,将跨境电子商务考试与企业专业考试和教师考试相结合,构建立体化考试体系,利用网络课程平台及当下社交媒体平台,通过网络后台数据分析调整教学过程,对教学效果进行分析适时调整,构建课前和课后考核体系。^[4]

基于对电商或直播等电子商务运营的重视,建立新的运营课程绩效评估体系,设计详细的运营要求和评价标准,对每个课程的运营绩效进行必要的解答,在实现最终评估的同时兼顾流程。同时需要了解行业和企业对于这些毕业生的评估,内容包括:应届毕业生的资格评估和就业情况、年度毕业生跟踪计划、毕业五年后的情况分析,并基于这些跟踪研究分析出相应的成果。

电商各行业的发展离不开真正有实力的人才,刻板印象中大家都认为职业化教育很难造就行业顶流,但现实恰恰证明这样的观念已过时。在新型电商行业中的佼佼者,为数不多的领军人物往往都是懂得顺势而为的普通人。新形势下电商众多行业所需要的是大量专业基础性人才,这些部门的大多数普通员工恰恰都是当下高校大批量培养出来的,或者可以说是定制培养出来的,这也正是电商新生态背景下产教融合创新与改革的意义所在,也值得我们继续不断地探讨。

参考文献:

- [1] 喻君洁. 我国直播电商发展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策略[J]. 商展经济, 2021(24): 32-34.
- [2] 聂昀秋, 马晓君, 刘云飞. 跨境电商产业学院建立探究: 以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大连片区为例[J]. 大连大学学报, 2022, 43(6): 74-84.
- [3] 苏森. 产教融合视域下高职电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研究

Research on the Cultivation Path of E - commerce Talen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CHEN Hua, BAI Weixing

(School of Culture Communicootion,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While sorting out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e - commerce characteristic models, it explores the construction of a long - term mechanism for e - commerce talent cultivation under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and provides countermeasures and measures for studying the problems in e - commerce talent cultivation and industry education integration.

Key words: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e - commerce talents; cultivation Path

(上接第 104 页)

[5] 高巍巍. 地方应用本科院校产出导向、产教融合人才培养体系实 [J]. 计算机教育, 2022(12): 207 - 207.

(责任编辑 许峻)

Practical Exploratio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urriculum System of Intellig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pecialty Based on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SU Yu¹, HUANG Jihai¹, LIU Qiuju¹, LI Jingzhu²

(1.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2. Henan University of Animal Husbandry and Econom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In response to the insufficient integration of teaching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the difficulty in connecting professional characteristics with local industries, this paper proposes to take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the starting point, talent cultivation as the core, and teaching positioning as the measure. The design principles, standards, and objectives of the talent cultivation system for intellig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jors were studied. Five measur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urriculum system were formulated, and a curriculum system structure for intellig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jors based on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was formed, providing new ideas for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ajors in local application - oriented universities.

Key words: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application - oriented; curriculum system; talent cultivation model

产教融合视域下黄河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策略探析

陈勤香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传媒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要解决当前黄河文化产业的体量小、创新能力弱、产品低端化、整体发展滞后问题,需要开展产教融合,充分发挥政府、行业、企业及高校在文化产业化人才培养、资源开发、创新发展中的优势,构建四位一体的产教融合育人模式。以产教融合实现黄河文化产业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实现产业与教育协同发展、互利共赢。进而扩大黄河文化影响力、辐射力,发挥好黄河文化产业在黄河流域经济增长的引领、带动作用,助力黄河流域经济、文化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产教融合;黄河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四位一体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3.04.019

中图分类号:G712;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3)04-0111-04

新时代背景下,黄河文化必须要坚定走高质量、产业化发展的道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多角度呈现中展现出黄河文化的魅力,带动黄河流域的经济发展,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顺利实现^[1]。当前,黄河文化产业的发展必须要以产教融合为载体,发挥优秀社会、企业和高校的优势,实现黄河文化的高质量发展,为黄河文化产业发展培智赋能。当前,与东部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以创意型为主的文化产业模式相比,黄河文化产业仍处于起步状态^[2]。

一、产教融合在黄河文化产业发展的价值

产教融合是推动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有效举措,使高校及产业行业实现转型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3]。

(一)有助于为黄河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培养高技能人才

文化产业属于产品生产应用型产业,交叉性强,涉及生产、文旅、文创以及各类传统产业。因此,文化产业的发展更需要大量高技能、复合型人才来支撑。在产教融合育人模式下,文化企业可以借助高校专业人才优势,突破企业发展的人才缺乏瓶颈。

一方面可以利用学生已有的专业知识储备,加快高技能人才培养的速度,最大限度地扩大产业人才队伍储备量,摆脱传统文化产业发展中无法大规模培养高质量人才的局限。另一方面,通过校内的专业训练,大量高质量人才进入黄河文化产业队伍,可以促使黄河文化扩大产业规模,也可以在发展合作中激发创新意识,提高产品的质量。

(二)有助于为黄河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文化产业属于资本与技术双重密集型行业,其长远发展离不开技术创新,离不开高技能人才的支持。当前,高校特别是艺术类应用型高校拥有大量受过长期专业训练,熟悉产业发展方向、具有丰富文化产品鉴赏、制作经验,创新意识较强的师资力量。在产教融合过程中,借助这些优秀教育资源,可以为黄河文化产业创新发展提质赋能,激发创新活力,实现文化产品从单纯量变到质、量共变的飞跃。

(三)有助于降低生产经营成本

产教融合模式下,由企业提供软、硬件设备或平台,高校提供厂房、实验室等条件,双方建设联合实验室、实践基地等的模式可以实现教育发展和产业

收稿日期:2022-12-15

基金项目:2022年度河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河南省黄河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2022-ZZJH-365)

作者简介:陈勤香(1977—),女,河南正阳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传媒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高等教育及文化研究。

兴旺的共赢。一方面,企业将部分生产资源转移校园,利用学校提供的厂房、水电等资源及优惠政策开展教学与生产,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生产及经营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另一方面,借助高校内丰富的学生资源,指导学生在实习实训中创造有价值的产品,将其作为商品进行商业运作,降低人工成本,进而提高企业利润。

(四)有助于为黄河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广阔市场

由于历史原因,当前的黄河文化企业大多偏居一隅、影响力偏弱,缺乏有效的发展空间。开展产教融合,可以使文化产业借助学校的师资力量、创新传播平台、学校的积极正面形象进行产品宣传推广,扩大产品影响力,树立高质量的黄河文化产品形象,推动相关文化产品走向更广阔的舞台,使黄河文化精神得到发扬,实现黄河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二、黄河文化产业发展现状

(一)产业人才数量不足、质量不高

人才是第一资源要素,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产业发展的根基。当前,正处于产业转型升级、实现跨越发展关键时期的黄河流域文化产业,面临着文化产业市场不够完善,高技能人才资源不足,甚至原有高技能文化产业类人才“孔雀东南飞”现象。人才储备不足、高技能人才缺失导致黄河文化产业成为人才洼地,阻碍了黄河文化产业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笔者在对黄河流域某产业发展标准草案进行审议中发现,虽然该草案对相关工艺流程有比较全面的规定,但从产业发展宏观层面看,仍存在产业发展系统性不足、发展站位不高的问题,显示出黄河文化产业发展急需高质量人才支撑的现实。

同时,黄河流域一些高校的教育教学尚未完全走出以自我为中心的办学理念,存在着与社会脱节现象。人才培养理念不能很好适应新时期人才需求,学科专业布局不够完善,人才培养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的支撑度不足,与市场结合度不高,导致人才培养质量不高,无法为企业成长提供坚实的智力支撑,助推产业的发展,成为产业发展的发动机和助推剂,适应当前社会对人才的能力要求。

(二)能够引领行业发展的企业不足

从整体上看,当前黄河文化产业体系中多呈现家庭作坊小规模运作的经营形式,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数量不足。根据对2019年新三板文化企业数量统计,符合《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的文化企业共1184家,而黄河流域9省区全部上市文化企业仅有139家,仅仅多于上海一市的134家,远远少

于广东省的199家^[4]。显示出黄河文化产业缺乏足够数量的龙头文化企业带动区域文化产业发展。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数量不足,一方面是由于经济条件有限,限制了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与黄河文化产业人才短缺、无法有力支持产业发展有密切关系。

(三)企业产业发展创新氛围不强

虽然国家和地方都对文化产业发展出台了不少的优惠政策,着力激发文化产业发展的活力。但从目前看,黄河文化企业仍存在发展与市场脱轨,与需求脱节现象;文化产品处于低附加值、高成本率的矛盾状态,严重制约了黄河文化产业健康发展,限制了黄河文化影响力的传播。其根本原因在于企业创新意识不强,无法满足社会对黄河文化产品的高质量需求。多数黄河文化企业属于资金少、规模小、人才少的“三小(少)”型企业,无法提供富有竞争力的条件吸引到具有创新意识的高素质员工。同时,不少企业现有技术工人普遍年龄较大、文化水平不高、自主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缺乏。

(四)企业人才培养动力不足

文化资源在文化产业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5]。黄河流域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为黄河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物质条件。当前,黄河文化产业发展滞后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产业人才培养方面,黄河流域众多文化类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经营者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缺乏足够的人才。由于企业规模小、融资困难,导致不少文化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弱,产品更新、规模扩大、人员培训等方面也受到掣肘,发展步履维艰。整体上看,当前传统的黄河文化经营者多未接受过系统的专业及文化艺术教育,自身阅历、认识水平及发展思路往往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需求。造成生产出来的相关产品缺乏竞争力、企业举步维艰,产品滞销,经营困难,对企业的高质量长远发展形成明显制约,也制约了黄河文化相关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但同时,由于人才培养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与资金,对于大多数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来说,过大的投入会影响企业集中力量生产与销售。因此,他们对自主培养企业发展所需要的后备人才缺乏主动性,培养过程也多遵循传统师徒制模式,缺乏创新性。培养出来的人才数量远远不能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也缺乏足够助推企业健康持续发展的创新意识、能力水平。同时,一些规模以上企业因为自己培养人才时间长、成本较高,积极性不高,再加上自身经济实力较强,更热衷于拿来主义,引进外来人才。

(五) 产品市场拓展能力不足

在市场经济时代,任何行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要有市场支撑。当前,黄河流域的文化产品除了少数与旅游产业结合,走文旅融合发展路线发展较快外,大多数黄河文化企业都存在产品覆盖面窄、影响力小等问题。如在地处黄河流域的H省黄河文化产业中的某特色产业发展的调研中发现,其产品在省内外颇有声誉,广受消费者的欢迎。但在地方政府组织企业扩大规模,向外拓展过程中,这些在当地有一定影响、但省内、国内市场占有率不足的特色文化企业,虽然有向外拓展市场的需求,但由于缺乏相关人才支撑,对走出去、向外扩展产品的不确定性产生恐惧心理,导致产品发展后劲不足、辐射面受限。

三、产教融合推动黄河文化产业发展的实现策略

当前,黄河文化各产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做得比较好的是与旅游业融合的文旅产业,通过与旅游业的有机融合,使黄河文化相关产业得到了极大的关注,取得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打造了嵩山文化产业、河洛盛唐文化产业、关中秦汉文化产业等一批在全国知名度高的文化产业品牌,成为黄河文化产业发展的标杆。但更多的黄河文化产业仍然面临着人才短缺,技术更新不足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走产教融合的道路,依托教育资源,实现产业链、创新链、教育链、人才链“四链联动”,助力黄河文化产业量质并进。

(一) 打破思维惯性,创新产教融合教育理念

当前,不少黄河文化产业产教融合处于一种尴尬的局面,个别规模较大、发展势头较好的企业自身技术、产品结构优势明显,不愿意与高校开展产教融合。而更多的规模较小、有产教融合需求的黄河文化企业则受限于企业体量、纳税额等较低,达不到产教融合企业的认定标准,从制度上无法顺畅和学校进行融合。因此,应当对黄河文化产业校企融合标准进行创新,打破原来的仅以企业规模、产值等作为选择标准。将企业的比较优势、文化价值、社会效益放在评价体系中,使更多的规模小、发展潜力大、社会效益好的黄河文化企业以“大师工作室”“专家工作站”等形式引进校园,有条件的高校甚至可以提供更多优惠的政策,吸引相关产业协会进驻校园,便利开展产教融合教育,借助学校的发展平台及人力、智力资源与协会的统筹发展提高企业及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高人才的培养质量。同时,还应当积极依托黄河文化产业协会、产业联盟等,与有产教融合教

育需求的不同类别高校进行合作,构建教育与产业统筹融合发展新格局。此外,不断完善人才管理机制,创新校内外融合育人模式,促进校内外文化产业人才合理流动。^[6]

(二) 制定符合发展实际的不同层次的产教融合企业认定

产教融合是当前企业高质量发展、高校育人质量提升的重要路径。国家及地方对产教融合都制定了相应的政策,比如发改委等部门从国家层面制定了《国家发改委 教育部关于印发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发改社会[2019]590号),山西、河南等黄河流域省市也制定了《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西省促进产教融合实施方案的通知》(晋政办发[2018]38号)、《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实施意见》(豫政办[2018]47号)等省级层面的政策。这些政策的出台为黄河文化产教融合企业的认定提供了发展依据,有利于不同层级制定相应的产教融合标准。黄河文化产业协会可以与教育机构进行对接,基于产业发展实际,制定符合黄河文化产业不同发展阶段的产教融合标准,全方位促进产教深度融合。

(三) 发挥产业协会优势,创新产教融合模式

产教融合中要破除教育教学评价及激励机制中的阻碍融合的因素,打破传统校企合作中以企业和学校单个对接融合的模式,建立以产业协会与教育部门对接的融合模式,发挥集团作战优势。针对大多数黄河文化企业多为中小微企业的现状,灵活采用“N+N”“1+N”“N+1”等模式,行业协会聚集规模相当、产品类似的企业组成企业合作单位,与相关院校开展产教融合合作。不同的企业根据自己的特色优势在产教融合实践中发挥相应的作用。以协同创新平台建设带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融合发展^[7]。

(四) 明确责权,理顺各方职能

产教融合涉及的范围不仅有学校及企业,还有政府、行业等。各方面在产教融合中有着不同的价值与作用,有不同的诉求,需要履行的职责也各不相同,各方面的相互关系也错综交织。在开展产教融合中需要明确各方责权,理顺各自职能。黄河流域各地方政府要从宏观层面对产教融合的政策方面落实责任,通过财政、税收、金融等工具,为产教融合注入信心,助推产教融合持续发展。各黄河文化产业行业应利用自身资源丰富、行业整体发展方向明确的优势,发挥产教融合的指导作用。企业及学校作为产教融合直接参与者,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明确

融合活动中各方的职责与要求,制定完善的融合规章制度。同时,企业需要利用设备完备、技术熟练与行业发展前景明确优势,对学生开展专业培训,学校需要组织学生积极参与产教融合,为融合活动提供足够的教学场地、人员保证,做好融合活动的安全保障,并对融合活动的过程与质量进行监督检查,保障融合教育符合产业发展需要、符合党的教育方针政策,确保产业融合教育高质量开展。

产教融合是当前高等教育特别是应用型高等教育服务社会需求,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式。黄河文化产业拥有丰富的文化产业资源,但发展时间较短、发展质量不高的问题突出。为了实现黄河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必须开展产教融合。通过社会、行业、企业及高校的密切合作,各司其职,黄河文化类企业不仅能够获得更适合自身发展需求的技术人才,获得大量先进技术和市场信息,更能促进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和长期持续健康发展^[8]。

共同为黄河文化产业发展培养大量的后备人才、注入创新发展活力,实现黄河文化创新性转化、创造性发展,使黄河文化产业更好地担负起传承黄河文化的使命,彰显黄河文化在中华文化的根魂价值。

参考文献:

- [1] 刘佩. 黄河文化保护传承与文旅融合路径研究:以河南省为例[J]. 广西质量监督导报,2021(5):75-76.
- [2] 张胜冰. 我国东西部地区文化产业之特点与发展模式[J]. 民族艺术研究,2006(1):43-49.
- [3] 朱政,张振鹏. 东中西部文化产业发展真的存在差异:基于新三板文化企业成长性综合评价的实证分析[J]. 艺术管理(中英文),2019(4):37-48.
- [4] 阎卫东,王素君,吕文浩. 地方高校产教融合推进内涵式发展的逻辑分析和路径选择[J]. 现代教育管理,2021(6):44-50.
- [5] 林存文,吕庆华. 文化资源禀赋对文化产业发展的影响:基于资源异质的研究视角[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20(8):86-101.
- [6] 韩佳佳. 山东省黄河文化传承与产业化发展路径研究[J]. 人文天下,2017(6):71-74.
- [7] 杨梅,周正柱. 应用型本科高校产教融合政策的推进策略研究:基于政策工具与政策要素的二维分析[J]. 中国高校科技,2022(3):79-84.
- [8] 陈宇红,孙秀茹. 应用型本科教育产教融合的探索[J]. 邢台学院学报,2022(1):170-173.

(责任编辑 许峻)

Analysis on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the Yellow River Cultural Indus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y - Education Integration

CHEN Qinxiang

(College of Media,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To solve the current problems of small size, weak innovation ability, slow overall development, and low - end products in the Yellow River cultural industry,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industry - education integration, fully utilize the advantages of the government, industry, enterpris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cultivation of talents,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build a four - in - one industry - education integration education model. It is needed to achieve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and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the Yellow River cultural industry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and achiev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mutual benefit and win - win results. It is imperative to further expand the influence and radiation of the Yellow River culture, give full play to the leading and driving role of the Yellow River cultural industry in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nd assist in the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culture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Key words: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Yellow River cultural industry;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 four in one

响应面优化绿豆玉米面烧饼的工艺研究

李建新, 陈淑静, 闵玉涛, 孙于庆, 张晓宇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化工食品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为提升烧饼的营养品质,在单因素试验基础上,以绿豆玉米面烧饼产品的气味、口感和结构等作为评价指标,并应用响应面法对原始配方进行工艺优化,得到绿豆玉米面烧饼最佳工艺参数为:面粉150 g,玉米面36 g,绿豆面12 g,水添加量77.5 g,水温32.1 °C,发酵温度33.2 °C,发酵时间42.6 min,在此条件下制作烧饼的感官评价得分为95.6分,与预测值(95.8分)基本一致。

关键词:烧饼;玉米面;绿豆面;单因素试验;响应面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3.04.020

中图分类号:TS21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3)04-0115-05

烧饼是我国北方的特色面点食品之一,不同地区烧饼的制作工艺也有一定的区别,有缙云烧饼、油酥肉火烧、武大郎烧饼、芝麻饼、黄桥烧饼等100多个花样^[1-3],深受消费者欢迎。近些年杂粮类食品脱颖而出,尤其是面点类和糕点类食品,如全麦面包等,受到消费者的青睐^[4]。例如玉米面蕴含丰富的多类亚油酸,能够有效预防一些心脑血管疾病^[5];绿豆具有抗肿瘤、抗氧化、预防糖尿病、降糖降脂、促进人体血液循环等保健功效^[6-9],绿豆与谷物结合可实现氨基酸平衡^[10],提高产品的营养和功能特性^[11]。本实验以面粉为主要原料,在其中添加适量的绿豆玉米面制成烧饼,提升其营养价值,得出绿豆玉米面烧饼的最佳配比,使烧饼成品达到最佳状态。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

小麦粉:郑州金苑面业有限公司;绿豆面、玉米面:市售;干酵母: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食用油:中粮福临门食品营销有限公司;膨松剂、调味料:平顶山市李大厨食品有限公司。

1.2 主要仪器设备

和面机、醒发箱、电烤箱:新麦(无锡)机械有限公司;电子天平:福州华志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1.3 实验方法

1.3.1 烧饼制作工艺

烧饼配方:面粉150 g,酵母2 g,食用油4 g,食盐3 g,膨松剂3 g,水80 g。

制作工艺^[12]:称料→面团调制→发酵→切割擀制整形→醒发→烘烤→冷却→成品。

操作要点:准确称取上述原材料,混合均匀,和面时先低速搅拌1.5 min,改为中速搅拌3 min(搅拌1 min后倒入称好的食用油),置于发酵箱发酵45 min;取出擀制整形,室温下醒发20 min,放入烤箱(上火220 °C,底火210 °C)烘烤10 min,取出室温至冷却,得到成品。

1.3.2 感官评价标准

选择10名感官评价人员(5男5女),根据表1的标准对相应成品的结构、弹性、色泽、气味等进行感官评价,评价总分为100分,最后结果取平均值。

1.3.3 杂粮粉配比

以1.3.1中的配方保持不变,控制杂粮粉质量分别占配方总质量的10%,15%,20%和25%,其中绿豆面与玉米面的比例为1:1不变,依次进行试验。当杂粮粉比例为10%时,烧饼面团柔软性降低,成品中香气不足;当杂粮粉比例为25%时,面团

收稿日期:2023-06-21

基金项目:河南省高校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202011068019X);郑州市科技局科研项目(zkz202118)

作者简介:李建新(1980—),男,回族,河南郑州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化工食品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农产品深加工。

的柔软度极低,弹性较差,难以整形,烘烤后成品虽然杂粮香气充足,但是蓬松度较差;当杂粮粉比例为15%和20%时,面团的柔软度虽然不高,但是能够进行基础整形,烘烤后的成品香气和杂粮香气明显,蓬松度良好。为了提升成品的营养价值,最终选择杂粮粉占比为20%,据此设定玉米面和绿豆面的比例分别为2:1,3:1和4:1,成品感官评价得分见表2。综合以上实验,最终选择玉米面和绿豆面比例为3:1。

表1 绿豆玉米面烧饼感官评分表

项目	评价标准	分值
结构 (15分)	组织细腻,不变形,气孔小且均匀	10~15
	状态一般,稍有变形,气孔分布均匀	5~9
	组织粗糙,变形严重,表面黏手,孔洞不均匀	0~4
弹性 (15分)	柔软且富有弹性,按下能快速复原	10~15
	比较柔软,有一定弹性,按下后基本能复原	5~9
	过于柔软,弹性差,按下后难以复原	0~4
色泽 (20分)	金黄色或黄棕色,颜色均匀	14~20
	泛白或偏棕色,颜色较均匀	7~13
	发黑,发暗,颜色不均匀	0~6
气味 (10分)	有烧饼香气,杂粮香气,无多余异味	7~10
	烧饼香气,杂粮香气较少	4~6
	烧饼香气,杂粮香气难以闻到	0~3
口感 (20分)	有正常烧饼、杂粮口感	14~20
	杂粮味较淡,甜度适中	7~13
	杂粮味寡淡,甜度过高或者过低	0~6
外观 (10分)	蓬松度优良,偏厚偏圆	7~10
	蓬松度一般,厚度不均匀	4~6
	蓬松度较差,过于扁平	0~3
接受度 (10分)	容易接受	8~10
	基本接受	4~7
	难以接受	0~3

表2 玉米面绿豆面不同比例得分

比例	结构	弹性	色泽	气味	口感	外观	接受度	得分
2:1	13	14	18	8	17	9	9	88
3:1	14	14	19	8	18.5	8.5	9	91
4:1	13.5	14	18	8	18	9	9.5	89

1.4 单因素实验设计

在优化绿豆玉米面烧饼传统工艺的试验中,分别选取水添加量、水温、发酵时间和发酵温度4个因素来测试其对绿豆玉米面烧饼的品质影响。

1.4.1 水添加量对绿豆玉米面烧饼品质的影响

按照基础配方不变,控制水温为31℃,发酵时间为45min,发酵温度为34℃,在此基础上设置水添加量(70,75,80,85,90g),研究水的不同添加量对绿豆玉米面烧饼品质的影响,确定适宜的水添加量。

1.4.2 水温对绿豆玉米面烧饼品质的影响

设置加水量80g,发酵时间45min,发酵温度34℃,其他配方保持不变,研究不同水温(27,29,31,33,35℃)对绿豆玉米面烧饼品质的影响,确定适宜的水温。

1.4.3 发酵时间对绿豆玉米面烧饼品质的影响

按照基础配方不变,控制加水量为80g,水温为31℃,发酵温度为34℃,研究不同发酵时间(35,40,45,50,55min)对绿豆玉米面烧饼品质的影响,确定适宜的发酵时间。

1.4.4 发酵温度对绿豆玉米面烧饼品质的影响

按照基础配方不变,控制加水量为80g,水温为31℃,发酵时间为45min,研究不同发酵温度(30,32,34,36,38℃)对绿豆玉米面烧饼品质的影响,确定适宜的发酵温度。

1.5 响应面优化设计

在单因素实验的基础上,以水添加量、水温、发酵时间、发酵温度为响应变量,以感官评分为响应值,在Design Expert 8.0.6上采用Box-Behnken试验设计(BBD)进行响应面分析。响应面试验因素与水平设计如表3所示。

表3 Box-Behnken 因素与水平

水平	因素			
	水添加量/g	水温/℃	发酵时间/min	发酵温度/℃
1	85	33	50	36
0	75	31	45	34
-1	70	29	40	32

1.6 数据处理

利用SPSS26.0进行数据分析与统计,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采用Design-Expert 8.0.6对试验数据进行响应面分析,绘制3D曲面图。

2 结果和分析

2.1 单因素实验结果分析

2.1.1 水添加量对绿豆玉米面烧饼品质的影响

由图1得知,绿豆玉米面烧饼随着水添加量的增加品质出现先增长后下降的趋势。当加水量为70g时,和面后面团硬度较高,夹带有生粉,发酵45min后,面团硬度没有改善,烘烤后成品较为粗糙;当加水量为75g时,和面后面团偏硬,发酵后,整形时可以明显感到面团柔软度的下降,但烘烤过后成品口感良好;当加水量为80g时,面团柔软度较好,接近纯面粉面团,发酵后整形时柔软度变化不大,烘烤过后成品口感良好,有明显的烧饼香气,所得到的感官评分最高;当加水量为85g时,面团柔软度较高,但稍微黏手,发酵后仍未改善,柔软度过高直接影响了整形阶段,烘烤过后成品口感良好,但是烧饼香气略有逊色。

2.1.2 水温对绿豆玉米面烧饼品质的影响

由图2得知,当水温为27℃时,面团稍微变软,发酵45min后柔软度增加,但弹性还是较差;当水温为29℃时,面团柔软度适中,发酵后柔软度良好,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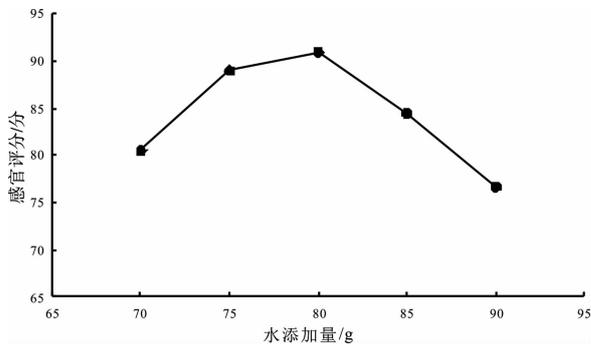


图1 水添加量对绿豆玉米面烧饼品质的影响

弹性一般,烘烤过后成品蓬松度一般,口感良好;当水温为 31 ℃时,面团柔软度良好,发酵后整形弹性保持不变,可拉伸性较高,烘烤过后成品蓬松度好,口感好,所得到的感官评分最高;当水温为 33 ℃时,面团柔软度下降,烘烤后成品蓬松度、口感均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当水温为 35 ℃时,面团柔软度进一步下降,面团发黏,无法整形,烘烤后成品蓬松度、口感较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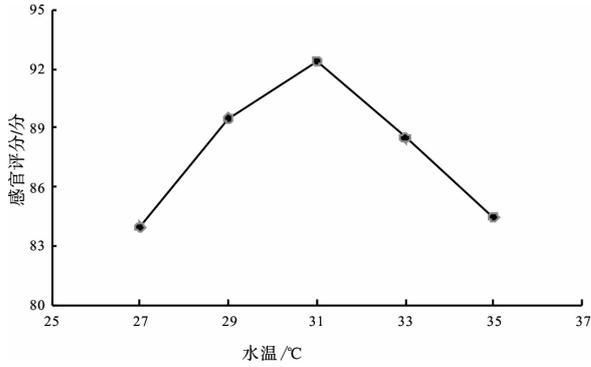


图2 水温对绿豆玉米面烧饼品质的影响

2.1.3 发酵时间对绿豆玉米面烧饼品质的影响

由图3得知,当发酵时间为 35 min 时,面团发硬,烘烤后成品蓬松度、口感较差;当发酵时间为 40 min 时,面团微软,烘烤后成品蓬松度、口感一般;当发酵时间为 45 min 时,面团柔软度好,按下后能复原,烘烤过后成品蓬松度、口感均好,感官评分最高;当发酵时间为 50 min 时,面团柔软度过高,按下后无法复原,难以整形,烘烤后成品蓬松度一般,口感一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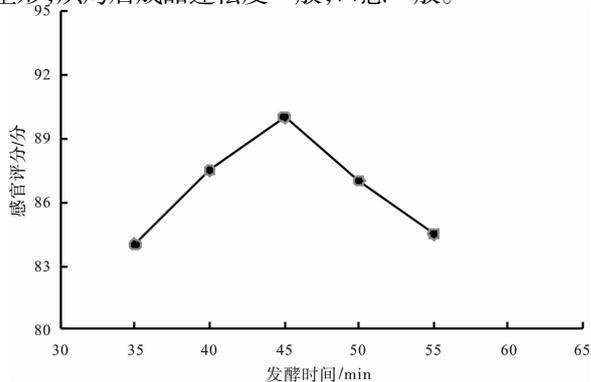


图3 发酵时间对绿豆玉米面烧饼品质的影响

2.1.4 发酵温度对绿豆玉米面烧饼品质的影响

由图4得知,当发酵温度为 30 ℃时,面团没有完全发酵,烘烤后成品蓬松度、口感较差;当发酵温度为 32 ℃时,面团柔软度较好,面团按下无法完全复原,烘烤后成品蓬松度良好,口感一般;当发酵温度为 34 ℃时,面团柔软度、发酵程度均好,烘烤后成品蓬松度、口感达到最佳值,感官评分最高;随着发酵温度上升,面团开始进一步变软,有些塌陷,烘烤后成品蓬松度、口感均开始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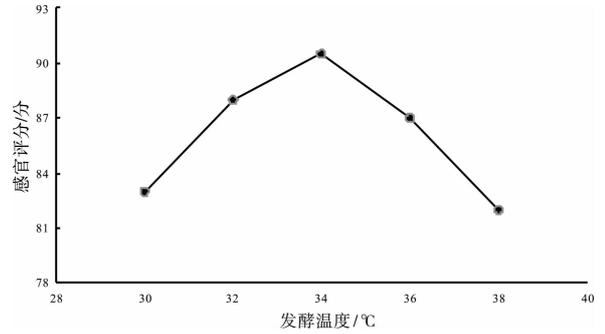


图4 发酵温度对绿豆玉米面烧饼品质的影响

2.2 响应面分析优化结果

根据单因素试验结果,确定较优水平,利用Box - Benhnken 中心组合试验设计,将绿豆玉米面烧饼的感官评分作为响应值进行响应面测试,见表4。

表4 响应面实验设计及结果

实验号	水添加量/g	水温/°C	发酵时间/min	发酵温度/°C	感官评价得分
1	0	0	0	0	96.3
2	1	0	1	0	87.5
3	-1	0	0	-1	81
4	-1	0	-1	0	86
5	-1	1	0	0	89.5
6	0	1	0	1	87
7	1	0	-1	0	82.5
8	0	0	1	-1	79.5
9	0	-1	-1	0	86.5
10	1	-1	0	0	86
11	0	0	0	0	95.4
12	-1	0	0	1	83
13	0	1	-1	0	86
14	0	0	-1	-1	80.5
15	1	0	0	1	80.5
16	1	1	0	0	88
17	0	0	-1	1	79
18	0	1	0	-1	77.5
19	0	0	0	0	96.2
20	1	0	0	-1	82.5
21	0	0	0	0	94.5
22	-1	0	1	0	81
23	0	1	1	0	86
24	0	0	1	1	82.5
25	0	-1	0	-1	84
26	-1	-1	0	0	86.5
27	0	-1	0	1	85
28	0	0	0	0	96.5
29	0	-1	1	0	85.5

以水添加量(A),水温(B),发酵时间(C),发酵温度(D)为响应变量,最终以成品的感官评价得分为响应值,对四种影响因素进行模型拟合,通过 Design Expert 8.0.6 进行分析可以得到模拟回归方程为 $Y = 95.78 + 0.042B + 0.12C + D - 0.25AB + 2.50AC - 1.00AD + 0.25BC + 2.13BD + 1.12CD - 5.01A^2 - 3.33B^2 - 6.45C^2 - 9.01D^2$,结果见表5。

表5 感官评分响应面方差分析结果

方差来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值	P值	
模型	790.49	14	56.46	22.36	< 0.0001	* *
A	0	1	0	0	1	
B	0.021	1	0.021	8.25E-03	0.9289	
C	0.19	1	0.19	0.074	0.7892	
D	12	1	12	4.75	0.0468	*
AB	0.25	1	0.25	0.099	0.7577	
AC	25	1	25	9.9	0.0071	* *
AD	4	1	4	1.58	0.2288	
BC	0.25	1	0.25	0.099	0.7577	
BD	18.06	1	18.06	7.15	0.0181	*
CD	5.06	1	5.06	2	0.1787	
A ²	163.14	1	163.14	64.6	< 0.0001	* *
B ²	71.82	1	71.82	28.44	0.0001	* *
C ²	270.06	1	270.06	106.95	< 0.0001	* *
D ²	527.16	1	527.16	208.76	< 0.0001	* *
残差	35.35	14	2.53			
失拟项	32.6	10	3.26	4.75	0.0734	
纯误差	2.75	4	0.69			
总和	825.84	28				

$R^2 = 0.9572, R^2_{adj} = 0.9144$

注: **表示极显著($P < 0.01$); *表示显著($P < 0.05$)。

由表5可知,模型 $P < 0.0001$,模型达到极显著,说明模型设计合理;失拟 $P = 0.07344$ (> 0.05),说明此模型拟合度较好。通过显著性分析可知,回归模型的一次项 D 为显著($P < 0.05$),交互项 AC 表现为极显著($P < 0.01$),BD 表现为显著($P < 0.05$)。二次项 A²、B²、C²、D²均表现为极显著($P < 0.01$)。4个因素对绿豆玉米面烧饼加工工艺的影响程度大小的顺序为发酵温度(D) > 发酵时间(C) > 水温(B) > 水添加量(A)。

2.3 响应面交互作用分析

各因素交互作用对绿豆玉米面烧饼感官评分的影响如图5所示。响应曲面的曲线斜率愈大,对响应值的影响程度就愈大^[13]。在图5中,响应值即感官评分随着各因素添加量的增大均出现先增后降的变化,发酵时间和水添加量交互作用极为显著,发酵温度和水温交互作用比较显著。

2.4 最佳配方的确定与验证实验

采用 Design Expert 8.0.6 软件优化了本试验项目,结果表明绿豆玉米面烧饼的最佳工艺参数为:水添加量 77.5g、水温 32.1℃、发酵温度 33.2℃和发酵时间 42.6 min,在此条件下制作烧饼的感官评价得分为 95.6分,与预测值(95.8分)基本一致,这说明本试验项目较为可靠,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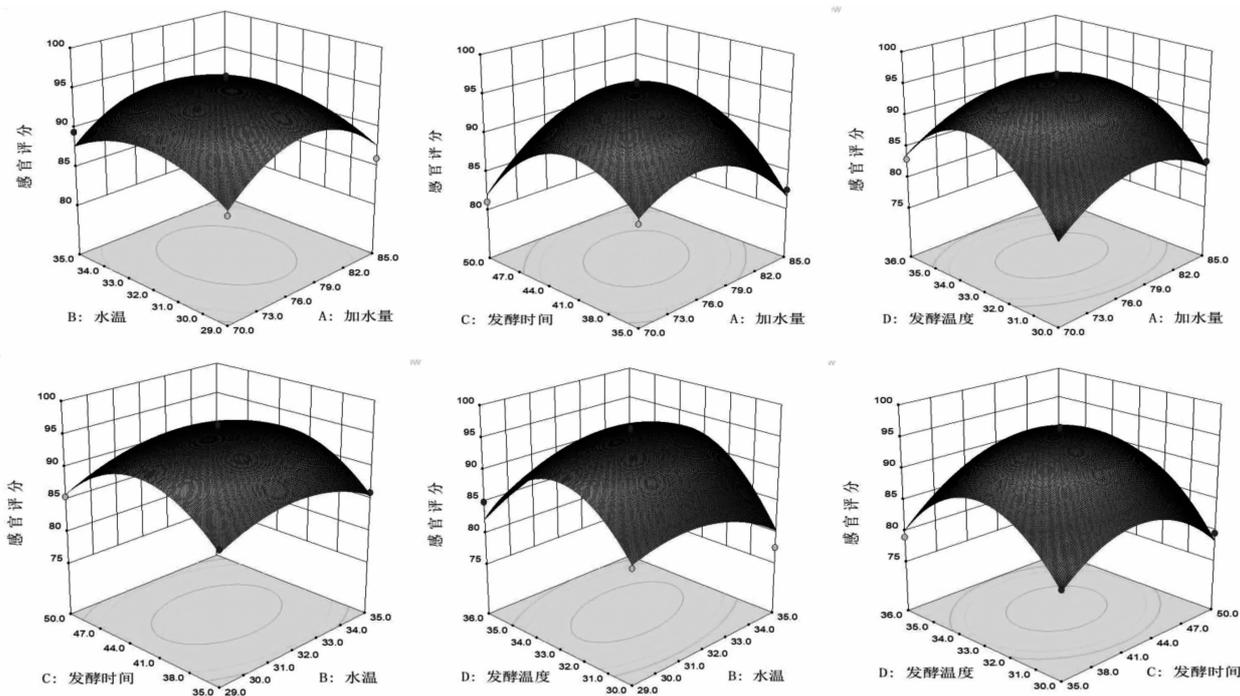


图5 各交互作用对绿豆玉米面烧饼感官评分影响的响应面图

3 结论

本实验在普通烧饼的制作工艺基础上,通过添

加绿豆面和玉米面两种杂粮,制作杂粮烧饼,进行工艺改良,以水添加量、水温、发酵时间和发酵温度为

改变量,进行单因素实验和响应面分析对制作工艺进行优化,以感官评价为依据,研究结果显示,4个因素对绿豆玉米面烧饼加工工艺的影响程度大小的顺序为发酵温度(D) > 发酵时间(C) > 水温(B) > 水添加量(A),绿豆玉米面烧饼的最佳工艺参数为水添加量 77.5 g、水温 32.1 °C、发酵温度 33.2 °C 和发酵时间 42.6 min 时,在此条件下制作烧饼的感官评价得分为 95.6 分,与预测值(95.8 分)基本一致,这说明本试验项目较为可靠,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使用此参数进行产品制作,得到的成品色泽金黄,口感优良,营养价值有所提升。

参考文献:

[1] 唐弢. “缙云烧饼”火了[J]. 食品界, 2021(10): 47-49.
[2] 邵万宽. 胡饼、烧饼、黄桥烧饼新探[J]. 美食研究, 2018, 35(3): 11-14+47.
[3] 刘泮华, 秦晓东, 齐鑫. 潍坊肉火烧的发展现状及未来展望[J]. 现代食品, 2020(6): 220-222.
[4] 贾彦杰, 申飞, 钱志伟, 等. 添加杂粮粉改善面包品质及营养特性分析[J]. 现代食品科技, 2020, 36(12): 204-212.
[5] 刘莹莹, 李嘉豪, 胡燕, 等. 蛹虫草玉米馒头加工工艺及品质[J]. 食品研究与开发, 2023, 44(11): 175-180.
[6] LI G H, WAN J Z, LE G W, et al. Novel angiotensin I-con-

verting enzyme inhibitory peptides isolated from Alcalase hydrolysate of mung bean protein [J]. Journal of Peptide Science, 2006, 12(8): 509-514.

[7] SOUCEK J, SKVOR J, POUCKOVA P, et al. Mung bean sprout (Phaseolus aureus) nuclear and its biological and antitumor effects [J]. Neoplasma, 2006, 53(5): 402-409.
[8] RANDHIR R, SHETTY K. Mung beans processed by solid-state bioconversion improves phenolic content and functionality relevant for diabetes and ulcer management [J]. Innovative Food Science & Emerging Technologies, 2007, 8(2): 197-204.
[9] 王文韬, 徐慧, 张蕴哲, 等. 绿豆多糖提取工艺优化及其功能特性[J]. 食品研究与开发, 2023, 44(6): 65-71.
[10] 杨末, 于雷, 赵安琪, 等. α -淀粉酶对绿豆面包品质的影响[J]. 粮食与油脂, 2018, 31(5): 31-34.
[11] 温娅晴, 张剑, 李雪杰, 等. 营养强化面条研究动态[J]. 粮食与饲料工业, 2022(3): 18-23.
[12] 耿志明, 蒋荣, 陈明. 面团配方及工艺条件对烧饼中丙烯酰胺形成的影响[J]. 中国食品学报, 2009, 9(4): 143-148.
[13] 吴婷, 刘思师, 陈仲巍, 等. 黑蒜多酚微波-超声波协同提取工艺优化及其抗氧化研究[J]. 特产研究, 2022, 44(4): 81-89, 95.

(责任编辑 吕志远)

Optimization of Mung Bean Corn Sesame Cake with Response Surface Methodology

LI Jianxin, CHEN Shujing, MIN Yutao, SUN Yuqing, ZHANG Xiaoyu
(School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Food Science,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nutritional quality of sesame cake, on the basis of single factor experiment, the odor, taste and structure of mung bean corn flour sesame cake were used as evaluation indexes, and the response surface method was used to optimize the original formula. The optimum technological parameters of mung bean corn flour sesame cake were as follows: flour 150g, corn flour 36g, mung bean flour 12g, water addition 77.5g, water temperature 32.1 °C, fermentation temperature 33.2 °C, fermentation time 42.6 min. Under these conditions, the sensory evaluation score of sesame cake was 95.6 points, which was basic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predicted value (95.8 points).

Key words: sesame cake; corn flour; green bean flour; single factor; response surface method

槲皮素/ β -环糊精包合物的制备及水溶性研究

赵春梅, 仝照岭, 王保玉, 李玉玲, 张玲丽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化工食品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为了改善槲皮素的水溶性,提高其生物利用度,采用溶液搅拌法制备了槲皮素/ β -环糊精包合物。通过对包合前后样品的红外光谱、X-射线衍射谱和核磁共振氢谱进行分析,证实了包合物的成功形成。考察了投料摩尔比、反应时间和反应温度对包合率的影响规律,在此基础上采用正交实验法对包合物的制备工艺进行了优化。实验结果表明,最佳工艺为投料摩尔比1:1、反应时间2.5 h、反应温度70℃,在此条件下所得的包合率最高,达到60.1%。极差分析表明,3个因素中的反应时间和反应温度的影响大于投料摩尔比。溶解度测试结果表明槲皮素/ β -环糊精包合物在水中的溶解度为392.4 $\mu\text{g}/\text{mL}$,与纯槲皮素相比提高了约81倍。

关键词:槲皮素; β -环糊精;包合物;制备工艺;水溶性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3.04.021

中图分类号:TS20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3)04-0120-05

槲皮素具有抗菌、抗炎、抗癌、抗氧化、抗风湿和神经保护等多种特性^[1-7],具有优异的抗氧化性,且广泛存在于各种植物中,常用做食品添加剂,不仅能延长食品的货架期,还能改善液态食品的稳定性^[8]。槲皮素与其他抗氧化剂联合使用,可表现出更高的抗氧化活性^[9]。槲皮素在水中的溶解度很小,且稳定性差,通过引入亲水基团,对槲皮素本身的分子结构进行修饰,可改善其水溶性^[9],但制备方法复杂,成本较高,不利于推广应用。

环糊精具有内部疏水、外部亲水的空腔结构,常作为主体分子与疏水性的客体分子结合,用于化学催化、药物缓/控释、分析检测、手性分离、食品、污染物吸附、分子识别等领域^[10-12]。由于环糊精表面有大量的羟基,因此具有较好的自组装^[13]和吸附性能^[14]。以环糊精为主体、槲皮素为客体制备槲皮素/ β -环糊精包合物,有望改善槲皮素的水溶性,提高其生物利用度。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槲皮素、 β -环糊精、无水乙醇,均为分析纯。

1.2 主要仪器与设备

TG16 台式离心机:上海卢湘仪离心机仪器有限公司;TU-1810 紫外-可见吸收光谱仪:北京普析通用仪器有限公司;D8 ADVANCE X 射线衍射仪:德国 Bruker 公司;Avanced III 核磁共振谱仪(400 MHz):德国 Bruker 公司;SDT Q600 同步热分析仪:美国 TA 公司;769YP-15A 红外专用压片机:天津科器高新技术公司;Alpha II 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德国 Bruker 公司。

1.3 实验方法

1.3.1 槲皮素/ β -环糊精包合物的制备

准确称取一定量的槲皮素于三颈烧瓶中,加入无水乙醇 10 mL,搅拌、加热,使固体溶解完全。称取一定量的 β -环糊精于烧杯中,加入 60% 的乙醇 50 mL,加热搅拌,使其完全溶解。将该溶液加入上

收稿日期:2023-06-15

基金项目: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22B150021);郑州市科技局基础研究及应用基础研究项目(zkz202113);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校科研启动项目(20190039)

作者简介:赵春梅(1982—),女,人,博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化工食品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无机纳米材料及有机-无机复合纳米材料的制备及性能。

述槲皮素溶液中,继续搅拌一定时间。反应结束后,用旋转蒸发仪除去溶剂,得到浅黄色固体。用无水乙醇洗涤、离心(7000 r/min, 15 min)多次,直至上清液变为无色。将固体放入50℃的烘箱中干燥3 h,即可得到槲皮素/ β -环糊精包合物。将上清液合并,用于紫外-可见吸收光谱测定。

1.3.2 表征方法

核磁共振氢谱测试:分别取适量的槲皮素、 β -环糊精和槲皮素/ β -环糊精包合物,溶解于氘代二甲基亚砜中,用400 MHz的核磁共振谱仪测试,得到槲皮素、 β -环糊精和槲皮素/ β -环糊精包合物的核磁共振氢谱。

X-射线衍射测试:分别取适量的槲皮素、 β -环糊精、槲皮素与 β -环糊精的物理混合物和槲皮素/ β -环糊精包合物,用X射线衍射仪在5~90°进行扫描,得到槲皮素、 β -环糊精和槲皮素/ β -环糊精包合物的X-射线衍射光谱图。

红外光谱测试:分别取适量的槲皮素、 β -环糊精、槲皮素与 β -环糊精的物理混合物和槲皮素/ β -环糊精包合物,加入适量的KBr,研细,再用红外专用压片机压片,用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在400~4000 cm^{-1} 范围内进行扫描,得到槲皮素、 β -环糊精和槲皮素/ β -环糊精包合物的红外光谱图。

1.3.3 标准曲线的绘制

用分析天平称取槲皮素0.0210 g于10 mL容量瓶中,加入无水乙醇溶解、定容,得到浓度为2.1 mg/mL的母液。用移液管吸取1 mL母液至50 mL的容量瓶中,用无水乙醇定容,即得到浓度为42 $\mu\text{g}/\text{mL}$ 的槲皮素溶液。再分别取1.5、2.5、3.5、4、4.5 mL浓度为42 $\mu\text{g}/\text{mL}$ 的槲皮素溶液于10 mL容量瓶中,用无水乙醇定容。得到浓度分别为6.3、10.5、14.7、16.8、18.9 $\mu\text{g}/\text{mL}$ 的标准溶液。用紫外-可见吸收光谱仪在200~600 nm范围内对以上5个样品进行扫描,得到紫外-可见吸收光谱。以槲皮素的浓度为横坐标,256 nm处的吸光度为纵坐标作图,并进行线性拟合,得到回归方程。

1.3.4 包合率的计算

包合物中槲皮素的包合率 $Y = [1 - (c \cdot V) / (m_0 \times 10^6)] \times 100\%$ 。其中 c 为根据回归方程计算的上清液中槲皮素的浓度, $\mu\text{g}/\text{mL}$; V 为上清液的体积, mL; m_0 为实验时投入的槲皮素的质量, g。

1.3.5 单因素实验

投料比对包合率的影响:保持其他条件不变, β -环糊精与槲皮素的摩尔比分别为1:1,2:1和3:1,按照1.3.1的方法制备包合物,计算包合率。

反应时间对包合率的影响:保持其他条件不变,反应时间分别为2、2.5和3 h,按照1.3.1的方法制备包合物,计算包合率。

反应温度对包合率的影响:保持其它条件不变,反应温度分别为60、70和80℃时,按照1.3.1中的方法制备包合物,计算包合率。

1.3.6 正交实验

在单因素实验的基础上设计正交实验,并分析各因素对包合率的影响能力的大小,从中选出制备包合物的最优条件。

1.3.7 溶解度测定

准确称取槲皮素0.0024 g于烧杯中,室温下分批多次向其中加入一定量的水,摇匀,直至槲皮素完全溶解,记录所用水的总体积。准确称取槲皮素/ β -环糊精包合物0.0072 g,用同样方法测定包合物在水中的溶解度。为了便于比较,对于槲皮素/ β -环糊精包合物,以溶解的包合物中槲皮素的含量为基准计算其溶解度。

包合物中槲皮素含量的计算式: $m = m_0 \cdot m_1 Y / m_2$, 单位:g。其中 m_1 为溶解的包合物质量, g; m_0 为制备包合物时投入的槲皮素的质量, Y 为包合率, m_2 为当次实验包合物的产量, g。

纯槲皮素在水中溶解度的计算式: $I_q = m_q / V_q$, 单位: $\mu\text{g}/\text{mL}$ 。其中 I_q 为槲皮素在水中的溶解度, m_q 为槲皮素的质量, μg ; V_q 为溶解槲皮素所用水的体积, mL。

包合物中槲皮素在水中溶解度的计算式: $I_c = m_c / V_c$, 单位: $\mu\text{g}/\text{mL}$ 。其中 I_c 为包合物中槲皮素在水中的溶解度, m_c 为溶解的包合物中槲皮素的含量, μg ; V_c 为溶解包合物所用水的体积, mL。

2 结果与分析

2.1 槲皮素/ β -环糊精包合物的制备

由于溶液搅拌法操作简单,包合率高,且槲皮素和环糊精在无水乙醇中都有一定的溶解度。所以,本文以无水乙醇为溶剂,用溶液搅拌法制备槲皮素/ β -环糊精包合物。投料比、反应时间和反应温度对产物的包合率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本文首先在投料比为1:1、反应温度为60℃的条件下反应2 h,制备槲皮素/ β -环糊精包合物,在此基础上考察实验条件对产物包合率的影响。

2.2 槲皮素/ β -环糊精包合物的表征

为了鉴定槲皮素/ β -环糊精包合物的结构,分别用核磁共振氢谱、红外光谱和X射线衍射谱对其进行表征。

2.2.1 核磁共振氢谱分析

槲皮素、 β -环糊精和槲皮素/ β -环糊精包合

物的核磁共振氢谱如图 1 所示。由图可以看出,包合后槲皮素在低场的峰消失了,这是因为槲皮素作为客体分子进入 β -环糊精的空腔后产生了屏蔽效应,由此可以证明槲皮素进入了 β -环糊精的空腔内,即槲皮素与 β -环糊精形成了包合物^[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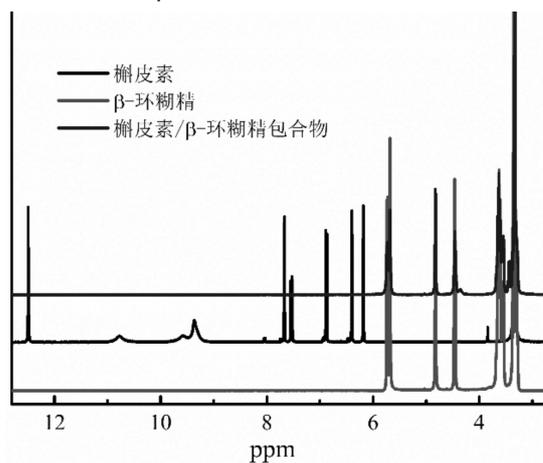


图 1 槲皮素、 β -环糊精和槲皮素/ β -环糊精包合物在 DMSO- d_6 中的核磁共振图谱

2.2.2 X-射线衍射分析

槲皮素、 β -环糊精、槲皮素与 β -环糊精的物理混合物和槲皮素/ β -环糊精包合物的 X-射线衍射光谱如图 2 所示。由图 2 可以清晰地看出,物理混合物的 X-衍射光谱仅仅是槲皮素与 β -环糊精峰的简单叠加,而包合物在 26.74、27.50 处归属于槲皮素的衍射峰消失了,这说明槲皮素和 β -环糊精物理混合时没有发生包合作用,而在槲皮素/ β -环糊精包合物中,槲皮素已经进入 β -环糊精的空腔中,即表明成功制备出了槲皮素/ β -环糊精包合物^[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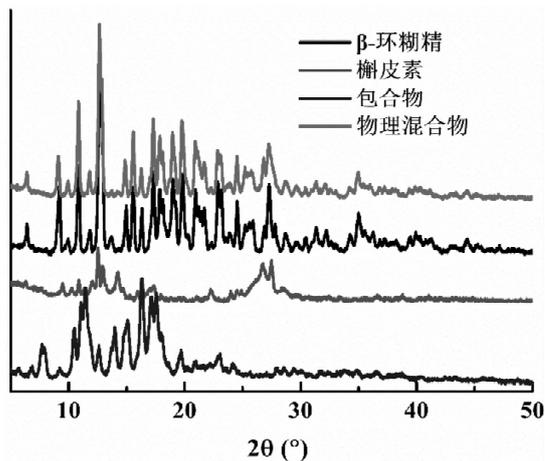


图 2 槲皮素、 β -环糊精、物理混合物和包合物的 X-衍射图谱

2.2.3 红外光谱分析

槲皮素、 β -环糊精、槲皮素与 β -环糊精的物

理混合物和槲皮素/ β -环糊精包合物的红外光谱如图 3 所示。由图 3 可以看出,物理混合物表现出槲皮素和 β -环糊精图谱的叠加。包合物在 1152 ~ 1640 cm^{-1} 范围的峰形与槲皮素的峰形完全不同,与 β -环糊精相似^[16]。这说明槲皮素进入环糊精的空腔内,即形成了槲皮素/ β -环糊精包合物。这与核磁共振氢谱、X 射线衍射谱结果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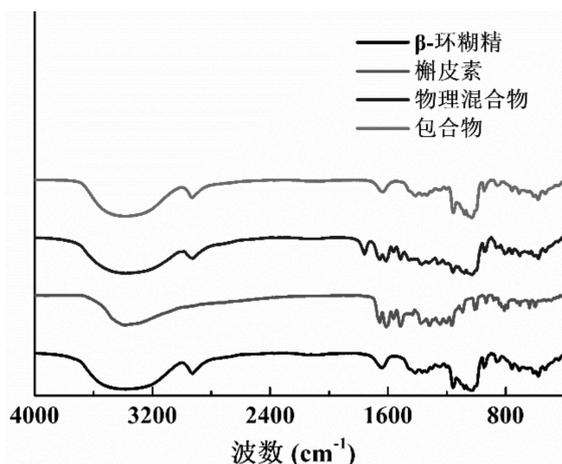


图 3 槲皮素、 β -环糊精、物理混合物和包合物的红外光谱图

2.3 槲皮素/ β -环糊精标准曲线的绘制

浓度分别为 6.3, 10.5, 14.7, 16.8, 18.9 $\mu\text{g}/\text{mL}$ 的槲皮素溶液的紫外-可见吸收光谱如图 4A 所示。由图 4A 可得知,在 256 nm 和 373 nm 处出现了最大吸收峰,在 256 nm 处的峰位重复性较好,因此选择 256 nm 处对应的吸光度作为纵坐标、槲皮素浓度为横坐标作图(图 4B)。通过线性拟合可得回归方程为。这说明槲皮素的吸光度在 6.3 ~ 18.9 $\mu\text{g}/\text{mL}$ 范围内与溶液浓度有良好的相关性,可用于计算槲皮素溶液的浓度。

2.4 影响槲皮素包合率的因素

2.4.1 投料摩尔比对包合率的影响

β -环糊精与槲皮素的摩尔比分别为 1:1, 2:1, 3:1, 由结果可知,随着投料摩尔比的增加,槲皮素的包合率逐渐降低,当槲皮素与 β -环糊精的摩尔比为 1:1 时包合率最高。这说明槲皮素/ β -环糊精包合物可能是以 1:1 的摩尔比形成的。

2.4.2 反应时间对包合率的影响

反应时间分别为 2, 2.5 和 3 h, 随着时间的增加,槲皮素的包合率呈现出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其中反应时间为 2.5 h 时的包合率最高。

2.4.3 反应温度对包合率的影响

反应温度分别为 60, 70 和 80 $^{\circ}\text{C}$, 随着温度的升高,槲皮素的包合率呈现出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其中反应温度为 70 $^{\circ}\text{C}$ 时包合率最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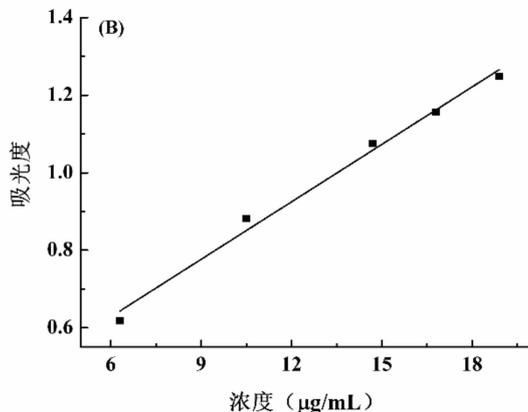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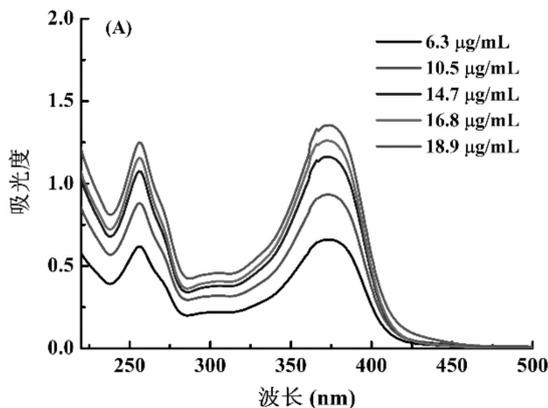


图4 槲皮素溶液的紫外-可见吸收光谱(A)和标准曲线(B)(溶剂:无水乙醇)

2.5 槲皮素/环糊精包合物的制备工艺优化

2.5.1 反应温度对包合率的影响

根据单因素实验结果,选取包合率最高的摩尔比、制备时间及反应温度设计 $L_9(3^3)$ 正交实验,正交因素水平和实验结果分别见表1和表2。

表1 槲皮素/ β -环糊精包合物制备条件优化正交实验因素水平

水平	因素		
	A 摩尔比	B 反应时间/h	C 反应温度/ $^{\circ}\text{C}$
1	1 : 1	2	60
2	2 : 1	2.5	70
3	3 : 1	3	80

表2 槲皮素/ β -环糊精包合物制备条件优化正交实验结果与分析

实验编号	因素			包合率/%
	A	B	C	
1	1	1	1	36.5
2	1	2	2	58.4
3	1	3	3	27.7
4	2	1	2	40.5
5	2	2	3	33.7
6	2	3	1	34.6
7	3	1	3	39.2
8	3	2	1	40.4
9	3	3	2	28.4
k_1	40.8	38.7	37.2	
k_2	36.3	44.2	42.4	
k_3	36.0	30.2	33.4	
R	4.8	14	9	
优方案	$A_1B_2C_2$			

由表5的极差分析可知,投料摩尔比、反应温度和反应时间3个因素对包合率的影响大小顺序为:反应时间 > 反应温度 > 投料摩尔比。由正交实验结果可知,制备槲皮素/ β -环糊精包合物的最优工艺条件为 $A_1B_2C_2$,即投料摩尔比为 1 : 1,制备时间为 2.5 h,制备温度为 70°C 。

2.5.2 验证实验结果分析

在最佳工艺条件下,即投料摩尔比为 1 : 1、反应时间为 2.5 h、反应温度为 70°C ,制备槲皮素/ β -环糊精包合物,包合率为 60.1%,是本文所有工艺

条件中最高的。

2.6 槲皮素/ β -环糊精包合物的水溶性

根据 1.2.7 中的方法测得,纯槲皮素与包合物在水中的溶解度分别为 $4.8 \mu\text{g/mL}$ 和 $392.4 \mu\text{g/mL}$ 。与纯槲皮素相比,包合物的溶解度提高了约 81 倍。表明槲皮素在水中的溶解度得到了明显改善,有望提高其生物利用度。

3 结论

通过溶液搅拌法制备了槲皮素/ β -环糊精包合物,并通过红外光谱分析、X-射线衍射光谱分析和核磁共振氢谱分析,对槲皮素/ β -环糊精包合物进行表征。结果表明,成功制备出了槲皮素/ β -环糊精包合物。通过正交实验法优化了制备工艺,最佳条件为槲皮素与环糊精的摩尔比为 1 : 1,包合时间为 2.5 h,温度为 70°C 。溶液度测试结果表明,槲皮素/ β -环糊精包合物在水中的溶液度比纯槲皮素提高了约 81 倍。

本文制备槲皮素包合物的方法简单易行,对实验设备要求较低,且包合产物的水溶性得到了较大改善,有利于提高槲皮素的生物利用度。

参考文献:

- [1] MOODI Z, BAGHERZADE G, PETERS J. Quercetin as a precursor for the synthesis of novel nanoscale Cu(II) complex as a catalyst for alcohol oxidation with high antibacterial activity [J]. Bioinorganic Chemistry and Applications, 2021, 2021: 1-9.
- [2] MARIJA L, IVANA B, NATASA S, et al. Antioxidant and anti-inflammatory activities of quercetin and its derivatives [J]. Journal of Functional Foods, 2018, 40: 68-75.
- [3] ZHENG J, XV H, HUANG C, et al. Quercetin protects against intestinal barrier disruption and inflammation in acute necrotizing pancreatitis through TLR4/MyD88/p38 MAPK and ERS inhibition [J]. Pancreatology, 2018, 18(7): 742-

- [4] TAO T, HE C, DENG J, et al. A novel synthetic derivative of quercetin, 8-trifluoromethyl-3,5,7,3',4'-O-pentamethyl-quercetin, inhibits bladder cancer growth by targeting the AMPK/mTOR signaling pathway[J]. *Oncotarget*, 2017, 8(42):71657-71671.
- [5] KADRI G, MÜZEYYEN D. Characterization and antioxidant activity of quercetin/methyl- β -cyclodextrin complexes[J]. *Current Drug Delivery*, 2016, 13(3):444-451.
- [6] GUAN F, WANG Q, BAO Y, et al. Anti-rheumatic effect of quercetin and recent developments in nano formulation[J]. *RSC Advance*, 2021, 11(13):7280-7293.
- [7] MESRAM N, NAGAPURI K, BANALA R, et al. Quercetin treatment against NaF induced oxidative stress related neuronal and learning changes in developing rats[J]. *Journal of King Saud University - Science*, 2017, 29(2):221-229.
- [8] ELMI N, GHANBARZADEH B, AYASEH A, et al. Physical properties and stability of quercetin loaded niosomes: stabilizing effects of phytosterol and polyethylene glycol in orange juice model[J]. *Journal of Food Engineering*, 2021, 296, 110463.
- [9] 辜艳. 水溶性槲皮素衍生物的合成[D]. 南京:南京理工大学, 2013.
- [10] FLORESTA G, TALOTTA C, GAETA C, et al. γ -Cyclodextrin as a catalyst for the synthesis of 2-methyl-3,5-diarylisoxazolidines in water[J]. *Journal of Organic Chemistry*, 2017, 82(9):4631-4639.
- [11] 沈海民, 纪红兵, 武宏科, 等. β -环糊精的固载及其应用最新研究进展[J]. *有机化学*, 2014, 34(8):1549-1572.
- [12] 徐晶, 刘欢, 夏光辉, 等. β -环糊精包埋柠檬醛微胶囊工艺优化及其缓释性能[J]. *食品科学*, 2014, 35(14):82-86.
- [13] JAFFER S, GHOSH P, DAS A, et al. Opening of DNA double helix at room temperature: application of α -cyclodextrin self-aggregates[J]. *Nanoscale*, 2010, 2(8):1420-1422.
- [14] ZOU Y, WANG X, AI Y, et al. β -Cyclodextrin modified graphitic carbon nitride for the removal of pollutants from aqueous solution: experimental and theoretical calculation study[J]. *Journal of Materials Chemistry A*, 2016, 4(37):14170-14179.
- [15] 杨永存, 马强飞, 石浩, 等. 核磁共振氢谱在 β -环糊精及其包合物研究中的应用[J]. *现代食品科技*, 2009, 25(4):439-443.
- [16] 李贇, 汪芳, 邹伟, 等. 槲皮素与6-O- α -D-麦芽糖- β -环糊精包合物的理化表征[J]. *食品科学*, 2016, 37(21):38-42.

(责任编辑 吕志远)

Study on the Preparation and Solubility of Quercetin/ β -Cyclodextrin Inclusion Complex

ZHAO Chunmei, TONG Zhaoling, WANG Baoyu, LI Yuling, ZHANG Lingli
(School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Food Science,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water solubility of quercetin, quercetin/cyclodextrin inclusion complex is prepared by solution stirring method, with β -cyclodextrin as host compound and quercetin as guest compound. The inclusion complex was characterized by Fourier transform infrared spectroscopy, X-ray diffraction spectroscopy and 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 hydrogen spectroscopy. The influences of material ratio, reaction temperature and reaction time on the inclusion ratio of quercetin/cyclodextrin were investigated carefully. And the reaction condition was optimized by orthogonal experimental method. The results display the highest inclusion ratio of 60.1% can be obtained under the condition of material ratio of 1:1, reaction temperature of 70°C and reaction time of 2.5 h. The water solubility of the inclusion compound is 81 times higher than that of pure quercetin.

Key words: quercetin; β -cyclodextrin; inclusion compound; preparation technology; solubility

鸭肉发酵菌株筛选及发酵工艺研究

冯冲,姚虹,陈红锦,乔书豪,郑绪文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化工食品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以鸭脯肉作为原料,以感官评分和pH值为指标,通过单因素和正交试验确定最佳菌株及发酵条件。结果表明,最佳条件为红曲霉菌和酿酒酵母菌的质量配比1:1、接种量0.06%、发酵时间8 h、发酵温度28℃。通过质构分析可知,鸭肉发酵产品比未发酵产品具有硬度低、胶着性高,咀嚼性稍高,黏性高、弹性低等特点,口感品质更好。

关键词:鸭脯肉;发酵;工艺条件优化;质构分析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3.04.022

中图分类号:TS26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3)04-0125-04

发酵鸭肉是一种经过腌制和发酵而成的产品,通过发酵,鸭肉的品质明显改善,更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1-2]。国外主要通过自然发酵和成熟干燥制成产品^[3],我国多采用天然发酵法,但由于其生产周期较长、卫生状况较差、成本较高、产量较低,且缺乏明确的品质衡量指标,人工接种技术逐步替代了早期的天然发酵。我国鸭肉加工尚处在从分割到深加工的过渡阶段,加工企业少,规模小,产品单一,加工水平尚不高^[4-6]。虽然熏鸭、盐水鸭和北京烤鸭制作前期需要腌制发酵,但多数是靠传统秘方和厨师经验来检验发酵的成熟与否,有无杂菌污染和菌群过量也是未知的^[7-8]。目前有关鸭肉发酵剂的研究报道较少,筛选适合鸭肉发酵的发酵剂迫在眉睫。优良的菌种不但可以产生良好的风味、色泽和抗菌素,还可以降解生物胺,减少亚硝酸盐的残留,同时还具备抗氧化、降胆固醇等功效^[9-10]。本文通过筛选优良鸭肉发酵菌株并优化其发酵工艺条件,以期获得优质的发酵鸭肉预制品,为鸭肉的系列深加工提供技术支持。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鸭脯肉: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红曲霉菌:福建屏湖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酿酒干酵母:

Lesaffre公司;乳酸菌: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根霉菌: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1.2 仪器与设备

LRH-150生化培养箱:上海一恒科学仪器有限公司;CT3质构仪:美国Brookfield公司;LCD-A200电子天平:福州华志科学仪器有限公司;IS128手持pH计:上海仪迈仪器科技有限公司;立式压力蒸汽灭菌锅:上海博讯医疗生物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1.3 方法

1.3.1 工艺流程

鸭脯肉→漂洗→腌制→添加发酵剂→发酵→烤制→冷却→检测→成品

1.3.2 pH值的测定

参照李超^[11]的方法,略加修改。取10 g样品,加入90 mL无菌水,破碎1 min,过滤后用手持pH计测定滤液的pH值。

1.3.3 质构的测定

测试类型为TPA质构分析,对样品的硬度、形变量、粘力、黏性、弹性等参数指标^[12]进行分析。探头NONE,夹具TA-SBA,测试距离目标13 mm,测试速度2 mm/s,返回速度2 mm/s,预测速度1 mm/s,负载单元10000 g。

收稿日期:2023-06-10

基金项目: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发酵鸭肉发酵剂的筛选及关键技术研究”(202111068045)

作者简介:冯冲(1970—),女,河南潢川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化工食品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发酵工程。

1.3.4 感官评定

用空气油炸锅把发酵好的鸭肉加工成成品,参考 GB 5009.44—2003《肉与肉制品卫生标准分析方法》,对鸭肉发酵产品的色泽、气味、硬度、弹性、滋味、口感等进行感官评定。参与感官评定的人员为 10 位不同年龄的人员和专家,评分标准见表 1。

表 1 发酵鸭肉感官评价评分标准

项目	评分标准	偏好	分值
气味	鸭肉香味强	好	16~20
	鸭肉香味较浓	较好	12~15
	鸭肉香味较弱,并伴有异味	一般	6~11
	酸腥味特强,甚至恶臭	差	0~5
	肉质鲜红,色泽均匀有光泽,颜色诱人	好	16~20
色泽	肉质较红,色泽较均匀有光泽	较好	12~15
	肉质暗红,色泽较均匀	一般	6~11
	暗红转褐色,无光泽,色泽不均	差	0~5
	组织形态	均匀完整,接受性好	好
均匀完整,接受性较好		较好	12~15
较均匀完整,接受性一般		一般	6~11
不均匀,接受性差		差	0~5
口感		口感好,很嫩,咀嚼性好	好
	口感较好,较嫩,咀嚼性较好	较好	12~15
	偏烂或偏硬	一般	6~11
滋味	无嚼劲或过硬	差	0~5
	肉味醇厚,鲜美	好	16~20
	肉味较正,鲜味不足	较好	12~15
	清淡,无特殊异味	一般	6~11
	无鲜味,有异味	差	0~5

1.3.5 正交试验设计

以感官评分、pH 值为评价指标,以单因素试验结果为依据,按照 Minitab17.0 处理系统 $L_9(3^4)$ 的正交试验设计方法,选取 3 种不同的水平进行试验并对其结果进行极差分析,以接种量(A)、菌种配比(B)、发酵温度(C)、发酵时间(D)作为 4 个考察因素进行研究,确定最优发酵工艺条件。正交试验因素水平设计见表 2,使用 Excel 2021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表 2 正交试验因素水平

水平	因素			
	A 接种量/%	B 菌种配比	C 发酵温度/°C	D 发酵时间/h
1	0.05	1:1	26	4
2	0.06	2:3	28	6
3	0.07	3:2	30	8

2 结果与分析

2.1 最佳发酵剂的选择

分别向鸭肉料中加入质量百分比为 0.05% 的红曲霉菌、根霉菌、乳酸菌、酿酒酵母菌,在 28°C 下进行发酵,发酵时间为 6 h,对成品进行感官评分和 pH 测定,结果见图 1。

由图 1 可看出,相比对照组,发酵鸭肉均可提高鸭肉口感质量,其中用红曲霉菌和酿酒酵母菌发酵鸭肉感官评分值最高为 84 分,其 pH 值分别为 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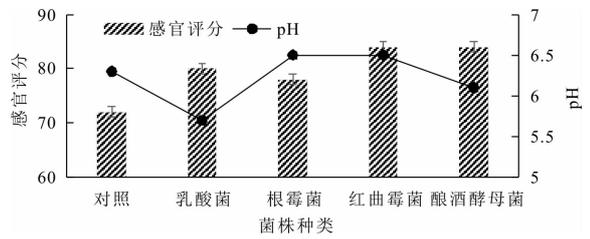


图 1 不同菌种对发酵鸭肉品质的影响

和 6.1,红曲霉菌发酵 pH 升高,酵母菌发酵 pH 稍降低。乳酸菌发酵鸭肉 pH 最低值为 5.7,其感官评分为 80 分。

2.2 菌种比对发酵鸭肉品质的影响

根据 2.1 优化结果,采用红曲霉菌和酿酒酵母菌的混合发酵,将红曲霉菌与酿酒酵母菌的质量百分比设为 2:1,3:2,1:1,2:3,1:2,混合均匀接种到鸭肉中,发酵温度 28°C,发酵时间 6 h,结果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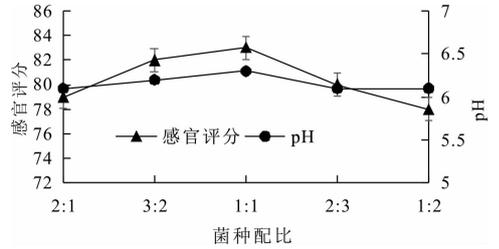


图 2 菌种比对发酵鸭肉品质的影响

由图 2 可以看出,随着比例的增大,感官评分明显下降,pH 值也随之下降。当菌种比例为 1:1 时,感官评分最高为 83 分,pH 值为 6.3,当菌种比例为 1:2 时,感官评分显著降低,大概是酵母菌比例过大,发酵产生二氧化碳过多,使 pH 降低,影响鸭肉的口感。因此,选用 1:1 的菌种配比是最优的。

2.3 接种量对发酵鸭肉品质的影响

根据 2.2 优化结果,采用红曲霉菌和酿酒酵母菌的混合发酵,将质量百分比设为 1:1,混合均匀加入鸭胸肉中,接种量分别为 0.04%,0.05%,0.06%,0.07%,0.08%,发酵温度 28°C,发酵时间 6 h,结果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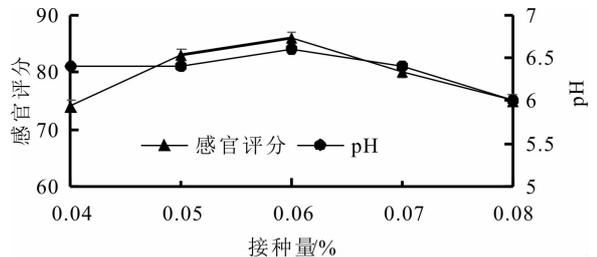


图 3 接种量对发酵鸭肉品质的影响

由图 3 可以看出,随接种量的增大感官评分和 pH 值先上升后下降,当接种数量为 0.06% 时,得分最高为 86 分。可能是由于发酵过程中随接种量的

添加产生的风味物质也在增加,从而提高了发酵鸭肉的口感和质量。当接种量过大时,酵母菌发酵产生的二氧化碳过量,从而导致了 pH 偏低。综合感官评分和 pH 值,以 0.06% 的接种量为最佳。

2.4 发酵温度对发酵鸭肉品质的影响

根据上述优化结果,采用接种量 0.06%,红曲霉菌与酿酒酵母菌的比例 1:1,分别在 22,24,26,28 和 30℃ 的温度下,发酵 6 h,结果如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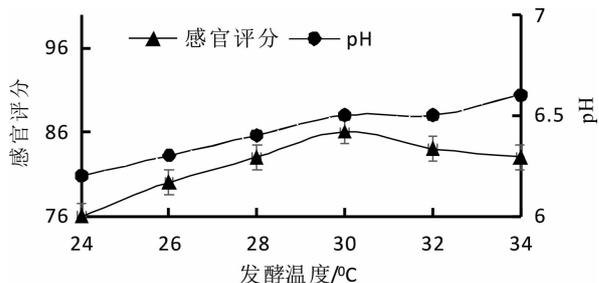


图 4 发酵温度对发酵鸭肉品质的影响

从图 4 可以看出,感官评分随发酵温度的增加而增加,pH 也在上升,因为温度越高,发酵越快,产生的发酵产物也就越多,所以发酵鸭肉的口感品质就更好。因此选取发酵温度 30℃ 为最适条件。

2.5 发酵时间对发酵鸭肉品质的影响

选取上述最优条件,接种量 0.06%、红曲霉菌-酿酒酵母菌菌种配比 1:1、发酵温度 28℃,分别发酵 2,4,6,8 和 10 h,结果如图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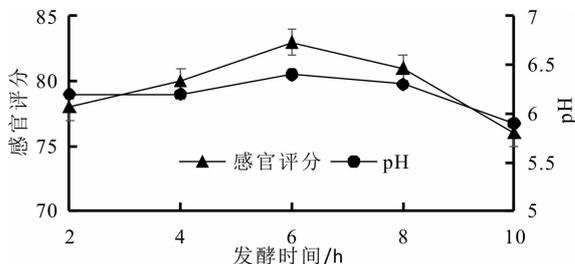


图 5 发酵时间对发酵鸭肉品质的影响

由图 5 可看出,随着发酵时间的不断延长,感官评分逐渐增大,发酵 6 h 后,感官评分最高为 83 分,此时的 pH 也是最高为 6.4。在 2~4 h 内 pH 值差异不大,可能是由于发酵初期发酵时间过短,发酵未完全进行,未形成较好的香味,之后发酵的时间的增加,红曲霉菌和酿酒酵母菌相互作用,从而得到了良好的风味物质。6 h 后,发酵的时间逐渐增加,感官评分却逐渐降低,这可能是由于发酵时间太长,产生的二氧化碳等物质积累使其味道变差。因此选择发酵时间 6 h 是最佳的。

2.6 正交试验结果

以感官评分、pH 为评价指标,以单因素试验结果为依据,以鸭肉为原料,采用正交设计的方法进行

试验研究。正交试验结果见表 3,感官评分方差分析见表 4,验证试验结果见表 5。

表 3 正交试验结果

试验号	A 接种量/%	B 菌种配比	C 发酵温度/°C	D 发酵时间/h	感官评分	pH
1	1(0.05)	1(1:1)	1(26)	1(4)	76.2	6.2
2	1	2(2:3)	2(28)	2(6)	80.3	6.4
3	1	3(3:2)	3(30)	3(8)	81.6	6.2
4	2(0.06)	1	2	3	85.1	6.3
5	2	2	3	1	76.6	6.4
6	2	3	1	2	80.8	6.5
7	3(0.07)	1	3	2	83.4	6.2
8	3	2	1	3	84.5	6.2
9	3	3	2	1	82.1	6.5
感官 k_1	79.37	81.57	80.50	78.30		
k_2	80.83	80.47	82.50	81.50		
k_3	83.33	81.50	80.53	83.73		
评分 R	3.96	1.10	2.00	5.43	D > A > C > B	
k_1	6.27	6.23	6.30	6.37		
k_2	6.40	6.33	6.40	6.37		
k_3	6.30	6.40	6.27	6.23		
pH R	0.13	0.17	0.13	0.14	B > D > A, C	

表 4 感官评分的方差分析

来源	自由度	Adj SS	Adj MS	F 值
A 接种量/%	2	24.14	12.07	1.22
B 菌种配比	2	2.28	1.14	0.12
C 发酵温度/°C	2	7.87	3.93	0.40
D 发酵时间/h	2	44.75	22.37	2.27
误差	0	*	*	
合计	8	79.036		

表 5 验证试验结果

指标	$A_2B_1C_2D_3$	$A_3B_1C_2D_3$	$A_1B_1C_3D_3$
感官评分	83.2 ± 2	82.8 ± 2	79.8 ± 2
pH	6.2 ± 0.2	6.3 ± 0.2	5.8 ± 0.2

由极差分析可知各因素对发酵鸭肉感官评分影响程度为 D > A > C > B,结果表明,影响最大的是发酵时间,接种量、发酵温度次之,菌种配比的影响最小,最优因素组合为 $A_3B_1C_2D_3$ 。极差分析各因素对发酵鸭肉 pH 影响结果表明,菌种配比及发酵时间对产品的影响较大,为了得到较低 pH,选取最优因素组合为 $A_1B_1C_3D_3$ 。对上述 $A_3B_1C_2D_3$ 和 $A_1B_1C_3D_3$ 与表 4 中感官评分最高和 pH 值较小的 $A_2B_1C_2D_3$ 进行验证试验,结果如表 5 所示。由表 5 可知, $A_2B_1C_2D_3$ 组的感官评分最高,另外, $A_2B_1C_2D_3$ 组的 pH 值介于 $A_3B_1C_2D_3$ 组和 $A_1B_1C_3D_3$ 组之间,其发酵产品不仅有利于保存,而且也不会因为过酸影响口感。因此最后确定 $A_2B_1C_2D_3$ 为最优工艺方案,即红曲霉菌和酿酒酵母菌的菌种配比 1:1,发酵温度 28℃,接种量 0.06%,发酵时间 8 h。

2.7 发酵鸭肉质构测定结果

发酵鸭肉质构测定结果见图 6。由图 6 可知,

鸭肉经过发酵后可明显降低第一循环硬度,第一循环硬度越低,鸭肉纤维较细,肉质嫩,更易消化吸收。经发酵后胶着性明显升高,可能是因为发酵过程中大分子有机物质被分解成小分子,发酵后咀嚼性有所提高,可提高鸭肉口感,同时也有利于消化吸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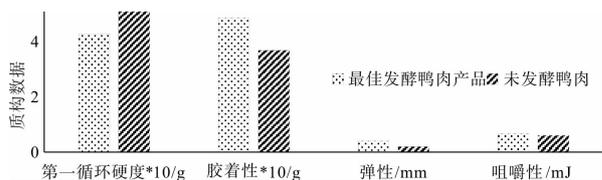


图6 发酵剂对鸭肉质构数据的影响

3 结果与讨论

通过单因素和正交试验确定鸭脯肉的最佳发酵菌株及发酵工艺条件。(1)最佳菌株:红曲霉菌和酿酒酵母菌混合配比为1:1。(2)最佳发酵工艺条件:接种量0.06%,发酵时间8h,发酵温度28℃。(3)通过质构分析得出:鸭肉发酵产品比未发酵产品具有硬度低、胶着性高、咀嚼性稍高、黏性高、弹性低等特点,品质更好。

菌种在混合发酵过程中产酶量、产酸量、亚硝酸盐和有毒物质的检测,以及在发酵过程中鸭肉各营养成分的变化、香气成分的变化等有待继续研究。

参考文献:

[1] 龙强, 聂乾忠, 刘成国. 发酵肉制品功能性发酵剂研究现状[J]. 食品科学, 2016, 37(17): 263-269.
 [2] 南庆贤. 肉类工业手册[M].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3: 366.
 [3] CORRAL S, BELLOCH C, LÓPEZ - DíEZ J J, et al. Yeast inoculation as a strategy to improve the physico - chemical

and sensory properties of reduced salt fermented sausages produced with entire male fat[J]. Meat Science, 2017, 123: 1-7.

[4] 王梦曼, 韦彦安, 孙京新, 等. 植物乳杆菌发酵鸭肉品质研究[J]. 肉类工业, 2021(3): 49-58.
 [5] 李沅达, 邓秀娟, 吴婷, 等. 红曲霉发酵食品研究现状与分析[J]. 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 2022, 13(3): 688-696.
 [6] 阮一凡, 潘道东, 孙杨赢, 等. 混菌发酵鸭腿工艺优化及其贮藏品质特性[J]. 食品科学, 2020, 41(10): 101-109.
 [7] LIU X, CAO G, ZHOU J, et al. The effects of Bacillus coagulans - fermented and non - fermented Ginkgo biloba on abdominal fat deposition and meat quality of Peking duck[J]. Poultry Science, 2017, 96(5): 1517.
 [8] 叶翠, 张香美, 卢涵, 等. 肉制品发酵剂研究现状与趋势[J]. 食品科技, 2019, 44(12): 290-294.
 [9] LIU P, WANG S, ZHANG H, et al. Influence of glycated nitrosohaemoglobin prepared from porcine blood cell on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microbial growth and flavour formation of Harbin dry sausages[J]. Meat Science, 2019, 148: 96-104.
 [10] 牛沁雅, 魏可君, 张慧琴, 等. 新型肉制品研究进展[J]. 食品研究与开发, 2018, 39(4): 207-212.
 [11] 李超, 王乃馨, 陈尚龙, 等. 混菌发酵制备鸭肉香肠的工艺优化及其氧化控制研究[J]. 中国调味品, 2016, 41(1): 25-29.
 [12] 张秋会, 宋莲军, 黄现青, 等. 质构仪在食品分析与检测中的应用[J]. 农产品加工, 2017(24): 52-56.

(责任编辑 吕志远)

Screening of Duck Fermentation Strains and Study on Fermentation Technology

FENG Chong, YAO Hong, CHEN Hongjin, QIAO Shuhao, ZHENG Xuwen

(School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Food Science,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Using duck breast meat as raw material, sensory score and pH value as indexes, the optimal strains and fermentation conditions were determined by single factor and orthogonal tes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atio of *Monascus* and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 was 1:1 (W/W), the inoculation amount was 0.06%, the fermentation time was 8 h and the fermentation temperature was 28℃. The results of texture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fermented duck had lower hardness, higher stickiness, higher chewiness, higher viscosity, lower elasticity and better taste quality than the unfermented duck.

Key words: duck breast; fermentation; optimization of process conditions; texture analysis